黑金译丛

大麻的疯狂

Reefer Madness

美国黑市中的性、毒品以及廉价劳工

SEX, DRUGS AND CHEAP LABOR IN AMERICAN BLACK MARKET

〔美〕艾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 著

王青山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大麻的疯狂》第一次报道了美国的非法劳工、大麻和色情行业的历史和现状，以前美国几乎没有主流的文章和报道涉及上述内容。在21世纪初，如果有人支持非法毒品的论调，那么就等于在美国社会制造了许多的敌人，而作者却大无畏地直捣这一软肋，直面毒品、非法移民以及色情的问题。这本书不仅仅是娱乐或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一部新闻纪实，是一部能使读者耳目一新的报道文学。

Reefer Madness 大麻的疯狂

http://www.ssap.com.cn



ISBN 7-80230-158-0/D · 017
定价：29.00元



黑金译丛

大麻的疯狂

美国黑市中的性、毒品以及廉价劳工

Reefer Madness

Sex, Drugs And Cheap Labor in American Black Market

〔美〕艾里克·施洛瑟 著 ○ 王青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麻的疯狂：美国黑市中的性、毒品以及廉价劳工/〔美〕艾里克·施洛瑟著；王青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9

（黑金译丛）

ISBN 7－80230－158－0

Ⅰ．大…　Ⅱ．①艾…　②王…　Ⅲ．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Ⅳ．D7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368 号

·黑金译丛·

大麻的疯狂
——美国黑市中的性、毒品以及廉价劳工

著　　者／〔美〕艾里克·施洛瑟
译　　者／王青山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6526996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85117871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编辑／金　烨
责任校对／阿　宝
责任印制／盖永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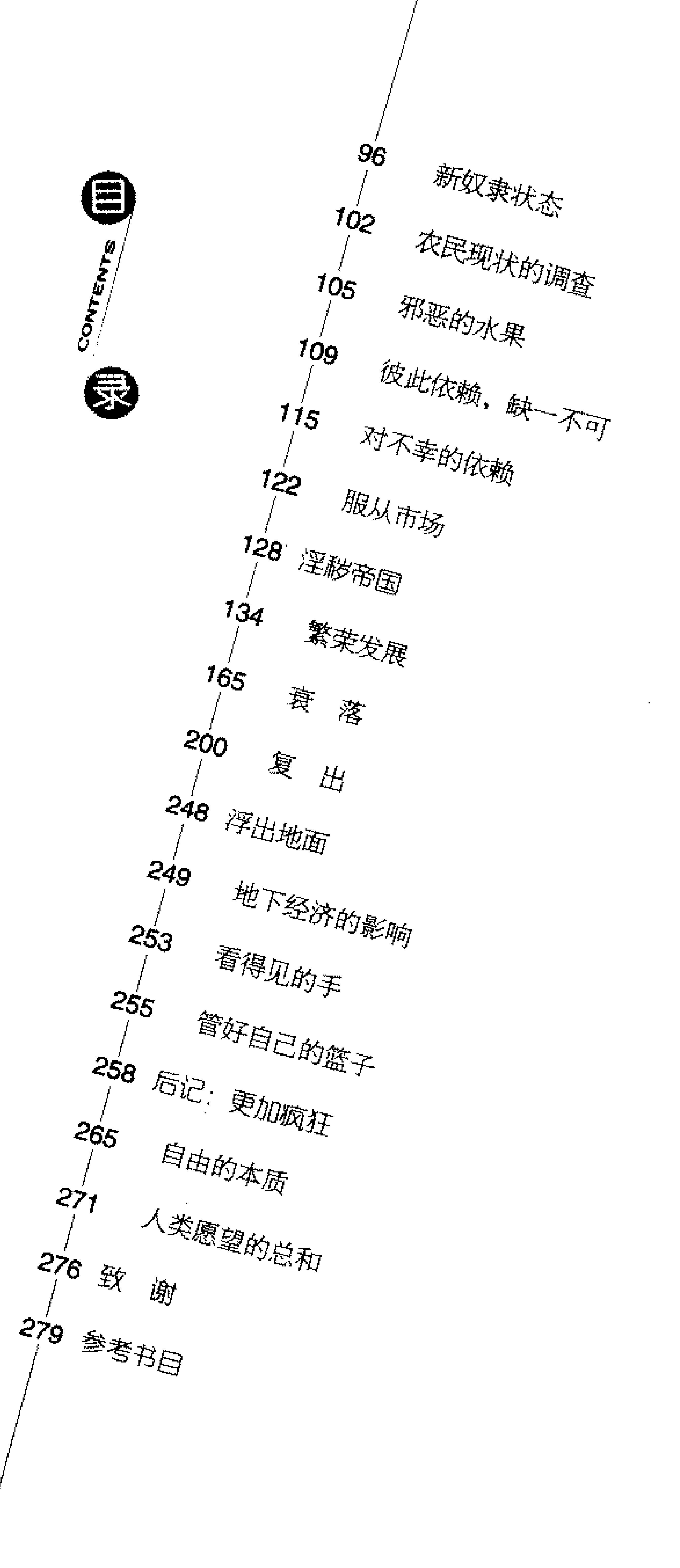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6528553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8.5　字数／214 千字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30－158－0/D·01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5－4557 号
定　　价／2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地下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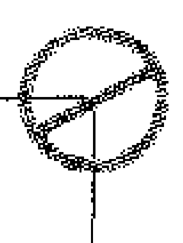
亚当·斯密坚信上帝是仁慈、睿智和无所不能的，这位伟大的自由市场理论家笃信上帝，他曾经说过："人类的幸福似乎是

* 尽管我为了这本书做了大量的报告和研究，可是我从其他人的著作中也受益匪浅，我会在注释中尝试把荣誉归功于那些曾经帮助我的人们，他们的思想、著作和研究成果对我的帮助很大。多年来，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和哲学理论已经有了许多的解释，罗伯特·L.海尔布龙纳（Robert L. Heibroner）的《基本的亚当·斯密》（*The Essential Adam Smith*）是一本介绍这位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学家的入门读物。在《经济学的情感：亚当·斯密、康道塞与启蒙运动》（*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一书中，艾玛·罗思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对"看不见的手"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文化历史问题，她指出亚当·斯密的这个著名的措辞是"一个略微带有讽刺意义的玩笑"，而且斯密的这句名言在他的世界观中从来就没有起到一个主要作用。可是我不同意她的某些观点，罗思柴尔德还似是而非地宣称，斯密借用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对白，《麦克白》中的主角乞求黑暗"用你血腥的和看不见的手"隐藏他邪恶的罪行。至于亚当·斯密对美国开国之父们的影响，我从彼得·麦克纳马拉（Peter McNamara）的《政治经济与政治才能：斯密、汉密尔顿与商业共和国的建立》（*Political Economy and Statesmanship: Smith, Hamilt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ercial Republic*）一书中学到了很多，我对亚当·斯密哲学的许多解释主要都是基于彼得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他不断修正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感理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和《国富论的本性与动机调查》（*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陈述得非常清楚。

在过去的25年里，有许多关于地下经济的著作纷纷出台，（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它们绝大部分都非常吸引人，但是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晶。维托·坦齐（Vito Tanzi）主编的《美国国内外的地下经济》（*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对这个主题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坦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财务事务部门的主管，也是地下经济领域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他相信高税赋和过多的政府规则不仅应该对影子经济负责，而且，它们也造成了许多其他的社会疾病。他发表的两篇论文《解密逃税》（*A Primer on Tax Evasion*）（见1993年12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论文集）和《全球腐败：成因、结果、范围和解决方法》（*Corruption Around the World: Causes, Consequences, Scope, and Cures*）（见1998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论文集）使我对逃税和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有其他许多的书籍，在《地下经济的上升》（*The Rise of the Underground*）中，菲利普·马泰拉（Philip Mattera）令人诚服地指出，低工资、违反规定和高失业率也是影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欧文·利珀特和麦克尔·沃克（Owen Lippert and Michael Walker）合著的《地下经济：其规模和影响的全球显现》（*The Underground Economy: Global Evidence of Its Size and Impact*）是一本具有启迪作用的评论集。哈里·I. 格林菲尔德（Harry I. Greenffield）在《无形、非法且不缴税：美国的地下经济》（*Invisible, Outlawed, and Untaxed: America's Underground Economy*）一书中，用几章的篇幅对地下经济中的货币和犯罪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他文章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例如，1998年德国波恩市劳工研究研究院发表的、由多米尼科·恩斯特和弗里德里希·施奈德（Domonik Enste and Friedrich Schneider）合写的第26号讨论论文《全世界渐增的影子经济——虚构抑或事实?》（*Increasing Shadow Economies All Over the World - Fiction or Reality?*）；2002年德国波恩市劳工研究研究院发表的、由弗里德里希·施奈德写的第514号探讨论文《22个过渡性国家和21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影子经济规模与发展》（*The Siz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dow Economies of 22 Transition and 21 OECD Countries*）；2000年春天，马修·H. 弗莱明、约翰·罗曼和格雷厄姆·法瑞尔（Matthew H. Fleming, John Roman and Graham Ferrell）在《国际事务》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上发表的《影子经济》（"*The Shadow Economy*"）；以及亚伊尔·埃拉特和克里福德·齐恩尼兹（Yair Eilat and Clifford Zinnes）于2002年在《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上发表的《过渡性国家中的影子经济：敌或友？政策视角》（"*The Shadow Econom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Friend or Foe? A Policy Perspective*"）。

三年多来，彼得·罗伊特（Peter Reuter）一直用经济理论去理解非法市场的工作方式，他曾经帮助创立了兰德（RAND）公司的毒（转下页注）



上帝安排的最初目的"，你既不能在圣经里也不能在奇迹中发现上帝的运作方式，但是每天你都可以在市场上，从那些再简单不过的商品交易中发现上帝的存在。每一次的交易可能都是由个人的意愿驱动的，但是，隐藏在身后的无不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制定着商品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它决定着供求关系，它体现出来的是所有人的愿望总合。自由市场在没有人为干涉的情况下，促进了农业和工业，创造了过剩的财富，保证生产出人们想要购买的商品。斯密认为，人类缺乏足够的智慧，不能透过一些精细的计划去刻意完善社会并且取得进步，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追崇自己的利己心，并且只遵循他的"热情"，那么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一定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获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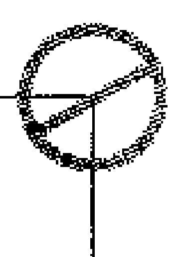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后来对这个国家的诞生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上帝赋予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的理念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里又添加了著名的短语——"生命、自由和财产。"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封建制度和贵族制度的国家，代之以共和国和市场的理念。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后，许多

（接上页注*）品政策研究中心，他现在担任马里兰大学的公共事务学院以及马里兰大学犯罪学和犯罪审判学系的教授。罗伊特教授在《无组织犯罪：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Disorganized Crime: The Economics of the Visible Hand*）中，强调了竞争在黑市形成中的作用，揭穿了一些关于黑手党集团受欢迎的神话。我也非常感谢他多年来解答了我的很多问题，以及对书中关于黑社会部分的复查，而本书中残留的一些过失完全都是我的错误造成的。罗伊特和罗伯特·J.麦科考恩合著的新书《毒品战异端：从其他地方、时代和缺陷而来的知识》（*Drug War Heresies: Learning from Other Places, Times, and Vices*）是学识和常识的完美结合。

著名的美国公司，例如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埃克森石油、微软、沃尔玛、波音等公司，它们每年的收入都超过了许多主权国家的年收入。世界上没有一种比美元更强势的货币，华尔街的收盘价指导着东京、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股市的价格，这个难出其右的巨大财富使美国能够建立起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可是，在美国经济里还有许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除了那些著名公司和品牌，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制造了大量的无形经济，也就是不公开的而且隐藏得很好的无形经济，这个经济有自己的劳工需求、价格体系以及各类商品。

“黑暗”、“影子”、“不正规”、“不正常”、“隐秘的”、“地下的”——各种各样的形容词都用于描述这个另类经济。尽管有各种方式的定义，但是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指没有论著涉及的美国地下经济行为，没有记录在案和未经报道的、当然也是违法的商业行为。这些经济行为覆盖的范围从极其普通的行为（例如，一名电工要求用现金作为报酬，而不去做收入申报）到犯罪行为（例如一名黑帮成员的贩毒行为），它们还包括第二职业、空白支票、出售赃物、街头贩卖、逃税、使用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人和童工、开办血汗工厂和廉价商店、走私香烟、出售枪支、非法移民、出售名牌假手表以及盗刻 CD 等等。经济学家在评估地下经济的实际规模和如何衡量方面还存在分歧，一些研究关注申报收入税时的个人收入与实际花费的差额，而另一些研究则调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货币的周转率以及用电量的水平。虽然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各有所长，但是其研究结果还是有争议的。不过，大家有两点共识：美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巨大，而且主要是在过去的30 年里发展起来的。

所有对非法经济行为的评估都不够精确，因为这些评估都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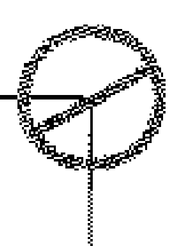


图量化那些被人为地、小心谨慎地隐藏起来的数据，不过，最佳的评估可以使我们大概了解地下经济的规模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1997 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施奈德通过跟踪对货币需求的变化计算出美国“影子经济”的规模。据施奈德的统计结果，1970 年地下经济的规模大概是美国 GDP 的 2.6% 到 4.6% 之间，到 1994 年，地下经济占美国 GDP 的 9.4%，高达 6500 亿美元。1998 年，美国国税局（IRS）的委员查尔斯·罗索蒂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告诉国会，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人该交而没有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款大约是 2000 亿美元，这个数目超过了政府每年在医疗保障上的投入，换句话说，假设联邦平均税率是 14% 的话，那么美国人隐瞒的、没有申报的个人收入就高达 15000 亿美元，而美国国税局的评估还没有涉及那些犯罪行为带来的收入。

在美国现代史上曾经有两个地下经济的繁荣时代。从1920～1933 年，政府的禁酒令导致私酒交易的蔓延和有组织的犯罪，在实施禁酒令最严厉的期间，美国人一年酒的花费就接近 50 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 540 亿美元），这个黑市市值在那时大约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5%，而当禁酒令结束后，一些酿私酒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备受尊敬的商人。二次大战期间，严格实施的配给制和价格控制体系创建了更大的黑市，一个用来公平派发匮乏商品的系统却产生了一些未曾预料的结果：配给制派生出来的交易和一种隐藏现金的经济模式。那时大约 5% 的汽油和 20% 的肉类产品的交易是非法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人的个人收入至少漏报 15%。后来，地下经济在艾森豪威尔的繁荣年代衰败了，那段时间工资增加、逃税下降，而且没有一种像私酒那样经过买卖就会产生巨额利润的非法

商品。随后，1960年代中期到末期，地下经济又开始复苏，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认为，国家的高税收和过多的政府干涉条例是地下经济复苏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者则声称里根时期的低工资、失业和商业违规应该对地下经济负有更多的责任。而这两派的观点并不矛盾，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大环境使得许多美国人涉及到地下经济。1960年代的嬉皮文化和1970年代末的反对税收运动异曲同工，都表达了对政府的厌恶感并且鼓励对美国国税局的挑战或轻视。一个全新的毒品文化也给有组织犯罪带来了机会。过去30年里，美国地下经济的膨胀不仅仅源于经济的窘境以及对非法收入的渴望，也是对政府逐步加剧的疏远和愤怒的表现，也是对法律的蔑视。

大约在同一时期，这种类似的现象在西方工业社会也非常普遍，欧盟的地下经济也许比美国还要严重，多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高税率，非法移民以及对政府的普遍失望已经造就了巨大的地下经济。按照弗里德里希·施奈德的估计，这些影子经济在英国可以达到GDP的12.5%，而在意大利大约是GDP的27%。那些曾经属于前苏联的国家甚至拥有更大规模的黑市，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大约占GDP的45%，乌克兰的黑市可以接近GDP的51%。地下经济在这些过渡状态的经济体中有时也会成为非常活跃的积极因素，使得该经济体中政府很少干预的、自主经营的自由企业最终得以蓬勃发展。但是，从多个方面上讲，发展中国家的黑市发展代表了退步，地下经济的扩张通常与增加腐败和加大贫富差距紧密相关。多年以来，许多前苏联的党政要员都从"第二产业"中获益匪浅，他们可以向客户提供那些主流市场不能得到的服务和商品。目前，最大的地下经济都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腐败的并置法律不顾的国家，例如玻利维



亚的地下经济大约占其 GDP 的 65%，而尼日利亚的地下经济可能占其 GDP 的 76%。

如今，美元是全球地下经济的通用货币。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流通的货币量比普通市民日常使用的货币量大得多，这一发现第一次表明地下经济在美国已经浮出水面。虽然，商业报告展示了无现金且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可是，钞票的使用量却悄声无息地升高了。由于美元的高面值以及相对的稳定性，不仅在美国，全球也是如此，面额为 100 美元的钞票很快就成为地下经济的首选货币。1970 年代末，每年平均大约有 20 亿美元的现金从美国流向国外，到 1990 年代，每年大约有 200 亿美元的现金转到国外。目前，大约有 3/4 的 100 元面额美元现钞在美国之外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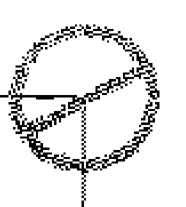
美元在全球地下经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实惠。美国美元现金的外流基本上可以是一种无息贷款，美国财政部每次发行新钞票的时候，它都会购买等量的、有息的有价证券，而当清算这些有价证券的时候，那些钞票必须退出流通市场并存入银行，在 2000 年，财政部就从海外流通的钞票中赚取了大约 320 亿美元。1996 年重新设计的新版百元美钞就是因为政府多少有些对中东假币制造者制造出来的近乎逼真的 100 元假币的恐惧，也担心这个“极品”会威胁到美元作为非官方货币的地位。其实，对美元最近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有组织的犯罪，而是来自欧盟的中央银行，面额为 500 元的新欧元现钞更适合黑市，它大概是 100 美元价值的五倍，如果使用 500 欧元的现钞，就可以大大减轻走私者皮箱的重量了。葡萄牙就是由于上述原因禁止使用 500 欧元面额的现钞，另外，在外国地下经济中至今还没有认可 500 欧元的现钞。

本书中有三个主题展现了美国地下经济的不同视点，不管它们是好还是坏，它们毕竟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大麻的疯狂”探讨了美国吸食大麻的法律和经济关系问题，目前，大麻已经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黑市商品，它遍布于全世界，吸食大麻的行为比吸食任何一种非法的毒品都普遍。美国各州的管制部门和针对大麻的联邦法律限制其生产并且制定了对吸食者的惩处，这些也显示了许多文化禁忌的专制本性。如今，美国人吸食的大麻数量以及因大麻入狱的人数比其他西方工业国家都多。

“草莓种植园”着眼于加利福尼亚州农业流动劳工的困境，他们基本上都是非法移民。墨西哥非法劳工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补充代表了一种趋势，他们很快就遍及到整个美国，现在许多业主更喜欢雇佣黑市劳工。虽然非法移民涉及到上百亿美元的商业行为，但是对非法移民劳工的日益增加的依赖也加大了对地下经济之外的其他影响，例如影响到工资和工作环境，甚至也影响到社会的民主进程。

“淫秽帝国”通过一个隐蔽的商人以及他的成功及衰败回顾了美国色情业的历史，描述了曾经只能在黑市进行贸易的商品如何进入主流市场，如何将长期渴望的不正常的行为变为受欢迎的娱乐表演。你可以看到，过去都是黑社会依靠出售色情物品来赚钱，而现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公司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并且从色情商品中赚取大量的金钱。如今对大麻和色情物品的需求具有很深的启迪作用，正是这两个商品——大麻和色情，使得美国人口是心非，表面上非常憎恶，其实私下喜欢，而且购买的数量也令人惊叹不已。

三个主题的联系表明地下经济与主流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忽略其他的前提下不可能清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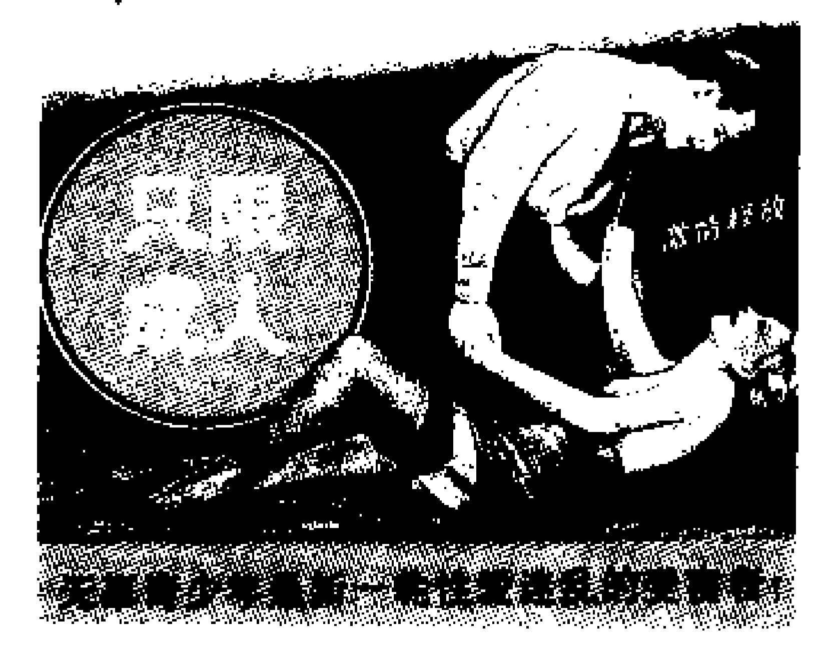


理解其中的一个。地下经济的巨大性和复杂性也向传统经济思维的精确统计发出挑战，那些硬性的数据指标突然变得不再可靠。华尔街股价的升降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以及 GDP 的最新预报的细小变化，如果某个经济测量值发生千分之一的变化，那么就会有上百亿的美元转手。如果没能够把国民经济中的 20%、10% 或 5% 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这些统计数据实际上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的 20 年里，美国在计算机软件、通讯、航空和计算机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只是这个经济实例的一部分，而万宝路、骆驼和菲利普·莫尔斯也在其中，而且烟草业在华盛顿特区是一个分量最重的说客，但是现在美国人在非法毒品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在香烟上的花费。

政府的适当角色以及对自由市场的适当限制是本书的主旋律，美国的政治系统和亚当·斯密提倡的经济系统都是表面上的自由。从 1776 年起，美国人民一直在为自由战斗，即使献身也在所不辞，如今你很难找到一个认为自由是件坏事的美国人。问题是很难对此给出一个答案：自由是为了谁？政府应该维护工人的自由还是雇主的自由、消费者的自由还是制造商的自由、多数人生活的方式还是少数人选择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理论上讲，自由很容易得到赞美，但是坚守那个崇高的理想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自由主义的目标有多么美好，将未检验过的自由强加给一个群体通常意味着否定了对方的自由。

地下经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因为，财富如何在那里创造出来？有多少生命毁灭在那里？法律的变迁如何把某个人认定为黑帮分子或是总裁（可能他具有两个身份）？如果你想真实地了解一个人，你必须观察和了解隐藏在他身后的东西、履历中的经历、描写他的书籍以及书桌上的家庭照片，当

然，你还得获悉那些藏在抽屉里的秘密，其实，在我们主观之外依然存在着许多的东西。如果，市场确实涵盖了所有人的愿望，那么隐藏在深处的愿望和他们流露出来的一样重要，就像阴阳一样，主流经济和地下经济归根结底就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你必须全面了解一个国家，你才能全面地认识它。



大麻的疯狂*

在印第安纳州，一个犯有武装抢劫的人将会被处以大约六年的监禁；强奸犯会被判处大约八年的监禁；而一个谋杀犯须要在监狱里服刑 28 年，这些处罚实际上比国家平均的处罚

---

* 多年来，吸食大麻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影响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为了尽可能将它们描述得准确一些，我拜会了很多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和专家。回忆起来，同已故的利奥·霍利斯特博士（Dr. Leo Hollister）的见面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霍利斯特博士曾经是美国神经生理药理学学院的前院长，也曾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医学院执教多年，学术界对他在大麻的毒性学和精神药理学方面的知识高度认同，霍利斯特博士的许多关于毒品方面的医学文献中的精华至今也无人超越。纽约城市大学医学院的药理学教授约翰·P. 摩根博士（Dr. John P. Morgan）曾经花了好几个小时，极其耐心地给我讲述了关于大麻的一些事情，揭露了许多流行的恐怖故事，摩根博士还和林恩·齐默（Lynn Zimmer）在 1997 年合著出版了《大麻的神话、大麻的真相》（*Marijuana Myths, Marijuana Facts*），它是一本非常好的指导性读物，主要描写了吸食大麻后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臆想的后果。还有两位出名的，直率的大麻使用的批评者，加百列·纳哈斯博士和米切尔·S. 罗森塔尔博士（Dr. Gabriel Nahas and Dr. Mitchell S. Rosenthal），他们提出了一些对大麻使用更加令人担忧的观点。纳哈斯博士是纽约大学医学中心麻醉学的研究教授，近 30 年来，他一直从事反对大麻的活动。我认为他对大麻的反对是非常热情和真诚的，（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但是他对大麻的科学观点却不足以令人信服。唐纳德·P. 塔什金博士（Dr. Donald P. Tashkin）是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洛杉矶的医疗中心的肺部疾病部门的教授，他曾提供吸食大麻对呼吸系统伤害的研究成果给我参考；旧金山综合医院爱滋病部门的主任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癌症研究院的助理临床教授唐纳德·阿布拉姆斯博士（Dr. Donald Abrams）也对我描述了他是如何检测大麻对免疫系统的影响的。

在许多政府对大麻的研究报告中都陈述了吸食大麻对健康的影响，我从这些委员会的报告中借鉴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爱丽丝·欧拉莉（Alice O'Leary）是大麻疗法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她帮助我接触到多位癌症患者和艾滋病患者，这些患者冒着被监禁的风险一直使用大麻作为治疗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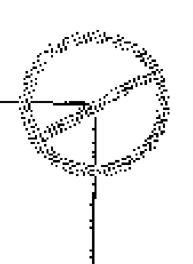
约翰·F. 霍普金斯（John F. Hopkins）在《肯塔基州的大麻产业史》（*A History of the Hemp Industry in Kentucky*）中，讲述了何时是大麻兴旺发展的时代、以及大麻种植业在美国的哪个时期曾经是合法的。在拉里·所罗门（Larry【Rats】Sloman）的《大麻的疯狂：大麻的历史》（*Reefer Madness: A History of Marijuana*）是一本关注大麻文化的书籍，它的内容非常活泼愉快，娱乐性极强。还有些20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也涉及到很多大麻的题材，喋喋不休地诋毁大麻。

很多专业人士都为我讲述了美国大麻种植行业的历史，恐怕没有几个人比他们拥有更丰富的大麻种植知识。

"家庭反对强制性最低判决"组织（FAMM）的创始人和主席朱莉·斯图尔特，从1991年起，她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怜悯心不停地与那些"简单的判决公式"做斗争，我真诚地希望，那些政客有一天能把她的观点融入到强制性监狱判决中去。FAMM的联系主管莫尼卡·普拉蒂帮助我找到了许多因大麻而接受过份惩罚的案例；感谢许多犯罪辩护律师对我的帮助，他们对我讲述了大麻法律如何在他们群体中被强迫使用，而且他们还告诉我许多关于他们委托人的信息。也非常感谢那些与我分享他们自己故事的多位大麻过犯者以及他们的家属。

我在书中对马克·扬事件的叙述主要来自法庭证词记录（美国地方法院印第安那州南部地区印第安纳波利斯分部的91－37－CR号案例）以及与那些重要的当事人的多次访谈。当我从马克·杨的生活中挖掘出了许多的详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马克·杨是一个非常诚恳的、直率的、乐于助人的人，这里我真诚地表示对他的感谢！或许他再也不会被关进监狱了。

这十几年来，全国倡导修改大麻法令委员会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艾伦·圣皮埃尔（Allen St. Pierre）和我不断地讨论、辩论、分享关于大麻的信息，尽管我们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但是他对大麻法律的改革一如既往地显示出正直、同情和改革的坚定。如果有一天，当美国政府的大麻疯狂行为得以终结的时候，我衷心希望圣皮埃尔可以以永终誉。



要严厉得多[1]，通常对被判谋杀罪成立的美国人的典型处罚是11年零4个月的监禁。印第安纳州法官判处的监禁期限往往长一些，但是如果服刑期间有良好的表现，那么囚犯实际服刑时间不会超过判决书上判决的监禁时间的一半。当我们关注马克·扬（Mark Young）案例的时候，以上的辅助信息值得我们牢记在心里。38岁的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家中被捕，罪名是充当贩卖产于摩根县附近一家农场的700磅大麻的中间人，扬在联邦法律下受到审判而且被判有罪。他以前从来没有受到毒品交易的指控，而且也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扬在非法交易中的角色只是个中间人，而且以前从来没有贩卖过任何毒品，这次他只是简单地给三个想买大麻的人介绍了两个想出售大量大麻的人，而且罪行发生在他被捕的一年半之前。没有没收的大麻、钱款或任何涉及扬犯罪的确凿物证，只是凭一个与政府合作的同谋犯的证词就判他罪名成立，1992年2月8日，莎拉·埃文斯·巴克尔法官（Judge Sarah Evans Barker）判处扬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

大麻在美国青年文化中如此地司空见惯，而且在高中和大学的派对上出现大麻的味道也是如此稀松平常，以至于许多美国人甚至以为吸食大麻的违法行为很少会被送进监狱。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许多人由于触犯大麻法律而被关进监狱，而且入狱的人数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联邦监狱系统里大约增加了2万名

---

① 在与在与印第安纳州政府改造部的帕姆·帕特森（Pam Patterson）会谈后，得知2001年印第安纳州的平均监禁刑期是：强奸犯16.5年监禁、抢劫犯11.8年、谋杀犯50.34年监禁。根据司法统计局2001年10月公布的“1998年州法院的重罪判决”报告显示，通常一名被判罪名成立的谋杀犯的监禁刑期平均为136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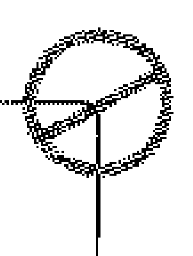
的囚犯[①]，他们入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麻犯罪，但是很难得到各州监狱和本地监狱相应的统计数据，合理的猜测大约还会有另外的25000名到30000名的大麻罪犯囚徒。马克·扬的判决尽管很特别，但无独有偶，现在可能有数十名大麻罪犯[②]由于被判处终身监禁而被关进联邦重罪监狱而且没有假释的希望。如果将那些被处以20年、30年或是40年监禁的中年罪犯[③]算在内的话，那么将老死在监狱中的人数可能会高达数百人。至于那些因为种

---

① 我所能得到的当时最新的统计数据是，1998年共计有927717人被州法院判处重罪违法，其中6.1%的罪犯是大麻犯罪，而3.6%的罪犯是因为拥有大麻，2.5%的罪犯是因为参与大麻交易。这也就意味着，在1998年，被州法院判处的大麻重罪的罪犯人数大约是56600人，其中的33400人是因为拥有大麻，23200人是因为参与大麻的交易。司法统计局并没有准确地计算出到底有多少名大麻重罪的罪犯被关进监狱，但是，它的确说明了，1998年，在那些因为拥有大麻被州法院判处大麻重罪的罪犯中，有36%的罪犯被送进监狱；而在那些因为参与大麻交易被州法院判处大麻重罪的罪犯中，有45%的罪犯被关入监狱。那些拥有大麻罪名的罪犯在监狱中大约服刑14个月，参与大麻交易的囚徒大约被关押了22个月。这就说明，在1998年，大约有12000个因拥有大麻获重罪的罪犯被送进监狱，大约有10440个因参与大麻交易而获重罪的罪犯也被关进监狱，所以那时监狱中大约有32880名大麻罪犯。我为什么要采用25000人到30000人这个数字呢？因为，我猜测那些因为大麻重罪的判决会可能比其他毒品重罪的判决要低一些。上述资料的来源参见2001年19月“司法统计局”公布的《州法院的重罪判决》。

② 在美国判决委员会可以得到1992年、1993年、1994年依据联邦法律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大麻罪犯的人数，在这三年中，总共有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司法局最新的报告中，1999年共有88名毒品犯罪者依据联邦法律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指明涉及毒品的类型。因为1999年因大麻犯罪被关进监狱的人数大大高于涉及其他毒品的人数，所以根据88人所估计出来的“数十名大麻罪犯”似乎是比较公正的一个数字。参见“1999年联邦毒品罪犯。”

③ 根据从美国判决委员会得到的信息、依据联邦法律，在1992年和1993年两年中，总共有110名大麻罪犯被判处240个月的监禁或刑期更长的判罚，从那时起，每年被关进联邦监狱的大麻罪犯人数至少已经增加了50%。



植、贩卖、拥有或购买大麻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关到州教养所和收容所的囚犯人数①，恐怕世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一提到“毒品战争”，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哥伦比亚的交换俘虏和哥伦比亚市中心的瘾君子们的景象，从许多方面看，这绝对是个误解。大麻是（而且很久前就已经是）美国最普遍使用的非法毒品，吸食大麻的数量比其他毒品的总量还多。大约有1/3的超过12岁的美国人至少吸食过一次大麻，大约有2千万的美国人每年都吸食大麻，而且有2百多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吸食大麻。② 海洛因和可卡因都是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而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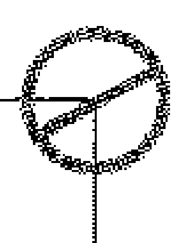
① 在美国，至少有十几个州可以根据违反《控制物质法案》判处大麻罪犯40年或更长的监禁甚至终身监禁。这些州是：阿拉巴马州（终身监禁）、佛罗里达州（74年监禁）、路易斯安那州（80年监禁）、密西西比州（终身监禁）、密苏里州（终身监禁）、蒙大拿州（终身监禁）、内华达州（终生监禁）、俄克拉荷马州（终生监禁）、罗得岛州（终生监禁）、田纳西州（60年监禁）、得克萨斯州（终身监禁）、弗吉尼亚州（40年监禁）。在那些习惯执行严厉刑罚的州，处理一起大麻犯罪就像棒球中的“三振出局”一样，直接判处终身监禁。据司法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因拥有毒品而获重罪的罪犯有0.2%被判处终身监禁，因参与毒品交易而获重罪的罪犯有0.1%被处以终身监禁。当年，大约有121000人因为拥有毒品被判重罪，同时，大约有214600人因参与毒品交易获得重罪。这也就意味着1998年一年中大约有1000人因违反州毒品法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司法统计局的数据并没有准确记录到底有多少名因为大麻犯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详细资料，请参见“1998年州法院的重罪判罚”以及1999年美国犯罪司法协会的《国家控制物质法案指南》（A Guide to Stat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s）。

② 在2000年，美国大于12岁的人口中，大约有8%吸食大麻；6%使用其他的非法毒品；大约有34%至少抽过一次大麻。同年，在190万吸食大麻的人群中，大约有12%的人在当年吸食大麻的天数是300天或300天以上。所有由联邦调查得出的吸食大麻的数据恐怕都有很大的水分，它们大大低于真实的数字。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很多人都不会如实地将他们吸食大麻的频率告诉政府的调查人员，这种做法确实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讲实话也确实勉为其难。

国各地吸食的大麻中有1/4或一半都产于美国本地。虽然过去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大麻的种植者都是那些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和夏威夷的老嬉皮士们，但是现在美国国内绝大多数的大麻都产于美国的中部，从阿巴拉契亚山西面到大平原的这一长而宽的地带。这一地带的农场主凭借着大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美国大麻的年产总值非常惊人：估计在40亿美元到250亿美元之间[①]，而

---

① 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大麻产量既可以从它的消费量（每年美国大麻吸食者每年吸食的数量），也可从它的产量（美国一年生产多少大麻）得出相应的数据，但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切实了解实际种植和吸食的大麻数量。1997年，美国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ONDCP）曾经按照以下的假设，估计出美国人每年吸食的大麻数量，在1995年，大约有860万人每月吸食大麻，这些人每月平均抽18.7支大麻，而每支大麻烟卷的重量约为0.0136盎司，每盎司大麻的价格为269美元，根据以上的假设，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估计1995年美国人在大麻上大约花费了70亿美元，实际上真实的数字差不多可以上浮30%，如果按照该数量进行调整，那么这个估计的数值就会接近90亿美元。而我根据每天而不是每月吸食大麻的人数估计，那些每天都抽大麻的人平均每天会抽4到5支大麻烟卷，我认为，每天抽大麻的200万人一天抽4支大麻的量一定比860万每月都抽大麻的量大得多。大麻的总花费也取决于每支大麻的成本——40亿美元？还是80亿美元？用不着过分地分析，我估计每年生产消费的大麻的价值大约在12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1989年，哈佛学院研究大众政策的马克·A. R. 克莱曼（Mark A. R. Kleiman）曾经使用基于消费的方法得出估计数据，他估计美国市场上的大麻总计约为14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40亿美元的大麻产于美国本土。而这种基于消费的估值也有很大的偏差，拉尔夫·魏斯海特（RalphWeisheit）就认为，1980年代末美国大麻产量的价值大约在320亿到650亿美元之间。约翰·格特曼和保罗·阿尔门塔诺（John Gettman and Paul Armentano）在全国倡导修改大麻法令委员会（NORML）"1998年农作物报告"中曾经指出，1997年美国本土种植价值约为151亿美元的大麻，而这些大麻的零售价大约接近252亿美元。所以，综上所述，估计大麻年产量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1982年，DEA曾经宣称，他们没收了38%的美国本土种植的大麻，而基数也是缉毒局估计出来的，如今，缉毒局不再推算美国本地的室内、室外种植的大麻产量了，也许，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以上资料来源于：1997年9 （转下页注）



2001 年美国最大的合法商品作物也就是玉米的年总值大概也就只有 190 亿美元。

大麻背后有许多组织完善的支持者，他们通过书籍、杂志、网站和流行音乐呼吁大麻的合法性以及促进大麻的使用。他们相信大麻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种良性的娱乐药品，它也是一种草药，而且它还是工业应用下的一种日用品。反对者的态度也极为坚定，组织也更为完善。他们认为大麻是一种危险的毒品，它伤害使用者的精神和身体以及良好的精神状态，它促使人们发生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并且鼓励蔑视传统的价值观并威胁到美国的年轻一代。正在发生的激烈争论就像恶劣环境中依然茁壮的野草一样遍布美国的 50 个州。双方都同意大麻摧毁了无数人的生活，但是难辞其咎的是大麻本身还是禁止使用大麻的相关法律，在这一点上双方是针锋相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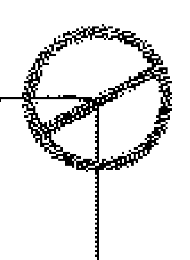
1982 年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的针对毒品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大麻的战役，是由一些保守的家长团体组织开展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州和联邦政府对大麻犯罪降低了惩罚。但是在 1980 年代，禁止大麻的相关法律曾经是非常严厉的，有很多的强制管理方法，惩罚也比以往的政府严厉得多，例如，在“大麻疯狂”的 1930 年代，那时候政府的管理更像是例行公事。那些过去通常用来打击海洛因和可卡因交易的所有合法的手段，

（接上页注①）月 29 日，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的《美国毒品消耗，1988 ~ 1995》（*What America's Users Spend on Drugs*, 1988 ~ 1995）；马克·A. R. 克莱曼的《大麻：滥用的代价、控制的代价》（*Marijuana: Costs of Abuse, Costs of Control*）；拉尔夫·魏斯海特的《国产大麻》（*Domestic Marijuana*）；约翰·格特曼和保罗·阿尔门塔诺 1998 年 10 月做出的《全国倡导修改大麻法令委员会关于美国国内大麻产品的报告——1998 年大麻作物报告》（*NORML Report on U. S. Domestic Marijuana Production, 1998 Marijuana Crop Report*）。

例如，民事罚款、加大警察的调查权力、拓宽相关法律的应用范围、对告密者证词增加认同度以及机械的判处模式，例如，如同"三振出局"一样的强制性最低限判决，上述的手段都用来对付大麻的犯罪者。马克·扬如何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故事揭露了美国中心地带的很多事情，美国国内绝大部分的大麻都产于那个地区，联邦监狱人犯数目中正在改变的犯罪类型，以及实施了20多年的针对毒品战争后的效果，而且，这一战争也涉及到美国整个的司法系统。然而隐藏在马克·扬事件的后面却是另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这个社会对一个只是出售大麻的人的判决会比一个持枪杀人犯的惩处还要严厉呢？

备受争议的植物

"MARIJUANA"（大麻）是一种被植物学家称为 *Cannabis sativa* 植物的墨西哥通俗说法。不管采用什么形式的称呼，世界各地都很熟悉这种植物：非洲称之为"dagga"、中国称之为"麻"、北欧称之"hemp"，而印度称其为"bhang"、"ganja"或"ganja。"虽然大麻可能原产于中亚，但是现在它可以在任何气候下生长，就像乳草和蓟草那样广泛传播，挤垮邻近的青草并茁壮成长，成熟的大麻有3英尺到20英尺高。种植大麻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大麻是最古老的非食用的农作物之一。该作物的茎富含纤维，几千年前就开始被用于编织绳索、制作帆布和纸张。大麻是雌雄异株的植物，雌雄株的比例一致。雌株花蕾分泌一种大麻独有的黄色黏性物质，这种物质含有超过60多种化合物的丰富的大麻化学成分，一些成分具有改变精神状态的功能，非常像Delta-9-THC。公元前28世纪的中国炎帝——神农氏第一



次记录了大麻对精神和身体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将大麻和酒的混合物作为外科手术的麻醉剂，也用它治疗一些微恙。古埃及人也极为赞赏大麻的医疗功能，而古罗马的妇女则用抽大麻来减轻劳动带来的疼痛。

莱斯特·格林斯普恩博士（Dr. Lester Grinspoon）是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退休教授，他认为，大麻终有一天会成为一种安全而且廉价的、万能的“神奇药品。”在他的《大麻——禁药》（*Marihuana, the Forbidden Medicine*）一书中，他声称有证据表明吸食大麻可以减轻由化学药剂产生的反胃现象、预防由青光眼引起的失明、能刺激艾滋病患者勾起食欲、可以作为抗癫痫的药物、缓解哮喘和偏头疼、减轻慢性疼痛、减少伴随多硬结的肌肉痉挛，还可以治疗脑瘫和下身麻痹等等。而其他的医生则认为格林斯普恩过于盲目乐观，因为不可能允许像大麻这样的含有400多种化学成分的“天然药品”应用于现代医学。他们强调，针对大麻的每一项可能的潜在医疗功能，如今已经研发出许多剂量精确而且纯度极高的药品。例如，delta-9-THC的人工合成物Dronabinol已经用于临床多年了，尽管一些临床的肿瘤学家认为它的止呕性不如大麻。近期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英国上议院指出，大麻也许确实具有医疗使用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大规模的研究来验证格林斯普恩大麻医学价值理论的真伪。格林斯普恩博士抱怨政府总是过渡关注大麻的危害性，而从不挖掘它的好处，所以那些著名的药品公司也就不愿意去资助必要的研究，正像格林斯普恩曾经解释的那样，“你不可能取得这种植物的专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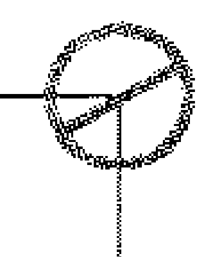
持续性的使用大麻对身体造成的长期影响，以及大麻是否是使用其他非法毒品的“敲门砖”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尽管大麻有时候确实会给一些人带来心理依赖，但是大麻似乎不会给吸食

者造成较大的生理依赖[1]，而且看起来它不像海洛因、可卡因、尼古丁、酒精或咖啡因那样使人上瘾。吸食大麻的人也可能会去体验其他的作用于精神的毒品，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大麻被认为是其他毒品的潜在“跳板”的这种说法，其实更多的是来源于文化的驱动，并不是由于大麻本身的药理学因素。Delta-9-THC 是一种具有高度溶解性的油剂而且有五天的半衰期，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很快地遍布全身而且会在体内残留一段时间。一名偶然尝试一支大麻烟卷的人三天后依然可以从尿检中发现吸食大麻的痕迹，而当大麻瘾君子在戒掉大麻一个多月后，他的尿检还可能呈阳性。Delta-9-THC 可以滞留在身体的不同的细胞里和重要的器官内（和安定、氯丙嗪和奎宁的特性一样），这些会增加伤害身体的可能性，可是这并没有得到相关的证明；对牙买加、希腊和哥斯达黎加那些生前重度吸食大麻者的研究证明大麻并没对心理和生理造成太大的伤害，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认知、生殖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研究已经表明，即使戒掉大麻后，短期记忆力衰退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试验和实验室动物的其他研究证明，大麻可能会轻微地抑制免疫力，但是最终也没有研究表明 delta-9-THC 可以改变人类免疫系统。1970 年代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传言，例如大麻可以杀死脑细胞、损害染色体以及使男人长出一对大乳房等

---

① 1994 年，杰克·亨宁费尔德博士（Dr. Jack Henningfield）作为美国研究院毒品滥用中心临床药理学的主管，专门从事“上瘾研究”，他曾经按照毒品使人上瘾的程度将主要毒品排序如下：海洛因、可卡因、大麻、酒精、尼古丁、咖啡因。他认为人们最容易戒掉大麻，而尼古丁最容易使人上瘾。详细资料请参见 1994 年 8 月 2 日《纽约时代周刊》的《尼古丁会让人上瘾吗？这取决于你使用什么标准衡量》（*Is Nicotine Addictive? It Depends on "Whose Criteria You Use"*）一文。



等，都已经被证明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

吸食大麻在某种形式上像吸烟草一样可能会损伤肺部。洛杉矶医疗中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唐纳德·P. 塔什金博士（Dr. Donald P. Tashkin）正在对那些有超过十年大麻烟龄且一天吸三四支大麻的人群进行研究，他声称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长期吸大麻可能会造成慢性支气管炎，可能会引起主呼吸道细胞的变化，也就是潜在的癌症早期的征兆，而且对分解细胞功能的损伤会增加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一只大麻烟卷所含的致癌物质焦油的含量是一支普通烟卷的四到五倍，塔什金博士认为，那些重度吸大麻的人最终会遭受口腔癌、喉癌和肺癌带来的痛苦。可是，更为奇特的是，卷得越紧的大麻烟危害性越小，因为你吸入的烟会少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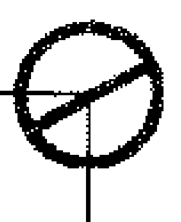
很少有针对吸食大麻带来的短期影响和大麻毒性的争论，按照美国神经生理药理学学院前院长利奥·霍利斯特博士的说法，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如果偶尔吸食大麻，大麻造成的伤害比中度饮酒带来的伤害要小得多，但是出于多种原因，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孕妇以及心脏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吸食大麻。虽然，每年都有数千人因为过量误服一些药品导致死亡，例如过量服用阿司匹林、醋氨酚（一种替代阿司匹林的解热镇痛药）或抗组胺剂的药品都会致人死亡。可是在过去 5000 年中有关吸食大麻的记录里，却没有一个人仅仅因为吸大麻或使用大麻丧生，大麻是一种为数不多的而且没有明确定义可以致命的有医疗作用的物质。据估计，如果一个人在 15 分钟内抽 100 磅的大麻才会致命。

被当成犯罪、犯非刑事罪、再犯罪

第一个与大麻相关的法律是 1619 年在弗吉尼亚通过的，它

要求每个家庭都要种植大麻。当时，大麻不仅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而且还是战略必需品，它的纤维用于制造船帆、绳索，而且它的副产品还可以用于填补木船的缝隙。马里兰、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的殖民地最终还允许大麻可以作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以刺激它的生产并且缓解殖民地的货币短缺。之后，包括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佛逊在内的许多美国创建之初的总统们也都将大麻计入固定资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了解大麻有影响精神状态的特性。当时国内大麻的产量激增，首屈一指的是肯塔基州，直到国内战争结束后，当地的大麻才由俄罗斯进口的大麻代替，国内其他的一些材料也替代了大麻的应用。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大麻是一种受欢迎的特许经营药品，而且可以在药店里公开出售，有一盎司草药包装的和含有大麻成分的酊剂两种，用来治疗偏头疼、风湿和失眠。“布朗医生”的镇静药片就含有大麻，伊莱·利利（Eli Lilly）公司的“咳嗽一天停”也同样含有大麻的成分。

1910 年墨西哥政治剧变导致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移民高潮，而对这些农民移民的偏见和恐惧也扩展到他们一贯的自我陶醉手段：吸大麻。得克萨斯州的警察官员认为，大麻可以刺激暴力犯罪、唤醒“流血的冲动”并赋予吸食者“超人的力量”，而且有谣言传闻说墨西哥人正在把这个“杀手野草”传递到那些没有疑心的美国在校学生的手里。海员和西部的印第安人将大麻传入墨西哥湾的港口城市，新奥尔良报纸上的文章将大麻与非洲裔美国人、爵士音乐家、妓女和黑社会的白人联系在一起。一位著名的大麻批评家认为：“主流的种族和许多文明的国家都是嗜酒的，而时时沉迷于大麻的种族和国家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一直在衰退。”这种说法也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大麻被描述成一



种闯进美国生活的异端，能够将健康的青少年转变成性欲狂。1914年，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颁布了第一个禁止销售大麻和拥有大麻的本地法令。到1931年，美国已经有29个州宣布大麻不合法，而那时候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反对的说法和争议。

大萧条助长了反移民情绪的高涨。美国西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许多官员请求美国财政部取缔大麻，他们的呼吁也得到了赫斯特报业的支持，它们报纸上的耸人听闻的头条标题曾经这样警示大众："海岸周围长满了杀人的野草，致命的麻醉植物等待随时收割，这些意味着大麻将要奴役加利福尼亚州的儿童。"联邦麻醉品管理局（FBN）的官员哈里·J. 安斯林格（Harry J. Anslinger）对这个问题的严肃性以及是否需要联邦立法提出质疑，但是他很快就屈服于政治压力，主张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大麻。安斯林格多次在公共场合和无线电广播中声称，这个"邪恶的野草"可以导致冷血杀手、性犯罪和精神错乱。他还写过许多耸人听闻的、标题为"大麻：青年人的刺客"的杂志文章。1937年，国会通过了《大麻税收法案》（*the Marijuana Tax Act*）①，在美国各地，拥有大麻都将是犯罪行为。在这个法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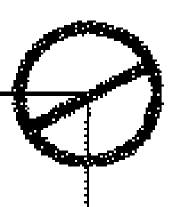
---

① 事实上，在1937年《大麻税收法案》施行之前，肯德基州还有美国最大的大麻工业，生产服装和帆布。此法的通过等于扼杀了所有大麻的经济和医学用途，加上媒体一面不断夸大大麻对于社会的毒害，一方面又宣传一些大麻的药用神迹及其对精神的作用，使得大麻有了极高的知名度，社会大众为之疯狂，不知如何是好。当时的一本杂志《流行技艺》（*Popular Mechanics*）还预测大麻将会成为美国的谷类来源之一，这个专题刚好在《大麻税收法案》施行后的两个月出刊，可见这个法案之匆促。此法规定，所有的大麻进口、流通，每盎司必须缴交一美元的税金，没有执照的买卖将视为违法，可判刑10～40年监禁。由于赋税甚重，青年们又趋之若惊，大麻从每盎司的两美元升到350美元。黑市交易如同禁酒时期那般猖獗起来。——译注

效后的一个星期，一名58岁的大麻经销商塞缪尔·R.考德威尔（Samuel R. Caldwell）成为触犯新法令的第一人，虽然多年来，国家法律和本地法律对大麻过犯的处理都很轻，但是这次，丹佛的J.福斯特·塞姆斯法官（Judge J. Foster Symes）陈述了考德威尔涉及大麻的“恶行”后，判处了考德威尔四年监禁。

哈里·安斯林格在美国毒品政策历史中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FBN成立之初，就由他领导而且经历了六届的总统任期，掌管FBN的时间长达30年。安斯林格和他的竞争对手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非常相像，二者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都主张建立反共法律，而且都把自己古怪的个性带到各自负责的联邦办公部门。安斯林格不相信公共卫生系统可以治理毒品上瘾的问题，他下令关闭那些被他称为“吗啡供应站”和“瘾君子酒吧”的治疗诊所。他认为只有严厉的、强制执行的法律才是对非法使用毒品行为最合适的方法。他要求法官们“监禁那些过犯者，然后扔掉监狱的钥匙。”虽然他的观点阻碍了新的科学观点，但是他的论点在当时和多数美国人的观点还是一致的。1944年，纽约医学院发表了一遍关于大麻的文章，其作者指出，使用大麻不会导致暴力行为、不会引起精神错乱、不会上瘾，而且认为大麻可以作为安眠药使用。此事使安斯林格大怒，并且将他冠以“危险分子”和“怪异者”的作者们全部解职。

FBN经常指出美国毒品的问题，有些与它的职能毫不相关。二次大战期间，安斯林格曾经指责日本人使用麻醉品动摇美国人民战斗的意志，而几年后，他又指责共产党使用同样的手段。国会在麦卡锡时代通过了《伯格斯法案》（*The Boggs Acts*），它对涉及大麻和海洛因的违法行为处以同样的处罚——对第一次拥有上述毒品的人处以2～5年的监禁。在解释这个法案以及随后通



过的麻醉品控制法案的时候，安斯林格强调，大麻的关键作用就是使麻醉品上瘾的“跳板。”与胡佛一样，安斯林格憎恨爵士乐，他建立了一个针对那些行为举止看起来是非美国式的著名艺人的、特别的“大麻与音乐家”的 FBN 档案，许多对乐队成员的秘密报告，其中也包括卡·卡洛威（Cab Calloway）、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莱斯·布朗（Les Brown）、康特·巴锡（Count Basie）、吉米·多尔西（Jimmy Dorsey）和埃灵顿（Duke Ellington）等名人。安斯林格曾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策划在全国范围内对流行音乐家进行调查，可是由于 FBN 的无能，FBN 的人员不能渗透到爵士乐圈而告失败。可是，他确实千方百计地拘捕了好莱坞著名的大麻吸食者——演员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的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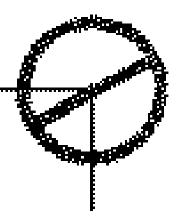
虽然安斯林格对使用大麻的态度是极端敌对的，而且不容置疑，但是他也允许有一些例外出现。1940 年代，他曾经与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也就是二次大战时期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合作尝试用麻醉品进行思维控制的试验。在 FBN 的帮助下，将佩奥特掌①和钠异戊巴比妥安米妥混合制成一种“实话毒品”，用于 OSS 对战俘的审讯。当这种混合物没有效果时，安斯林格又建议使用混有大麻的香烟，这种做法同样没有功效，最终 OSS 对“实话毒品”的研究以失败告终。不过，安斯林格后来又与 CIA 紧密合作，启动另外一项研究“MK-ULTRA”的、声名狼藉的思维控制项目。在这个试验中，在试验者未知情也没有征得试验者同意的前提下，给上百人服用了麦角酸酰二乙胺（迷幻药，LSD）。在 1950

① 一种无刺的圆形仙人掌，原长于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有钮扣形小块茎，新鲜或者晒干的佩奥特掌被某些土著美洲人当作麻醉药咀嚼。——译注

年代后期曾经为中央情报局经营了若干家妓院的乔治·怀特（George White）是安斯林格的顶级特工，他负责观察那些喝下混有迷幻药的饮料后的行为表现，他不仅给那些茫茫然的男人和女人服用了多种有效的影响精神的药品，他本人也服用这些药品以观察它们的效果。当他后来回忆为“MK-ULTRA”项目工作的时候，回忆道：“我竭尽全力地、全心全意地投入，就是因为它非常有乐趣，真是有乐趣！一个精力充沛的美国小伙子在哪里可以得到允许和鼓励去说谎、杀人、偷盗、强奸和抢劫？”然而这些行为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讲足以获得长期监禁的判决，可是FBN成员的行为似乎得到的却是特许，甚至被赋予了爱国的标签。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杀人凶手》（*The Murderers*）中公开承认，他曾经定期为亦是瘾君子的“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特供吗啡，安斯林格传记的作者约翰·C. 麦克威廉斯（John C. McWilliams）确信，那个显贵的瘾君子就是约瑟夫·R. 麦卡锡参议员。

1962年，哈里·J. 安斯林格已经退休了，许多州也已经通过了《小伯格斯法案》（*little Boggs acts*），这些州法案对非法拥有大麻和出售大麻的处罚都高于联邦法律的建议处罚。在路易斯安那州，仅仅拥有大麻就会遭到5～8年的监禁；在密苏里州，第二次涉及大麻的犯罪会导致终身监禁；而在佐治亚州，如果第二次对未成年人贩卖大麻则会被处以死刑。

1960年代，政治气候发生了很多变化，同样也涉及到对毒品滥用的态度。约翰·肯尼迪总统和林德·约翰逊总统任命了许多调查委员，对一些过于简单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批判，而正是这些假设引导了之前15年的大麻政策，他们还否定了大麻与暴力犯罪以及大麻和海洛因的简单的直接因果关系。当大麻在白人中



产阶级和大学生中非常流行的时候，应该对先前针对大麻的法律进行重估，以前的大麻法律在大众没有太多非议的情况下，已经禁锢了贫困的墨西哥人和非裔美国人几十年。针对毒品滥用的政策也应该逐步从单纯的犯罪审判过渡到关注公共健康方面，而且应将重点从惩罚转向治疗。1970 年的《全面的毒品滥用预防和控制法案》（*the 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终于将大麻从其他麻醉品区别开来，还降低了对那些少量拥有大麻者的联邦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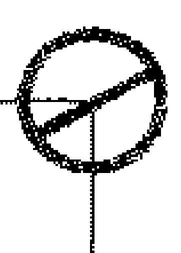
1970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委派一个两党联合的委员会调查大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大麻的法律地位以及大麻对社会的影响。美国大麻和麻醉品滥用委员会在 1972 年得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结论：州法和联邦法律应该允许大麻合法化。委员会的成员一致同意在家中拥有少量的大麻不应该再是犯罪行为，而那些出于利益而种植、贩卖大麻或者在大麻作用下驾驶的行为依然应该遭到严格禁止。这个委员会这样解释："当我们认识到对大麻作为毒品的误解后就试图去除大麻的神秘色彩；鉴于目前吸食大麻问题的社会背景，我们也努力摈除对吸食大麻的偏见。社会确实应该强烈地阻止大麻的使用，可是应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预防重度吸食大麻以及对重度吸食者提供医疗帮助。"他们还认为，"鉴于当代美国社会关注的众多问题，根据我们的判断，确实不应该对大麻给予过高的关注。"尼克松总统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委员会出卖了，进而否认了委员会的结论，他还私下谴责这些犹太人煽动对大麻法律的改革。不过，在 1970 年代，已经有 11 个州政府认为大麻合法，其人口数目已经超过美国人口的 1/3，而且其他州政府也已经弱化了反对大麻的法律。当吉米·卡特总统支持大麻合法化的时候，美国监狱协会、美国医学会以及国家教会

协会也都支持大麻使用合法化。看起来，对大麻犯罪处以长期监禁的判决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历史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后来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开启了现代美国反对毒品的运动，该事件发生在 1976 年 8 月，是由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的一个家庭烤肉晚餐引起的。在女儿的生日派对结束后，身穿睡衣的罗恩和玛莎·马纳特（Ron and Marsha Manatt）在清晨走过湿漉漉的草地时，借助手电筒的灯光，他们惊讶地发现地上有许多大麻烟蒂、卷烟器以及加度葡萄酒的空瓶子，而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女儿邀请来的那些只有十二三岁的好友遗弃的。他们警告了这些孩子后，马纳特夫妇将当地的父母们请到他们的客厅，成立了后来闻名的“爱管闲事的双亲协会”（Nosy Parents Association），致力于防范青少年使用毒品。随后，玛莎·马纳特给美国毒品滥用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NIDA）的主席罗伯特·杜邦博士（Dr. Robert DuPont）写信请求帮助，后者将玛莎·马纳特介绍给了佐治亚大学健康教育的托马斯·格利顿（Thomas Gleaton）教授，很快他们就成立了两个组织：“针对毒品教育的双亲对策协会”（Parents' Resource Institute for Drug Education）和“毒品远离青少年的双亲国家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Parents for Drug-Free Youth），这两个组织得到了美国毒品滥用协会和联邦毒品管理局高层官员的支持，它们也想对国家毒品政策施加巨大的影响。不久，国内成立了数千个类似的双亲组织，在罗思·佩罗（Ross Perot）[①] 的帮助下发动了“得克萨斯人针对毒品的战争。”

---

① 佩罗旗下的 EDS 公司是全球第三大软件公司（前面两位分别是 IBM、微软），是 IT 服务的创始者，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计算机服务公司。——译注



那个时候，吸食大麻似乎非常流行。1976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2 个高中生中就有一个学生每天都吸大麻。1960 年代青年的反传统文化崇尚大麻，声称它是被遗弃者和离经叛道者的精神麻醉品。一位雅皮士的领袖曾经自信地预言："革命的口号将是'大麻烟卷以及行为和言论的自由'，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将是长发的吸食大麻的人"，那些保守的双亲组织牢记这句话，并因此赋予了大麻更深刻的负面意义。身为毒品滥用协会成员的罗伯特·杜邦曾经一度支持大麻的合法化，后来，他也谴责大麻在青年人中"引起价值观的混乱"，使得年轻人过于追求满足感、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他强调"造成文化转变的急先锋就是吸食大麻。"

在 1980 年的总统竞选中，罗纳德·里根支持大麻"也许是当今美国最危险的毒品"的观点。随着保守双亲组织的强有力支持，他也将针对毒品的战争带到了白宫。1982 年，里根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增设白宫毒品滥用政策办公室，并任命化学家卡尔顿·特纳（Carlton Turner）担纲，他很快被称为"毒品沙皇。"特纳曾经在密西西比大学主导了多年的大麻研究项目并且管理着政府特许的大麻农场。依照《政府管理》（*Government Executive*）杂志的概述，特纳认为"当今的年轻一代参加抵制服兵役、反对核力量、反对大商业行为和反当局的示威"，大麻不能脱其干系。他还认为吸食大麻可以使年轻人成为同性恋。1977 年，缉毒局还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大麻的合法化，而三年后，缉毒局却认为大麻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毒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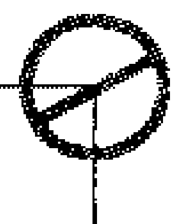
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ie），弗吉尼亚法学院的教授，时任尼克松总统的大麻委员会副主席，他相信，那些支持大麻法律改革的鼓吹者已经被日益强大的双亲组织排除在主流声音之外。那些政治的温和主义者不久也放弃了改革的观点，在他们的

沉默中，“零宽容”和“使用者有责任”的观点使判罚毒品过犯的观点复苏。于是，1984 年的《全面控制犯罪法案》、1986 年的《反毒品滥用法案》以及 1988 年的《法毒品滥用修正案》都提高了对拥有大麻、种植大麻和大麻交易的联邦惩罚力度，判罚依据为所涉及的大麻数量，“共谋”和“企图”也严格地作为完整行为接受处罚，而且现在对 100 棵大麻的惩处和拥有 100 克海洛因的判罚完全一样。

地域不同，判罚不同

如今，大麻是归类于第一类控制清单的物质，这意味着它具有很高的滥用潜力，官方不承认它的医学价值而且在医药管理下也没有使用大麻的安全级。海洛因、迷幻药和佩奥特掌也是第一类毒品，而可卡因和苯环己哌啶（译者注：即 PCP，“天使粉”，一种麻醉药和致幻剂）属于二类毒品，允许医生开处方。在联邦法律下，在美国拥有任何重量的大麻都是非法的，第一次触犯大麻法律，就有可能会面临缓刑至死刑的判决。此外，利用美国邮政和州际托运商进口、出口那些与大麻相关的产品也是违法的，诸如大麻剪刀、饮水吸管以及香烟纸，上述行为可能导致拘留或者 10 万美元的罚款。

根据民事没收条款，固定资产、汽车、现金、有价证券、珠宝首饰以及其他能涉及到大麻犯罪的财产一律即刻没收，联邦政府不必证明没收的财产是否是大麻的非法所得所购置的，只要卷入到某个犯罪活动中去即可没收。例如，大麻生长在某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一辆用于运输大麻的汽车，这就足够了，可以将其没收。如果在一艘游艇上发现一支大麻烟卷就可以没收这艘游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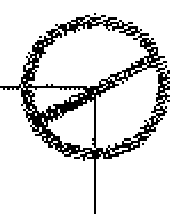
同理，如果发现某住宅院内种植了一棵大麻，即可没收这所住宅。自从只根据严格的证据，也就是“不合理的怀疑”强加给人们后，现在即使涉嫌大麻的嫌犯事后证明是无辜的，他的财产也有可能被没收。除了高额的罚款、监禁和没收财产外，罪名成立的大麻罪犯有可能面临失去460多项的联邦补助，例如，你可能会因此丧失获得学习贷款、小企业贷款、职业执照以及农场补助金。那些因大麻而获得重罪处罚的美国人，即使你是个残疾人，可能也不会再享受到联邦福利和食品补助，而那些罪名成立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反而依然有资格保留上述的福利待遇。

1980年代，各州的大麻法律也变得非常的强硬，而现在各州的大麻法律有了很大的区别。一些州将大麻定义成与酶斯卡灵（mescaline，译者注：一种致幻剂）和可卡因一样的毒品，而其他的州却将它归到一个单独的合法目录下。在纽约州，如果你拥有少量不到一盎司的大麻，而且假如你是初犯的话，你会遭到100美元的罚款处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你有可能获得长达20年监禁的判罚。在蒙大拿州，如果你也是初犯，销售了一磅的大麻，那你就非常不走运了，就会遭到终身监禁的处罚。在新墨西哥州，也是初犯，而且贩卖的是一万磅的大麻，代价有可能只有不超过三年的监禁。在某些州，如果你的房间里有人吸大麻，即使你不吸，你也触犯了法律；另外，如果有人使用你的财产，例如，在你的房间吸食大麻或者倒卖大麻、使用你的土地种大麻，你都有可能面临犯罪指控。在爱达荷州，贩卖吸食大麻用的吸管有可能换来九年的监禁。而在肯塔基州，如果使用大麻的纤维制作纸张和服装，它不仅是犯罪行为，而且从理论上讲，你将得到和拥有等量大麻一样的惩罚。

如果携带大麻开车越过那条看不见的州界线，也会导致非常迥异的惩罚。假设发现你携带三盎司大麻在俄亥俄州尤宁城内开车，可能会罚你 100 元美元，但是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公路上，麻烦可就大了，你可能会面临下列的惩罚：六个月到三年的监禁、10000 美元的罚款、一项重罪记录、吊销驾驶证、没收车辆，以及面临拥有大麻的指控、持有大麻且试图贩卖的指控和“公共妨碍”罪（使用汽车的一种违法行为）的指控。要是你在印第安纳州被捕，就要承担 10000 美元的罚款、至少 5000 美元的法律费用，再加上没收汽车。相差如此巨大的惩罚不仅仅发生在不同的州之间，就是在同一个州里的不同的县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例如，在伊利诺伊州的拉萨尔县，持有 300 磅大麻的初犯可能获得四个月的集训营处罚，而同样的案例如果在麦克莱恩县，这个罪犯可能就会受到四至八年的监禁处罚。

至少美国有 20 个州，如果任何大麻罪名成立，就可以应用联邦法律的“抽一支大麻烟，就会丧失你的驾驶证”的条例，而且不管你是在哪里被捕的，都会吊销你的驾驶证。也就是说，假设一个人从来没有在大麻的影响下开过车，而且他的确是因为在家中客厅的躺椅上吸食大麻而被捕的，此时他的汽车也安全地停在路边上，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的处罚还是比醉酒驾车严厉得多，要被吊销驾驶证。

2001 年，全美国因为触犯大麻法律而被捕的人大约有 72 万 4 千人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同年因海洛因和可卡因犯罪的人数，接近 90% 的大麻被捕者只是因为简单地拥有大麻，多数案件的犯罪行为只是轻罪行为，这些人只是在监狱里被关了几天而已。但是如果拥有超过一盎司的大麻，大致相当于一包普通香烟含有的烟草重量，在许多州都是重罪。罪名成立的人将会受到几



个月或几年的监禁并且会丢掉房子和工作。那些将大麻用作药品的人，他们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从毒品贩子手中购买或者自己种植大麻，然而这两种选择同样是违法行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圣路易斯的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因为种植大麻而遭到15年监禁的判决，在判决后，他和他妻子曾经试图自杀；北卡莱罗纳的一个艾滋病患者奥尔兰德·福斯特(Orland Foster)也因为种植大麻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而他的狱友的监禁判决还不到15个月，可是你知道吗？他的同室狱友监禁的原因是杀害了一名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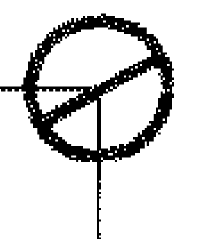
也许下面所述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塞尔(Sayre)，一位下身瘫痪的病人吉姆·蒙哥马利(Jim Montgomery)，他经常吸大麻用以缓解肌肉痉挛，当地的治安官员在他的轮椅后面发现两盎司的大麻后将他逮捕。随后，吉姆受到陪审团的多项指控：拥有大麻且试图贩卖、拥有使用大麻的随身工具以及非法拥有枪支（有两把从他父亲继承的两把手枪，他父亲生前是一名警察）以及维持一个受控制品的地点四项指控，建议终身监禁外加16年的监禁。面对陪审团做出的判决，法官和检察官都感到惊骇不已。后来，法官将监禁的时间减到了10年。在花了30000美元的法律费用并上诉失败后，又暂时将他关进牢房，没过多久，就由于医疗原因将他释放，而政府最终也没能没收他和他寡居母亲共同居住的房产。

俄克拉荷马州对染指大麻的人来讲简直就是个噩梦，它恐怕是美国对待大麻罪犯最严厉的一个州。1992年，拉里·杰克逊在他朋友的塔尔萨市的公寓里被捕，因为一名警察发现在杰克逊右脚边的地板上有少许的大麻，其重量大概有0.16克合0.005644盎司，结果，杰克逊受到拥有大麻的重罪指控，随后被判罪名成立

而且被处以终身监禁。在俄克拉荷马市，利兰·詹姆斯落入了警察的圈套，他试图从便衣警察的手中购买50磅的大麻，利兰因此被判处两个终身监禁外加10年监禁。

俄克拉荷马州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将被政府诱骗购买大麻的人判处终身监禁的地方。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Tuscaloosa County），卡车司机威廉·斯蒂芬·邦纳（William Stephen Bonner）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其原因就是一名州毒品探员把40磅的大麻送到他的卧室。另外一个案例是，一名叫雷蒙德·波普（Raymond Pope）的佐治亚居民，被人引诱到阿拉巴马州的鲍德温县，诱饵是那里有便宜的大麻，其结果显而易见，他落入到当地治安官的圈套里，当他购买了27磅的大麻后，遭到逮捕并判决其罪名成立且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波普的犯罪记录还包括以前在佐治亚的汽车旅馆偷过多台电视和床单。道格拉斯·拉马尔·格雷（Douglas Lamar Gray）在阿拉巴马州摩根县的伊克诺旅馆里向一名政府的告密者订购了一磅的大麻，交易非常像一个真实的交易，而当他付出900元美元后，格雷被逮捕，随即遭到审讯而且判其罪名成立，最终格雷被判处25000美元的罚款和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送到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去服刑。格雷是一位腿部使用假肢的越战退伍军人，在格雷遭受隔离羁押的重压下，格雷的妻子曾经试图用手枪自杀，虽说幸免于难，但最终还与格雷离婚了。

虽然对购买、贩卖或拥有大麻的判罚通常都很严厉，但是对种植大麻的判处更严厉。在爱荷华州，种植几棵大麻就意味着五年的监禁；在密苏里州，会判七年监禁；田纳西州会判15年监禁。在弗吉尼亚州，一旦对种植大麻的行为起诉，州法建议的惩罚是种植一棵大麻相当于5~30年的监禁。



摩根县的一家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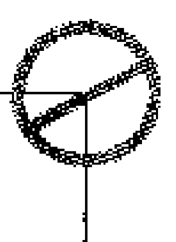
1988 年 11 月，克劳德·阿特金森（Claude Atkinson）和欧内斯特·蒙哥马利（Ernest Montgomery）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机场附近的一家丹尼店（Denny's，24 小时营业的廉价餐馆，连锁店遍及美国东部）里见面，探讨大规模种植大麻的计划。阿特金森是位 49 岁的印第安纳州本地人，他种植大麻的技术非常高超，名义上是农场推销商。阿特金森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建立了许多大规模种植大麻的农场。他种植大麻的经验和技术显然比逃避拘捕高明得多，1984 年执法部门在印第安纳州帕拉冈（Paragon）的大麻种植农场将其逮捕，之后他又因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巨型仓库里用人工灯光种植大麻被捕，而在 1987 年，一个猎鹿人偶然在印第安纳的一块地里发现了他种植的数千棵大麻，他又遭逮捕。克劳德·阿特金森并没有理睬与政府的交易，也没有出卖过其他人，在监狱中多次服刑。在监狱里，他为了今后的冒险又招募了新兵。出狱后，他虽然一贫如洗，但他随时准备重新种植大麻。欧内斯特·蒙哥马利是个 40 岁的失业卡车司机，一心想要挣大钱。他们见面后一拍即合，当下决定由蒙哥马利出资，阿特金森提供技术保障，好好大干一场。随后，克劳德·阿特金森在印第安纳州政府用“阿诺·策普”（Arno Zepp）的假名注册了一家名为“R. P. Z. 投资公司”的影子公司，“阿诺·策普”只是他众多假名中的一个而已。

那个秋季，在阿特金森指导和监管下，他们在位于戈斯波特（Gosport）的蒙哥马利的隐秘小屋的地下室内修建了一个大“栽培室”，蒙哥马利还将他的弟弟，一个有轻度酗酒问题的挖墓

者，招募过来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在水泥地面上钻了许多用于排水的小孔、安装冷却系统、铺上沙石、安装反射镜、在天花板上安装了许多上千瓦的卤光灯，随后在小罐子里种上大麻的种子，并且他们还安装了一个电子发生器以防被检测仪器发现。蒙哥马利还将他朋友的儿子大卫·李·海恩斯（David Lee Haynes）和一个在木场负责锯木头的小伙子招至门下，负责照看这些植物。杰尔·蒙哥马利忙完白天的挖墓工作后，每个晚上还要到这个阴暗的地下室管理并修整大麻。到了翌年的春天，十六块胶合板上长出了大约12500棵大麻幼苗。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农场。

1989年的5月，一个年迈耳聋的老太太玛莎·布鲁梅特同意将她位于摩根县艾米嫩斯（Eminence）和科洛弗代尔（Cloverdale）之间的农场租给R. P. Z. 公司，这是个接近40英亩的农场，还有一个大农舍，产权待售。玛莎·布鲁梅特觉得发生的一切非常令人诧异，出租的异常顺利，因为这个名叫“查理·彼得斯”的人连车都懒得下，甚至没有进农场看一眼就与她签订了合同，当场给她一万美元现金，她随后将这些现金存入了银行。

随即，欧内斯特·蒙哥马利和他的妻子辛迪与“R. P. Z. 公司”签订了一个租用农场的假合同，他们将“R. P. Z. 公司”作为一个法律缓冲区，由公司负责如何利用这块土地，大卫·海恩斯则搬进农场“照顾”大麻的种植工作。这个小团队开始耕地、施肥并种下玉米，当玉米长到足够高的时候，他们开始在玉米之间移植大麻。夏天，他们行走于垄间剪除大麻的雄株，使留下的雌性大麻的蓓蕾产生更多的delta-9-THC，成为更有价值的农产品——大麻。9月末，玉米变黄的时候，也迎来了大麻的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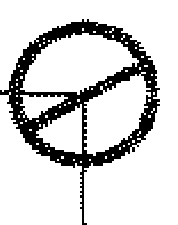
随后在农舍内对大麻进行加工。剪切过的大麻大约一英尺宽三英尺长，像是一个个的“账本”，这些“账本”送到农场的住房或是戈斯波特的小屋再进行细加工，除掉茎干、分离大麻叶并用风扇将叶子风干。所做的一切看上去都非常完美，很快，他们就拥有了大约900磅的优质大麻。现在，他们迫切需要的就是买家。欧内斯特·蒙哥马利想起了与他妻子见过几次面的马克·扬，他也许知道谁是合适的买主？

马克·扬当年36岁，少年时代就开始吸大麻，他那时每天都抽大麻。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东边一个中产阶层的地区长大，当他只有两岁时，父亲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和妹妹安德里亚在母亲玛丽的照料下成长起来，母亲做服务员或舞女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扬自小就是一个任性、固执而且讨人喜欢的小孩子，但是他经常惹麻烦。恶作剧、小偷小摸始终伴随他的成长。他的运气似乎很差或者说差得有些离谱，因为别人事后总能逃脱，而他总是被逮住。他读了一年高中后辍学，十六岁时就做了父亲，他结婚给孩子起了名字后，随即就离了婚。那时候，他做过的工作五花八门，例如，铺地毯、洗盘子、浇筑水泥、看管酒吧、卖二手车以及翻修哈雷摩托车。他有一本喜爱的哈雷摩托车图片的小册子，与当地的摩托帮很熟，但是却与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他的生活似乎永远充满着麻烦。他约会过许多女孩，经历过短暂的同居生活，同时也慢慢地积攒了一些轻罪的犯罪记录，其中包括：无照驾驶、拥有大麻以及拿走女友的收音机等等不良记录。他还受过两次重罪指控：21岁时，使用假处方试图骗取口服避孕药；25岁时，拥有少量的安非他命和安眠酮，上述的两次重罪曾经带给他缓刑和一美元的处罚。当欧内斯特·蒙哥马利和他联系的时候，他正在干翻修摩托车、批发二手车的生意，当然他

也在寻找新的赚钱的路子。那时候，他已经有许多按摩院的股份，不过很不幸的是，现在那些按摩院也都关张了。他的梦想就是挣一大笔钱，移居佛罗里达州，给人定做哈雷摩托车，在奥基乔比湖做个兼职钓鱼导游。

克劳德·阿特金森、欧内斯特·蒙哥马利和马克·扬10月初在扬的家里见面，他们商议的大麻价格是每磅1200美元，如果扬找到买主，每出售一磅大麻他将获得100美元的佣金。没过多久，阿特金森和蒙哥马利再次来到扬的家，在那里他们见到两个人，据他们讲，他们是受人委托想买断所有的大麻。但是，由于那些大麻正在加工处理当中，所以，阿特金森表示，在一个星期内只能提供100磅的大麻，还不能完全交货。几天后，一位来自纽约的人带着一个装有12000美元的纸盒来到扬的家中，之后又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蒙哥马利家检查大麻质量，而阿特金森则在后面清点钱数，第一笔交易就这样完成了，扬从蒙哥马利的手中拿到了10000美元，这个纽约客最终买走了600多磅的大麻，而交易的地点都在蒙哥马利的家里。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些高质量的大麻全都出手了，除去纽约客买走的600多磅，剩下的200磅大麻，他们给了干活的工人一些，其余的都卖给了蒙哥马利在伊利诺伊州的朋友。

由印第安纳波利斯向西大约25英里，有个叫艾米嫩斯(Eminence)的小镇，小镇唯一的十字路口附近有一家国民银行(Citizens Bank)、一座小教堂、一个便利店和一个蓝色的混凝土建筑物——邮局。这个小镇以拥有180名居民而自豪，看上去这个小镇从大战以来就没有盖过新建筑。在美国的中西部，有不计其数的类似艾米嫩斯的小城镇，虽说这些小镇日渐落寞，但是它们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如果要是去“R. P. Z. 投资公



司”租用的农场，你必须先由窄小的公路离开艾米嫩斯，然后转道一条土路再开上一段时间，经过一个40英亩到100英亩的原野。那里长满了玉米、干草（注：如红花草或紫花苜蓿等经切割晒干后用作饲料的草或其他植物）和小麦，然后再经过几个简陋的农场，这些农场有几个破农舍、有个临时活动房车以及几辆生锈的破车，毫无生机。再向西开一会儿，就到了。土地变得平坦起来，有许多一块一块的土地，每块地的面积都很大很大，有树桩和树作为地界围着那些地，让你觉得这些乡下的居民世代就住在这块土地上。在清扫了农舍后，阿特金森和蒙哥马利就中断了与玛莎·布鲁梅特的农场租借合约。这个有过传奇故事的农舍被后来的租用者漆成了浅褐色、谷仓漆成了大红色。房子前面有个走廊，它的边上有个小院，甚至草地上还有个秋千。看着这个不起眼的美国农场，恐怕没人能相信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这个农场曾经种植过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的大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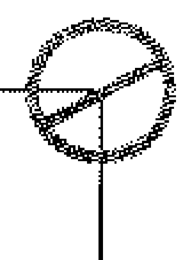
这个行业的秘密

史蒂夫·怀特（Steve White）看起来就像是个极普通的印第安纳州农民，蓬乱的头发、灰胡子、一口满是烟渍的牙齿以及一双有力的大手。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穿着旧法兰绒上衣、灰裤子和一双旧工作长靴，说话时有些轻微的乡下鼻音，开着一辆小货车。当时，怀特是缉毒局清除及抑制大麻项目的印第安纳州协调员。在此之前，他在印第安纳已经做了20年的缉毒局特工，而且是秘密特工。他几乎清楚地了解该州的每一寸土地，长年步行或开车巡视各地，每年的夏季都驾驶飞机低空飞行，巡查每个小山丘和农田。他和当地的农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没人想到他是个

警察。他生长在纽约并在那里上完小学。他的父亲在华尔街工作。除了跟踪打击毒品贩子之外，这位怀特特工每年都去伦敦收集古老的英国玩具士兵。在任何虚构的小说中，他都有可能成为难以置信的主人公。精明能干、思路清晰、谦逊、直率，使得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他的大麻知识甚至比那些被捕的罪犯们都丰富。

怀特告诉我，克劳德·阿特金森堪称种植大麻的天才，也是个超级推销员。那段时间，他们正好是在艾米嫩斯的附近进行一般范围的巡视，即使是在空中也很难发现隐藏在玉米地中的大麻。这时，怀特用无线电通知他的手下："记得西北部的北面吗？卡利·格兰特在玉米田里吗？我们以前没看到过垄宽这么宽的玉米地，看起来农作物长的浓密了些。"有时候，大麻种植地东一块西一块地分布在上百英亩的农田里，你发现了一处并不意味着能发现其他的大麻种植地。种植者之所以隐藏起大麻种植地，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躲避政府的巡视，而是对付那些偷大麻的贼。围绕着大麻种植已经形成了一个隐秘的、不为局外人所知的美国乡下黑社会。当时，乡下正流传着一些流言：现在，在中西部有一大批被称为"田间盗贼"(patch pirates) 的人。所谓"田间盗贼"是指那些只靠偷大麻维持生计的人。怀特他们一直都在跟踪这些盗贼。怀特承认，种植者那些掩人耳目的手段是为了对付这些盗贼，而不是为了对付他们这些特工。"不过鱼钩和鱼线一样重要，关键是要钓到鱼。"

尽管怀特的特工们最近在蒂帕卡努县的一个农场里发现过"60000 棵美丽的植物"，但是户外种植大麻的农场为了躲避侦查，其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个案子的结果很令人失望，缉毒局找到种植大麻的嫌疑犯后，检举人却没有对他们起诉。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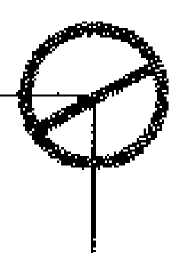
特抱怨道："我要的是逮捕这些人而不是给大麻定罪，那些东西只需一把火就可以烧干净。"他的日常工作就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双方不停地变换战术，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即使逮捕了大麻种植者，他也会颇为友善地同他们交流大麻交易的窍门儿。怀特并不憎恨他的猎物，他曾经说过，"这些人不是海洛因和可卡因贩子，他们没有暴力倾向，我甚至觉得他们还有些个人魅力。"可是毕竟他们在触犯法律，所以怀特还是喜爱追捕他们的这项工作。

史蒂夫·怀特拿出一张美国地图并在上面画了个圈，他圈定的地域包含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歇根、俄亥俄东部的一部分、肯塔基和田纳西的南部、密苏里、爱荷华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西部。据怀特讲，美国绝大部分国产大麻都来自上述地区，而室内种植的价格昂贵的大麻都来自西海岸，但从数量上讲，其他地区的大麻产量很难赶上美国的中部地带。怀特对这些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在二次大战时期，美国政府大力提倡人们种植大麻。那时，这个中心地带大约有20万英亩的大麻，其目的就是替代亚洲进口的大麻纤维，因为当时日本切断了亚洲对美国的大麻纤维的出口。那个名为"为了胜利的大麻"的项目后来演变为一场财政危机，同时也留下了遍布这个中心地带的野生大麻。现在，这些被称为沟边杂草的大麻多达成千上万英亩。由于它含有微量的delta-9-THC，所以多年来，毒品犯都将它用于烟叶的使用。有证据表明，这些沟边杂草可以同户外种植的大麻进行异花授粉，那些适宜玉米生长的条件和土壤同样适合大麻的生长。许多当地的治安部门都有三到五人专门负责搜寻大麻。在过去的20多年里，许多有着丰富种植经验的、又想赚大钱的人都转向种植大麻，因为其他农作物不可能带来如此丰厚的利润，比如，

一蒲式耳的玉米只卖二美元，而一蒲式耳的大麻至少能卖到七万美元。怀特认为大麻是美国最大的经济作物，在印第安纳州，即使大麻的产量不是第一位，至少也仅次于玉米和大豆。

在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美国几乎所有的大麻都是从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牙买加进口的，后来许多事件造成了美国国内大规模种植大麻。1975年，墨西哥对大麻种植地进行空中喷洒除草剂——百草枯，其结果引发了美国国内对进口大麻产品的恐慌。美国公共健康总署警告，如果吸食那些带有百草枯的大麻会对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1980年代初，由于美国边境巡逻队和美国海岸警备队成功的努力，使非法走私进口大麻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美国政府出台了更加严厉的针对毒品运输的联邦法律，加之大量的大麻带有一股强烈的气味很容易被发觉，所以这些都刺激了毒品犯转向走私更容易隐蔽的而且还能够带来更多利润的可卡因。由于美国大麻价格的飞涨，美国本地的大麻种植者也就顺势迎合了国内的需要。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负责毒品政策分析项目的马克·A. R. 克莱曼认为，这一现象是保护主义作怪的突出实例，进口的羁绊哄抬了价格，使得国内的产品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现在美国有些大麻每盎司的价格比黄金都贵。

反毒品运动和美国国内大麻种植业的繁荣使得缉毒局在调查大麻上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克莱曼估计，到1988年底，联邦政府在反大麻上的费用高达9.7亿美元，大概占了联邦毒品管制费用的20%至25%。目前，联邦政府花费了大约40亿美元用来打击大麻。缉毒局最初只是在197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州开展了清除/镇压大麻项目，现在，联邦特工在所有的50个州都在搜寻被大麻种植业的业内人士称为“栽培”和“园艺”的大麻种植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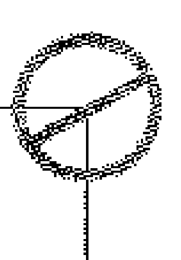
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地说出美国的大麻产量，那些由政府和其他机构公布的数据也是非常不确定的。2000 年，缉毒局清除了大约 260 万磅的国产大麻，之前，缉毒局声称他们没收的大麻数量超过了国内产量的一半以上，而批评家则认为缉毒局实际上只发现了国产大麻的 10% 到 20%。单从美国的大麻价格上看，有每磅 400 美元的新墨西哥州劣质大麻，还有每磅超过 7000 美元的被称为“北极光”（Northern Lights）和“阿富汗库什”（Afghan Kush）的“精品。”很显然，美国黑市的大麻数量肯定是巨大的。

那些把大麻用于商品交易的种植者逐步将室外种植转到室内种植，使用人工灯光和水栽培技术种植大麻，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大麻盗贼并降低被政府发现的风险，而且这种种植技术也可以控制大麻生长的进程。室内种植一年可以收获六次，像浴缸大小的面积就可以种植 30 棵大麻。我曾经问过史蒂夫·怀特他发现过的室内种植大麻的地方，他大笑道：“很难讲一个准确的地方，哪都有可能。”例如，一所房子的夹壁墙、有二层却没有楼梯间的房子或者在地板下的只能爬行的空间，都有可能是大麻的种植室。怀特曾经在孩子的壁橱里面发现了隐藏在玩具后面的大麻种植室的入口。缉毒局现在把热成像设备安装到直升机和低飞巡逻的飞机上来探测反常的热源，这样就有可能发现室内的大麻种植地。当然，那些反常的热源也有可能是陶器制作场所或者“极可意”水流按摩浴缸（Jacuzzi），这些只能依赖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才能区分出来。怀特认为发现室内种植大麻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你的鼻子，因为大麻能散发出强烈的味道，无论你使用多好的通风设备以及电子设备，你都不能中和空气中的大麻气味。不久以前，室内大麻种植的规模就相当宏伟，在印第安纳州

的安德森市抓到了一大批种植大麻的人，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还去过以色列专门学习水栽培技术，他们在一个房屋内种植了8000棵大麻，而且还把墙改造成一英尺厚以防止红外探测。而现在，大麻种植者通常用假名字和现金租用多个贮藏室和公寓，在多处建立大麻的种植室，而且室内配备定时器和自动控制系统，基本上是无人看管，这样即使当局发现若干地点，也不太可能发现全部的种植地点，而且，大麻种植者早就把这些损失提前考虑进种植计划。

我曾经问过怀特，对印第安纳州大麻种植的执法工作是否有过无奈和无意义的感觉，他的回答是："我并不是傻瓜，坐在这里对你说，我们要根除大麻。"不过很明显，他丝毫不怀疑缉毒局的尽职尽责、清剿大麻的行动具有强力的震撼作用。他接着说："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有一架直升机，当发现大麻的时候，就有人从直升机上下去检查，可能我不愿意这么干。"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犯罪司法学的教授拉尔夫·魏斯海特并不认识史蒂夫·怀特，但是他对美国中西部大麻种植的看法和史蒂夫·怀特的观点一致。魏斯海特第一次对大麻种植感兴趣是在1980年代中期。一天，一则电视新闻报道了一位伊利诺伊的老农民因为种植大麻被捕，而这位农夫和他的儿子从不吸大麻，他们种大麻只是为了赎回他们的农场。这引起了魏斯海特对大麻种植的兴趣。在得到美国司法部的同意后，他开始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大麻种植研究。他采访了五个州的多名执法官员和许多因大麻被捕和定罪的种植者。在他的《国产大麻，一个被忽视的产业》(*Domestic Marijuana, A Neglected Industry*）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美国大麻的历史以及一些大麻种植者。魏斯海特也认为，绝大部分美国的国产大麻可能都来自于史蒂夫·怀特曾经提过的那九个



州，他同样认为大麻是美国最大的利润巨大的商品作物。

据估计，美国大约有1000万到3000万人种植大麻，其中大约有10万到20万人是商业种植者。通常这些大麻种植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一些人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赚钱。1980年代农场转型期，他们就开始种植大麻，发现种植大麻非常容易赚钱而且工作也相当简单。正像一个大麻种植者告诉魏斯海特的那样，“你知道，我花了一辈子的精力努力清除杂草，所以对我来讲留下一种杂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还有些天生的“老手”，他们尝试建立大麻帝国，不太在乎大麻交易带来的风险。而另外一些种植大麻的人不太有商业意识，他们只是将大麻送给朋友或以稍高于成本的价格将大麻卖出，与他们的邻居共享大麻种植的技术，相互比较各自种植的大麻成色，就像是在夸耀家产的西红柿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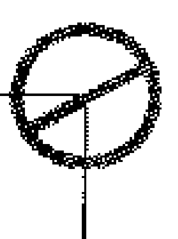
在大麻的种植者当中，有受过教育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极为隐秘，没有几个人属于“全国倡导修改大麻法令委员会”（NORML），很少有人读过《高潮时代》（*High Times*）①，几乎没人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某些名单上，因为那样可能会引起怀疑。室内种植非常吸引那些热爱发明创造的人，无止境的发明以及制作精巧的设备都用于室内种植，从计算机控制的供水系统到可以前后均匀洒水的电子平台应有尽有。一些大麻室内种植者已经成为专业人士，具有高超的技艺，他们不仅可以生产少量的优质大麻，他们还可以通过杂交育种或杂交繁殖等手段，调节大麻的delta-9-THC的含量，也可以

① 在美国已有30年历史的杂志，早先以其推广“大麻文化”而建立了响亮却也极负争议的名声。——编者注

增加或者减少大麻的其他化学成分（指任何一种成分，如大麻醇、四氢大麻醇等）。魏斯海特见过多位同样对大麻有着极度热情的大麻种植者和执法官员，同他们详细探讨了关于改良大麻成分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在他的书公开发行后，他颇为惊讶，两大阵营都没有对书中的描述有什么争议，可是魏斯海特的母亲对书中主要观点有一点不满，他母亲非常反对毒品，"我不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是，书中将那些种植大麻的人描写得就像普通人一样。"

一天深夜，我见到了一个自称大卫的大麻种植者。他连续种了十几年的大麻，从室外种植开始，逐步发展到复杂的室内种植。大卫对他的工作极为自豪，出于可理解的高度警惕性，他非常遗憾不能与他的朋友们分享他的室内种植技术。他的室内大麻种植室秘密地建造了几个星期，就像是一个用手工组装的工厂，它使用了价值五万美元的高科技溶液培养设备。当种植室完工的时候，它是那样的完美，大卫禁不住产生了要为它举行开工典礼的念头，当然，他及时地打消了这荒唐的念想。虽然大卫非常讨厌园艺而且从来就没通过一门理科课程，但是如今，他掌握了丰富的大麻植物学、植物生物学的知识和先进的温室管理技术，这些也只有像特工怀特才能欣赏的东西。当他抽完一棵用刚收获的大麻卷成的大麻烟卷的时候，他开始徐徐道来，谈到大麻给他带来的愉快、风险以及他比喻为"在室内扮演上帝"的他的工作。

在一个假墙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秘密入口，附近的邻居休想发现它的存在。大卫的种植室比通常的大得多，生长着数百棵的大麻，它们生长在一个用矿毛绝缘纤维（rock wool）制成的容器内，外面连接着带有许多白塑料管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大麻的容器上面悬挂着许多极亮的高压钠灯，需要用一个特别的变压器提



供强大的电源才能启动，天花板上是一个燃烧天然气的二氧化碳发生器。窗户完全是封闭的，种植室内非常暖和，空气的湿度也很高，整个房间充满了新鲜干草（如红花草或紫花苜蓿等）的刺激性气味。它就像一个没有玻璃窗的温室，除了小细管里上水的声音外，室内非常的安静。

当所有的设备正常运转后，大卫开始对大麻生长的必要条件进行调控：空气、光线、温度和水。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不可能有风，所以必须有个通风系统产生风，而且流动的空气中还需要含有丰富的二氧化碳。当户外温度很低的时候，大卫使用吊在天花板上的二氧化碳发生器给室内的空气“施肥”，泵和定时器会自动浇灌这些植物，当然它也给大麻提供土壤含有的氮磷钾营养液。在室内成功种植大麻的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就是光线和黑暗的时间比例，在某一段时间内，大卫的高压钠灯一天要开 18 个小时，它可以将室温升高到华氏 100 度，而在大麻雌株繁殖期间，室内就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黑暗，哪怕只有两尺烛光的亮度就足以破坏蓓蕾里的 delta-9-THC 的微妙的积聚过程。据大卫讲，如果在错误的时间打开手电筒，那些光亮就能毁灭那些大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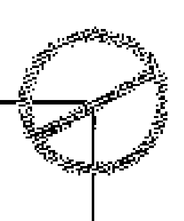
大卫是一个真正的大麻种植专家和鉴赏家，他种植的都是来自阿富汗东北部兴都库什山脉的昂贵大麻。当他讲到有些户外大麻种植者将那些依旧潮湿的大麻塞到塑料垃圾袋里的时候，他苦笑了一下，露出厌恶的表情，就像酿酒大师见到他人胡乱处理葡萄时的表情似的。他接着说：“大麻的蓓蕾非常容易碎，你必须小心处理那些成熟的花蕾，然后必须立刻密封，这样才能保持大麻的香味。”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成品，深绿色带有芬芳气息的大麻，味道就像罕见的外国香料。

室内种植大麻比户外种植需要更多的工作，但是室内种植大

麻也存在潜在的危险。如果液体飞溅到炽热的灯泡上就会引起灯泡爆炸；水管破裂的话，几百加仑的水顷刻就会淹没整个房间；断电会使整个系统崩溃。如果监控营养液不当，它很快就呈酸性，用大卫的话讲就是“它会给大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将会弄死所有的大麻。如果二氧化碳发生器（许多大麻种植者都使用的）的喷嘴使用不当，会引起天然气爆炸，保险公司肯定不会对此进行赔偿。更为普遍的、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昆虫也会伤害那些昂贵的大麻幼苗。大卫已经和小蜘蛛、温室粉虱和蚜虫周旋了很长时间，但是在封闭的房间里使用杀虫剂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它会给吸食者带来某些风险。大卫采用的是生物控制法，用饥饿的食肉幼虫来除掉不想要的害虫。他最近在房间里释放了几千只小黄蜂，这种做法看似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的确有效。在旁边的冰箱里，他始终保留着 500 个瓢虫的卵以备急用，就放在苏打水的旁边。就在我们见面之前，他还在室内放了许多的黄蜂，不过他在黑暗的房间里走动的时候也遭到了成群的小黄蜂的叮咬。

职责所在

在 1990 年 3 月 18 日，几个印第安纳州约翰逊县的治安警察发现了一辆开得不稳定的红色吉普车，于是命令司机到路边停下接受检查。他们发现了醉醺醺的杰尔·蒙哥马利，当时汽车里有三个空伏特加酒瓶、一个装满大麻的三加仑水桶和一个装有 13000 美元现金的灰盒子。在获得搜查许可证后，治安官员搜查了蒙哥马利的家，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大麻以及一个藏在床下的文件箱。当代理治安官约翰·麦尔斯用螺丝刀打开文件箱后，发现



箱内藏有农场设备的发票、涉及到"R. P. Z. 投资公司"的文件、与玛莎·布鲁梅特的协议以及几本关于种植大麻的书籍——《室内大麻园艺》、《一流的植物》和《在灯光下如何种植室内大麻》。

上述调查导致了当局对位于格林县索尔斯贝里附近的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搜查，这个农场的拥有者是"阿诺·策普"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同年的8月22日，联邦、州和当地执法部门的侦探逮捕了克劳德·阿特金森并搜查了农场。在印第安纳警备队的帮助下捣毁了10000株大麻，被捕后的阿特金森很快就开口坦白了一切。1991年5月，欧内斯特·蒙哥马利在戈斯波特的小屋子里被逮捕，同时缴获了种在小罐子里的7000株大麻秧苗。同一天的早晨，马克·扬也被人叫醒，扬不像他的农场主合作伙伴那样，他没有种植任何东西，当时他和女朋友帕特丽夏正要搬往佛罗里达。当他看到一个胸佩警徽腰别手枪的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扬当时茫然不知所措，还以为是因为逃税招致警察上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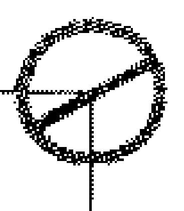
十多名执法官员包围了他的房子，此次行动的指挥官——缉毒局的侦探非常客气地对待马克·扬，让他穿上衣服并且同意不在邻居面前给他戴手铐。在警局里，扬见到了对他的指控书，他被控涉嫌贩卖700磅大麻并共谋在玛莎·布鲁梅特的农场种植12500棵大麻的指控。他到那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日后他要面临的严重惩罚。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担保人下午到警局试图保释他，但是政府拒绝接受保释金。参照印第安纳州的严格法律，若是两项罪名成立，最多会被判处28年监禁，或者14年甚或更短的监禁。可是如果依据联邦法律，同样的两项重罪指控，再加上他的年龄已超过17岁，就可以将他视为职业毒品犯，这就会给

他带来第三个判决，马克·扬即将面临一个可能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现在的判决规则

自从美国国会成立的那天起，美国就有了强制性的最低刑期判决，不过这样的判决通常都是针对特指的一些犯罪。在某些书籍里可以发现许多从前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例如，1790 年"海盗掠夺行为"和 1915 年"在中国制药和贩卖毒药的行为"的案例。国会随后又压倒性地通过了多款刑法，开始只允许最高限判决。对联邦法官来讲，最高限判决具有历史意义。联邦法官决定是否给予罪名成立的罪犯最高刑期判罚或者轻罪判罚监外执行的判决。直到 1987 年，联邦法官依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进行判决。为了避免公民遭到过分的惩罚，国会只是设立了上限。假释是另外一种避免罪犯受到不适当的严厉判决的一种手段，它可以决定囚犯何时可以提前释放。

1951 年，国会通过的《伯格斯法案》第一次广泛定义了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当时的美国正处于麦卡锡时代的顶峰，又处于朝鲜战争的紧张时期以及国内对共产党颠覆的恐惧阶段。那时候，美国年轻人使用麻醉品的现象日益增多，而人们认为那些仁慈的法官对此又过于宽容。国会议员们似乎对毒品犯罪比以往严厉了许多。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倾向立法，这样就可以将那些把毒品卖给未成年人的毒品犯处以死刑；国会议员埃德温·亚瑟·霍尔（Edwin Arthur Hall）建议应该对毒品犯判处 100 年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另一位国会议员 L. 加里·克莱门特（L. Gary Clemente）则建议对再次触犯《麻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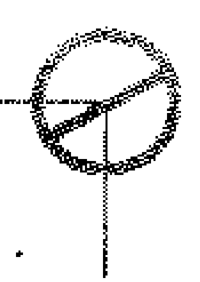
药品进口和出口法案》（*the Narcotic Drugs Import and Export Act*）的毒品犯处以死刑；而 FBN 的负责人哈里·J. 安斯林格似乎比较温和，他建议对再次触犯法律的罪犯处以五年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处罚，他相信国会“完全可以清除毒品交易。”随后，国会接受了安斯林格的建议并且在 1956 年延长了反毒品强制性判决。当时，美国监狱管理局的负责人詹姆斯·V. 班尼特（James V. Bennett）对新实施的判决制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样改变法律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行为。结果班尼特遭到 FBN 特工的秘密跟踪，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到 1960 年代后期，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人士普遍认为针对毒品采用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罚并不成功。许多国会议员、联邦法官甚至检察官都认为这种判罚过于严厉而且不公平。最糟糕的是它并没有起到防止麻醉品使用的作用，1960 年代毒品文化的蔓延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厉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而停止过。1970 年，国会废除了几乎所有的对毒品犯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惩罚。国会议员乔治·H. W. 布什预言这些“刑事改革”一定会“使司法更公正，产生一个更适当的法律判决。”一场旨在寻求决定监禁刑期的新方法的运动正在兴起，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法官缺少自由度会带来不公平，而法官过高的自由度同样也会导致不公平。过去，佛罗里达州对一个毒品犯会处以 20 年监禁的判罚，而同样的罪名，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官会给出缓刑的判决，反差如此之大。纽约的联邦法官马文·弗兰克尔（Marvin Frankel）建议建立一个可以保证在判决中更加公正的新的司法系统，而且法律专家应该参考犯罪的性质以及罪犯的犯罪纪录，设立一个如何针对各种犯罪判罚的指导方针。

1984 年，国会经过深思熟虑，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判决改

革法案》(*Sentencing Reform Act*),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支持,并建立了美国判决委员会(the U. S. Sentencing Commission)。回想当年,当时启用专家作为政府的理想模式的时候,社会的嘲讽曾给改革时代蒙上的阴影,而这一刻却似乎是法理战胜了大众的鼓噪。仅仅18个月的时间,委员会就更改了对2000多种联邦犯罪的千差万别的判罚。在全新的规则下,触犯每款联邦法律都有一个固定的数值,法官按照各种标准添加或减少,最终的判罚则是依据罪行的数值总数,再参照一个表格中此数值相应的刑期。法官也可以不参照这些判决法则,但是他必须提供相应的解释。判决后,被告或者检察官都可以提出上诉。

就是通过《判决改革法案》的那个国会在这个法案里也保留了适用于那些将毒品卖到学校的毒品犯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罚。而两年后,国会又放弃了1986年通过的《反毒品滥用法案》,放弃了那些深思熟虑过的判罚指导方针,代之以生硬死板的法律条款,对各类毒品犯施行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判决。当时,马里兰大学的篮球明星莱恩·拜厄斯(Len Bias)刚刚因为可卡因死亡,这一事件使反毒品的情绪又达到了新的高峰。那年是大选年,所以那些法律制定者决定再次对大众显示一个有力的信息,参照毒品犯涉及的毒品总量,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判罚可以是五年、十年或二十年的处罚。随后,基于“三振出局”的规定,又对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判决进行了补充,可以对那些多次触犯毒品法的罪犯处以终身监禁。可是在国会对强制性判决的争论中,很少涉及到《伯格斯法案》失败的判例,很少探讨新法律是否与判决规则相抵触,也没有涉及到在诉讼初期到最终的关押判决期间,它可能会对犯罪审判系统产生何种影响。据当时的一个民意调查,普遍接受这些严厉判罚的理由就是对报应的渴望,也就



是法律上称谓的“仅仅是应得的赏罚。”

在美国成立后的最初200年，任何罪名成立的罪犯大多数都可以请求法官宽大处理。那时，法官在觉得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刑期甚至可以做出免除监禁的判决。这个新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的法律剥夺了法官的这个权力，而将其赋予了检察官。现在，一名美国检察官拥有独有的权力：是否对一个特定的案例实施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判决，即是否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指控。而对被告来讲，能避免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的唯一途径就是承认罪行并且为检察官提供其他罪犯的“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认定该罪犯的合作及提供的信息是否充分有效，是否可以得到减刑判决的角色是美国检察官并不是法官，所以如果提供的信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么这名试图采取合作的罪犯依然不会被减刑，但是强制性长期监禁的条款确实可以刺激罪犯开口讲话。从政府的角度上看，罪犯认罪并合作，可以避免昂贵的审判过程而且顺便还可以得到有价值的证据；而从被告的角度上看，指证其他人是十恶不赦的、违心的事情。

另外一些法官则认为许多罪犯的证词会因此变得不可信，因为一个绝望无助的人出于解救自己的目的，他会随口编出许多不着边际的故事。现在要求减刑的上诉没有任何意义，减刑的希望只有合作。在这样的系统下，进退两难的选择就只能取决于证词的质量。托拉·S. 布朗（Tora S. Brown），一个19岁的第一次涉及毒品的罪犯，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只有8个月大的女儿。她交代了其他一些涉及五氯酚（迷幻药的一种，PCP）的人，但是由于她拒绝指证自己的母亲，布朗最终被判处10年的监禁且不得假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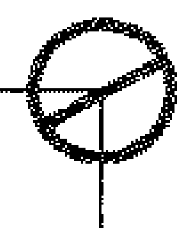
令每个人悲哀的一天

印第安纳南方地区助理美国检察官唐纳·艾德（Donna Eide）建议马克·扬接受一个简化判决：判处他40年监禁且不得假释，条件是马克·扬认罪并且与政府合作。扬的律师凯文·麦克沙恩（Kevin McShane）认为这个提议十分荒谬可笑，即使在一级谋杀案子里，他都不能接受认罪后还得到40年监禁的判罚。1991年5～9月，政府对马克·扬只有这一个提议，而在这段时间里，其他的罪犯一个接一个“踊跃”地同意与政府合作。

克劳德·阿特金森也面临强制性终身监禁的判罚，而其他人也将受到10年或终身监禁的判处。如果采取合作的态度，根据每个人犯罪情况将会有一个8年或30年的上限，但是他们也可以重获自由，不受到监禁的判罚，可是这取决于他们的证词在法庭上是否有效。扬、欧内斯特和他妻子辛迪此时依然采取不认罪的态度。

根据美国当时的判决原则，马克·扬的大麻犯罪会导致他得到20～27年的监禁，判决原则适用于扬的案例，除非美国检察官参看扬以前的犯罪记录，加大惩罚力度并要求给予强制性终身监禁。唐纳·艾德给出了最新的提议：18年监禁，等待合作。可是扬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政府在正式审判前的星期五决定加大惩处力度。时间不等人，马克·扬必须在周末做出决定：同意合作或者面临终身监禁的风险。

凯文·麦克沙恩不相信政府最终会对他的委托人判处终身监禁，他认为这些威胁通常都是法庭调解过程中的交换条件。他也不相信政府真想从马克·扬的身上得到什么信息，因为克劳德·



阿特金森对大麻农场的情况比其他的人了解都多，况且他已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了。其他地区的联邦当局肯定对来自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买主身份感兴趣，但是谁也不清楚马克·扬是否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在审判前，种种迹象表明政府似乎仅仅是要避免审讯，于是麦克沙恩强烈建议马克·扬接受18年的判决，因为他有许多敌对的、潜在的证人，而且他在法庭上的机会就像掷骰子，不能确定结果。此时，扬的家人也支持麦克沙恩的建议，同时还乞求扬与政府合作。他母亲在关押期间探望他的时候，也曾经哀求过他，她回忆道："最后，当我们预料到结果会很糟糕的时候，我也只能依赖他自己。我曾经乞求他，'马克！和别人一样，你也与政府合作吧！不要放弃。你要知道，那可是终身监禁！像别人一样，你也应该说出你知道的一切，救救你自己！'但是没办法，他不接受，没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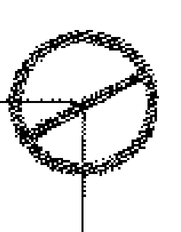
审讯的前一天，辛迪·蒙哥马利同意请求法庭调解，法庭对透露出的种植大麻的运作细节非常感兴趣，但是对违法事实也深信不疑。麦克沙恩认为马克·扬的案子与欧内斯特·蒙哥马利组织种植大麻的犯罪无关。加里·蒙哥马利做出了不利于他哥哥的证词，同时他证明自己是个文盲，所以不能对陪审团朗读他自己的请求协议。辛迪·蒙哥马利也提供了不利于她丈夫的证词，而克劳德·阿特金森则详细地交代了每个人的犯罪事实。在关押嫌疑犯的地方流传的传闻把审讯描述得绘声绘色，据说马克·扬不仅威胁了辛迪·蒙哥马利、克劳德·阿特金森以及他们家人的安全而且还与一个准备反对有罪结论的女陪审员发生了性关系。扬自己认为，在其犯罪中没有证人，没有关于他犯罪的物证，法庭只有辛迪·蒙哥马利和克劳德·阿特金森的证词。陪审团经过两小时一刻钟的复议做出马克·扬所有罪名成立的结论，可是在这

之前没有一个陪审员被告知，如果马克·扬的罪名成立，他最终可能会受到终身监禁的判处。

克劳德·阿特金森对25年监禁的判决非常愤怒，不论如何他感觉自己已经与政府进行了合作。一名检察官事后讥讽他是个“幻想家”，他居然期待只获得几年监禁的判罚。对一个已经62岁的人来讲，25年的判决意味着他要在监禁中度过余生了。欧内斯特·蒙哥马利被判处34年监禁且不得假释，实际上也等同于终身监禁。他的弟弟被判处8年徒刑，他妻子被判处6年徒刑，其他的被告也得到了3～10年的监禁判罚。1992年2月8日，莎拉·埃文斯·巴克法官判处马克·扬强制性终身监禁并罚款100美元，但是她没有判处没收他的财产，马克·扬那时已经身无分文，只能用一辆二手车支付律师费。巴克法官说：“马克·扬先生，对法庭的每个人来讲今天都是悲哀的一天。事情告一段落了。”

身居高位的朋友们

该年度的下半年，比尔·克林顿开始了他的总统竞选，这似乎意味着对毒品的战争走到了尽头。克林顿是在第一个生育高峰时代出生的总统，也是承认曾经吸过大麻的美国最高位的领导人。在竞选期间，他曾经声称，年轻人吸食大麻并不触犯美国的毒品法。克林顿曾经说过：“我在英国的时候，曾经抽过一两次大麻，可是我并没有吸入。”他措辞十分谨慎，但还是流露出了嘲讽和怀疑的态度。他又补充了依据，“我真希望当时吸进了烟。”克林顿后来对MTV观众讲话时也暗示过，吸大麻只是年轻人的轻率行为，并不是严重的罪过。作为阿肯色州的州长，克林顿曾经支持过大麻合法化，可是作为总统，他却从来没有怀疑过



罗纳德·里根制定的严厉的大麻政策，克林顿还反对将大麻作为药品使用并且还支持对那些给病人开大麻的医生给予法律处罚。克林顿内阁成员之一，控制联邦政府对毒品医疗应用研究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长唐纳·E. 沙拉拉（Donna E. Shalala），她对毒品的态度和南希·里根一样，“大麻是非法的、危险的、不健康的而且是错误的，它就是一张通向绝望的单程车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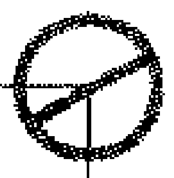
在克林顿的任期内，因大麻被捕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比其他总统任期内都多。尽管理查德·尼克松似乎一度被视为是大麻客的复仇女神，但是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因大麻被捕的人数是尼克松时代的三倍。

1990 年代中期，因大麻而被捕的人数急剧增加，多少也是出于警察过多关注违反“生活品质”的人。在纽约市，由于鲁道夫·朱利亚尼市长（Mayor Rudolph Giuliani）对大麻采取“零宽容”政策，所以大麻犯罪会导致 26 年监禁的惩罚。但是克林顿时期针对大麻的战争并不是由美国诸多城市的各种新策略所驱动的，而是由民主党人似乎要“弱化”毒品带来的恐惧所驱动的。谴责大麻已经成为生育高峰出生的人把自己和 1960 年代反传统文化区分开来的最好的方式，是标榜真正的“美国主义”的一种方式。由于美国社会呈现出强烈反对毒品的一致性，所以那时针对大麻的战争就像 1950 年代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一样轰轰烈烈。因为承认年轻的时候曾经吸食过大麻，1987 年被里根总统任命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H. 金斯伯格（Douglas H. Ginsburg）被迫辞职，金斯伯格辞职的决定开创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先例。麦卡锡时代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定义政治观点的问题，“现在或是在以前，你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吗？”很

快它就变异成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的新的心理测试。每一名国会成员和想要竞选的人必须回答下面的问题："现在或者以前，你曾经吸过大麻吗?"

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早在1981年就提出过一个把大麻用于医学合法化的议案，而15年后，身为白宫发言人的金里奇却建议对那些携带超过二盎司大麻进入美国的人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尽管克林顿政府否决了这项议案，但是它还是认可了禁止大麻的基调，认同里根时代制定的美国政府针对毒品的政策。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和国会议员鲍勃·巴尔（Bob Barr）是两个极端的声讨大麻的代表人物。麦康奈尔曾经竭力主张对贩卖大麻和拥有大麻的联邦惩罚应该与对贩卖和拥有可卡因及海洛因的联邦判罚一样。巴尔则极力反对并阻拦对"所谓的大麻医学使用"的研究，并且声称那些尝试中藏有巨大的阴谋。他也曾经说过："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正在遭受毒品支持者的进攻，而这些人企图用毒品来奴役人民。"他还呼吁改革美国的大麻法律，将大麻犯罪视为"颠覆性的犯罪运动。"麦康奈尔和巴尔对大麻带来的潜在伤害显得忧心忡忡，可是他们对待吸烟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巴尔反对对烟草公司的一切诉讼，他强调这些努力带有"前苏联规则"的色彩，而且，被怀疑的烟草产品是"合法的、普遍使用的、高额利润的产品，它遭到了来自制定规则的知识分子的冷遇，而且还传闻说烟草这样或那样地对人有害。"麦康奈尔在2002年接受了烟草说客的许多礼金，其数量比其他国会议员都多。在美国，烟草的使用是造成可预防性死亡的最大的罪魁祸首，它应该对每年大约44万人的死者负责。

1950年代，宣誓变为了例行公事，普遍的毒品测试成为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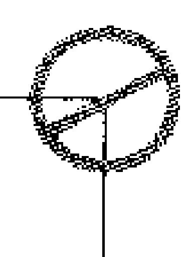
吸食大麻者排出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种手段。1980 年代初，财富 200 强中有 3% 的企业对它们的雇员和求职者进行非法毒品使用的测试，而十年后，已经有 80% 的公司要求进行毒品测试。1998 年通过的《工作场所远离毒品法案》（*Drug-Free Workplace Act*）为那些希望强制执行毒品测试的小公司提供联邦资金。因为大麻是一种非常普遍使用的非法毒品，吸食大麻会产生巨大的阳性结果，目前公司、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采用的毒品测试尚不能确定某个人是否受困于毒品的影响。大麻的代谢物可以滞留在吸食者的身体里许多天甚至数星期，假如你在星期六的晚上抽了一支大麻，你肯定逃脱不掉下周一早晨的测试。现在支配着美国工作场所的权力极大的毒品测试系统不能揭示你是否在工作中已经受到毒品的困扰，它只能显示你是否是个喜欢吸大麻的人。现在根据测试的结果，可以合法地开除那类大麻吸食者或者使他/她丧失应聘的机会。可是同时，如果某个人每天晚上喝上十杯龙舌兰酒，却不会有丢掉工作的风险。一个对七个著名公司的 14000 员工的调查发现，有 8% 的小时工和 23% 的经理们在工作期间经常喝酒。

不仅仅是针对毒品战争的意识形态驱动了大麻测试的普及，经济利益也带动了大麻测试的普及。“工作场所远离毒品协会”帮助国会起草了发展测试的新法律以及反对那些限制雇主测试工人的一些州法，该协会中有四家公司出任董事，其中两个公司就是药物制造公司并且负责毒品测试的工作。到 1980 年代末，很少有一个新兴的产业能像这个产业那样，在短时间达到 7.4 亿美元的年收入。尽管大家通常都认为工作期间吸食大麻的人不如正常人工作谨慎小心，但是上述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根据 1990 年对大麻使用者和工作场所的 200 多项研究证明“大麻对

工人的生产效率没有直接的和负面的影响"，但是，没有任何人质疑并反对对一些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常规的毒品测试，例如飞机驾驶员、火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等，这些重要的群体必须向他们的雇主提供尿样以证明自己没有吸食毒品。而对国会成员进行强制性毒品测试的立法却接二连三地胎死于委员会的腹中，甚至都进展不到投票的地步。

遭到大麻战争伤害的人往往是那些穷人和工人阶层，他们不像中上层的人群，请不起费用昂贵的律师，也就无法避免监禁的厄运，在审判之前，他们就已经进入了毒品待遇的程序，他们通常会因为大麻的被捕进而丧失州和联邦的福利待遇。1997 年，加里·马丁（Gary Martin）因拥有大麻被捕。早在 20 年前，他遭到抢劫时受到严重的伤害，导致大脑永久性损伤，而且使得他右半身瘫痪并失去了左腿。于是马丁开始吸大麻以缓解截肢带来的"错觉疼痛"（"phantom pains"）。在被捕之前，马丁居住在一个专门为老人和残疾人居住的住宅群，在因为拥有不到四盎司的大麻被捕后，他被政府逐出了公寓。政府事先没有将此事通知为马丁治疗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马丁会被逐出，而他们都曾经为马丁的行为游说过政府的许多部门。《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的记者汤姆·康敦（Tom Condon）曾经评论过，"因为大麻就将这个家伙从那个公寓中逐出，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然而那些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的子女往往都能逃脱严厉的大麻惩罚。1982 年，也就是里根总统开始针对大麻战争的那一年，约翰·C. 贝克（John C. Baker）因在得克萨斯州他家牧场附近向秘密特工出售近 1/4 盎司的大麻遭到逮捕，而此公子的父亲就是未来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如果依据得克萨斯州的州法，约



翰·贝克应该受到重罪指控并且受到两年到二十年监禁处罚。实际上，他最终只受到轻罪指控，由于主动认罪，只罚款 2000 美元了事。1990 年，国会议员丹·伯顿（Dan Burton）曾经建议国会立法判处毒品犯死刑并且主张，“我们必须对孩子们进行毒品教育，而且应该给予毒品贩子们更加严厉的新的惩罚措施。”而四年后，他的儿子就因为将八磅的大麻从得克萨斯州偷运到印第安纳州而遭到逮捕，伯顿旋即为儿子请了一名律师。就在等待审判的时候，也就是五个月后，丹尼·伯顿二世又因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自己的公寓里种植 30 棵大麻而被捕，警察在他的公寓中还发现了一支手枪。依据联邦法律，仅非法拥有枪支这一项罪名就会使丹尼·伯顿面临五年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而参照州法的大麻条款，还得再加上三年监禁。可是联邦法律并没有施加到他的身上，最后他仅仅得到了温和的判罚：社区服务、缓刑和软禁。再让我们关注一下理查德·W. 赖利（Richard W. Riley），此公曾经是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后来就任克林顿政府的教育部长。当理查德·W. 赖利的儿子被指控共谋贩卖可卡因和大麻的时候，依照相应的法律，他也应该面临 10 年监禁的判罚和 400 万美元的罚款，可是理查德·小赖利仅得到六个月软禁的判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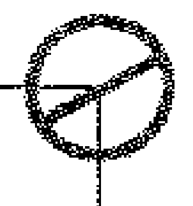
1996 年 9 月，国会议员兰迪·坎宁安“公爵”（Randy “Duke” Cunningham）曾攻击克林顿总统在非法毒品使用面前的表现就像个风度翩翩的“骑士”并且任命了多名“对犯罪太懦弱”的宽大的法官，坎宁安还叫嚣：“我们必须对毒品犯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那些沿街叫卖的毒品贩子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四个月后，他的儿子兰德尔·托德·坎宁安（Randall Todd Cunningham）因涉嫌帮助将 400 磅大麻从加利福尼亚州偷运到马

萨诸塞州被缉毒局逮捕。尽管托德·坎宁安承认自己是一个走私团伙的一名成员，而且这个走私团伙已经将三万磅的大麻走私到了美国各地，如果按照这个罪名起诉他，那么会导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判处，可是他只是受到了偷运400磅大麻的指控。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建议给予托德14个月的新兵训练营（boot camp）以及7个月软禁的判罚。国会议员兰宁安乞求法官的怜悯，他还强忍着眼泪说："我儿子心地不坏，他以前从来没有犯过罪。"托德·坎宁安最后仅受到两年半监禁的处罚，而且他原本有机会得到更轻的判罚，只是因为这个国会议员的儿子在其保释期间三次都没有通过可卡因的测试！

最昂贵的一棵大麻烟卷

目前美国大麻的法律使政府在定刑时会产生巨大的偏差，给予一些人重刑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可以得到极其宽大的判罚。1990年代初，犹他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曾经警告过，那些决定毒品犯命运的权力已经从独立司法机构转移到政府的手中。由于采用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国会已经剥夺了联邦法官在判决时的决定能力，但是对执法官员和美国检察官却没有一个类似的约束条款，所以就会导致目前的美国"由警察和检察官做出的一个类似于事实上的标准判决。"虽然联邦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随时都会受到宪法的挑战，但是最高法院依然支持这种方法而且支持增加检察官的权力。

如今，对毒品案件中如何量刑而言，美国检察官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指控中的大麻数量标准以及是否可以适用联邦指控，都由检察官决定。如果换作其他的检察官，可能只是指控马克·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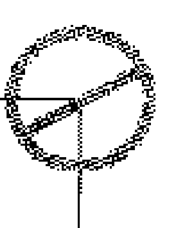
涉嫌毒品交易并判处马克·扬七年监禁，而实际上对马克·扬的指控是涉嫌"共谋种植"12500 棵的大麻。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同的定罪方式会有多大的区别。如果农场的承租者种植大麻，那么栽培花木农场的拥有者与大麻种植者一样也要付法律责任，这种"共谋理论"的例子也就意味着将糖卖给私酿酒者的人也应该受到监禁的处罚。加里·塔克（Gary Tucker）是亚特兰大郊外一家名为"南极光与水栽培"的花木栽培农场的拥有者，他就是因为承租者种植大麻而受到十六年半监禁的处罚，而且在其他地方兼职做收银员的妻子乔安娜也被判处 10 年监禁。在大麻犯罪的判决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涉嫌大麻的数量，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通常都不关注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角色以及重要程度，所以驾驶一辆装有大麻的汽车司机所得到的判罚与这些大麻拥有者的判罚是一样的。而实际上，那些涉嫌共谋犯罪中的小角色经常会被判处最长的判决，因为他们手中几乎没有可以用来和政府做交易的有用信息。

毒品犯可以处在三种不同的司法管辖权下：本地、州和联邦的司法管辖，而判罚结果也大相径庭。如果一名美国检察官只是简单地决定介入一个特定的案件，他的判断与将来的判罚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同样的毒品犯罪罪名下，一个人甚至可能会受到两次指控，被州陪审团判决无罪的大麻种植者，可能随后被联邦法庭判处罪名成立。1985 年，一名佛罗里达州坦帕（Tampa）的西瓜农场主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因种植大麻被捕，随后根据州法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缓刑的判罚。而五年后，当地的检察官认为对克拉克判罚不够严厉，根据联邦法律，克拉克以同样的犯罪又被判罪名成立而且被处以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当某位检察官介入大麻案件的时候，并没有制定好的固定标

准可作参考。联邦政府只要愿意，它就可以对因大麻犯罪被捕的724000人中的任何一个或每一个人进行指控，但是一般在一年中，只有不到1%的被捕的罪犯遭到联邦政府指控。在某些地区，有政策规定检察官只能介入涉嫌超过100棵大麻或100盎司大麻的案件，而在其他的地区，联邦检察官可以任意决定并参与其中。爱德华·楚普里斯基（Edward Czuprynski）是一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他不断地抨击密歇根州贝城的官员。他曾经被联邦法庭指控拥有1.6克的大麻，这重量大致相当于一颗大号烟卷的烟草重量。按照密歇根的州法，他最多被判罚款100美元，但是在联邦法庭上，楚普里斯基听到的却是14个月监禁的判罚，而且他提供法律服务的营业执照也被吊销。于是，这家成功的、名声显赫的法律公司也关张了。他自己对此事的评价是："他们使我完全破产，而且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在联邦监狱度过六个月后，楚普里斯基根据第六巡回上诉法庭的指示被提前释放。对照他的四万美元的法律费用，六个月的监禁使他损失了10倍于法律费用的收入。另外联邦政府在此案中也许还花掉了纳税人上万美元，所以楚普里斯基曾经说过："那棵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支大麻烟卷。"

大约在10多年前，朱莉·斯图尔特创建了一个名为"家庭反对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协会"，其座右铭是"恰如其分的判罚"。在她哥哥因种植375棵大麻秧苗被判处五年监禁之前，朱莉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过美国的毒品法。目前，该协会的成员已经超过25000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在马克·扬被捕之后，他的姐姐安德里亚·斯特朗（Andrea Strong）随即也丢掉了两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郊外清扫房屋的工作，这也说明大麻的恶名依然遍布乡下各地。斯特朗现在是协



会成员服务的主管，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联邦犯罪法律专家，她现在正在不屈不挠地要求政府废除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判决。协会也在游说国会进行判决改革并且汇编了一本受到强制性判决的案例回顾，其中有迈克尔·T. 艾里什（Michael T. Irish）的案例。艾里什是第一个因为帮助别人将印度大麻麻醉剂从船上卸下来而遭到 12 年监禁判决的大麻罪犯。查尔斯·邓拉普（Charles Dunlap）是第一个因为将汽车租给朋友导致八年监禁的大麻罪犯，原因就是那位朋友用这辆汽车进口大麻。另外是一位名叫佐邓塔·迈克卡特（Zodenta McCarter）的老婆婆，她贫困而且还是个文盲，被人描述为是一个“天真的、相信他人的、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的老女人，她是第一个因为与人共谋出售一种与大麻同类的杂草被处以八年监禁的罪犯，而这种野生的大麻实际上几乎不能影响吸食者的心理状态。被关进监狱后，迈克卡特患上心脏病并接受了三次心脏手术，后来又感染了肺结核。

监狱的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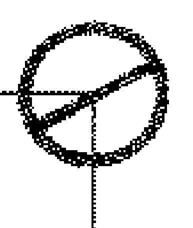
莱文沃思监狱（Leavenworth Penitentiary）是联邦系统中最古老的一所监狱，它也是美国最危险的监狱之一。100 年前美国没有联邦监狱，联邦政府判处超过一年监禁的犯人大约只有 2500 名，被分散在各个州的监狱中服刑。1896 年国会拨出资金修建了第一个联邦监狱莱文沃思监狱，占地面积超过 1500 英亩，位于堪萨斯州的郊外，距福特·莱文沃思军事基地只有几英里的路程，这个监狱是由罪犯自己修建起来的。在这个监狱的 100 年历史中，只有过一名罪犯越狱并且成功躲过追捕。监狱的四周都有警卫塔，红砖墙有 35 英尺高，还有同样深的壕沟。建筑物显得

非常结实，透出凶险的气氛，使人联想到政府的威慑力量。它的设计很像美国的国会大厦，可是，在这里，国家象征的自由和民主都转化成了惩罚和服从。在寒冷冬季的早晨，当这座监狱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浮现出来的时候，它正像一位曾经在此服刑超过七年的囚犯描述的那样：莱文沃思像漂在虚无缥缈的大海里的一座陵墓。

如果你要去探视室，你必须在一个小警卫塔里，向教导官员通报姓名并讲明来访目的，然后再登上楼梯到达前面的入口，经过两道带有钢栅栏的电子门后，有人给你照相并在照片上盖上戳，然后再签一个保证书，让你确认没有携带武器、爆炸物和麻醉品，再经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后，有人护送你穿过另外一个同样带有钢栅栏的大门。探视厅就像哥伦布会议大厅，墙上是淡色的木板，一排自动售货机，小桌子边上是舒适的椅子。囚犯和探视者中间没有玻璃墙，教导官在房间后面的一个平台上监视探视的情况，天花板上还藏有监视器。当我坐在椅子上等待会见马克·扬的时候，刚好有个小孩子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和他父亲玩耍，而这个一脸胡须的父亲此时身穿着一身黄褐色咔叽布的工作服。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乔纳森·特利（Jonathan Turley）教授认为莱文沃思监狱是联邦监狱系统的一个完整的缩影：陈旧、过度拥挤，对囚犯和监狱官员都极度危险。莱文沃思监狱标定的囚犯人数是1200人，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囚犯的人数多次超过1700人，过度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暴力的风险，很容易造成囚犯暴乱。所有联邦监狱关押的犯人数目差不多平均都超过限额的30%，目前有一些监狱犯人的人数达到了定额的两倍，同时每年联邦监狱犯人的增长数目都超过一万人。

严厉的毒品法和严格的管制，使联邦监狱系统的囚犯人数空



前增长。1950 年代的《伯格斯法案》都没能产生如此的效果，因为那时的毒品犯罪少于普通的犯罪而且被起诉的人数也不多。1967 年后期，联邦麻醉品管理局只有 300 名侦探，而它的继任者缉毒局现在已经拥有 4600 名探员。在 1980 年代期间，联邦政府把毒品犯关进监狱的费用增长了 1300%，从 8.8 万美元增长到 13 亿美元。反毒品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和指导性判罚的结合使用大大改变了囚犯的数量。1970 年，联邦监狱关押的毒品犯人数是 3384 人，今天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 68000 人，其中的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犯罪，以前没有被逮捕过，只是由于低水平的毒品犯罪而遭到监禁。2000 年，7500 多人被指控触犯大麻法律，其中一半人之前都没有相关的犯罪纪录。每个州的教养设施中也关满了毒品犯罪者，有时还会提前释放一些暴力犯罪者，以便腾出地方给那些受到强制性处罚也就是监禁且不得假释的毒品犯。当今美国在押的毒品犯人数已经超过 33 万人，大大超过美国 1970 年所有罪犯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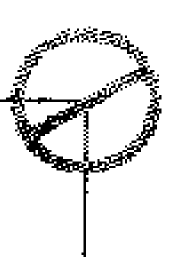
马克·扬的个子很高，大约有六英尺五英寸高，从身材上看就像一个老练的摩托车手。我见到他的那天，扬留着嬉皮式的马尾辫，看起来很像乡村音乐歌星汉克·小威廉姆斯，沙哑的声音和一幅幽默无表情的脸。在被送到莱文沃思之前，扬和与他相处了很长时间的女朋友帕特里夏·罗兰在当地的监狱里举行了美国风格的婚礼。结婚后，帕特里夏尽其可能来探视他，但是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开车到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思大约需要九到十个小时，她经常给他带来家附近发生变化的照片：新住宅以及购物商店内新开张的商店。他们还在一起讨论在他们租的房间里应该摆放什么样子的家具，后来她按照他们的商定摆放好了家具，她还把照片带给扬，她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他忘记那个远在红墙之外的

熟悉的世界。

扬在送到莱文沃思监狱之前从来没有进过监狱。触犯联邦大麻法律后，通常将犯人关押在低安全级别的监狱或者监狱营，但是因为扬是一名终身监禁的犯人，这个判罚结果也意味着他会有试图越狱的企图，所以需要将他关进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扬进入联邦监狱后，突然发现他身边的狱友几乎都是暴力犯罪的惯犯：杀人犯、强奸犯、武装抢劫犯和国际恐怖分子。他的两人间狱室只有八英尺宽十英尺长，有一个可以滑动开关的实体铁门，挨着狭小通道的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在他入狱的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件。那天，扬和其他囚犯正在监狱礼堂观看电影“沉默的羔羊”，黑暗中突然爆发骚乱，囚犯按种族分成若干个团伙，残破的家具演变成了武器，礼堂里的典狱官员被胁迫作为人质。在混乱中，扬抢了一把破椅子退缩在墙边，内心感到极度恐惧。数小时后，警官终于平息了这次暴乱。扬被瓦斯呛得泪流满面，被戴上手铐牵引着走出地面上全是鲜血的礼堂。

因为扬非常魁梧强壮，所以其他的犯人一般不敢招惹他。他告诉我：“但是在这里，任何时间对每个人都可以发生任何事情，”他突然猛地折了一下手指说，“就像这样。”那些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囚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2003年，扬的一位好朋友克莱德·哈里森（Clyde Harrison）因为欠别人50美元在食堂里被刺身亡，当时食堂里面还有上百名囚犯正在吃饭。那个凶手颇为斯文地将餐刀的刀柄递给典狱官。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朋友当场死亡，然后“其他人跨过他的尸体走向沙拉吧去取食物。”

对马克·扬的审判如此奇特，他感觉自己也很难将其描述得清楚。他对我说过只有麻醉了自己以后，才感觉那次审判有多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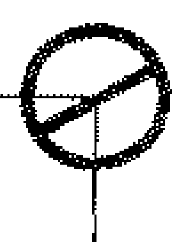
的可笑滑稽。他一点也不了解欧内斯特·蒙哥马利，与克劳德·阿特金森只见过两次面，而且见面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他从来没去过那个种植大麻的农场也不知道它在哪里，而绝大部分在法庭上指证他的人，以前他也没有见过他们，所以以“共谋种植大麻”的理由将他判处终身监禁毫无道理。扬非常坦诚地对我讲述了他过去所做的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事情，也承认他替印第安纳州的那帮人找大麻的买主，但是他还是讥笑克劳德·阿特金森在审讯中努力想将他指证为一个负有主要责任的大麻经纪人以及操纵一个贩卖大麻的网络。按扬所描述的，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由来非常富有戏剧性。有一回，扬在佛罗里达州同一个家伙一起钓鱼并分享了一棵大麻烟卷，那位“渔友”非常欣赏这种大麻，而这支大麻正是蒙哥马利送给他的免费样品。几天后，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扬询问是否还有更多的“那种好货”，扬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而那个人又找到了他的朋友——纽约的买主。扬在法庭上承认他实际上只得到了七万美元的极小的一部分，可是确实不了解买主和卖主。他们两伙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抛开了中介人。扬苦笑着说：“他们骗了我。”

尽管他经常抽大麻，但在被关进监狱之前，他对大麻一无所知。现在，他俨然已经是个大麻专家了。他知道大麻的纤维可用来造纸，这样就可以节省数百万棵树，而且大麻的蒸馏物也可以转为酒精类的燃料，同样可以终结世界能源的短缺。他在监狱里正在设计一种完全依赖大麻燃料的哈雷摩托车，还给它起了名字“亨普斯特”（Hempster）。不过更使他家人伤心的是扬又因为在监狱里抽大麻曾经被关进与人隔绝的禁闭区。据他讲莱文沃思的大麻很好，尽管有些贵，在莱文沃思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许多非法

毒品，甚至你都可以找到那些在中西部都异常罕见的印度大麻麻醉剂。

这次，我终于把憋在心里几个星期的问题讲出来了：当他意识到可能会判处终生监禁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和检察官合作呢？他回答道："是否应该去做确实让我费了不少神，可是对那些我有两种看法。第一，我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做人原则，而且庆幸的是我没有丧失这个原则。另一方面，我不会吹牛讲大话，因为我也没有可以供出来的人，我能给法庭说出谁来？"我在一旁暗示他，其实法庭需要的只是一个名字，只是见到他的合作行动。实际上，扬能提供给法庭的人名也只是那个和他一起钓鱼的人，而他到最后也没那样做。他接着讲："这家伙什么也没做，他连半盎司的大麻都没买，对吧？"扬也理解其他的嫌疑犯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说的那样："当你面临判决的时候，任何人的都可以做出可以保护自己的事情，而对我来讲，我不会那么做。"

扬认为莱文沃思监狱最糟糕的就是嘈杂的噪音，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铁门和混凝土墙壁都阻挡不住数百人的吼叫的回音。扬对我说，如果能被释放，他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钓鱼，他一边想像着还一边说着："我敢肯定鱼上钩了，一定是鳟鱼。"他对检察官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有些人认为做过一些事的人就能做出其他所有的事情，他们只能证明我抽大麻或者是我给一帮人介绍了一个想买大麻的人，仅此而已。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毁灭了这些人的家庭，做出终身监禁的判决，剥夺了别人生活，让孩子们失去了住房。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令人恐怖的法案。"他大笑着说："我不知道还有人居然为了工资去做那么歹毒的事情。"他对监狱的教导官员并没有任何成见，这些有家室的男人，在监狱工作，而且整天手无寸铁地处于众多暴力囚犯之间。



他说道："我可不想在这里工作，有时候，我特别奇怪他们是否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你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除了这些，扬还表达了对宪法的强烈信念："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糟糕的时期，但是，我相信宪法一定可以扭转那些。"我们见面的时间马上就结束了，一名监狱官员走过来友好地拍了一下扬的肩膀提醒道："哥们儿，该走了。"没过多久，沉重的大铁门关上了，马克·扬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要摈弃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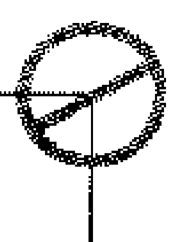
汤姆·道森（Tom Dawson）外表非常简朴而且带有一股乡下人的风格，办公室混乱又不起眼，丝毫也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刑事律师，而且每个联邦巡回法庭都十分认可他的能力。道森在莱文沃思城里长大，早在 1967 年，他就访问过那个森严壁垒的监狱。他觉得扬关在那里接受终身监禁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说："那里关押的都是疯子，我指的是关押的都是狂人，都是危险的人群。"道森正在说服马克·扬上诉。他认为在马克·扬的共谋种植大麻的案件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扬能否合理地、确切地知道或预见到生产出多少数量的大麻。道森和美国助理检察官唐纳·艾德对大麻的棵数和磅数、它们之间适当的转换公式有不同的见解。一个人的前途是否取决于这个数字结果，这个争论已经成为阿波特和科斯特洛（Abbott & Costello）程序的一部分。道森是一名彻头彻尾共和党人而且始终反对毒品犯罪，但是现在他对毒品战争的幻想已经完全破灭了"它正在把涉及到的一切东西变得一团糟。"

在判决的时候，被告的犯罪程度看起来通常都不太重要了，

法庭看中的反而是被告能否主动上交资产并供出其他嫌疑犯的名字。在另外一名律师负责的案件里，一名用快艇走私可卡因的大毒品贩子在法庭上指证了"他见过的每一个人"，尽管他涉及到两万公斤可卡因，但是只受到了不到四年监禁的判罚。道森说，"只是那些不愿合作的家伙最终全部承担了其他罪犯的刑期，就是这么回事。不幸最终会选择一些可怜的人，就像马克那样执著地坚持'我不做那些，我有自己的原则'的人，那么好了，你就要担负起别人的刑期，就是这么回事。"在毒品案件里，有罪辩护控制了法律系统。道森对我说过，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无辜者也最好选择有罪辩护，"如果你不认罪，那你就输了，严厉的判刑会让你瞠目结舌。"

政府在毒品案件中的财政动机，也就是没收财产的做法大大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道森透露道，那些法庭的辩解调停就像阿拉伯露天市场的讨价还价一样。没收财产带来的收益被划分到参与案件的每一个执法部门。多名前司法部的官员已经承认，许多没收的财产及其罚款都用来应付财政预算。有些时候，一名被告是无辜还是有罪与他或她的财产相比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加利福尼亚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31 名州和联邦探员以农场可能种植大麻的借口突袭搜查了唐纳德·P. 斯科特（Donald P. Scott）的 200 英亩的农场。在搜查中，斯科特被一名代理治安官不经意地射杀身亡，他们最终也没发现种植大麻的证据。随后文图拉县（Ventura County）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发现，那些毒品侦探的部分动机是感觉有希望没收那个价值五百万美元的农场，他们在搜查行动的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对那个农场价值的评估报告。

在新泽西州，尼古拉斯·L. 小比斯尔（Nicholas L. Bissell,



Jr.）是一名当地检察官，被人称为“没收皇帝。”他曾经帮他同事买了一处因大麻而没收的土地，而且他还按那块土地的市值收取了少部分的佣金。而在康涅狄格州，联邦检察官莱斯利·C.奥塔（Leslie C. Ohta），则被人戏称为“没收女皇。”她曾经没收了保罗和露丝·德巴赫（Paul and Ruth Derbacher）的住宅，起因就是他们22岁的孙子出售大麻而遭到被捕。尽管当时德巴赫夫妇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拥有这座房子的时间也已经长达50年，而且两位老人一再声称不知道他们的孙子在房子里面隐藏了武器和毒品，但是奥塔依然坚持没收房产，并且她还强调他们应该知道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可是没过多久，奥塔18岁的儿子就因为在她的雪佛兰开拓者越野车上卖迷幻药被逮捕，而且他还承认在她的房间里出售过大麻。可是奥塔很快就被调离了美国检察官没收部门，而且政府既没有没收她的汽车也没有没收她的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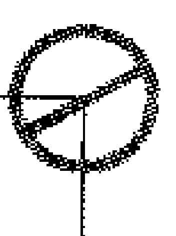
在与没收相关的法律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条款，即如果相关的法律部门按照证词成功地没收了一笔财产，政府最高可以拿出没收财产价值的1/4用于奖赏那些秘密指证的人。于是乎，对其他人的告密已经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在大宗的毒品案中，告密者有可能赚到一百万美元甚至更多。1985年，联邦政府用于奖赏告密者的奖金数额大约是250万美元，而十年后，奖金的数额竟高达一亿美元。随着对告密者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带给罪犯的影响程度也变得不可预知。告密者不但使嫌犯罪名成立而且还有机会得到直接的金钱利益，所以有许多告密者因为陷害无辜而遭到逮捕，有许多执法人员也因为虚构告密者换取搜查证而遭到逮捕。一名曾经在里根时期负责司法部犯罪部门的斯蒂芬·S.特罗特（Stephen S. Trott）法官曾

经在《国家法律杂志》（*National Law Journal*）上这样说过，“那些罪犯很可能说或者做任何事情以便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不仅会泄露朋友和亲戚的秘密，而且他们也撒谎、做伪证、制造证据甚至教唆别人合作一起说谎，欺骗与他们接触过的任何人特别是法官。”

对告密行为给予法律和金钱的奖赏甚至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买卖与毒品相关的信息。对那些本身没有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提供给检察官而又想避免过分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的被告，如今他们可以秘密地从黑市的信息提供商那里花钱购买信息。据汤姆·道森估计，有些专业的信息供应商给被告提供服务的价码高达25万美元。

针对毒品战争的工作方式在联邦法律系统中已经引发了争议，现在大约有100多名高级联邦法官拒绝在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律下处理那些低级的毒品案。他们当中的一位，纽约东部的地区检察官杰克·B. 温斯坦（Jack B. Weinstein）饱含歉意地公布了他的决定，他可能将那些“肮脏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同事，他在声明中指出：“我需要休息，准备从那些轻浮的言行中，从那些难以忍受的毒品案件中脱离出来。我不能简单地判处那些穷困无助的人，而且严惩这些人对毒品交易没有任何警示效果。”温斯坦相信，监禁可以是一种威慑，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当他拒绝对一个走私海洛因的贫困女人判处10年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的时候，温斯坦引用了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一句名言：“不必要惩罚是非常不幸的，理应摒弃。”

1988～1993年，黛博拉·丹尼尔（Deborah Daniels）曾经担任印第安纳州南方地区的美国检察官，她不仅全程监督了马克·扬大麻案件的审理过程，而且她在布什任期内帮助司法部制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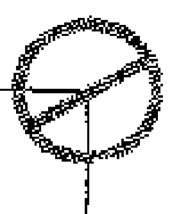
判决指导原则。她对我说："作为一名检察官，我认为不可以制定这些法律。"通过立法，国会利用强制性最低刑期判决和那些指导方针剥夺了法庭的判断力，司法部也意识到检察官"替代法官的角色"可能是错误的，诉讼不得不按照条文强制执行。丹尼尔也承认，在某些地区，有些美国检察官"处理案件的时候采用回溯法"，先决定这个被告应该受到何种惩罚，然后再去想如何指控。她解释道："我不赞同那样做，那是欺骗行为。在印第安纳州的南部地区不会发生那种欺诈行为，我们的做法一目了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扬受到那个判决。"同时她也否定了利用长期监禁的威胁来劝诱被告人请求调解，"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她办公室的工作原则就是，即使在处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案件的时候，我们也要寻找证据，而且每个案件都不例外。她强调，"当你开口讲话的时候，心里应该是这样想的，'确实，这个家伙的行为有这么严重，这些就是他做的。'然后，你再决定这个案子应受到何种判罚。"

丹尼尔认为马克·扬受到的判罚就是国会要求的对违反毒品法的那种判罚，许多人不认同马克·扬"仅仅因为大麻"就遭到终身监禁的判罚，可是丹尼尔不同意那些人的看法。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主动地打击国内非法毒品的制造行为，它就很难阻止从其他国家进口非法毒品的行为。她承认："是，监狱的代价是昂贵的，可是如果我们准备打击某些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她也不认为嫌疑犯与政府合作的压力降低了法庭证词的质量，她还特别强调，许多人不了解美国检察官，他们花费了自己很长的时间将那些无辜的人从麻烦中解脱出来，而不提起指控。丹尼尔认为，在审视了所有的事情后，在马克·扬的案子里，这套系统的工作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

急剧降温的邪恶

在纽约的一个墙上挂满印度挂毯的小公寓里，我和艾迪·罗森塔尔（Ed Rosenthal）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交谈。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大麻种植的导师。罗森塔尔所著的关于大麻的书已经卖出一百多万本，极为流行的几本书是《大麻种植手册》、《蓓蕾大全》、《大麻啤酒》和《请问艾迪：大麻法律——不要导致破产》。无论罗森塔尔到哪里，都有人想接近他并且免费送给他大麻，试图给他留下印象。到了晚上，经常有陌生人给他打电话，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种植大麻的建议，例如如何对付那些害虫以及如何使用计算机控制光线等等。但是罗森塔尔和那些法律学者一样熟知“共谋”的法律，他总是客气地回答“对不起”，然后挂断电话。他本人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公寓楼下蜂鸣器的提示牌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当我向一名走出公寓的人打听他时，那人否认自己认识罗森塔尔这个人，直到我说出我的身份和目的，他才告诉我如何找到罗森塔尔。他虽然已经秃头了，但还是带有古怪的孩子气。罗森塔尔原来是主攻哲学的，他现在拥有一家出版公司，销售有关大麻的书籍。他还作为一名大麻专家出现在法庭上。也正是通过美国的法律系统，他才能在两个不同的渠道内都陪伴他的读者。

在交谈过程中，罗森塔尔始终用烟斗在抽大麻，就像一名杰出的教授可能喜好抽“艾伯特王子”一样。他的最新作品是《密室种植》，书中讲述了如何建立一个室内种植系统，而且如何做到不被探测仪器发现。我请教罗森塔尔，在当今的政治气候下，有着如此严厉的判罚，而且他的许多朋友也因大麻入狱，他



是否对他在有生之年可以见到大麻合法已经感到绝望了？他摇着头说："我觉得政府对大麻所做的全是错误的，他们制定的法律非常脆弱，终有一天会被打破。"它不会立刻发生，可是终有一天就像柏林墙倒塌那样，整个大麻禁令的大厦也会坍塌。罗森塔尔认为，如果仅仅简单地增加数百万的监狱单间，那么永远不会阻止种植大麻者的脚步。罗森塔尔估计，总有一天，一群有权势的白人和中年人聚在一个房间里讨论大麻的出路，而且他们会一致认为最合逻辑的办法就是对大麻征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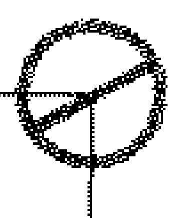
罗森塔尔的预言至今也没有实现。然而在国家和地方这个层面上，针对大麻的战争正开始走向分化。1996 年，亚利桑那州投票批准了《提案 200》，票数的结果显示了支持将大麻用于医疗合法化以及改革本州的毒品法律。你要知道，从 1980 年代起，亚利桑那州一直积极地推崇"零容忍"的毒品策略，州政府不仅对毒品交易和拥有毒品施以重罚，而且对使用毒品也同样处以重罚。过去在亚利桑那州，尿检不合格就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在菲尼克斯，一个在数天前抽过一棵大麻的人会面临犯罪指控；而在纽约市，甚至几星期之前抽过大麻的人都会遭致犯罪指控。如今亚利桑那州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政府只能在沙漠中支起帐篷来监管那些多余的囚犯。《提案 200》呼吁应该立刻释放那些仅仅因为拥有毒品和使用毒品而被判有罪的而且没有本身没有涉及暴力犯罪的囚犯，它还呼吁对那些不含暴力犯罪的、小规模毒品犯罪的罪犯进行毒品治疗、进行毒品教育以及将监禁惩罚转为社区服务，而且它还呼吁加大对酒精和烟草的税收，以之建立一个州毒品治疗和教育基金。现在，亚利桑那的投票者从两个极端走到一起共同支持《提案 200》。几年后，加利福尼亚的投票者以压倒多数支持一个类似的法案，要求对第一次毒品犯罪的人进

行治疗而不是监禁的惩罚。

由于投票的权利，美国人民已经否决了大麻禁令的一些基本前提。从 1996 年起，已经有八个州的投票者支持准许大麻的医学使用。在俄勒冈州，在 1996 年州政府立法通过三项再次将大麻治罪的法律后，一群激进分子征得了足够的签名强迫对上述的法律进行公民投票。大麻合法化的提案遭到身为民主党人的州长以及共和党控制的立法部门的反对，而且在两党中，没有一个头面人物公开支持大麻合法化。然而俄勒冈州的人民投票否决了刚刚通过的一项新法律，该法律可以判处拥有少量大麻的人有罪。人民团结在一起并挑战了他们的立法者。内华达州近来也在努力使大麻非刑事化，但是这种呼吁轻易地就被投票者否决了。

总体来看，保守的共和党比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更愿意批评针对大麻的战争。除了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外，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威廉·E. 巴克利（William E. Buckley）以及新墨西哥州的前任共和党人州长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都曾经呼吁大麻合法化。2001 年 11 月，约翰逊曾经在耶鲁法律学院对他的听众讲："毒品是健康问题，而不是犯罪司法问题，针对毒品的战争完全是个失败。"同时，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7% 的美国人反对政府否决大麻的医学应用；61% 的人反对逮捕和监禁那些非暴力犯罪的吸食大麻者。这一全新的大众倾向大大地弱化了对 1990 年代那个关键的政治问题必须做出一个庄重的或者是满怀懊悔的答案。当有人问，你曾经抽过大麻吗？那位纽约市共和党人的市长这样回答道："当然我抽过，而且感觉相当好。"

虽然乔治·W. 布什总统承认过他曾经与酒精斗争过，但是他拒绝讨论他是否抽过大麻的问题。布什总统和那个在第一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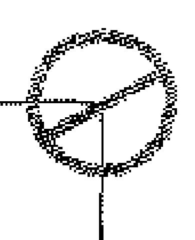


育高峰出生的前任克林顿一样，似乎对毒品更加“严厉。”他任命的大法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发誓“逐步加强对毒品的战争。”而布什的毒品沙皇约翰·沃尔特斯（John Walters）以前就曾呼吁加大对大麻犯罪的处罚，他还攻击毒品治疗建议，而且还把他的强硬态度传给了继任的哈里·J. 安斯林格。对毒品使用者提供治疗的建议，沃尔特曾经争辩道：“这是自由主义者承诺一个‘治疗社会’的最新表现形式，他们的主张会使政府成为一个个人康复中心的代理。”布什政府不仅没有展开毒品的治疗，反而计划扩大对毒品的检测。2001 年通过的教育预算案提供基金对学生普遍进行毒品检测。布什总统任命克林顿时期的白宫总管也是前议员阿萨·哈钦森（Asa Hutchinson）掌管缉毒局，哈钦森强烈反对将大麻用于医学治疗，他认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向“孩子们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在 2001 年 10 月，缉毒局决定禁止含有大麻成分的食品，尽管这些食品不能使你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这个禁令是合理的，因为有些健康食品例如“Hemp Nuggets”可能含有少量的 delta-9-THC。对此，哈钦森解释说：“许多美国人不知道大麻制品和大麻来自于同样的一种植物。”可是，缉毒局迄今为止也没有禁止含有罂粟种子的百吉饼（先蒸后烤的硬面包圈），它可是含有鸦片的成分！

2002 年 2 月 12 日，缉毒局的多名探员搜查了位于旧金山的一个医疗性大麻合作机构，他们没收了数千棵的大麻并逮捕了三个人。这次搜查行动极其符合缉毒局的负责人哈钦森当天在旧金山所做的反对毒品演讲的内容。虽然布什政府在某些议题上支持州的权利，但是不能容忍州政府对联邦大麻政策的任何挑战行为。依据加利福尼亚的法律，数千名的艾滋病和癌症患者可以接

受少数非盈利机构提供的大麻，而且那些非盈利机构与州执法当局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可是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却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经过市政府和治安部门的批准，洛杉矶大麻资源中心已经运营了五年，其间，它可以公开给那些经医生同意使用大麻的病人提供大麻。缉毒局的特工也光顾了这个机构而且说明娱乐性的大麻使用是被禁止的，不过缉毒局随后便搜查了这所机构，拿走了它的大麻，更有甚者，他们还拿走了病人数据库。这个机构的律师也是西好莱坞市的市议员约翰·杜兰（John Duran）曾经这样评价缉毒局这次行动带来的后果："我们有960名病人离开了这里，他们正走向各个公园寻找毒品贩子以期待能得到他们需要的大麻，这正是这个城市不想看到的事情。"

在旧金山搜查中被逮捕的三个人中就有艾迪·罗森塔尔。那时他正在帮助那个机构为病人种植用于医疗的大麻。罗森塔尔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大麻医学用途的书，他确信大麻不同的品种可以缓解不同疾病带来的病症。一种大麻的化学成分（可指任何一种，如大麻醇、四氢大麻醇等）的混合物可能帮助艾滋病人恢复食欲，而另外的混合物可能减轻化疗带来的恶心呕吐，而且罗森塔尔正在利用他在大麻植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种植适合病人的各种大麻。罗森塔尔在为大麻辩护的20多年里，一直没有惹火上身，可是那天早上六点钟他就被缉毒局的多名特工叫醒，缉毒局的特工将他逮捕并且搜查了他的住宅，他们在房间附近的仓库里没收了数千棵的大麻。然而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旧金山的地区法官特伦斯·哈利南（Terrence Hallinan）还做客过罗森塔尔每月的广播节目，并且他还称赞过那个医疗大麻机构取得的成就。罗森塔尔被缉毒局逮捕后曾经说过："政府的反毒品政策是一个由上千个谎言支持的一个大谎言，我的罪行就是我愿意挑战



那些谎言。”2003 年 1 月 31 日，他被指控种植大麻以及共谋种植大麻，如今他将面临一个 5～85 年监禁的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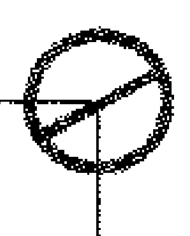
当布什政府加快针对毒品战争步伐的时候，许多盟国却反其道行之。加拿大在 2001 年的夏季就已经将大麻的医疗应用合法化，而且政府的卫生部门正在尝试用大麻给病人进行试验，加拿大不久很可能使拥有大麻非刑事化，这项政策已经得到了加拿大医学协会、加拿大警察协会以及皇家加拿大骑警的支持。葡萄牙在 2001 年就已经可以合法拥有各类的毒品。同年，在比利时因个人吸食而拥有大麻的行为也已经不是非法行为，而西班牙和意大利早在 1990 年代就做出了上述的选择。北爱尔兰也早在 25 年前就已经将大麻非刑事化了，而且人们在政府控制的咖啡店就可以买到大麻烟卷。荷兰政府正在支持大麻医疗应用的立法，此法案将可以使国家卫生部门免费提供“药物品质”的大麻。在研究了大麻对身体的健康风险和大麻的医学应用后，瑞士国会的上议院于 2001 年 12 月投票通过了大麻合法化的议案，瑞士不久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控制商业生产大麻和销售大麻的国家。

欧洲各国的毒品政策过去受美国的政策影响很大，可是近来英国也已经放松了对大麻的严格禁令。1980 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曾经狂热地支持里根总统倡导的针对毒品的战争，她对大麻也采用了类似的严厉语言。她曾经这样警告毒品犯：“我们在你身后，你们面对的将是无情的追捕，我们会让你们的余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撒切尔还承诺，她的政府“永远不会将非法毒品合法化，不管是软毒品还是硬毒品。”戴安娜王妃当时也加入到反毒品的运动中，她频繁出现在 BBC 的系列节目中，这个反毒品的系列节目名称引用了南希·里根的经典劝告“只是说不。”保守党的继任者约翰·梅杰也延续了撒切尔夫人的毒品

政策，随后在工党赢得选举后，托尼·布莱尔首相几乎也没有什么改变。克林顿对毒品严厉的态度似乎对布莱尔影响很大，随即布莱尔首相也任命了英国第一个“毒品沙皇”，并且在1990年使毒品禁令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他声称毒品交易是“极度恐惧的、邪恶的商业行为，是现代世界必须抵制的行为。”

1988～1998年，英国因大麻被捕的人数几乎翻了四倍。一年几乎有10万人被捕，而且其中大约有5600人受到监禁的处罚。但是这十年里，英国吸食大麻的人数依然在增加。尽管在欧洲各国之中，英国拥有最严厉的大麻法律，可是很快英国年轻人吸食大麻的人数就高居榜首。英国的青少年抽大麻的人数似乎比荷兰的青少年还多，虽说后者可以轻松地步入那些获得政府批准可以出售大麻的咖啡店里购买大麻。就像美国一样，英国也有许多著名的保守人士挑战传统观念试图改革大麻法律。《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的编辑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ore）在2000年建议布莱尔政府应该“拟定计划将大麻合法化。”警察基金会也建议应该减轻对大麻犯罪的惩罚，而且前保守党副领袖彼得·利利（Peter Lilley）也支持个人使用大麻合法化。布莱尔起初坚持对大麻法律不作任何更改，可是在2002年，他还是听从了警察基金会的建议。于是在政府相关部门公布的控制清单中，大麻被给予了一个较低的控制级别，而且也不鼓励警察拘捕那些拥有少量大麻的人，但是在英国拥有大麻依然是犯罪行为，它可以得到最高两年监禁的判罚。

拒绝将大麻合法化的理由都是因为传说大麻对人体有害，布莱尔首相也没有理睬英国许多的对大麻研究的成果。早在1968年，一个由阿宾杰的伍顿男爵夫人（Baroness Wootton of Abinger）领导的针对大麻的议会委员会就曾经发现“长期适度地吸食大



麻对身体确实没有什么有害的影响"，而且还指出"大麻的危险性比鸦片、安非他命、巴比妥酸盐要小得多，甚至比酒精的威胁还要小。" 1998 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手术刀》（*Lancet*）对有关大麻的科学文献评估后断定"适度的使用大麻对身体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手术刀》的这篇文章的结论与世界上第一次正式调查使用大麻带来的问题的结论是一致的。远在 1894 年，印度的大麻调查委员会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之后，就做出过如下的结论，有些重度吸食大麻者患有支气管炎，但是"适度的吸食大麻实际上没有负面影响。"当时，英国的委员们似乎非常惊讶于大麻对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危险性。于是在他们长达七页报告的基础上，当时的印度殖民地的统治者决定拥有大麻不再是犯罪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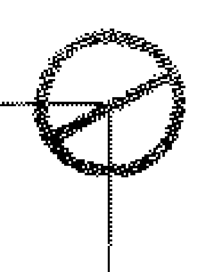
成本和代价

在美国实施非常严厉的毒品政策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毒品的使用也达到高峰。耶鲁医学院的教授也是研究美国麻醉品政策的著名历史学者大卫·马斯托（David Musto）博士曾经解释道，当毒品的使用达到高峰的时候，对它的容忍也同样会达到顶点。但是当毒品远离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时候，毒品的使用者就会处于社会边缘，成为替罪羊，更容易受到惩罚。对许多人来讲，他们看不到社会对苛刻的惩罚制度付出的代价。马斯托认为，美国的毒品法折射出了文化的变迁。多年来，虽然极端的制裁可能有助于限制毒品的流行，但是毒品使用增加和减少的主要理由里却充满了谎言，这个理论随即被近期美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1979 年，年轻人吸食大麻的人数达到

最高点。七年后，政府开始实施了严厉的联邦法律，可当时吸食大麻的人数已经降低了大约40%，年轻人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戒掉大麻是因为感觉大麻有碍于身体健康而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严厉的大麻法律在1960年代没有能够阻止嬉皮士吸食大麻，而30多年后，它们依然没能阻挡嬉哈一代（hip-hop generation）同样的嗜好。1990年代中期，青少年吸食大麻的比率又一次攀升，超过了过去的两倍。

毒品战争实施20年后，隐藏在这场战争身后的是数目惊人的代价：迄今为止，州、联邦和地方政府为了与毒品战斗已经花费了上百亿的美元，千百万的美国人因大麻被捕，每年至少有25万人被指控大麻重罪并且被关进监狱。虽然政府已经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伤害，但是不仅年轻人吸食大麻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大麻的供应链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影响。在1982年，也就是里根总统发动对毒品战争的那一年，美国中学中有88.5%的高年级学生声称他们可以“相当容易”或“非常容易”地搞到大麻，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依然高达到88.5%，并没有下降。

统计的结果可以部分地反映出事实情况，但是人性的代价就很难度量出来。在1994年，我第一次将马克·扬的案例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不久，美国第七上诉巡回法庭就撤销了对他的终身监禁判罚，但是撤销的原因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它裁定马克·扬对大麻种植的知识一无所知，这也就意味着对他的监禁判决应该取决于他所介绍卖出大麻的重量，而不应该由生产的大麻重量决定（扬自己也不能准确地估计出这个数量）。上述的裁定将他的案子退回初始法庭重新审理。最终，莎拉·埃文斯·巴克对马克·扬又做出了新的判决：12年半的监禁且



不得假释。

随后，扬从莱文沃思监狱转到了另一个中等安全级别的监狱继续服刑。然而他的监狱生活并没因此变得轻松下来，他妻子突然停止探望他，不久她就同他离婚了。他在监狱里还继续抽大麻并因此受到相应的惩罚，监狱多次停止了他的探视权和打电话的权利，他也被关在不同的惩戒场所，甚至经常受到隔绝的惩处。但是他依然抽大麻，而且这一现象在联邦监狱中非常普遍。他后来对我说过，“我必须跨过海洛因去找大麻。”这也许说明监狱里吸食海洛因的现象更为严重。在 2002 年 2 月 6 日，扬被转到一个辅导院接受教育管理，他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还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可是因为他还继续抽大麻而且尿检不合格，在享受了仅仅六个星期的自由生活后，他又一次被关进联邦监狱。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马克·扬又一次被释放，居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正在尝试找一份新的职业，但是，他却不曾动过种植大麻和出售大麻的念头。马克·扬假释的条文规定，在未来的八年里，他不得离开印第安纳州的南部地区，不得与任何重罪犯来往，不得使用各类非法毒品，而且如果尿检不合格，就会再次将他关进监狱服刑多年。然而马克·扬依然固执地抽大麻，因他喜欢大麻而且认为大麻没有什么问题，他坚持这样认为，“盲目地跟随政府，比我做过的那些事情还愚蠢。”

如果你想这样的话

如今，美国大麻和毒品滥用委员会对大麻的结论依然和 30 年前的结论一样。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个人使用大麻合法化，种植和拥有少量的大麻不应该再是犯罪行为，但是种植和出售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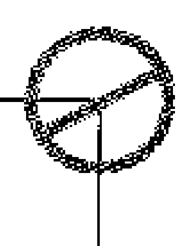
量的大麻、公开吸食大麻、将大麻出售给年轻人以及在大麻的影响下驾驶汽车等行为应该还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大麻的合法化是通向合理的大麻法律的第一步，它的好处显而易见。法律管制资源可以从对大麻过犯者的拘留和监禁中摆脱出来，可以更加关注那些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些每年美国政府投入的仅仅为处理大麻的巨额资金可以转到更需要的地方，例如资金可以转向对毒品滥用成瘾者的医疗上；数千间的监狱房间就可以关押那些暴力犯罪的罪犯；黑市上贩卖大麻的利润就会直线下降。但是大麻的合法化只是对大麻战争带来的浩劫的一个局部的解决方案。

对大麻罪犯的强制性判决应该废弃，恢复法官的传统权力，保证个人得到的惩罚和罪行的一致性；修改那些没收财产的法律，这样，犯罪调查的动机也就不会再被贪婪所驱动了；应该限制职业告密者的使用方法，并且应该有严谨的监管措施。如果采取这些步骤会给美国的年轻人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这个信息并没有认为抽大麻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好事情。但是难以启齿的是，那样的话，美国政府将不再继续一个失败的政策，不再为了表现出坚定而去不必要地毁灭生命。

大麻的非刑事化也会有助于解决人们对大麻的医学应用的争论。那些身患重症的病人就可以避免冒犯罪的风险得到他们的“药品。”大麻的毒性可能比一般的食品还低，拒绝那些癌症患者、艾滋病患者以及截瘫患者使用比许多医生开处的合法毒品安全得多的有益的“药品”简直就是报复性的和残忍的行为。

虽然大麻不会使青少年变成连环杀手或者不可逆转地破坏他们的智力，但是它依然具有强烈的麻醉功能，使用大麻会降低理性的思考能力和运动能力。如果没有节制地沉溺于大麻，青少年就会经历与年龄不符的社会和情绪的混乱行为；而且如果抽大麻



确实对生殖系统和免疫系统有伤害的话，那么吸食大麻的青少年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一定要强烈阻止青少年吸食大麻。然而如果人们对孩子们说谎，诡辩大麻的危害性，一旦孩子们认为不是这样的话，反而会鼓励孩子们去怀疑那些更危险毒品的危害性的真实性，他们也许会怀疑，海洛因、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是否真是那么可怕？在美国，两个主要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从酒和烟草行业的游说者那里接受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政治捐款，而对大麻采取“零宽容”的政策以及进行的道德指责都是虚伪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物质滥用上瘾的专家迈克尔·D. 纽科姆（Michael D. Newcomb）指出，“烟草和酒精是青少年普遍摄取的、滥用的、致命的毒品”，美国 11 岁至 13 岁的青少年喝酒的人数是抽大麻人数的四倍。毒品教育的各种项目理应尊重年轻人的智力，应该告诉他们毒品对身体有害，而不应该采用威吓的战术、谎言和虚伪的假关怀。而且政府也应该像对酒精中毒者和尼古丁中毒者那样给予毒品滥用者医学治疗。很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和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人民正在忍受许多健康问题的困扰，解决健康问题不应该是监禁和没收财产的理由。

在一个惩罚大麻罪犯比惩处谋杀犯还要严厉的社会，很容易造成人们和社会的精神变态。很长时间里，大麻的法律都是基于种族偏见、非理性的恐惧、隐喻、象征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基于事实的大麻政策。结束针对大麻战争的指令不应该再一次来自于国会或者总统，来自缉毒局、警察、监狱或者是法庭，它应该源于公民的行动以及投票的结果。当普通的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这个决定终将到来，政府的行为终将不能阻挡公众的监督。如果你想的话，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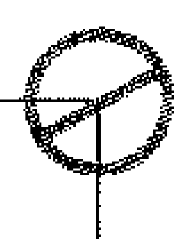
草莓种植园*

在太阳升起之前，许多雇工纷纷从他们蜗居的小窝棚、后院

* 早在60年前，就曾经出版过一本有史以来最好的描写加利福尼亚雇农生活的书。《田地中的工厂：加利福尼亚流动农场劳工的故事》（*Factories in the Field: The Story of Migratory Farm Labor in California*）的作者凯里·麦克威廉姆斯（Carey McWilliams）在书中就勾画了一个农业生产系统，而这个系统的许多方面依然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于当今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中。而且在过去的50年里，雇工的状况也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美国的墨西哥雇工的困境始终与种族歧视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形已经超过了一个多世纪。

我非常感谢那些曾经花费了许多时间与我交谈的专家们，他们的观点使我获益匪浅。在正文中没有提到名字的许多专业人士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在这里表达对卡丽·卡恩（Carrie Kahn）的敬意。当时，她在圣地亚哥是一名勇敢无畏的KPBS的记者，她一直坚持在边境线上用热情和高超的采访技巧坚持报道了7年。加利福尼亚州乡下法律援助协会的执行主席比尔·赫尔格（Bill Hoerger）用几个小时给我讲述了他这个代表农场雇工利益的组织的许多成就，我也致谢那些加利福尼亚州乡下法律援助协会的律师们，感谢他们对我讲述了许多他们的工作并带我去采访那些悲惨的雇工们。在"联合农场工人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给与我很多的帮助。我也感谢那些邀请我参观露营地和住房的农场雇工和分成佃农们。在尝试揭露加利福尼亚雇工们的凄惨生活的时候，我经常感到语言贫乏，在此非常抱歉没能找到合适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维克托·福特（Victor Voth）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果树栽培学系的名誉退休教授，他曾经给我解释过草莓种植者目前面临的挑战。在草莓种植行业中，福特教授是一位传奇人物。在他的指导下，已经开发了许多种颇受欢迎的草莓品种。阿马多·阿马罗（Amado Amarao）是德里斯科尔协会（Driscoll Associates）（转下页注）



的工棚、地下室和车库中走出来，汇集到加利福尼亚州瓜达卢普的街道上。在这个凉爽的清晨，男人们头戴牛仔草帽或棒球帽、防风上衣、运动鞋以及各式粗糙的工作服，女人们则用围巾或大手帕将头发和脸围住，只把眼睛露在外面，从远处看，她们好像披着艳丽的彩色面纱。很快1号公路两旁排起了一长串等待乘客的汽车，这条公路并不是那条紧靠太平洋的、壮观的1号公路，只是在圣玛丽亚山谷（Santa Maria Valley）里的仅有四英里长的一条公路，圣玛丽亚山谷位于洛杉矶和萨利纳斯（Salinas）的中部。这里的1号公路是瓜达卢普的主要街道，街道的两边罗列着小杂货店、墨西哥餐厅、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店面和酒吧。天刚蒙蒙亮，路上的旧别克汽车、敞篷小货车、拖着移动厕所的古老校车以及破旧的敞篷货车都奔向附近的田野，也有少数的工人走在路肩上，路面上晃动着被路灯映衬的身影，两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模样好似昨晚他们是在户外宿营的。当太阳从海面升起的时候，30人一组的采摘工队伍聚集在望不到头的田野的边缘即将开始采摘草莓。在长长的垄沟里，数百名男人和女人弯着腰用双手采摘草莓。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这个场景使人想起遥远的过去，似乎这就是那种几乎消失的古老的生活方式。而你看到的一切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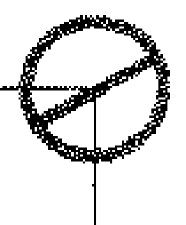
在1970年代初期，圣玛丽亚山谷大约只有600英亩的草莓园，如今这个数字已经是那时的六倍了。草莓是最耗费劳力的

（接上页注*）的一位植物育种专家，他耐心地对我解释了草莓栽培的细节并且带我参观了公司在奥克斯纳德（Oxnard）的一家农场。我非常有幸能听到一些人的直言，却不能公开他们的姓名，我也对这些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我从来就没有对草莓种植者魔鬼化的意图，这些真实的谴责并不是针对少数的个人，而是谴责那个鼓励和奖赏剥削贫困雇工的运作系统。

农作物之一。种植草莓的风险很高而且成本也相当高，但是草莓比其他农作物的利润也高，仅次于大麻的利润。在瓜达卢普外面的同一块土地不久前还是饲养奶牛的家庭农场，而现在已经成为草莓种植园，而且雇佣了数千名流动雇工。这些雇工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这些由非法移民构成的流动雇工不仅帮助我们解释了加利福尼亚州近年来草莓业的繁荣，它也终结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田园景色并改变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构成。

农业至今依然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产业。从 1940 年代末开始，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产品输出就名列美国各州的榜首。现在，它的水果、干果和蔬菜的产量已经超过全美国产量的一半。加利福尼亚州种植了数百种的农产品，其中有国内的品种也有国外的品种，而这些农作物绝大部分都出自森特勒尔瓦利（也译作中央谷，Central Valley），这个地区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农场。可是据某些评估，加利福尼亚的农业现在已经呈现下滑趋势，如果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加利福尼亚州每年的农作物产量已经下降了 15%。在 1982～1997 年期间，加利福尼亚州每年大约失去 30 万英亩的农田，主要是因为城市化的原因。宽阔的田野正在遭受蚕食，不断让位给商业区和林荫道。常年灌溉的水渠被改道引入到城市和城镇作为生活用水，为了打开市场以吸引海外的竞争者，建立了许多完善的冷却系统和交通系统。可是，随之而来的空气污染已经开始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同时那些高速增长的、高额利润的加利福尼亚的农场经济，也就是种植高价值农作物的那些农场，如今已经非常依赖廉价劳动力。几乎每一种与健康有关的以及那些深受挑剔消费者喜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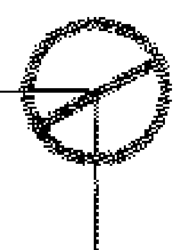


保健水果和蔬菜还是用手来摘取，例如莴苣、葡萄、鳄梨、桃和李子，所以每当上述水果的需求量增加的时候，采摘的人手也必须相应地增加。现在加利福尼亚各地，那些依赖农作物生存的流动农工大约有30% ~60%都是非法移民，尽管他们的工资很低，但是他们还是十分乐意地长时间工作。这一现状使加利福尼亚州得以保证农业的生产。尽管从1964年起，加利福尼亚州减少了近九百万英亩的农田。如今那些种植水果和蔬菜的农场主非常依赖繁荣的劳动力黑市，而且如果没有这个黑市，可能就会有许多农场关门倒闭，实际上那些普遍被人辱骂的、被人斥为偷走福利的、骗子似的非法移民成为了支撑加利福尼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加利福尼亚州流动雇工的增加，非法移民的比例也在增加，它反映了国家的一种趋势，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忽视了这种现象。在19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在未来的十年里不会再有流动的农业工人；专家们也曾经预测过，不久科技就会替代那些流动雇工。他们还预言，如果到1975年依然还有机械不能收割的农作物，那么这种农作物就不应该在这个国家里种植了，后来的人口普查结果也支持了这个假说。菲利普 · L. 马丁（Philip L. Martin）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也是国家对农场劳工统计的权威人士之一。据他估计，1920年代的美国大约有200万的雇工，1940年代大约有100万，即使在1970年代，当时恺撒 · 查韦斯（Cesar Chavez）组织了大量的流动工人，当时的流动农业人口也只有20万。随后这个数据开始攀升，本土的农业雇工绝大部分被那些非法出入墨西哥的流动大军取代。现在很难准确计算出流动农业人口的数目，在众多原因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流动大军中存在相当多的非法移民。马丁相

信，美国现在雇用的流动的农场雇工会超过 100 万，不仅有许多的流动雇工，而且付给他们的工资也正在减少。如果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农场雇工每小时的工资比 1980 年减低了 50% 还多。流动雇工是美国最贫困的工人，他们通常都是男子，平均年龄 29 岁，一年在农场工作 25 个星期，而他们一年人均还赚不到 7500 美元。据估计，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 49 岁。

草莓行业的繁荣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是加利福尼亚州农业近几年变化的标志。草莓业已经成为加利福尼亚州产业的中心，它的年收入大约为 8.4 亿美元。草莓给美国的农场主带来的利润比其他的美国出产的新鲜水果的利润要高得多，只是苹果例外。然而采摘草莓的农工不仅是最贫困的雇工，而且他们绝大部分是二类合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在收获草莓的季节，我用几个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商业种植水果地区，也拜访了许多工人、农民、学者和农场劳工激进分子。在圣玛丽亚山谷，乡下的贫困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在那里，悲惨的佃农协议使雇工深深地陷入债务之中。沃森维尔（Watsonville）和萨利纳斯（Salinas）出产加利福尼亚州一半的草莓，这里季节性的大雨使雇工们原本就已经很艰辛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而在圣地亚哥县（San Diego County），那些劳动大军足以威胁加利福尼亚农业命脉。现在那里农场主对农工的需求正受到房地产开发商的挑战，开发商们也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那里，那些流动雇工居住在那些只是第三世界才会有的临时搭建的陋室里，而与之比邻的就是那些昂贵的郊区风格的住宅区。在加利福尼亚州草莓种植园里，对那些由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你可能会找到许多的答案，但是你很难解决那些道德上的难题。



草莓业：短暂的过程

草莓种植园并不算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它不像柑橘林、苹果园，甚至玉米地的景色那样非常吸引人。现在的草莓都是在塑料薄膜下孕育生长，直至成熟。在种植草莓之前，整个草莓种植地都覆盖上塑料薄膜，而且施以甲基溴化物，这样就可以杀死土地里的有害细菌和线虫。一段时间后，撤掉那层塑料薄膜，工人们将滴灌水管安装在土层里，再盖上全新干净的塑料，然后手工种下草莓，塑料薄膜可以起到保持热量、保持土地潮湿以及防止侵蚀的作用。待草莓收获以后，工人们会将草莓秧、塑料薄膜和滴灌水管从土壤里起出来一起扔掉，因为如果留下当年的草莓秧，下一年长出来的草莓会比前一年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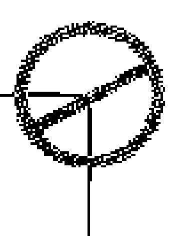
过去加利福尼亚州还不能左右美国草莓的产量。1950 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州草莓的产量仅是美国总产量的 1/3。随后，新的种植技术、新品种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加利福尼亚州的草莓产量开始激增。在 1974 ~ 1994 年之间，加利福尼亚草莓的产量翻了三倍，使得美国各地的草莓价格纷纷下降，美国人均消费的新鲜草莓数量也翻了两倍。2001 年，加利福尼亚州向外面运送了 9100 万箱的新鲜草莓，一个箱子大约有 12 品脱，可以装 11.5 磅的草莓。今天，加利福尼亚州草莓的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总产量的 80% 以上，大约是世界商业草莓产量的 1/4。

在好的年景里，草莓会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利润很高的农作物，但是它也是风险最大的农作物之一。草莓容易吸引各式各样的有害物如蚜虫、线虫和小红蜘蛛，而更具威胁的是气候。不管种植者如何准备好土地，也不管他们如何精心照料草莓，草莓产

量的关键取决于当地的气候条件。种植草莓的理想条件是凉爽的夜晚、温暖充满阳光的白天、风速每小时不能超过五英里，而且果实萌发的时候还不能下雨。只要天气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就会很快地彻底毁掉草莓。霜冻可以冻死草莓的花；大风会使叶子与果实相互摩擦，从而损伤草莓的外表并产生许多褐色的条纹；热浪会延缓它的生长并且会软化草莓。最糟糕的是暴雨，因为草莓非常脆弱，以至于持续不断的暴雨使草莓表面撕裂，而这些小口很快就会被葡萄孢子感染并造成灰斑，连续几天的大雨会使草莓颗粒无收。

草莓的市场也像变化无常的天气一样，同样存在着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草莓种植者时常要考虑新鲜草莓腐烂的风险，草莓摘下来十天后就开始变质。一个农场主曾经告诉过我，“我不可能像种小麦的农场主那样，将草莓存到地窖里，然后打开计算机决定何时以最高价卖出。”草莓的质量、市场的供求、上市时间以及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使草莓的批发价格波动很大，草莓的价格可以从 3 美元一箱到 15 美元一箱，而且这些种植特殊水果的农场主得不到政府任何的价格保护支持。虽然现在加利福尼亚种植的草莓可以持续供应九个月，但是在收获季节里，大约有 1/4 到 1/3 的草莓已经成熟，这段时间仅仅持续几个星期，所以农场主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只能随行就市接受市场的价格。而那些经过处理的草莓则可以贮藏起来，日后以大约 25 美元/磅的价格售出。

许多成功的农场主都种植高品质的草莓，他们有充足的资金可以安全度过坏年份，而且他们都是通过著名的市场协会出售草莓，这些农场主每年一英亩的草莓可以赚到一万到二万美元。但是其他的草莓农场主通常只能依赖气候和不稳定的市场了，全凭



自己的运气。当水果和蔬菜纷纷上市的时候，能够赚取稳定利润的人通常都是那些中间商，例如加工商、冷藏库和连锁超市，而不是那些种植者。在草莓种植业里，农场主一年内可能会有巨大的损失，每英亩的生产成本大约在 12000 美元到 30000 美元之间，如果种植 50 英亩的高品质草莓，一年的投资可能会高达一百万美元。几乎没有人可以控制这些固定的成本：租金、树苗、杀虫剂以及滴灌系统，农场主唯一可以真正控制的就是劳动力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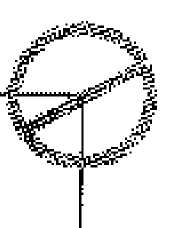
许多农场主都遵守规则并且对他们的工人也很好。实际上所有的草莓采摘者都渴望在属于“德里斯科尔协会”（Driscoll Associates）的农场里工作，因为那些农场的环境很好而且那里的工资也是这个行业里最高的。同时采摘者们也非常认可其他的一些农场公司，例如“纳彻里普”（Naturipe）、“甜心”（Sweet Darling）、“卡尔本”（CalBen）和“海岸浆果”（Coastal Berry）。那些认为所有的草莓种植者都虐待工人的说法一定是错误的，可是有些农场主确实如此。因为雇工的成本大约可以占到种植草莓总成本的 50% 到 70%，所以降低劳工的成本有时也就意味着获利或亏损，能否度过坏年份或一个灾难性的年份。违法带来的诱惑是巨大的，而这种非法行为又很少遭到惩罚，所以近年来有些农场主已经不那么自律了。

最简单的降低劳工成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将许多工人排出在花名册之外。除了社会保障和医疗税之外，农场主通常有义务为他们雇用的每一名工人支付失业税和工人赔偿保险金。可是如果用现金支付工资给一个“无形”的工人，至少会比一个正常工人的支出降低 20%；如果再忽视加利福尼亚州加班规则，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那么实际上就又减少了 50% 的工资；而且一旦出现拒付工资的情况，那么这些钱就都是农场主自己的了。

分成佃农的经营方式是非常阴险的，这意味着该农场主逃避了对工人的责任。佃农就像一个稻草人、一种手段，通常都是中年的雇工，签订了承包协议的分成佃农要负责农场的经营，因此真正的农场主转移了许多法律和资金的风险。分成佃农方式在草莓行业里有着很长的历史。在过去的十年里，它是一种经营惯例，与其说它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组织完善的欺诈行为。

新奴隶状态

当我见到菲利普（在草莓种植园的故事中，没有姓的名字都是化名），他的外观看起来很糟糕，衣服又脏又破，脸颊消瘦，也没有刮胡子。他的草莓田和地狱差不多，垄沟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草莓、旧箱子和空苏打罐，满地都是破烂的滴灌管，而且也没有将塑料薄膜覆在地上。见到我吃惊的表情，他对我解释道，“太贵了，公司给我的钱不够做这些。”他的工人正在一旁把那些“猫脸”，也就是小的不成形的草莓摘下来。大雨严重毁坏了草莓地，菲利普以 12 美分/磅的价格出售这些草莓，他搞不懂为什么处理过的草莓价格如此之低，但是佃农合同的条款规定他必须接受出售的价格。他对我讲，“他们拿我们当奴隶使，他们想给我们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并答应以后给我寄他签的那些法律文件以证明他的说法。这个种植季节才刚刚开始，菲利普就已经背负了五万美元的债务，这只是去年累计下来的债务的一半。另外，他还欠美国国税局 5000 美元。他沮丧地说：“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曾经有过好日子了，我永远处于这个深渊中。”菲利普曾经也是个草莓采摘工，可是有一天他的农场主问他是否愿意做



“农场主”，结果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几经做了 16 年的分成佃农，但他几乎没有积攒什么财产并且随时准备退出。

分成佃农的经营方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草莓行业已经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其间，随着法律的变化和劳力供求的变化，这种经营方式也随之上升和回落。在不同的时代，对这些“稻草人”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分成佃农、承租农场主或是“合作伙伴”，其实这个策略最根本的就是将最大的风险从农场主身上转移出来。1980 年代，分成佃农方式非常盛行，它不仅流行于草莓业，树梅、雪豆和南瓜种植业也都采取这种经营方式。在典型的分成佃农耕种协议里，农场主将一部分草莓地分配给一个雇工和他的家人，农场主不付给他们工资，而是许诺与他们对半分成。这个分成佃农就变成了记录在案的“农场主”，他要负责雇用草莓采摘工、给他们付工资、代扣雇工的税以及核对他们的绿卡，这位“农场主”还得负责其他与种植相关的所有成本以及农场的管理工作。利用雇工作为理论中的独立经营者，真正的农场主就逃脱了触犯劳工法和移民法以及可能受到重大损失的风险，而这些分成佃农就替他们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风险，他或她无法得知这一年能否盈利，而且一旦盈利，也搞不清楚农场主能否公正地与他们分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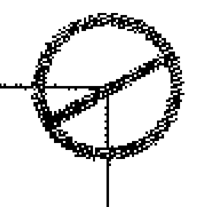
确实有许多勤奋的、有事业心的分成佃农设法完成了合同而且赚到了足够的钱，从而使自己成为了真正的农场主，这些从佃农转为农场主的人被称为“墨西哥人。”但是多数的分成佃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年下来，他们通常只能赚到与其付出极为不符的钱，甚至比他们付给雇工的薪金还要少，有时候，他们根本就赚不到一分钱。

1989 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法院曾经针对黄瓜种植业中分成

佃农的种植方式的协议作出规定，这个协议与草莓行业的协议及其类似，不允许农场主忽视工人的补偿法律。法院认为，分成佃农不是独立的经营者，农场主不能靠替雇工巧立一个新名称就可以逃避雇主的法律责任。分成佃农种植方式也只是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1990 年代，草莓行业中又重新出现了新型的分成佃农的经营方式，新的方法似乎比旧的更文明、更人道一些。新的协议架构是佃农农场主和真正的农场主一起避免种植草莓的财政风险。那些真正的农场主的新名字是委托商人，他们不直接支付草莓农场运营一年所需的钱，而是把钱借给那些分成佃农，委托他们去运营，可是贷款的利率却高达 19%。在以前的协议里，如果事情干砸了，那些辛苦一年的分成佃农只是一无所得而已；可是如果在新的协议下，他们就必须承担成千上万美元的债务。

萨利纳斯的“加利福尼亚州乡下法律援助协会”（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CRLA）的律师迈克·穆伊特（Mike Meuter）认为，在他负责的地区，其中包括沃森维尔，接近一半的草莓种植农场有分成佃农经营。乡下法律协会成员对圣玛丽亚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个山谷的一半或 3/4 的草莓农场都是分成佃农的种植方式。不管这个比例是否准确，可以毫无疑问地讲，分成佃农的经营方式又一次普遍实行起来。加利福尼亚州乡下法律援助协会的另外一名律师珍妮·巴雷特（Jeannie Barrett）仔细查阅了分成佃农耕种协议，她近 20 年来都往返在圣玛丽亚地区，她认为这个新的协议最坏，“它基本上就是劳务还账制的一种形式。”

我还拜访了圣玛丽亚最大的委托商之一的“贵格农产品”公司（Kirk Produce）。这家公司由一个著名的草莓农场主创建，



其他的原始投资人也是草莓农场主。彼得·M. 古斯道夫（Peter M. Gwosdof）律师替贵格公司起草的合同文本堪称是艺术品，而且他还拥有这个合同的版权。[①] 为了证明分成佃农不是贵格的雇员，这些合同强调公司与他们“不合伙、不合资、不合作种植、不出租种植以及没有其他的业务联系”，但是在其他地方，合同明确说明那些“独立的农场主或种植者”从贵格租用土地并且从贵格贷款给农场，他或她必须通过贵格购买农场必需品和浇灌设备，种植的草莓必须满足贵格的质量要求，而且所有的合格草莓必须以贵格规定的价格卖给贵格。此外，如果分成佃农的种植工作没有得到贵格公司的批准，贵格公司有权利随时收回土地或是终止租借协议，而且租借协议的终止并不意味着免除贷款。

其他的委托商人依然使用类似的条款，这些合同长达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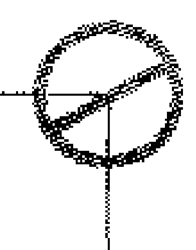
---

① 我曾经得到过一些“贵格”公司合同的复印件，“贵格农产品公司农业转租”、“贵格加工公司与贵格农产品公司新鲜草莓供货销售协议和持续保证”以及“贵格加工公司与贵格农产品公司草莓协议。”如果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那些“独立的种植者”究竟有多么自主，可以参考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第二上诉受理地区第六分部的判决结果，这些结果在第二民事诉讼 No. B084308（Super. Ct. No. 200797）（圣大巴巴拉县）的卷宗中可以找到。这个案例关注了贵格公司的一位名叫鲁道夫·孔特雷亚斯（Rodolfo Contreras）的分成佃农的雇佣状况，法庭认为，“贵格公司按照协议条款以定期和经常性的方式对农作物的多次交货支付‘预付款’来保障承租人种植农作物，”法庭还发现，“当贵格公司得到农作物销售的收益后，承租者还必须‘偿还’那些‘贷款’。孔特雷亚斯在承租期间，他欠贵格公司大约7万美元，实际上，那些协议不能给孔特雷亚斯提供真正赚钱的环境。因为孔特雷亚斯依然欠贵格公司钱款，所以经过同公司协商后的孔特雷亚斯还对贵格公司心怀感激，其实孔特雷亚斯自己真正的投资只是一辆拖拉机和一部敞篷小汽车，这些投资对经营一个农场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不可能制定这样的协议让孔特雷亚斯这样的投资人独立经营农场。孔特雷亚斯只有过去三年从事体力劳动的经验，他从来没做过一个独立的商人而且从来也没接受过商业的教育。”

所以那些签订合同的分成佃农们很难读懂这样冗长的合同文本。再者，合同通常都是英文版的，然而绝大部分的佃农都讲西班牙语而且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法律文件。另外一份调查显示，沃森维尔外面的佃农只具有接近五年级的教育程度，所以几乎没有多少佃农可以真正理解合同的全部内容。贵格公司的合同也建议那些"独立农场主或种植者"在签字之前去找"独立的法律人士或财务人士"，向他们征询意见，可是在雇工中，与上层人士来往的机会很有限，而且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经营的农场的诱惑力又非常巨大，所以这些分成佃农很容易被诱惑签订这样的合同。这些人只有做了之后才知道真正的代价。

这些委托商人做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当他们把钱借给分成佃农后，他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将贷款收回来：贷款用来购买与种植相关的东西，例如，贵格通常卖给承租者秧苗、化肥、杀虫剂和包装材料；收利息；收回最初的贷款。另外，这些委托商人对卖出的每一箱草莓都收取手续费而且冷藏一箱草莓另外收取一美元或更多。多数分成佃农都必须将他们的草莓卖给委托商人，他们自己却没有权力给草莓定价，所以分成佃农们经常抱怨他们的所得并不是草莓的全部价值。他们的抱怨完全正确，虽然当时官方市场草莓的价格是 8 ~ 14 美元一箱，可是我在圣玛丽亚见到的每一个分成佃农卖出的新鲜草莓价格都是 5 美元一箱。

菲利普后来寄给我的文件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这些合同文本也的确妨碍了加利福尼亚食品农业部市场管理分部对他的案件的调查。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一家名为"阿戈马特农产品"(Ag-Mart Produce) 的委托商被发现了以下的欺骗行为，他多收了或者说是少付给菲利普 118320.62 美元。当草莓的市场价格是 8.75 美元一箱的时候，委托商人对菲利普的收购价格是 7 美元、



5 美元甚至只有 1.74 美元一箱；而有的时候，委托商人出售了菲利普几百箱的草莓，可是却未付菲利普一分钱。等到加利福尼亚食品农业部发现了这些的时候，"阿戈马特农产品公司"已经停止了在该州的业务。

还有其他一些触犯州劳工法和联邦劳动法的行为依然被分成佃农们接受，偿还贷款的压力控制了那些佃农，甚至多数的富有同情心的分成佃农都处于这样的困境中。每个星期末，他们必须给采摘工人付工资，而委托商人通常都是每三个星期才付一次的钱。委托商人还从支票里直接扣掉服务费和贷款利息，这样留给采摘工人的钱可能就不多了。而贵格公司的彼得·M. 古斯道夫律师这样对我解释，贵格农产品公司不是"资金贷款人"，公司是通过联邦国家银行得到的资金，因此不触犯州的高利贷法律，公司可以收取任意数目的利息。他还向我保证，贵格公司不会从贷款中获益，而且如果公司的"独立种植者"遇到一个好年景，那么它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最好的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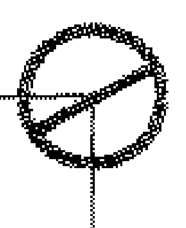
比尔·赫尔格（Bill Hoerger）是乡下法律协会的高级律师，他认为这样的贷款似乎使佃农成为了真正的商人。为了获利，那些委托商人们通常不需要偿还贷款，在以前的系统里，这些贷款是运营成本，而在新的系统里，年底的坏账可以用于勾销高税款。据加利福尼亚劳工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希普斯曼（Ann Hipshman）讲，贷款使许多的分成佃农处于"奴隶状态。"一个已经成为草莓农场主的人发现了新协议的可鄙之处，他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丝毫的新东西，他说，"去读一下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它详细描写了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我遇到的每一个分成佃农都处于可怕的财务困境中。佃农经

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养活家人，他或她将家人的名字用假名登记到工资簿上去，这样才能保障他们得到工资。后来我随机采访了若干个种植园，一遍一遍地听到了同样的故事，而且我见到的都是一张张同样疲惫的面容。佩德罗是唯一一个我见到的一点也不愤怒的分成佃农，他当时36岁，不过看上去要老10岁。他做过8年的采摘工人然后又开过卡车。他对我讲，他的一部分田地被洪水淹了，而剩下的34英亩的草莓也已经被大雨摧毁了，今年肯定是一无所获。他以分成耕种的方式经营了六年的草莓种植，几年累计下来的债务已经有12万5千美元。我问他为什么累计了这么多的债务呢？他耸耸肩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欠钱。”而这些灾难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愉快心情。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可以给他雇佣的雇工提供一个工作，而且非常自豪自己是个老板。当他的眼光停留在田地里的工人和风中啪啪作响的破损的塑料薄膜上时，佩德罗对我说：“我不关心实质性的东西，我是耶和华的使者。”

农民现状的调查

加利福尼亚州过去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农场垄断农村经济的快乐时光，雇佣的雇工都期望有朝一日能拥有自己的土地，社会模式也从来没有接近过托马斯·杰佛逊支持者的理想模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规则下建立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模式并没有妨碍加利福尼亚州并入美国。19世纪中叶形成的利润丰厚的小麦农场最早呈现了现代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实例。不久后，加利福尼亚州的水果和蔬菜种植者都效仿这种经营模式。加利福尼亚州农业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而且它拥有大量的肥沃土地、几乎完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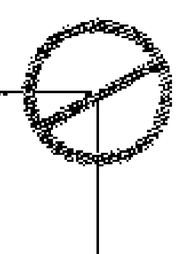


气候以及充足的灌溉水源。但是它唯一缺少的就是劳动大军，缺乏人手去采摘丰收的苹果、甜瓜、柑橘以及海枣。历史学家克莱图斯·E. 丹尼尔（Cletus E. Daniel）已经对加利福尼亚州大规模农业的最初阶段作过详细的描述，将之作为对农民的状况、地位或行为的调查。第一批雇工是中国的移民，随后日本的移民也在此耕种过，直到 1882 年的《拒绝法案》（*Exclusion Act*）以及 1907 年的《绅士协议》（*Gentleman's Agreement*）限制了中国和日本移民进入加州。在 20 世纪初期，加利福尼亚州曾经招募大量的墨西哥人以解决它长年的农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据说只要需要，这些低薪的墨西哥人就会工作努力，而且只要不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返回墨西哥。

在 1929 年之前，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的人员流动非常自由，之后无书面文件的移民美国的行为成为了一种轻罪，变成违法行为了。截止到那个时候，加利福尼亚州 70～80% 的流动雇工是墨西哥人，洛杉矶墨西哥人的数目比美国其他城市都多，只是略逊于墨西哥市。而这些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加利福尼亚农村经济的支柱。而那些英国流动工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其经典著作《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描述的、已经成为不朽的“农夫移民”（Okies）（是对于流动农业工人的蔑称，尤指 1930 年代期间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流动农业工人。）就是历史的畸形产物。实际上，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绝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州的流动工人都是墨西哥移民，不管他们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移民。这些移民的民族特性经过几代的变化依然与他们工作的天性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农产品的收获方式完全和 18 世纪一样——人工采摘。

现在的机械设备几乎可以收割所有在美国种植的水果和蔬菜，可是因为雇工可以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只有当机械化的成本低于流动雇工工资的时候，农场主才会使用这样的机械设备。1970年代，联合农场工人协会（UFW）成功地将加利福尼亚州葡萄和莴苣行业的流动工人组织起来。在加利福尼亚州，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农作物，联合带来的威胁轻易地说服了许多农场主给流动雇工提高工资、提供福利以及改善工作环境。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支持协会的立法，用以保障雇工议价的权利、保障最低工资以及失业补偿。因为劳工成本增加，所以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主都将机械化作为当务之急。但是后来连续几任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例如，乔治·德克梅吉恩（George Deukmejian）和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他们解散了“农业劳资关系董事会”（Agricultur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并且放松了加利福尼亚州严厉的劳工法的强制执行。在这种大环境下，协会的工人都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非法移民；而农场主为了避免工作场所违法的指控，利用法律条文将劳动合同的定约人和分成佃农作为流动雇工实际的老板。那些来之不易的福利，例如病假、带薪休假、提供家庭住宅以及健康保险，统统都不见了，而且雇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每况愈下。

在1970年代初，农场工人联合协会大约有八万名成员，可是现在它的人数只有原来的1/3。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流动劳动力非常廉价，他们不仅仅采摘水果和蔬菜，而且他们也出现在田园里了。当然，这得感谢非法移民、自动打包设备和雇佣协会工人的做法迅速地远离了这个行业。一个著名的劳动力专家最近观察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没有机械化，我们看到农业正在“墨西哥人化。”



邪恶的水果

我是在4月中旬采访的沃森维尔。那时候，正好天降大雨，而且大水刚刚淹没了数百英亩的草莓种植园。许多深蓝色的塑料桶凌乱地堆在草莓田地里，田地都变成了泥浆，而那些没有被大水淹没的田地也都被大雨摧毁了。我在一个破旧的劳工营地里见到了许多草莓工人，那个营地就是一个依山势和草莓园修建的小型贫民窟，而且距城里还不太远。长年以来，这些已经灰暗的木板搭建的简陋房舍通常居住着350人左右，主要是草莓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但是，在收获高峰的时期，大约40间的陋室还得塞进数百名雇工。1990年代中期，由于拥挤的居住环境和拙劣的建筑设计，这个贫民窟一度爆发过肺结核。简陋的房间里，卧室占据了中心走廊，而且也没有窗户，两个卧室的房租是每月500美元，能有这片遮挡风雨的屋顶在这里也算是运气的。当我在这个贫民窟里转悠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孩子在院子里面跑着玩耍，他们似乎忘记了身边的肮脏和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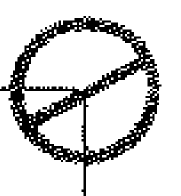
那天，天空乌云密布，更恶劣的天气即将来临，未来几个月天气的好坏就决定了这些工人全年的收入。几个靠在汽车旁的草莓采摘工人告诉我，他们通常在这个季节里每天都要工作8到10个小时。他们之中只有一个采摘工是今年新雇用的。每天早晨，都有人去附近山坡上的草莓农场察看是否可以工作，可是，这些天去察看的工人都是无奈而返。已经雇用这些采摘工人多年的工头只能叹着气说，也只能等到下个星期了。

采摘草莓的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一项季节性工作，它被认为是一种“随意”的工作。这项工作没有合同、不需要资

历也必须天天坚持干下去的合同契约。农场主根据需要可以随时雇用和开除采摘工人，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一个只做过六天的采摘工人和一个做过六年的工人也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通常雇用的报酬期限是以天为基础的，如果农场主需要减缓采摘和细致的工作，报酬就以小时计算；如果农场主需要尽快地将草莓从田地里运出，就采用计件工资以鼓励勤快的工人。一名流动工人通常不知道自己能工作多长的时间以及能得到什么样子的报酬方式，只有等他或她一早抵达了农场才知道如何。可能有一个持续两个星期的每天 10 小时的工作，也可能得不到工作。能否得到工作基本上取决于天气和市场的情况。

因为农场主天生的吝啬和无情，所以固定工资这种方法没有普遍实施起来，而且能否丰收这个问题，从种植初期到种植结束始终都是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许多农场主尝试每个星期给他们的工人一定数目的工资，这样可以有些好的商业名声，也可以保证那些可靠的有能力的工人每年都回到农场工作，毕竟金钱是最大的动力。

流动雇工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草莓是邪恶的水果，采摘草莓在加利福尼亚州是报酬最低、最艰辛以及最不招人待见的工作。草莓非常容易破碎和擦伤，采摘时必须非常小心，特别是采摘那种市场上需要的新鲜草莓。市场上出售的新鲜草莓不是扯下来的，而是从枝干上拧断的，这样才能保证草莓的顶部有个绿色的小盖子。工人们必须选择采摘那些大小、形状、颜色适当的以及果实饱满的草莓，而且还得把摘下的草莓整齐地码放到篮子里以吸引购买者的眼球，大约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学会如何正确采摘草莓。通常采摘工人不仅要负责采摘和打包，他们还得修理草莓的枝干，也必须经常检查浇灌设备。必须剪掉新长出来的嫩芽和长匐茎，必须扔掉腐烂的草莓，否则，它会影响其他的草莓。当采用



计件工资的时候，工人们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任务。在收获季节，种植园中充满着对计件工资的渴望。工人们推着小车来回奔走在垄沟里，停下来，弯下腰，分开他们左右的叶子，采摘合适的草莓，将草莓码放到盒子里，再检查草莓秧，然后再向前走循环往复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当车里的箱子都装满草莓后，他们快速奔回田地的末端进行点数确认，然后又飞快地回身，再开始新一轮的采摘。

草莓苗大约有 4 ~ 5 英尺高，成熟后才有 8 ~ 12 英尺高，所以你必须弯腰才能采摘。这就使得采摘草莓成为非常艰苦的工作。如果弯腰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就会造成后背僵硬，那么如果采摘工人在几个星期里每天这样弯腰 10 到 12 小时，后背一定会产生极其痛苦的疼痛，也许会造成终身残废。大多数的草莓采摘工人都在遭受后背疼痛的困扰，可以预见，采摘雇工的年纪越大后背的疼痛就越厉害。雇工和运动员一样，随着年龄的变化，干活的速度也会发生变化，采摘草莓速度最快的年龄在 20 到 30 岁之间。尽管一些有丰富采摘经验的妇女可能会工作长一些，但是，多数人在 30 多岁的时候就退出了这一行。在草莓种植园内，年龄歧视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年龄完全是工作效率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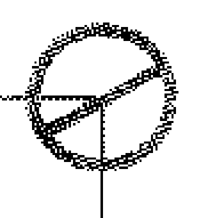
采摘工人的计时工资也是变化无常的。工资通常取决于农场主、采摘的草莓类型、采摘时间以及工人的熟练程度。沃森维尔和萨利纳斯地区的工资高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地区，因为这里距墨西哥要远一些。如果农场主要是给市场提供最优质的草莓，那么采摘工人每小时的报酬大约会在 8 到 10 美元之间。如果市场需求量很大，而且草莓也处于全部成熟的时候，采摘一箱草莓的计件报酬就是 1.25 美元。这样，那些干活飞快的采摘工一天的工资就可以超过 150 美元。可是这种情况大约只能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多数普通的采摘工也赚不到这么多的钱。如果有

30名采摘工人采用计件工资进行采摘，那么只有三四名采摘工人每小时可以赚到10美元，五六个采摘工人每小时只能赚到6美元或更低，这个钱数低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最低工资6.75美元/小时，其他的人每小时赚到的钱会在上述的两者之间。

对流动雇工来讲，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报酬的多少，真正在意的是能否有个工作。尽管采摘工作非常艰苦，但是有很多人都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如今失业的恐惧时常萦绕在加利福尼亚雇工们的心中。每个收获季节都会引发一轮新的竞争，每个人都希望在采摘季节里能赚到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一般来说，流动工人只能工作半年，而其他的几个月都在找工作。

另一件经常困惑雇工的问题就是找到住所。在这个地区，圣克鲁斯（Santa Cruz）和蒙特雷蒙特雷（Monterey）这些县的居住成本可能最高，因为这些地方非常受旅游者和富裕的退休者的青睐，而且，硅谷的白领阶层也经常往返于此。尽管受到房产开发商的很大压力，沃森维尔和萨利纳斯的居民还是决意保护他们本地的农场经济，虽然他们的农业用地的价值是每英亩四万美元，如果卖给开发商，他们就可以获得数倍的价钱，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可以俯瞰太平洋的草莓种植园。然而保留农业用地的决心并没有给农业工人提供一个庇护所。从1980年至今，专门用于种植草莓的田地已经翻了二倍，而且草莓的总吨数已经翻了四倍，但是为了采摘草莓而涌入的大量流动工人只好被迫去争夺低价的住房，而这些低价住房数量在数年中一直都没有增加，根本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流动雇工。

那些为单身居住的少数几个劳工宿营地是非常恐怖的地方，我曾经去过一个宿营地，那里有许多白色的建筑物，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着，特别荒凉。只是经理办公室的房前有一些蔷薇，看



上去就像拘留所或是低安全级别的监狱。在附近的另一个营地要好一些，简陋的房间里，墙刚刚粉刷过，混凝土地板还很干净。普通的房间大约 12 英尺长、10 英尺宽，一间房住四个人，夹板分开了四张轻便铁制的帆布床，房价是每星期 80 美元。这样的房价对多数流动工人来讲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这样的价钱只是得到了一张床和两顿饭而已。可是他们还住不起这样的房间，而我确实在那里看到过比这种住宿环境还好的马厩。

尽管如此，这样的宿营地常常还是可取的。如果流动工人住在住宅区，他们就要倾其所有支付昂贵的房租。在沃森维尔，一个小房子要住上三到四家人，每个房间里要挤进七到八人。和四到五个来自其他地方的流动雇工挤在车库里睡，你也要每月支付 100～200 美元。据调查，居住在索莱达镇（Soledad）车库里的人数大约有 1500 人，大约是这个镇人口的 1/8。到收获季节，住房短缺现象更为严重，在劳工营地里的雇工有时不得不付钱在汽车里过夜，而那些刚来的、单身的流动工人经常在普朗戴尔（Prunedale）的林区里宿营，每个晚上都变换藏身之地。在萨利纳斯山谷（Salinas Valley）的山坡上，有数百名的草莓采摘工住在洞穴里。

彼此依赖，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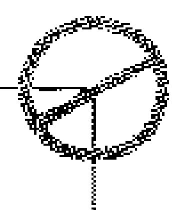
在加利福尼亚州瓜达卢普的一个小墓地里，墓碑上的名字和照片仿佛在默默地讲述着这个地区的移民史。20 世纪在此定居的瑞士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曾经在这里种植过各种豆类植物和甜菜，也曾经营畜牧场和奶牛农场；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移民引发了雇工的第一次浪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甚至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比他们晚一些来到此地的而且人数最多的是西

班牙的移民，他们在此经营塑料花和圣人画像。经历了若干代以后，瓜达卢普的墓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大部分的墓碑上都有死者的深褐色照片。走在这个墓地里，看着这些没有太大种族区别的以及肤色区别的照片，想像着他们生前的经济上的地位和竞争。现在他们的脸都在这里凝视着同一个方向，就像农场里常年都是成行成列的农作物那样整齐。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圣玛丽亚山谷存在过各种农场经济。虽然流动工人主要是以季节性的方式出现，可这里缺乏可以垄断加利福尼亚的工业化农场。瓜达卢普周围的田地过去主要都用于耕地作物和放牧，当地人拥有并经营那些畜牧农场和奶牛农场。那时候，尽管水果和蔬菜的收入也是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只占据了农业用地的很少份额。

随后，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圣玛丽亚山谷的农业模式转变了，因为耕种作物和奶制品的利润不高，所以农场主或转向种植那些高价值的特殊农作物或者干脆放弃了农场耕作。外地的公司买走了许多土地，例如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银行。出租后的肥沃滋润的牧场变成了草莓种植农场，在农场里面偶尔还有一些石油井。大量的流动工人蜂拥而至。1960年代，瓜达卢普的人口只有18%是拉丁美洲人，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85%。这里原有的中产阶层都搬到了圣玛丽亚附近的城市，远离了乡下的社会底层。

胡安·文森特·帕勒姆（Juan Vicente Palerm）已经花了至少20年的时间研究圣玛丽亚山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他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负责墨西哥和美国的研究，他也是一位专业的人类学家。他早期曾经在北欧实地调查跟踪西班牙外籍工人的生活，这些流动工人是根据谈判引进到北欧的工厂和田地的。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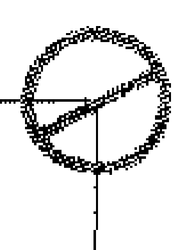
仅非常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而且对山谷里农作物的种植、打理、营销以及销售都十分了解。我和帕勒姆及他的学生用了一天的时间开车沿着瓜达卢普的街道浏览了那些种植园，他的学生马诺洛·冈萨雷斯曾经（Manolo Gonzalez）为了自己的研究亲身尝试采摘了一年的草莓。我和他们也探讨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主如何与墨西哥的农夫一起创建了这个农业系统，而且双方都已经受困于对方，彼此依赖，缺一不可。

为了依靠墨西哥贫穷的流动工人，加利福尼亚的农场主建立了一套工资结构，它有效地阻止了美国人前来农场工作，因为即使在收获季节雇工的工资也很低，这种收入在美国不够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但是这些钱却是十倍于墨西哥人在他们本地村庄的收入。在这种工资系统下，廉价的墨西哥流动雇工资助了加利福尼亚的农业，同时，这些雇工又把从农场赚到的钱寄回墨西哥，反过来又保障了墨西哥的农村社会，否则墨西哥的农村可能早已不复存在了。几十年里，许多墨西哥农村的男人离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田地，留在村里的老年人则负责照料他们的小农庄。加利福尼亚州的流动工作吸收了墨西哥过剩的劳工，可是实际上墨西哥政府对他们已经付出了教育经费、健康保障费用，而且日后还得负责收留那些从加利福尼亚州“退休”回来的雇工。

然而只要那些流动雇工决定要定居在加利福尼亚，他们就会干扰这个系统平稳的运作，同时也会增加加利福尼亚州的成本，特别是如果他们结婚还有孩子的话。这就是为什么移民移居管理部门（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INS）在收获季节后，通常立刻围捕并驱除加利福尼亚州的非法移民。尽管如此，多年来已经有数百万的墨西哥雇工定居在美国，而且大部分人都

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虽然从事农业工作是进入美国社会的一种手段，但是低工资以及可怜的工作环境使得多数的移民和他们的孩子都希望逃离这个国家。农场劳动是一种非常依赖体力的工作，与其他工作相比，它几乎就是报酬最低的工作。如果流动工人能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他的工资马上就可以提高三倍。因此，现在这套系统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非法移民的供给资源，既维持了农场的低工资，又保障了可以招募到替代那些“退休”返回墨西哥的雇工或者那些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更好工作的雇工。

胡安·文森特·帕勒姆相信，当前不仅有越来越多的流动工人穿梭于美国和墨西哥，而且有更多的墨西哥雇工在加利福尼亚州永久地定居下来。如今，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如瓜达卢普、卡莱克西科、卡特勒和麦克法兰已经逐渐被农村的穷困包围。在圣玛丽亚山谷，各种水果和蔬菜的生产量增加、每英亩土地的产量增加以及延长的种植季节，这些都为雇工们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全职或临时工作。大约有二万英亩椰菜种植农场，由于一年中都要陆陆续续进行收割，所以椰菜行业需要大量的常驻雇工。芹菜和菜花行业也增加了全职雇工的数量。在山谷里的这些农场，大约40%的农场劳动由居住在此地的雇工完成，多数雇工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但是草莓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穷困雇工到此地工作，其中只有大约12%的雇工可以得到全年的工作。种植草莓是非常耗费劳动力的工作，它需要的劳动力几乎是种植椰菜的25倍，现在草莓种植园雇用雇工的数目比在山谷里种植蔬菜的总人数还要多。许多草莓采摘工都希望能在临近的蔬菜田地找到工作，一是那里的工资要高一些而且工作也不像采摘草莓那么辛苦，二是草莓业雇工的流动性相当高，工作不稳定，但迄今为止，草莓种植园也不曾有过雇工短缺的迹象。从1940年代至今，



墨西哥的农业人口已经翻了三倍。帕勒姆评价说："从绝对数字上看，今天墨西哥的农民比过去任何年代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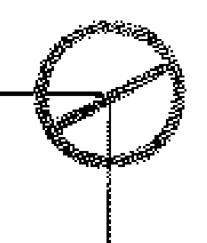
在25年前，有些学院的课本一度断言加利福尼亚州农业的大规模浇灌、灵活的农场运作、农场结构、低工资以及雇用外籍工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那些观点显然已经落伍了。西班牙南部地区正在快速地演变成"欧洲的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同样的技术种植、同样高价值的农作物以及来自非洲北部的非法移民；意大利的南部和地中海的法国现在也正在采用同样的经营模式；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智利通过国外投资者的帮助也正在拉丁美洲重现加利福尼亚州工业化的农业。这些国家生产的某些农产品正在和美国的同类产品发生竞争，而运输和冷藏技术的改善已经为原来不能出口的商品建立起了国际市场。帕勒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许多水果和蔬菜的种植和加工逐步就会淡出加利福尼亚州而转到墨西哥，因为那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一定会降低生产成本。墨西哥不久就会为冷冻快餐生产出冷冻的各类蔬菜，而加利福尼亚州种植的洋蓟、椰菜、草莓和芦笋则用来供应新鲜蔬菜市场。因为收割这些特别的农作物不能轻易地使用机械化设备，否则机械设备可能使成品致残，它们的高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只有那些手工采摘的、无瑕疵的成品才富有高价值。由此可见，今后加利福尼亚州农业的繁荣会更加依赖墨西哥的农民。

在圣玛丽亚山谷，多数草莓采摘工是米斯特克印第安人（Mixtec Indians），他们可能是西半球最贫困而且最受剥削的人民。瓦哈卡（Oaxaca，墨西哥东南部的一座城市）西部山区土地的侵蚀和农作物产量的下降，迫使许多的米斯特克人变成了流动雇工。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迈克尔·卡尼（Michael Kearney）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迁移或饿死。米斯特克人目

前已经垄断了加利福尼亚州最低工资的工作，在提华纳(Tijuana，墨西哥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临美国边境，位于圣地亚哥市以南，是一个热点旅游中心。)，你经常可以看到那些米斯特克雇工的妻子和孩子们，矮小、黧黑、漂亮，身穿鲜艳的本地服装在街道上对游客推销口香糖（Chiclets），原料是奇可树凝结成牛奶样的树胶。

直到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所有的墨西哥雇工都是梅索蒂斯混血儿（mestizos），而且他们与那些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下来的墨西哥人保持着很神秘的联系。这些新来的流动雇工给群居的工人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挑战。除了米斯特克印第安人固有的92种方言以外，至少还有另外六种瓦哈卡当地人使用的而且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就已经使用的语言。加利福尼亚州的米斯特克雇工中，大约只有1/5的人稍微会一点英语和西班牙语。在米斯特克人迁移的过程中，他们是抢劫和歧视的牺牲品。在墨西哥中部，他们必须向当地官员行贿；在提华纳，他们深受走私贩、强奸犯和小偷们的折磨；而在圣地亚哥东部的因皮里尔沙漠（Imperial Desert），他们冒着丧失生命的代价跨越边境，每个星期都有在那里发现两三个偷渡的流动雇工尸体的报道。

在瓜达卢普，许多定居的雇工都非常憎恨这些来自瓦哈卡的新雇工。在1980年代，经常有许多非法移民跨越边境，非法劳工将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成员逐渐赶出山谷。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这里的小时工资已经下降很多，而且失业的现象也极为普遍。这里的劳动承包人现在更为主动地去招募非法劳工，因为他们比合法居民的工资要低而且还很少提出异议。当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平时只有5700居民的瓜达卢普到那时人口会增长1/3，大大增加了本地的负担。帕勒姆的研究员曾经发现过，



在那段时间里，一个双卧室的房间居然住着22个雇工！

除去漫长跋涉的艰辛，那些米斯特克人为了能养活他们在老家的家人，强烈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一份工作。在瓦哈卡，他们每天大约只能挣到两到三美元，而在北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的草莓种植园，他们大概每天可以挣到五美元。而在圣玛丽亚山谷工作的米斯特克雇工在草莓收获的高峰季节，一个小时就可以挣到10美元，一天的收入比老家一个月的钱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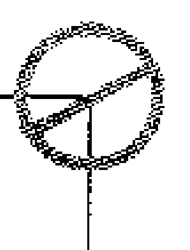
对不幸的依赖

1951年，一个由总统任命的调查委员曾经对移民劳工进行了调查，该委员会在报告中谴责了美国流动工人中非法移民的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在那个时期，人们发现有许多工人居住在果园和浇灌渠里，他们生活在随时会被拘捕的环境里，就像逃犯那样东藏西躲，并且一直都受到农场主的残酷剥削。农场主丝毫没有改善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不断地消减工资而且还随意解雇他们。据调查委员会讲，在许多的案例中，这些流动工人的生活工作方式实际上就是处于“劳役还债制。”该委员会估计，当时美国的40万流动工人中大约有40%是非法移民，而且毫无疑问，这些大量的非法劳工降低了所有流动工人的工资。确实，非法移民不仅在农业取代了本地出生的工人，而且在非农业的行业也取代了本地工人，例如建筑行业里就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工人。这个调查委员会强调，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加大对雇用、剥削这些非法移民工人的雇主的惩罚力度，建议对他们加大罚款、给予渐进的惩罚并禁止那些由非法劳工收获的农作物的州际间的商业贸易。该委员会调查的结论是：“我们在别人不幸和

厄运的基础上建立了我们的流动工人大军，当这种劳工输入降低的时候，也就是因为人家没有足够的不幸的时候，难道我们依赖国外人民的不幸来补充我们的劳动大军吗？"

国会并没有理睬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以至于之后的20年里，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是犯罪行为，而雇用非法移民的行为并不违法。1986年，国会通过了《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RCA），这个法案要求加大对非法移民雇主的制裁，但是不幸的是，这些惩罚措施似乎没有得到良好的贯彻实行，很少有雇主受到相应的惩罚。加利福尼亚州大约有100万的私人雇主，大约只有200名联邦调查员在进行移民代码的检查，调查工作场所是否存在触犯法律的情况。此外，对雇用非法移民行为的惩罚也相当温和，对第一次违法的人只会罚款250美元，而第三次触犯法律也就上交3000美元罚款即可了事。

《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并没有有效地阻止使用非法劳工，反而却起到了鼓励这种违法行为的作用。为了消除因新条例惩罚农场主可能会导致雇工短缺的现象，国会在法案里又增加一个特别特赦条款，这个条款只适用于那些可以证明自己在去年已经得到工作的非法移民工，其实它并不需要太多的证明。随后，国会通过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和参议员彼得·威尔逊（Pete Wilson）支持的《特别农业工人计划》（SAW），它使35万的非法移民看到了可以获得合法身份的希望。实际上，大约有130万的非法移民申请特赦，而这个人数大致是墨西哥农业中成年男性人口的1/6，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使用虚假文件，这一结果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欺诈行为。最终100多万名非法移民获得了合法身份，随后，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又加入到非法移民的行列中。《移民改革和控



制法案》没能起到减少农场劳工的作用，相反造成了劳动工人过多的事实。那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乡下可以很轻松地得到伪造的绿卡、社保号、驾照和《特别农业工人计划》所需的工作证明，而且通常只需要50美元和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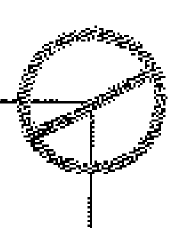
在这段时期，生活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人数大约在700～800万之间，其中近一半人是墨西哥人。虽然当时那些倡导移民政策改革的人士呼吁另外一个大规模的特赦计划，准备对上百万的非法移民发放绿卡或给予公民身份。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主更倾向全新的外籍工人计划，他们设想通过国际协议招募流动工人，并且保证工人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条件，但是流动雇工必须在收获季节后返回墨西哥。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也呼吁建立一个正式的、井然有序的计划来保障流动工人在两国之间有秩序地流动。1942～1964年，美国政府实施了一个类似的尝试计划——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计划。在这一阶段，凡是在计划中登记注册的流动工人都必须呆在边境附近的一个大型居住营地，在等待雇主的过程中，他们被迫在脖子上戴上号牌，然后脱光衣服，由专门负责驱除虱子的人员喷洒驱虫剂，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美国。而这些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一旦进入了美国，他们就受制于一个雇主而且无法更换雇主。后来由于爆出这些雇工普遍受到农场主的虐待，所以这个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计划被迫终止。现在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当时的那个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计划为非法移民浪潮打下了基础，为其建立了一个社会网络和流动雇工的模式。实际上，即使在那个计划实施阶段，美国农业中雇用的非法劳工的数量通常也高于墨西哥短期合同工的数目。

尽管有上述诸多弊病，但是胡安·文森特·帕勒姆并没有丧

失针对外籍工人的新计划的信心，他曾经在1960年代目睹过西欧实施类似的计划，见证过它们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所以，帕勒姆对那些在欧洲实施过的计划并没有太大的幻想。他建议当前应该考虑一个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外籍工人计划，因为目前加利福尼亚州雇工的生活环境已经变得极其恶劣，而且他们在跨越边境时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所以帕勒姆认为应该立刻启动一些新措施，即使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起码也是向前迈出了第一步。目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美洲各国的资产可以随时跨境往来，但对墨西哥的流动工人并不提供任何的法律保障，帕勒姆相信新的外籍工人计划可以保证雇工们享受到目前他们没有的一些权利，这样的话，即使那些非法移民依然没有得到官方的移民许可，这些在新计划中的雇工也不会再像逃犯那样不得不过着东藏西躲的生活。

那些对外籍工人计划长期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这些计划在原则上就存在缺陷。20多年前，当时在得克萨斯州大学的西德尼·魏因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和斯坦利·R. 罗斯（Stanley R. Ross）就表示过，“外籍工人”只不过是契约劳动力的一种现代委婉说法而已。外籍工人计划在法律上信奉美国存在二等公民的概念，它创造了一个只有有限权利的特定社会阶层。除了在理论上引起争议外，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一个计划根本就不能实施。一位经济学家就说过，“对临时的工人，难道还有什么永久性的承诺吗?”而且就是因为大量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工人最后选择定居而不是返回家乡，欧洲最终才终止了外籍工人的相关计划。

墨西哥雇工长期垄断了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农业劳动，但是只是近期他们才开始向美国各地移民。现在，多数都是非法移民的墨西哥雇工正在俄勒冈州采摘树梅、在爱荷华州



为玉米去雄、在弗吉尼亚州收割烟草以及在新泽西州的苗圃里做工。而且那些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农业中使用过的雇用非法移民的方法，例如影子农场主和劳动承包人的方式，现已出现在肉类加工行业、建筑业、大楼管理员服务业以及服装制造业。大多数加利福尼亚州的非法移民现在都在非农场行业里工作，而且他们来自墨西哥的各个地方，其中包括一些城市地区甚至墨西哥市。迈克尔·卡尼（Michael Kearney）认为恰帕斯（Chiapas，墨西哥南部的一个州）本地的居民不久就会加入米斯特克人迁移的行列。农会的管理者强烈反对新外籍工人计划的出笼，同时许多人质问，为什么政府为了农业就应该成为一个非法移民的承包者。而一些非农场行业却非常渴望雇用低工资的外籍工人，例如饭店、汽车旅馆、快餐店以及肉类加工业。那些反对者认为，当如此之多的、已经定居在美国的、那些穷困的墨西哥雇工正在为能找到工作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不需要另外一个补充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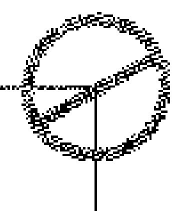
菲利浦·L. 马丁（Philip L. Martin），他曾经在由《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任命的农业劳工委员会工作了四年，他相信改善雇工生活的最有效途径就是简单地强制执行现有的劳动力和移民法，松散的联邦管制措施就等于资助水果和蔬菜的种植者，它已经扭曲了这些行业的经济发展。他强调，“廉价劳动力在短期内可以给农业带来许多好处，但是也使农场主们忽视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必须重视科技才能坦然面对国外农业经营者的竞争，因为那些国外的同行同样也可以雇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马丁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容忍美国的农业使用非法劳工，美国的农场劳动力市场必定会陷入死循环：雇工为了更好的工作退出农场，随后而来的非法移民取而代之，然后再进入另一个同样的循环。马丁指出，“我们在本质上已经私有化了这个国家的

移民政策，将它交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农场主们的手中。"

墨西哥—美国法律防御和教育基金会的前任主席约奎因·阿维拉（Joaquin Avila）认为，合法与非法移民的区别在工资的层面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不可能指望在一夜之间将其割断。他认为墨西哥经济发展起来才是减少移民的基础，在它的经济发展之前，美国应该保证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国籍，得到适宜的工资以及使他们免受到剥削。

针对农业工人有许多政策观点，但最可能的就是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总统委员会和一个属于国会的委员会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表达了他们对流动工人困境的沉痛心情，但时至今日现状依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那些农场主依然主导一切，而农业雇工只有受人摆布的权利。除了仅有的几十年的关注外，现在的美国人民面对现实已经变得漠然了，因为美国水果的价钱已经不再那么贵了，而且如果维持流动雇工的贫困现状，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可以省下 50 美元。[①]

① 在美国，一个典型家庭的平均每年食品支出大约为 5031 美元，其中，在水果和蔬菜上的花费大约是 500 美元。根据菲利普·L. 马丁的分析，农场雇工的成本还不到水果和蔬菜零售价的 10%，如果将美国农场工人的工资加倍的话，那么，较高的劳力成本就会直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平均每个家庭的食品支出每年就会相应地增加 50 美元，而且，实际增加的支出可能还会高一些。如果那些加工过的水果和蔬菜不再用人工采摘的话，那么，美国家庭在水果和蔬菜上的支出只需要 301 美元，如果每一个家庭增减 30 美元的话，其实这 30 美元还买不到两张 CD，那么，对局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雇工来讲，也就意味着可以消除他们极度贫困的困境，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以上资料请参见 *Endless Quest*,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1（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 2002 年出版）。



在1996年春季，农场工人联合协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草莓种植园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有组织活动，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当示威游行到达沃森维尔的时候，吸引了12000人的支持者。这个草莓战役的口号是“为了公平的五美分”，农场工人联合协会解释道，如果农场主们能将收购每品脱草莓的价格增加五美分，另外再拿出五美分给他们的雇工，这些流动雇工的工资就有可能增加50%，他们的生活就会大大地改善。然而农场主们并不乐意接受这个建议。去年，当文图拉县（Ventura County）草莓种植园的雇工全部加入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时候，农场主们立刻开始对部分草莓田地进行翻耕，并在采摘季节后停止了全部的农场工作，工人们被解雇而且必须偿还预付工资。由于全国范围的媒体都对此战役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为了回应此次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草莓战役，这一回农场主们采取了更为狡猾的策略，他们雇用了洛杉矶的一家公关公司——海豚集团（the Dolphin Group），展现关于这个行业的更为和善、更为温和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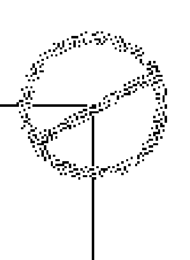
海豚集团常年支持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和共和党的事业。该集团制作了声名狼藉的威利·霍顿广告（Willie Horton ad），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丧失了竞选总统的资格，可以说是劣迹斑斑。该集团曾经利用菲利普·莫里斯和烟草行业的资金建立过一个所谓的反吸烟组织；还曾用加利福尼亚州葡萄行业的钱组建了虚假的葡萄行业工人组织——“葡萄行业的工人和农场主联盟。”1996年，海豚集团拿着草莓行业提供的金钱创建了“草莓行业工人与农场主的联盟”（SW&FA）。这个联盟在沃森维尔也举行了自己的示威游行，还赢得了本地天主教主教的祝福，而且还呼吁说这次行动是为了“农场工人的权利和人

权。”另外，该集团还声称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许多女性组织者引诱那些流动工人以此换取他们对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支持。

虽然期望值很高，但是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草莓战役很快就因为与农场主支持的组织机构发生争执而陷入困境。当时，除了草莓农场主支持的“草莓行业工人与农场主的联盟”，还有“支持草莓工人委员会”以及“农业工人委员会”等等类似的组织，而那些以前从没有归属过任何联盟的那些贫困的流动工人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了许多声称代表工人利益的联盟或协会。那时，许多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组织者都受到过反联盟暴徒的袭击，而且许多工人也非常担心因为支持某一个联盟而遭到解雇，他们必须得仔细地衡量支持一个联盟带来的利益和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的可能性。不过，农场工人联合协会还是想方设法与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有组织的草莓农场以及属于“海岸浆果”的多个农场签订了协议，而属于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雇工如果在这些农场里工作，就能获得较高的工资与工作资历相关的多项权利，还可以享受到休假、带薪假日，而且还有他们全家的医疗保险。尽管，农场工人联合协会依然在草莓种植园展开工作，但是事实证明它非常困难，而且也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在 2002 年的 9 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签署了一项可能帮助农场工人联合协会的立法，当合同与农场主发生争议的时候，双方可以由官方进行调解。所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1600 个草莓种植农场里，那时大约有二万名草莓工人属于农场工人联合协会。

服从市场

在圣地亚哥县的一天早晨，我见到了一个名叫道格的农场主，



我俩在一辆停在他田边的拖车里交谈了很久。道格的父亲和祖父在二次大战期间被关进了日籍美国人的拘留营。他们出狱后，祖父买了一辆二手卡车。开始，他祖父替一些农场主打工，不久他祖父就租到了一些土地。他祖父不会讲英语，而当时还是孩子的父亲也不会英语，但是他们两人在家族事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种植蔬菜取得成功后，他们二人最终转向了种植草莓，同时也负责运输和加工草莓。在他们家最初的农场土地上，如今已经建起了许多公寓，还有一个公园和一所学校。道格现在只是在距之几英里之外的土地上种植草莓，他用带金属刺的栅栏将他的草莓种植园围起来。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成百上千套西班牙风格的分户出售的公寓正慢慢地延伸到山丘上，已经逼近了他的农场。附近许多农场主都卖掉了他们的土地。道格的一生中都耗费在草莓种植园的工作里，积累了丰富的种植草莓的经验，可是现在他也不敢确定是否希望孩子们继承这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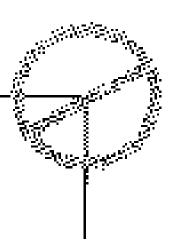
道格说："农场工作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行业，农夫的地位也不高，实际上，很多人都厌恶我们。"伴随着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和邻居的争论，他时而问自己，"嘿，为何做这个？"而且如果他把土地卖出去，他马上就会非常富有，再也不必担心水的成本、小偷以及新西兰草莓带来的冲击。大雨已经摧毁了大约1/4的提前上市的草莓，而这个时候正是草莓价格最高的时节。道格不理解那些对加利福尼亚州农场主的敌意，毕竟农业保存了户外的土地，他认为美国人对他们能幸运地得到这些便宜的食品一点都不领情，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要用限制雇佣流动雇工的方式阻止草莓的生产。他的观点是，"我的工人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自己。我摘过草莓，告诉你，那不是太苦的工作。我尊重这些人，他们工作确实很努力，而且这些工作岗位随时都对那些

所有想干的人敞开。”时常有许多大学生参观农场，他们深信采摘草莓是一个很好的赚外快方式。道格嘲笑道，“他们老远跑来，在这都呆不到一个小时。”

当我们从拖车里出来，沐浴在明媚阳光下的时候，工人在距离很近的监督下正在沿着垄沟来回走着采摘草莓。道格对自己是第三代的农场主颇感自豪，他是一个精明强干、非常有教养、谨小慎微的人，而且他的种植园说明了一切。但是我还是怀疑道格和他的工人们还能在这里坚持几年呢？

道格摘了个草莓给我，它像个鲜红的大蜡烛，咬了一口，草莓又甜又香，还略微带点儿源自土壤的苦味。

那天晚上，无意间还遇到了几个道格的雇工。加利福尼亚州乡下法律援助协会年轻的律师里卡多·索托（Ricardo Soto）还带我走到一个鳄梨果园旁的参观了一个隐秘的流动工人的露营地。在圣地亚哥北部的雇工中，大约有1/3、差不多接近7000名的雇工都无家可归，他们的9000名的家属也同样居无定所。许多雇工都在露天宿营。从1980年代初，低收入者的住房供给变得非常紧张，随后就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贫民区。一些贫民区甚至有成百上千间粗糙简陋的小屋。圣地亚哥北部的市郊已经逐渐蚕食了农业用地，那些富有的上班族与草莓采摘工已经成了邻居。在我参观过的一个较大的贫民区里，妇女正在小溪里洗衣服，而与之比邻的就是用砖墙围起来的那个地方有几个网球场、一座游泳池和一个乡村俱乐部所在地的标记。显然，这些郊区的居民不喜欢与这些墨西哥雇工为邻，而当地的政府不仅不提供低收入者住房，还对此宣布紧急状态，通过立法禁止人们将靠近路边的土地出租给雇工，而且还捣毁了许多大规模的露宿营地。圣地亚哥的许多被流动雇工的生存环境所震惊的农场主们确实已经



尝试在农场附近修建雇工的住宅，可是这一做法却遭到了邻近的私房业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大量的贫民区降低了临近房产的价值，但是永久的雇工居住地可能会更加降低他们的房产价值。一位农场主对我说过，“当那些人发现你要准备给雇工们修建住所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开枪。”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新建的露天宿营地的规模都很小。在一条路的尽头，接近栅栏的地方，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米斯特克人，他就住在一个新建的露天宿营地里面。这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的年轻人年仅 18 岁，可是看上去非常疲惫，毫无年轻人的生气。那天，他已经在道格的农场里采摘了 12 小时的草莓。我问他的老板怎么样，他客气地回答道，“还不错。”

在去年的 4~7 月，弗朗西斯科一直都在采摘草莓。他大约挣了 800 美元，他将钱都寄给了在圣塞瓦斯蒂安乡村的父母。现在是他在草莓种植园的第二个季节，可是他还不是很熟悉圣地亚哥县，主要的原因就是害怕被逮捕，所以白天他只待在农场里，晚上就回到宿营地，哪里也不敢去。一个星期里，他通常工作六天，偶尔工作七天，每天大概要采摘草莓 10 到 12 个小时。他每天早上大约 4:30 起床，步行半个小时到道格的农场。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你必须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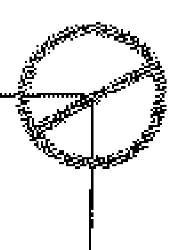
天近黄昏的时候，13 个穿着脏衣服的疲惫男人走到我们身旁，他们都是弗朗西斯科的同乡，都是替道格打工而且也都住在同一个露天宿营地。他们在家乡就彼此认识而且在这里也互相帮忙。其中年纪最大的是 43 岁，最年轻的看上去大约只有 15 岁。这些人都是非法移民，而且都病了，不断地咳嗽，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看病。当太阳落到山下的时候，蚊子像乌云一样袭来，但是这些人似乎是太累了以致无心关注这些叮人的蚊子。他们有仰

面躺着的，有侧卧着的，他们在坚硬的地面上休息，好像大地就是个舒服的沙发。

弗朗西斯科答应带我去看看他们的露天宿营地。我们从栅栏的一个小洞里钻进去，再钻过生锈的铁丝网的缺口，然后踏上了一条灌木丛中拐弯抹角的小路，给人的感觉就像行走在中世纪的迷宫里。接近宿营地的时候就看到路边有很多遗弃的啤酒罐和食品包装纸。走着走着，第一个小屋映入了眼帘。它又矮又小，和帐篷差不多，就像是银色的垃圾袋搭在一个木头架子上。在离小路不远的上面的小空地上还有三个类似的小屋子，它们是用夹板搭建的，而且还做了伪装，免得被人发现，屋顶上堆着用于伪装的树枝和树叶。这块土地的拥有者并不知道这些流动雇工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也很难发现这一宿营地。这些流动雇工就像逃犯和越共一样隐蔽在这儿，垃圾随处可见。弗朗西斯科指给我看他的小窝棚，它大约有五英尺高、五英尺宽、七英尺长，在如此小的窝棚里，他还要与其他两个人合住。如果晚上下雨，第二天他们就得全身湿漉漉地去工作，在太阳下晒干他们的衣服。弗朗西斯科在来到圣地亚哥县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家乡，他都是在床上睡觉。

在这些小窝棚的另一边，灌木丛使小路更加狭窄，走过之后，就到了另外一块空地。山坡旁边有两把坏了的亚麻椅子。从这里看下去，有许多漂亮的草莓田地、新房子，还有远处高速公路上的灯光。

那天晚上开车回旅馆的时候，脑子里浮想联翩，想到了奥伦奇县（Orange County）的居民。奥伦奇县是美国最富有的县之一，家家富有。可是如今，他们大都因为金融投机破产，不愿意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经费提高税收，不愿意偿还贷款，只是一味地



发牢骚抱怨天下不公平，而且把他们的问题都归罪于非法移民。同时，我也想到了弗朗西斯科，这些富人眼里的鬼怪、替罪羊，每天都做着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个小时。而且在连续几个月，每天夜晚都睡在地上。即使是这样，他依然可以攒下钱寄给远在家乡的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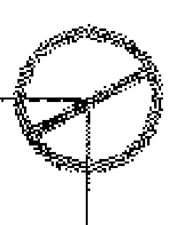
多来年，我们都被灌输要屈从“市场”，而且我们也将我们的信仰置于供求的规律中。我们却恰恰忘却并忽略了市场只鼓励效率，每个人的价值都跟它有关。市场会驱使工资下降，就像水一样，直到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平。如今，这个低水平的工资不仅出现在华盛顿、纽约和萨克拉门托，而且也出现在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农场和瓦哈卡的山村，要知道这个水平线只是大约5美元一天。没有哪个人们崇拜的神明比这个自由的、未加抑制的市场更无情、更虚伪，也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那些贫民窟不应该出现在美国每一个城市的郊区。现在所有认为自己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士都应该好好看一看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不干预市场，让市场自行其是，那么自由市场通常总会寻找到那些饥饿的、绝望的和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是自由市场的一切，而对劳动力来讲就不是自由。



淫秽帝国

1986年7月10日，司法部长兼首席检察官埃德温·米斯三世（Attorney General Edwin Meese III）在有关色情文学的总结报告中陈述了“赤裸裸地直截了当描述色情的作品”的危害性及其影响，并且倡议动用联邦猥亵法对其采取严格的强制限制。米斯委员会（the Meese Commission）自从成立那天起，就处于争论的漩涡中。有人指责委员会主席亨利·E. 哈德森（Henry E. Hudson）对色情作品的态度带有强烈的偏见，身为维吉尼亚联邦检察官的哈德森在阿灵顿郡取缔了成人书店并起诉那些出租X级录像带的主流音像店；委员会执行总裁艾伦·E. 希尔斯（Alan E. Sears）在给全国知名的药店和连锁店的信函中警告，凡出售《花花公子》的商店都会在米斯委员会的报告中被列为色情分销商（传播商）；另一个委员会成员布鲁斯·利特神父（Father Bruce Ritter）是一个著名天主教慈善团体的创始人，一直在努力扩大对委任小组（panel's mandate）的影响，试图说服他们将同性恋行为定义成变态的反社会行为，并应该受到美国政府的谴责。

根据长达一年的调查和六次公开听证会的结果，米斯委员会



认为几乎所有的那些露骨的硬核色情影片（hard core）和大部分的软核色情影片（soft core）都刻意表现出有辱女性尊严的形象，会怂恿强暴行为发生。“硬核色情片”通常指的是影片中含有那些对真实的交媾行为进行毫不遮挡的实录，而“软核色情片”大体是指影片中存在表演性的交媾行为。许多宗教领袖和女权主义者也认同这个结论，而一些社会学家却表示几乎没有已知的恰当理论支持这些观点。在众多对米斯委员会采用的方法、目标以及对色情作品危害的看法的争议中，有一点毫无争议，那就是在此报告中对鲁本·斯特曼（Reuben Sturman）事件的一致态度。俄亥俄州谢克海茨（Shaker Heights）的居民鲁本·斯特曼被指控制作、传播分销色情作品，覆盖地域横跨美国并传播到了到世界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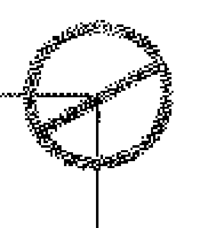
鲁本·斯特曼最初只是个卖连环漫画的推销员，但他却成功地将克利夫兰一家小型的杂志公司转型成为一个国际传媒集团，在北美、亚洲和西欧拥有数以百计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生产色情电影、录像带、杂志、偷窥装备以及性用品。它们自己拥有批发仓库和零售店。竞争对手曾抱怨道，斯特曼不只是控制了成人娱乐业，他本人就像他的同乡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那样，就是这个行业的巨头和象征。斯特曼收购合并了许多公司，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分销网络并形成自己的帝国，以精明的市场策略、大胆的勇气、秘密结盟等方式公然挑战政府的尊严。其做法正像历史学家评论洛克菲勒那样，“他运用高超的技巧将每一条法律允许的行为发挥到极致。”斯特曼每年以千百万美元贿赂一大批法官，他们帮助掩饰斯特曼拥有特权经营的、分布在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巴拿马（Panama）和利比里亚（Liberia）的众多产业的身份。斯特曼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至少拥有 20 个不同的化名，极少做公共演说，

即使在法庭露面也经常将自己的面孔深藏在面具之后。《克利夫兰的老实人》（*Cleveland Plain Dealer*）推测斯特曼可能是俄亥俄州最富有的人，但是近十几年来我们也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他在1964年拍的面部照片。

性产业的拥护者认为，斯特曼是一个通过自身奋斗取得成功的一流的美国企业家，他坚韧不屈、机智超群、勤奋工作而且充满自信，这些才是他达到巅峰的关键。而反色情主义者和司法部门官员却认为，斯特曼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庞大犯罪组织的头领，其淫秽帝国的成功来自于不平等的竞争优势——源于黑社会的保护和支持。

关于色情文学的报道铺天盖地，正反方的论点层出不穷，但很少有人指出，二次大战后美国现代工业的最终产品——色情作品已经成为大众商品，以其为主导的经济迅猛发展，已经占据了很大的经济比例。许多性产业的批评者作为“反美斗士”虽然对色情产业进行了长时间的谴责，然而遗憾的是，只有少数的美国精英们认识到这点，意识到性和金钱混合体的猛烈冲击，其间有大量的财富在丧失也在聚集，而新的认同也不断遭到抛弃。公众的谴责经常被认为是为私人的困扰呐喊。与公众呐喊的孤独和挫折感相比，性产业从来就没有受到缺少主顾的困扰，反而，当今的色情产业已经从默默无闻的社会边缘文化的亚文化上升到美国流行文化的主流。

在米斯委员会发布结论性报告的7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表了也许是美国史上最为严厉的声明，强烈谴责“硬核色情片”。时任老布什总统也继续引导着这场反色情的战役，成百上千个色情产业的制作商、分销商和零售商被起诉，他们多数是被这个行业利益驱动的。这场反色情的国家战役完全符



合美国色情文学消费的调查指数。按照《成人电视新闻》(*Adult Video News*)的统计，从1985年米斯委员会成立到1992年老布什总统的任期结束之间，美国"硬核色情片"录像带出租的年租金从7千9百万美元涨到了4亿9千万美元，2001年攀升到7亿5千9百万美元。虽然性产业的实际收入很难估计，但时至今日，美国人在"成人娱乐"上、硬核色情片录像带和DVD、网上色情网站、有线和卫星色情节目、偷窥设备、性电话、性表演、性玩具以及性杂志上的费用大致在80亿和100亿美元之间。色情消费的金额大致与好莱坞的国内票房收入相当，且大于流行乐和乡村歌曲的收入。如今，美国人在脱衣舞俱乐部的消费超过在百老汇剧院、地方剧院、非盈利性剧院、交响乐和管弦乐花费的总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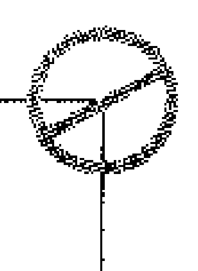
---

①《成人电视新闻》的出版商保罗·菲什本(Paul Fishbein)和高级编辑马克·科恩斯(Mark Kernes)提供了美国"硬核片"的销售、出租和发行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有多少钱花在那些赤裸裸露骨的色情物品上。在1997年，我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作出一个合理的估计，那时候，我曾经对杂志业、视频业、有线电视业、卫星电视业、音讯台业以及色情行业的著名人士进行过非正式的采访，我自己估计这个花费大约有80亿美元，其中，"硬核片"出租和销售：30亿美元、脱衣舞俱乐部：20亿美元、电话性聊天：10亿美元、性杂志：4亿美元、家庭或饭店的按次点播：3.25亿美元、投币放映机：3亿美元、性玩具：1亿美元。从那时以后，按次点播的收入翻了一番，性杂志的收入下降，而原来被世人忽略不计的因特网色情收入，它的年收入已近接近10亿美元了，但是，随着因特网的继续普及和发展，而且，你可以在线免费得到许多色情物品，所以，因特网实际上可以使色情行业收入达到高峰或使色情行业的收入跌到谷底。在2001年，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在《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中估计，色情行业的年收入大约为100亿美元，可是，我自己感觉这个数字似乎有些水分，里奇的估计数据遭到了一位《福克斯》网站撰稿人丹·艾克曼(Dan Ackman)的指责，他也曾经指出《成人电视新闻》的数据过分(转下页注)

“硬核色情片”现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以致人们很容易就忘掉了不久前对它们的严格禁令。社会学家查尔斯·韦尼克（Charles Winick）指出：“近20年，美国文化中性内容的含有量大大超过前2个世纪作品中的性描写。”1970年的一份联邦色情调研报告估计，美国当年的纯色情文学总销售额不超过1千万美

（接上页注①）高估了成人电影的出租和销售的数目，而这个数据是决定色情收入的关键因素，艾克曼认为，比较准确的色情物品总收入大约在26亿美元到39亿美元之间。在艾克曼的文章发表前几天，一位公正的分析家在《福布斯》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做过估计，他认为色情行业的收入大约为110亿美元。1999年在《福布斯》上的一篇文章曾经估计，当时全世界色情业的收入为560亿美元，美国则是最大的市场，美国人一年大约花费250亿美元用于购买录像带和DVD，而这个钱数的1/10到1/5用于色情作品似乎是可信的，再者说，在色情产品全部合法化以及全部上税之前，色情产业的实际收入不可能一目了然，所以，色情产业的年收入在30亿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还是比较可信的。目前，美国人在摇滚乐、嘻哈和通俗音乐会上的年花费大约是20亿美元。

里克·莱曼（Rick Lyman）于2002年12月30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票房收入的巨额增长》（*A Big Fat Box Office Increase*）中指出，2002年好莱坞国内票房的收入超过90亿美元，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记录。1986年，经济学家海伦·雷诺兹（Helen Reynolds）在《卖淫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rostitution*）中曾经估计，美国大约有50万妓女，那时她们的收入大约为200亿美元（大约合今天的330亿美元）。根据“美国唱片产业协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出版的《2001年消费者概览》（2001 *Consumer Profile*），当年美国摇滚乐唱片的销售收入大约为34亿美元。美国大约有2300家脱衣舞俱乐部，而且每家俱乐部一年的收入大约在25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之间不等。如果假设，每家俱乐部的年平均收入是100万美元，那么美国人在脱衣舞俱乐部的年花费大约为20亿美元，以上的数据由《外国舞娘》（*Exotic Dancer*）的编辑戴夫·马纳克（Dave Manach）和《脱衣舞娘》（*Stripper*）的前任出版商罗布·阿博纳（Rob Abner）提供。在2002年，百老汇剧院的年收入是7.052亿美元，那些地区的和非盈利的剧院的年收入大约是5.55亿美元，而美国交响乐团的年票房收入是5.04亿美元。



元，甚至可能少于500万美元。

很难对“淫秽”、“色情”和“猥亵”做出清晰准确的定义，每个人对它们的理解也是大相径庭，即使是对“硬核色情片”和“软核色情片”的定义，这些年来也是不够清晰准确的，而且还摇摆不定。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修正案也限制公开的淫秽演讲。但是一百多年来，对何谓“淫秽”的定义也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同样，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多政策指导着美国电视业的走向，司法部门摇摆不定的限制淫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美国性产业的结构，有时采取严厉的措施，并罗列出众多的非法行为，从洗钱到敲诈勒索。可同时，淫秽罪的定义也为色情市场的日益竞争、市场运作的高效性埋下了伏笔。色情业也必须应对司法部门的限制，周旋于法律的边缘。

1980年代，成人录像带和成人有线电视将人们从下流电影院和成人书店转到家中，大部分色情产业的利润不再来自传统的性产业，而是被性商业行为取代，诸如邻家的录像带出租小店、一流的连锁饭店、“财富”500强里的卫星和有线电视公司。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圣费尔南多山谷（San Fernando Valley），就像附近的好莱坞电影业一样，一个X级的电影产业已经成型并兴旺发展，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众多的发行商、明星、影迷俱乐部以及电影评论人。尽管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对“硬核色情片”都施以严格的限制，而美国在色情领域大大超前于西方诸国，他们每一个星期就有大约210个新品种的“硬核色情片”录像带出炉。美国色情文化产品的输出在其文化输出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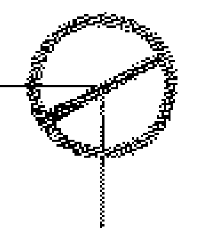
随着色情业由地下行业逐步成为主流产业，我更想知道到底是谁从这个百亿美元产值的行业里获利。多年来，也只有一些关

于色情业和色情掌门人的少量报道，好像没有书籍涉及到这个是非之源。米斯报告中提到的鲁本·斯特曼引起了我的关注。我的朋友们对鲁本·斯特曼一无所知，甚至没听说过他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色情交易的起源和运作方式进行调查，并没有涉及它的道德和道义，只用经济的观点来看色情业，具体研究的目标就是与之相关的金钱。调查中对性产业的若干领先指数进行了分析并采访了若干个有着数十年色情产业经验的人士。后面，我将描述色情业如何进化、如何运作，涉及的地域从南加利福尼亚的工业园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不同寻常的建筑物，并用更多的故事来展现当代色情商业的诞生地：克利夫兰。

鲁本·斯特曼本人的发家史就能体现美国现代性产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到色情业从早期私下出售《姑娘》（*girlie*）杂志到市区报摊以及市区内购物中心到出售成人录像带的转变历程，也可以看到斯特曼本人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毫无一点错误，而且数十年来与联邦政府进行顽强的对抗。如同沃特·迪斯尼一样，斯特曼也是这个崭新产业的巨头，只是其诱人的、利润丰厚产业的用户对象不是孩子而是成人。虽然鲁本·斯特曼本人极具神秘感，可是他的影响与色情行业密不可分，他把色情产品简单地归结为另一种工业产品。这个鲜为人知的生意人的商业经历揭示了一个行走于法律边缘的产业发展历程，如何使一个一度被蔑视、被查禁、不被法律保护的行业变为美国人幻想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行业。

繁荣发展

现代美国的性产业起源于芝加哥一个小公寓的餐桌上。1953年，休·霍夫纳（Hugh Hefner）在那里出版了第一期的《花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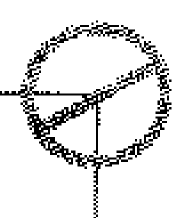
公子》。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有许多成功的色情杂志，例如《调情》（*Flirt*）、《私语》（*Whisper*）、《大饱眼福》（*Eyeful*）、《情窦初开》（*Titter*）和《明眸》（*Wink*）。其中充斥着大量搔首弄姿、身着泳装的女郎照片。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刊登裸体照片的杂志，例如《阳光与健康》（*Sunshine & Health*），这本杂志旨在指导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它经常刊登一些正在打排球的裸体女郎照片。而《花花公子》把性引入到大众消费品当中。那时的休·霍夫纳年仅27岁，给美国公众带来了令人心动的创意。《花花公子》将美国中西部的如同邻家纯情女郎的照片呈现给大众，她们友善充满阳光并且愿意为大众展示她们脱掉外衣后的健康胴体。第一期《花花公子》的插页刊登了玛丽莲·梦露的彩色裸体玉照，当期的发行量就达7万份。几年后，《花花公子》的发行额就已经接近100万美元。

鲁本·斯特曼比霍夫纳大两岁，但都属于二次大战后充满野心的一代，内心极其渴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斯特曼的父母是来自俄国的移民，那时在克利夫兰的贫民区经营一家很小的食品杂货店。斯特曼的目标就是比父母做得更好。在空军服役三年后，就读于西部预科大学，其后成为一个糖果和香烟的批发商。结婚后，斯特曼打算独立经营自己的事业。这个时候，斯特曼遇到了一个来自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的书贩，此人可以搞到卖不出去的、退回到出版商化浆的连环漫画。斯特曼便从此人手中廉价收进那些剩余的连环漫画，用报纸打包成12本一包，再批发给当地的杂货店，家中的车库兼做仓库。昔日的斯特曼就是一个聪明、富有魅力的推销员，他卖的连环漫画5美分一本，是市场价格的一半。人们那时经常可以看到斯特曼开着装满漫画的老道奇卡车穿梭在克利夫兰，造访那些街边小店，推销他的连环漫画。

不久，斯特曼创立了“普里米销售公司”（Premium Sales Company），还拥有了一个不大的临街店面。斯特曼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多余的每一分钱都投回到业务中，他的批发业务已经从克利夫兰拓展到布法罗、匹兹堡、底特律、芝加哥和辛辛那提。斯特曼最终在上述的城市里建立了自己的批发仓库，批发的杂志也不仅仅是连环漫画了，添加了从肯塔基州廉价批来的汽车杂志、电影杂志和字谜杂志。妻子埃丝特和弟弟约瑟夫也进入了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斯特曼已经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年轻商人，他通过《退伍军人福利法案》（*G. I. Bill*）购置了一所住宅，旗下已经拥有覆盖美国八个主要城市的批发分销网。

由于《花花公子》的巨大成功，众多刊物开始纷纷模仿，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带有黑白裸体女人照片的廉价杂志。同时，一种有几十年历史的文学类型和另一类型的平装书也出现了。它们的鲜明特征是耸人听闻的标题、同样风格的封面、不多的事件叙述、每隔几页便出现性场面并附加隐晦和暗示的注释。那时候的商店通常都不把那些性杂志和上述的“平装书”摆在货架上，而是放在柜台下面。而且几乎所有的分销商都不愿意涉足与性相关的杂志和书籍。这时一个雇员向斯特曼建议，普里米销售公司应该出售一些性类型的书籍杂志，斯特曼没多想便同意了。没过不久，斯特曼注意到与性有关的书籍杂志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而且一本性杂志的收入至少是一本连环漫画的二十倍。斯特曼茅塞顿开，他要分销每一本性小说和性杂志。

1963年，底特律的警察突击搜查了斯特曼在当地的仓库，并查封了2万本色情杂志。斯特曼马上对底特律警察局提起诉讼，提出高达二十万美元的赔偿请求，而警察的行动也随后终



止。1964 年 FBI 人员又对位于克利夫兰的斯特曼仓库进行了突击搜查，查封了 590 本名为《一个警察的性经历》（*Sex Life of a Cop*）的平装书，同时 FBI 也没收了杰克·克鲁阿克（Jack Kerouac）所著的《秘密》（*The Subterraneans*）。《一个警察的性经历》的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桑福德·E. 阿达伊（Sanford E. Aday），他既是一个著名的色情文学作家，同时也是出版商。《一个警察的性经历》描写了两个警官在他们所处的城市里诱奸许多年轻妇女的经历，其中涉及到市长和警察局长的妻子。这本书激怒了法律执行部门的官员们，尽管书中甚至没有出现一个下流字眼。斯特曼面临加利福尼亚和密歇根两个州的淫秽罪指控。甚至亨利·米勒也认为这本书令人憎恨，对男人来讲它就是一本色情小说，尽管亨利·米勒所著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也被禁止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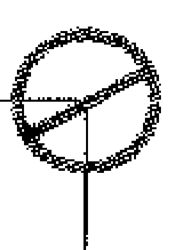
对斯特曼销售《一个警察的性经历》的指控使得斯特曼必须开始考虑色情文学的大量发行带来的问题。那时许多州对淫秽指控都是轻罪处罚，即该行为被视为不正当行为或不良行为，但是根据联邦法律，对这种行为却是重罪处罚，甚至可以判处长期监禁。虽然那时的政治法律环境正处于变更阶段，但是对性表达的方式仍然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好莱坞的电影里不得出现全裸露的镜头，电视节目中的已婚夫妇总是分床而居。当时纽约的喜剧演员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就因为在夜总会表演时使用淫秽字眼被控有罪，并被处以四个月的监禁。斯特曼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做出了令世人惊讶的决定。他不惜一切代价为其行为以及今后三十年的后半生辩护：美国人在家中应该享有自主权利去阅读、观看他们需要的东西，同理，他也应该享有销售的自主权利。法庭最终认可了斯特曼对其淫秽罪指控的无罪辩护，并做

出“无罪”判决。随后，斯特曼指控时任 FBI 局长埃德加·胡佛侵犯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

异教徒，自由主义者和滥情者

审判淫秽行为对法庭来说也是不寻常的挑战。法官和陪审团既要判断被告是否有罪，也要断定其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被告的涉嫌物品是否是淫秽的。对淫秽行为的审判不像审理谋杀罪那么简单，因为谋杀罪的定义几乎没有变更过。淫秽犯罪行为的定义经常能折射出一个政府行为的价值观变化，看上去带有淫秽亵渎语言和图像的行为往往与亵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虽然淫秽亵渎行为表面上只是某个人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却会给人的身心带来实际的伤害。

直到 19 世纪中叶，美国都没有打击淫秽罪的相关联邦法律。国内战争后，国会才立法通过禁止并取缔淫秽作品的相关法律。禁止色情邮件的立法，其起因仅仅源于当时联邦军队中流行传看一些叫做“法国明信片”的色情照片。但是，那时对触犯这个新法的处罚相当轻，像是走过场，因为联邦政府更热衷于制止联邦军队中的其他不良行为。19 世纪 70 年代初，那些不良行为和政府的不作为触怒了一个名叫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的杂货店店员。那时不满 30 岁的纽约杂货店员康斯托克组织了美国第一次反对淫秽色情的运动。安东尼·康斯托克是居住在纽约的原教旨主义者，他坚信魔鬼的存在，他将那些从事非法色情活动的男女视为“邪恶的人”。康斯托克年轻时候有过接触色情作品的可怕经历。那时他还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新迦南，一些农场的雇工把色情画报给他看。那些赤裸裸的映像给他带来了不可抵御的性冲动，只能自慰来排解。这个可怕经历折磨



了他多年，长期以来其内心都充满了罪孽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在绝望和渴望之间的内心冲突，渴望纯洁和对亵渎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的压抑心情。康斯托克这样评述淫秽的色情，“它就像毒瘤那样纠缠不休，不停地侵蚀你的心灵、腐蚀你的思想，直至你的内心充斥淫秽肮脏的想法，最后你将厌倦现实的生活，以堕落的方式了结一生。”康斯托克抵制色情运动的目标就是拯救那些丧失斗志、灵魂备受谴责、沉沦在色情和贪婪肉欲中的那些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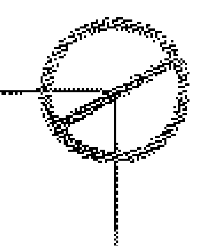
在纽约经常可以看到公开出售“淫秽文学”和“色情图片”的场面，愤怒的安东尼·康斯托克创立了青年基督教协会(YMCA)，其目的就是重建纽约的社会风气，抑制堕落，并开始对华盛顿政府进行十字军式的声讨。1873 年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法案，它把通过邮政邮寄派送“淫秽、下流或挑逗性欲”作品的行为视为犯罪，并可以处以罪犯长达 10 年的强制劳动监禁。后来这个法案被称为“康斯托克法案”，它也禁止邮寄与性相关的物品，如不得邮寄节育产品和堕胎药。美国邮政局任命康斯托克为特别顾问，可以免费乘坐邮政火车穿梭各地监察色情邮件。纽约州政府立法机关也赋予了康斯托克警察的所有职能，而且他有权利佩戴枪支。

随后的 40 年里，安东尼·康斯托克就像一名美国官方的道德检察官，随意打开别人的邮件检查，如果有相关色情的东西就以政府的名义将其没收。安东尼·康斯托克身高体壮，留着浓密的金棕色胡子，经常着一身黑色服装。他曾亲手逮捕好了几百名赌徒、色情作品发行商、脱衣舞表演者和非法为人堕胎者。他的行为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喝彩，而且那些有革新思想的市民也试图禁酒。但是许多报纸都诽谤谩骂康斯托克，指责康斯托克的所

作所为侵犯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他的十字军式的行动是在试图用狭隘的宗教教条影响这个国家。许多评论家也攻击康斯托克，说他用谎言欺骗的手段获取色情出版物，用没收的色情物准备私人展览，付钱观看性表演然后再拘捕那些表演者。康斯托克排斥他的对立者，把他们称作“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并认定他们的生活空虚堕落、道德败坏、不可救药。康斯托克主张“除了异教徒、自由主义者和滥情者，那些下流的商人的也应该被视为即无宗教也无阶层的异类。”

康斯托克不仅禁止发行婚后指南、假借研究性的伪科学论文和那些下流小说，他也查禁阿里斯托芬、伏尔泰、沃尔特·惠特曼、斯密莱·佐拉、霍纳尔·巴尔扎克和利奥·托尔斯泰的作品。在康斯托克的眼里，乔治·萧伯纳就是一个“爱尔兰下流商人”。含有官方色彩的康斯托克社团的举措非常成功，把一个出版商关进了监狱并且销毁了大量的色情书刊。康斯托克声称前七年就销毁了 202679 件淫秽图片和照片、12 吨色情书籍、64094 个用于放荡性生活的橡胶制品、6072 副下流扑克牌，甚至还有 26 幅挂在画廊里面展览的色情油画。区助理法官威廉·P. 菲耶罗（Wiliam P. Fiero）的评价是，“此时的美国，是一个抑制不道德行为和崇尚高尚情操的伟大社会。”

康斯托克法案是基于 1868 年英国最高法院的一次关于色情作品的裁决，即皇家高等法院在处理一本描述天主教牧师的下流淫秽行为的案件中做出的何谓色情作品的定义，即色情作品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诱导人的意志，使之道德沦丧，具有淫秽的影响力。”为了保护年轻人和敏感群体免于色情文学的伤害，即使一整本书中有一页出现性内容，这本书也被视为色情文学。但是这项规定却奈何不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富有绅士们，他们



花大价钱就能得到那些限量出版的色情文学作品。银行巨头J. P. 摩根的例子就展示了他的双重标准，一边赞助支持安东尼·康斯托克的行动，一边拥有多个情人，而且还收集淫秽色情作品。

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最高法院都不受理涉嫌淫秽罪的案件。在法庭调查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小说是否是淫秽小说的审理中，处理此案的大法官沃伦伯爵（Earl Warren）曾试图针对出版界出台一个淫秽罪的定义和相应的惩罚条款，以保证对淫秽色情文学的长期限制。1957年最高法院判决认定塞缪尔·罗斯（Samuel Roth）犯有淫秽罪。塞缪尔·罗斯是一个优雅的纽约绅士，也是一个争议作品的出版商。在此案的审理中，最高法院第一次正式声明淫秽色情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但是最高法院也放弃了一个沿用了近90年的法院认定色情作品的判别标准，即一整本书中只要有一页出现性内容，这本书就被视为色情文学。怀疑一个单独的色情段落是否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并且把英国古老的淫秽色情作品标准搁置一边。那时法院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定义淫秽色情作品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新标准应该可以区分亨利·米勒和桑福德·E. 阿达伊的作品哪些是色情作品。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法官坦言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虽然波特·斯图尔特法官自己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淫秽色情的定义，但是他却断言，"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就是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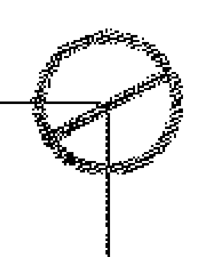
在一系列有争议的判决下，沃伦法庭（Warren Court）解禁了一些有争议的小说，比如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亨利·米勒和桑福德·E. 阿达伊的小说。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的《邻家主妇》（*Thy Neighbor's Wife*）也解禁了。他是纽约非主流文学的出版商，盖伊·塔利斯的努力为美国的小说家们赢来了写作自由。20世纪60年代末，最高法院制定了评判淫秽色情的三段论：作品的主基调必须具备对性过分感兴趣的特征；明显有悖于当代的社会道德标准；完全没有履行社会价值观。经过长达十年的司法争论，最高法院最终对有关色情的众多疑问给出了清晰的法律定义和解释，其中包含为什么那些可以刺激性欲望的色情作品不受宪法的保护？得克萨斯州的海特－阿什伯里（Haight-Ashbury）和亨茨维拉（Huntsville）明确了何谓当前时代的社会标准。一名参与第一修正案的法官曾玩笑地说：如果一本书里有连续几页具有社会价值观的内容，它也就有一些社会价值。

在严谨的法律条文规定下，已经禁止了淫秽色情的观念和行为。但是，1969年高等法院推翻了佐治亚州一条关于禁止拥有淫秽色情作品的法律条款。现在美国的成年人有权利拥有色情物品，甚至沃伦法庭很可能通过一项条款：美国人有权利买卖和制作淫秽色情物品。看起来联邦法律要摒弃安东尼·康斯托克倡导的精神了。

只限成年人

1967年，联邦法庭对鲁本·斯特曼的淫秽罪指控定案，最高法院裁定《一个警察的性经历》一书的确具有一些社会价值。然而最高法院的裁定并没有完全得到其他相关法庭的认可，克利夫兰的联邦大陪审团向斯特曼发传票让他提供商业记录，美国地方法院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斯特曼拒绝提供，并且提请上述机构的指控应当无条件地遵从联邦高等法庭的裁定。在联邦高等法



庭做出裁决前，克利夫兰大陪审团届任期满，州政府又重组了一个新的大陪审团并且给斯特曼派发了新的传票。斯特曼对此置之不理，断然拒绝上述指控。与此同时，一场与之相关的文化论战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斯特曼的支持者反对州法院对斯特曼的指控，并引用大量参考事例指出相应的法律条款的误区。那时，斯特曼对时任 FBI 局长的 J. 埃德加·胡佛指控的律师团也被法庭解散，但是斯特曼依然信誓旦旦地说：不惧怕 FBI 和政府，要用一切法律手段打败他们。

律师成为斯特曼产业兴衰的关键。为了应付加利福尼亚、密歇根和俄亥俄州对斯特曼的淫秽罪指控，斯特曼把两位熟知第一修正案的杰出律师斯坦利·弗莱舍（Stanley Fleishman）和赫勒尔德·普赖斯·法林格（Herald Price Fahringer）请进他的律师团。斯坦利·弗莱舍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律师，他为社会弃儿、新教徒和残疾人辩护；外表尽显高贵绅士风度的法林格也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律师，很难想像他会与斯特曼为伍。在克利夫兰，斯特曼的律师为斯特曼处理法律问题，很快伯克曼（Berkman）就成为斯特曼的法律顾问、军师和心腹。伯克曼和斯特曼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国际象棋。多年以来，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副国际象棋，两个人通过电话下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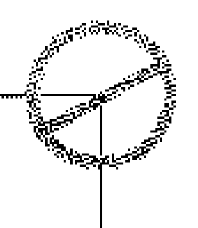
法律羁绊也不能阻挡斯特曼帝国的持续扩张。他不断地在克利夫兰、美国中西部的城市和加拿大设立连锁零售店。这些连锁零售店的布局和风格都一样。前面的货架上摆放着连环漫画、市面的普通杂志、糖果、杂货和烟草制品。后面是一间门上标有“只限成年人”的房间，里面分门别类堆放着许多与性有关的书籍和杂志。那些成人作品大都由斯特曼出版，而且其色情内容也大大地超过沃伦法庭的每一项新规定。成人杂志里有性交照片和

矫揉造作的女子照片，各式各样的平装书里面都有对纵欲、自虐和同性恋性行为的极其细致的描写。巨大的市场需求驱使性产业蓬勃发展，各种变态行为和禁忌都陷落在追逐商业利益的诱惑里。

1968年9月6日，联邦特工在斯特曼的家中逮捕了他的妻子，在孩子面前给她戴上手铐并把她带回调查局留下指模和脸部照片，她被指控18次邮寄色情作品。斯特曼的弟弟也以同样的罪名在同一天被联邦特工逮捕。起诉书中提到的书和杂志大部分都是描写女同性恋的。斯特曼那天刚好不在家。这样，斯特曼、他妻子和他的弟弟将可能面临90年监禁和9万美元罚款的判决。逮捕斯特曼、他妻子和他弟弟的消息马上就成为克利夫兰的头版新闻。美国司法部长伯纳德·J. 斯图普里斯基说，“我烦透了那些色情的东西。”

在法庭审理此案中，鲁本·斯特曼的弟弟退出公司，结婚19年的妻子与他离婚而且也离开了公司，并放弃了她的股份。时至今日，鲁本·斯特曼依然没有放弃的念头。现在斯特曼成为了这个帝国“君主新闻”（Sovereign News）的唯一拥有者，他竭尽全力隐瞒“君主新闻”的真相，因为如果法庭没有证据证明斯特曼是“君主新闻”的拥有者，那么法庭对斯特曼罪名的就不成立。他先把“君主新闻”拆成上百家独立运营的公司，然后在特拉华州和内华达州将其整合，把那些公司的股份分配、高级职员和董事会成员列到公开文件里。这些文件里面没有斯特曼自己的名字。

鲁本·斯特曼开创了隐秘公司的先河。他不用美国人注册，找一些没有性产业背景的加拿大人注册公司，像是那些稻草人在合法地经营公司。这些人员的名字出现在公开的公司文件上、收



人税收文件上以及支票上，而真正的经营者、操盘者斯特曼则躲藏在暗处，徘徊在法律之外。斯特曼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搅乱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这些部门很难去加拿大追踪那些注册法人，也很难估量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美国国税局没有权利检查他们的税收状况。比如，当调查人员调查谁掌管“君主新闻”时（实际上“君主新闻”仍然是斯特曼在克利夫兰的大本营），他会发现“君主新闻”隶属于一家“巴哈马公司”，而这家公司又是由另外一家内华达注册的“威尔逊与同伴”公司控股，调查过程中还会发现“巴哈马公司”登记注册的总经理是一个叫做莫顿·戈斯（Morton Goss）的人，而他是安大略一家地毯店的老板。

克利夫兰犹太社区中心有两幢接邻的砖楼，里面有斯特曼的办公室和“君主新闻”的仓库。仓库特意加装了监视器和笨重的大铁门以防不测。那些来找斯特曼的访客通常被告知这里没有斯特曼这个人。在公司内部，那些需要斯特曼批示的备忘录上，收件人只是“R”、“D”或仅仅是“负责人”三个字，斯特曼下发的文件和批示上也只有“此致”而没有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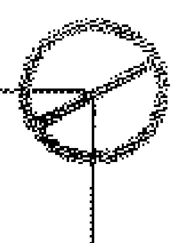
1968 年，对斯特曼的淫秽罪指控最终落下帷幕，而鲁本·斯特曼只认可侵犯联邦办案人员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次联邦探员突袭克利夫兰的仓库搜寻斯特曼的行动中，一个美国司法探员在斯特曼的办公室里发现了鲁本·斯特曼，并按法律程序的规定发问“你叫什么名字?”斯特曼的回答也是“你叫什么名字?”结果，愤怒的探员推搡斯特曼的前胸并再次质问他的名字，而斯特曼也推搡探员的前胸同样质问那位探员的名字，斯特曼的这一举动后来也一并被指控犯有“袭警”罪。在斯特曼强大的律师团辩护下，1968 年法院撤销了对鲁本·斯特曼的淫秽

罪指控。为了给政府一个面子，斯特曼认可了“袭警罪”。在这场官司中，鲁本·斯特曼仅仅为“袭警”的非法行为交了300美元罚款。斯特曼大获全胜。

20世纪60年代末，鲁本·斯特曼是美国最大的色情书籍杂志出版商之一，也很有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分销商。那时，又有两个人加入到斯特曼帝国的高层组织，一个是密尔顿·吕洛斯（Milton Luros），他早年是个美术设计师，现在掌控美国西海岸的成人书店并出版性杂志，他的印刷设备和印刷能力在加利福尼亚位列第二，仅次于《洛杉矶时报》的印刷厂；另外一个是希腊后裔迈克尔·特韦斯（Michael Thevis），他控制着美国东南部的性产业，东南部的成人书店几乎都属于特韦斯。特韦斯17岁起家，在亚特兰大摆了一个小报摊，而他现在的公司总部已经占据了商业区里的整个一个街区。那时美国社会对色情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美国男人经历了长达50年的私下拥有并享受色情作品后，色情出版物终于可以作为一种产品浮出水面了。色情电影把“商业味道的性”带给更多的观众，也同时引发了对色情作品更多的争论。同时，性产业也正在进行结构重组，整合后的鲁本·斯特曼帝国无论从商业上还是影响力上都超过了对手。

男人的舞台剧

1890年发明电影摄像机之后，摄影机新技术都被用于展示各式各样的裸女镜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已经成为性电影的制作中心。那些电影还只能卖给那些买得起35毫米放像机的收藏家们，因为当时35毫米放像机的价格非常昂贵。第一次公开放映硬核的性电影是在欧洲的高级妓院里，用来吸引主顾。美国大约在1915年才开始制作那一类的色情电影，16毫米



的摄影机和放映机的使用很快创立了一个地下性产业，它们在美国各地制作、放映那些淫秽电影。这些“色情电影”在多数社团的流行以及对放映这种电影的容忍揭示了美国人对性的奇特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始终贯穿在美国的文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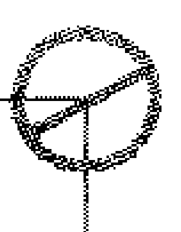
在1920年代，“男性观众午夜专场”也就是清一色男性观众的“硬核片”专场已经司空见惯，成为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习俗。不过那时候，美国不允许在妓院和公开场合放映那些下流淫秽的电影，人们只能在政治保守的机构、基瓦尼俱乐部（Kiwanis，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的礼堂和学院兄弟会这样的场所观看。后来的数十年里，色情电影的放映员带着他们的放映机进行地区巡放，有时甚至还有真人秀，请人表演一次1～2小时色情表演的成本大约是50美元。制作这种电影和做巡演的人赚不到大钱，它只是一种亚文化现象和他们的兴趣紧密相关。女演员会得到有限的报酬，而男演员通常都是免费的。多数演员都是皮条客和妓女。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有很多的出版商因为出售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书被关到监狱，而政府法律的相关部门却很少过问这种表演行为。几乎不干预午夜的色情表演，也不逮捕那些色情表演者。而主办这些色情夜场的团体在当时城里似乎还非常受人尊敬。只要谨慎地放映这些色情电影而且没有妇女和儿童观看，警察和检察官一般不予以干预。确实，伊利诺伊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部门没有将色情电影归进本州的淫秽法律上去，只是禁止在商业区放映色情电影。

早期的只有男性观众的色情电影都是用大量的图片描述性行为，在1920年代初形成的色情电影的基本拍摄角度、拍摄位置、

拍摄手法以及色情电影的主题，到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个时期还是无声电影，观众看到的是一段时间的表演片段紧接着就是一块对话的字幕。电影里含有一些可以取悦男性观众的插科打诨的片段，电影里的女性都描写成渴望性的女人。由于性作品都背负着社会骂名，所以她们经常带着面具进行表演。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美国大约有 2 千部色情电影。在收藏那些电影数量最多的人当中，包括时任 FBI 局长的 J. 埃德加·胡佛，他把那些电影存放到 FBI 的犯罪实验室。胡佛是反对色情和白人奴隶交易的代表者，他痛恨那些贩卖色情垃圾的人并指责他们腐蚀了美国的青少年。1924 年，胡佛出任 FBI 局长还不到一年就命令他的下属在美国各地搜集色情作品，再将它们集中存放到华盛顿的 FBI 总部，但这一行动并没有通知当地的地方法官。这些物件归档到一个叫做“色情文件”的特别档案中单独存放，直到胡佛去世这个档案才被曝光。资料显示，这个近 50 年的档案中存有大量的色情小说、淫秽杂志、色情漫画、色情唱片、色情明信片、色情扑克牌以及 1 千多部的色情电影，但是只有胡佛本人、胡佛的私人秘书和与胡佛非常亲近的局长助理有权接触档案里的东西。

即使今天观看一部早期的色情电影，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强烈的震撼。今天，我们可以在《生活》（*Life*）杂志中的图片、新闻纪录片和好莱坞的电影资料中看到 50 年前或 60 年前的影像资料。这些好莱坞版本的早期电影中很少出现性场景，偶尔也只是出现热烈的接吻镜头，而略去热吻过后的场景。老电影中的男主角都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和风度翩翩的骑士，结婚前的女士都是遵守社会道德的纯洁少女，不会做有悖社会风气的事情。当然，事实与好莱坞的版本有很大的区别，私人行为并不符合大众称赞



的规则，所以主流文化只描述了真实的一小部分。可是那些色情电影的内容和好莱坞的电影有天壤之别，那些黑白的色情电影光怪陆离，电影充满了违禁的镜头，例如违禁表演、表演者的身体、戴面具的裸体女人和只穿着黑色内裤的男人等场景。我们可以从那些早期的黑白色情电影中了解一些美国的隐蔽历史。

自动贩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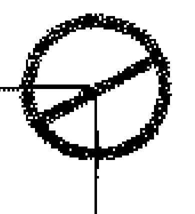
克利夫兰闹市区有一家罗克西连锁电影院（Roxy），对面有一个小商店。一天，鲁本·斯特曼在这个商店里看到一个外观颇似投币游戏机的机器，投入硬币后就可以在小屏幕上看色情电影。我们看来有些像早年的拉洋片，不过它是自动的。从 1940 年代末，嘉年华活动中就出现了这些一个挨一个的这种自动装置。斯特曼并没太在意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斯特曼的朋友也是他的大客户迈克尔·特韦斯讲，在亚特兰大成人书店里安置的许多自动放映机取得了丰厚的利润。从前做投币点唱机分销商的马丁·I. 霍达斯（Martin I. Hodas）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安装的投币放映机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率先在购物中心用投币机给孩子们播放动画片的纳特·拜伦（Nat Bailen）也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取得巨大成功。鲁本·斯特曼终于意识到了自动放映机潜在的巨大商机。很快自动放映机就成为斯特曼性产业中最赚钱的工具。

斯特曼没有依赖这种自动放映机，他又加以创新。在一个类似小报亭大小的放映间里放置两台投币式的 8 毫米放映机，有小屏幕，门可以锁上，顾客可以一次投币 25 美分观看长度为 12 分钟电影的 1 ~ 2 分钟。千万别小看这个昏暗狭窄的投币式放映间，它更新了一个大众观念：人们不必再去特定的场所观看色情电

影，而在一个隔绝的小小投币放映间里就可以独自一人观看。不久前，经常还可以见到许多美国中产阶层的男士挤在一起秘密地享受短暂的“电影”“乐趣”。

到1950年代中期，前面提到的色情电影和色情表演的巡展日渐衰退，因为，随着便宜的8毫米放映机的普及，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在家里用放映机观看多种级别的色情电影。色情演出变得多余了，原来早期色情电影中的情节描述和插科打诨的场景在“色情片”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连续不断的性行为镜头。那时，8毫米“硬核色情片”的制作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发行商，成人书店也不太愿意出售“硬核色情片”。当时只是在理发店、图片社、酒吧、加油站和公路上的卡车服务区出售“硬核片”。1960年代后期自动放映机普及，给那些色情电影制作人拓展了市场，同时新产品的需求量也激增。很快，制作商一个星期大约可以发行50部到75部可以循环放映的影片。那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是业余爱好、副业或是赚取小钱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寻求利润的行为，并且还出现了投资人、制作室和全职雇员，形成了成人电影行业。

鲁本·斯特曼所有的连锁店都加装了投币式的放映间，他还给其他的书店免费安装投币放映间，投币放映间运营利润的50%归斯特曼所有。斯特曼为此在克利夫兰市新建了一家公司——“自动贩卖”，专门生产投币式的放映间并建立了许多地区公司，为这些公司提供此项服务。在斯特曼的书店里，投币式放映间一律都设在书店的最后面，前面依次是连环漫画、性书籍和性杂志的货架，没过多久，书店里的投币放映间最具人气。平装书、杂志和性工具的利润通常可以覆盖成人书店的日常开销，而投币放映间带来的几乎都是利润，放映间几乎不需维护。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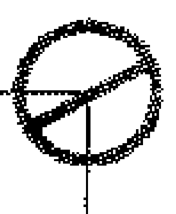
的8毫米放映机持久耐用，一部新“循环影片”只要8美元，大概只需要2个到3个顾客的消费便可以收回一个投币放映亭的成本。通常普通规模书店里的投币放映间一个星期至少能赚2千美元，较大规模的书店一个星期里就能轻松地赚到1万美元。斯特曼的“自动贩卖”服务公司的雇员们每天或每周定期地出现在成百上千家有投币放映间的书店，核对发票、收钱，与书店的老板或经理们核对收成分配，用手推车运走币值上千美元、成吨重的硬币钱袋。

斯特曼把从投币放映间赚来的钱都用于开建新公司和仓库，同时也进入海外市场与国外的商业伙伴进行合作。在荷兰，斯特曼和查利·格尔茨（Charlie Geerts）合伙开办了许多家成人书店。在英国，斯特曼与霍洛韦（Holloway）家族的玛丽、本和他们的5个儿子合作。很快，斯特曼的合伙人就分别成为荷兰和伦敦性产业的巨头。斯特曼通常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提供资金、经营策略和经营理念，而他的合作伙伴自己运作这些合资公司并承担多数的法律风险。斯特曼以同样的模式在法国、德国和瑞士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商业伙伴。短短的几年里，经斯特曼改良创新的投币式放映间风靡北美的主要城市并遍及西欧的主要城市。

斯特曼也把投币放映机赚来的钱进行多元化投资，对性工具的投资便是其中之一。斯特曼认为早期大多数性工具的外包装毫无吸引力还不太卫生令人厌倦无味，于是他决定自己生产、出售自主品牌的性工具。斯特曼亲自出马，在香港选定了塑料制造厂、振荡器制造厂和充气娃娃制造厂，然后在洛杉矶选定一个工厂生产制作“仿真橡胶制品”，也就是高仿真的男女性器官。斯特曼对这个新公司名字的要求是听起来要干净、卫生还要有些暧

昧的瑞典文化味道，最终选定“约翰逊医生”（Doc Johnson）这个名字。“约翰逊医生”系列的性工具不久就出现在大西洋两岸的成人书店，它的外观看上去非常清洁优雅。“约翰逊医生”是按照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正是这任总统的司法部找过斯特曼的许多麻烦。

早期投币放映机放映的色情电影带的内容相对比较乏味，只有一些裸体女人在跳舞或是不停地转动身子很少涉及性行为，因为制作商认为在法庭上很难为那些露骨色情电影带辩护，而这些没有情节和对话的电影不会明显地影响社会价值的走向。但是当电影院里的电影变得更加露骨的时候，投币放映机的内容也随之改变，“性泛滥”和“暴露”的影片流行起来。1960 年代末，带有暧昧性情景的电影只能在破旧的电影院上演，不久拥有 16 毫米放映机的影院在闹市区开张，像是挑战似的开始放映新制作的无声“硬核色情片”。1970 年代，一部丹麦的色情纪实片被允许上映，美国的主流观众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硬核色情片”。两年后，一部叫做《深喉》（*Deep Throat*）影片在迈阿密和纽约陆续放映。事后多年，据《深喉》的女主角琳达·洛韦拉塞（Linda Lovelace）透露，她是在经理的枪口胁迫下出演的。影片的导演是杰拉德·达米亚诺（Gerard Damiano），他原来是一个英国的理发师。制片人是安东尼·佩拉伊诺（Anthony Peraino）和他的两个儿子路易斯、约瑟夫，他们和黑社会的科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喉》基本上是一部色情电影，不过是彩色的，还有配乐。公演时，电影院排起了长龙，各个阶层的男女观众纷至沓来。作为色情电影标志的《深喉》，它的成本大约是 2 万 2 千美元，可是最初公演的 9 个月的票房收入就超过了 100 万美元，2 年的票房收入超过了 2500 万美元。



虽然当时“硬核色情片”的公开放映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但是当时美国投币式放映亭的年收入依然是成人影院收入的四五倍。鲁本·斯特曼无声无息地成立了许多公司，为他的投币放映间提供色情电影，并在欧洲资助“硬核色情片”的制作，这始于当时正在荷兰拍摄的他的第一部长篇色情电影。对斯特曼来讲，他本人对这个行业的经历很厌烦，以至于他从不走访任何色情作品放映间，甚至他都不去自己的制作公司。据他自己估计：20 年来，公司每天都发行一部新“色情片”。鲁本·斯特曼本人没有被性所迷惑，对他来讲性只是商业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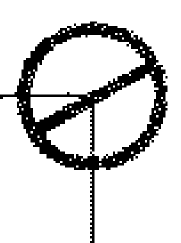
追求良好的行为准则

《深喉》的公演引起了争议，强烈的反对声浪阵阵袭来，矛头直指美国各地的成人书店和放映该片的电影院，指责好莱坞的色情电影充斥着色情镜头和粗鄙的语言，反对年轻人反传统的思想和日益放纵的社会氛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色情电影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不管是“硬核”还是“软核”的色情片，它们的内容都在丑化女性、鼓励滥交、散布没有爱的性行为、抛弃传统价值观以及侵蚀夫妻间的真情。色情电影要对越来越多的娈童案、乱伦、家庭破裂和性病的传播负责。反色情运动已经持续多年，表面上它输掉了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没有起到杜绝色情作品的作用，但是反色情运动却实实在在地遏制了色情业的迅猛发展势头。这场旷日持久的反色情运动的倡导人是辛辛那提的查尔斯·H. 小基廷（Charles H. Keating, Jr.）律师，他的毅力和雄心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他的俄亥俄州老乡鲁本·斯特曼的“工作热情”。

基廷身材高大，出身于运动员世家，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

曾经是美国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还得过游泳冠军。在开始律师生涯之前，他尝试过保险业的工作。1956 年，由于天主教徒反对色情文学的势头衰减，人们请基廷出面采取行动反对“淫秽泛滥书亭”这一现象。两年后，基廷建立了“全国高雅文学市民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itizens for Decent Literature，CDL），反对色情文学，倡导恢复正统文学，并得到了犹太社团、新教社团领袖的支持以及天主教会的支持。1960 年代初，基廷奔走于美国各地发表演讲，抨击色情文学作品，呼吁大众抵制色情的入侵，同时着重强调“色情文学具有腐蚀各个年龄段人思想的能量以及毁掉美国年轻一代的力量”。基廷认为色情小贩背后隐藏着美国的敌人，“色情泛滥显然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阴谋”。

1965 年 8 月，查尔斯·基廷和全国高雅文学市民组织的首席辩护律师詹姆斯·克兰西（James Clancy）来到一个国会所属的调查“有害的、淫秽的色情题材作品”的委员会，两个人还带来了许多年轻的高雅文学市民组织的支持者，游说国会应该针对色情文学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他们建议这个委员会应该研究那些色情作品的观点，为执法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并领导对性产业的打击。基廷在国会作证时曾经呼吁到，“我强烈要求也请求你们，有必要立即成立这个委员会。”在任命过程中，基廷发誓要将大多数的美国色情发行商投入监狱，毫无疑问地包括被克兰西称为“声名狼藉”的鲁本·斯特曼。在他们的陈述中，高雅文学市民组织领导者们特殊的心理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其间，基廷对委员会说他前一天晚上他在国会大厦附近的书摊上花 45 美元买了一些色情刊物，而且他还要在听证会上大声朗读某色情出版物（*Love's Lash*）的 6 页内容，国会议员约翰·登特（John Dent）打断了他并要求“放过委员们”。实际上，这些委



员们都十分熟悉那些杂志内容而且他们主要是想知道谁出版了这些东西。然而就在几分钟后，高雅文学市民组织的首席辩护律师詹姆斯·克兰西不理睬约翰·登特的反对也不顾贝基·罗登博小姐（Miss Becky Rodenbaugh）和多名该组织年轻支持者的在场，依然为国会的附属委员会大声朗读《穿着皮革制品时的冲动》（*Lust in Leather*）中两章内容的冗长概要，内容包括在波利乐舞曲伴奏下的性混乱场景：自虐、女同性恋、通奸、鸡奸和带着公牛头面具的裸体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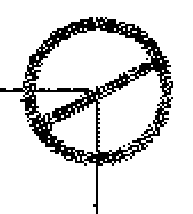
其后的几年里，基廷不停地游说，试图成立一个针对色情的国家委员会。高雅文学市民组织无论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得到了4名政府官员、6名参议院和120多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参议员卡尔·E.蒙特（Karl E. Mundt）和国会议员多米尼克·V.丹尼尔斯（Dominick V. Daniels）也是高雅文学市民组织成员，他们倡议通过立法成立一个针对色情和淫秽物的国家委员会，但是上面两位的提议遭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的强烈抗议，不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抗议成效甚微。高雅文学市民组织的长期努力终于赢得了回报，1967年10月，国会终于授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任命明尼苏达州法学院的院长威廉·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为该委员会主席。尽管威廉·洛克哈特认为色情法律条款会威胁到大量文学作品，他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强调“色情作品非常邪恶、淫秽和令人厌恶，没有多少人可以忽视反色情法律的欠缺。”

色情淫秽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启动后，高雅文学市民组织又把注意力转向美国最高法院。1968年6月，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即将退休，约翰逊总统任命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为最

高法院大法官。亚伯·福塔斯那时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与那些第一修正案的绝对支持者相比，例如法官威廉·O. 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和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福塔斯是一个反对色情出版物的温和派。除此之外，福塔斯曾经不断地和自由主义者们一起呼吁重新定义“淫秽、色情”，而且他还曾经是许多性产业人士的私人律师，其中包括作为休·霍夫纳的律师。

高雅文学市民组织带头反对亚伯·福塔斯的任命，而且同时还准备了一份半小时的名为“瞄准色情”的介绍资料，里面都是沃伦法庭认定的受到宪法保护的色情作品。在亚伯·福塔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誓就职前，高雅文学市民组织给国会议员和记者们举办了个展览，爱德华·德格拉茨（Edward De Grazia）在他的淫秽法律历史的演讲中，对《到处斜倚着的女郎们》（*Girls Lean Back Everywhere*）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国会大厦的新闻间里，高雅文学市民组织成员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enator Strom Thurmond）把硬币放进投币放映机里面，给一名男性观众放映了两部色情电影，这位观众对着屏幕发出大笑而且满嘴都是大声的粗鲁话。

经过长达 2 年时间、费用高达 200 万美元的调查后，针对色情和淫秽的调查委员会于 1970 年 9 月公布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指出，政府不能干涉成人自由的权利，即成人有权利阅读、购买或观看他们所想的东西。并且指出淫秽色情出版物不能明显地导致“犯罪、行为不良、行为失常或情感骚动”等行为。实际上，那些性罪犯们接触的色情物比普通人还要少，而且来自保守派家庭的性犯罪人数越来越多。调查委员会建议州、联邦和地方的淫秽法令条例应该予以撤销，同时也建议对淫秽色情出版物



的销售加以严格限制，严禁将色情物品卖给未成年人，限制淫秽色情出版物公开的广告宣传和公演。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曾任命查尔斯·基廷进入调查委员会填补一个空缺，基廷一意识到委员会准备做出的建议就尽其所能阻碍委员会的正常运转。他抵制委员会的例会；要求委员会主席威廉·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辞职；他还提起法律诉讼阻止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1970 年，基廷在美国各地辗转 20 多万英里，发表演讲抨击调查委员会。当调查委员会最终公布了报告后，基廷依然坚持他自己的长达 46 页抗议书的观点，这些主要是白宫的助理帕特里克·J. 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执笔完成的。基廷警告调查委员会正在鼓吹"道德混乱"和"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生观"，声称总统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做法不民主，指责调查委员会"不是美国政治系统的一个合法部分。"基廷宣称美国社会已经变得比所多玛城①和哥摩拉城②都更迷恋性，商店公开陈列着"诸如振荡器、人工阴茎等性工具。"基廷声称淫秽色情"本质上就是邪恶"，而且指责那个本应去解决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却签发了一张"给色情作品制造商的一个空白支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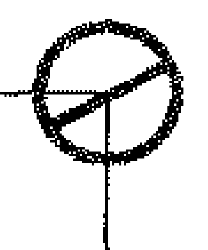
尼克松总统过去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沃伦法庭对色情的裁定。1969 年的一次演讲中，尼克松支持最高法院的基本立场，强调"最终决定不是取决于政府而是美国人民"，并期待有一天

① Sodom，罪恶之城。古代巴勒斯坦的一座城市，可能位于死海以南。在《旧约全书》中因为它的邪恶和堕落和蛾摩拉一起被毁掉。——译注

② Gomorrah，罪恶之都。索达姆旁边的巴勒斯坦古代城市，现在可能位于死海下面。据旧约圣经记载，这座城市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毁于一场大火。——译注

色情电影不再拥有任何观众。直到1970年的秋天，随着中期选举日益临近和学生示威给社会带来无政府之风，尼克松总统转变态度指责色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声称如果推翻淫秽法律也就等同于“宽恕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参议院随后以60票赞同6票反对谴责色情调查委员会并否决了它的结论。得到比利·格雷厄姆大牧师支持的一项抗议运动也指责色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魔鬼的报告”。

在三年内，尼克松给高等法院任命了4名新法官：沃伦·E. 伯格、哈利·A. 布莱克曼、刘易斯·F. 鲍威尔和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1973年6月，一些地方影院放映的“硬核色情片”如《深喉》、《琼斯小姐身上的魔鬼》（*The Devil in Miss Jones*）、《绿门后面》（*Behind the Green Door*）和好莱坞X级的影片《巴黎的最后一支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不仅取得了商业成功，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对此，高等法院的新保守势力明确表示出他们对色情作品的态度，沃伦·E. 伯格最高法院否认成人有想看就看的权利，同时也否定了可以导致出售色情出版物的与隐私有关的权利。在审理“米勒散发色情材料案”（Miller v. California）中，首席大法官伯格提出色情淫秽的新定义，不能再认为仅仅完完全全没有社会价值的文学就是色情文学，只要缺乏文雅、艺术、政治或没有科学价值的作品就可以认定是色情作品。更重要的是高等法院认定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法律权利制定自己的色情标准。正像同年伯格审理另一个案件时的解释所说，就像限制自由演讲的立法一样，色情立法就是为了“保护那些弱势群体、低教育群体和那些深信不疑、易于上当受骗的群体。”在米勒案件裁决一年后，高等法院维持康斯托克条款，裁定它不违反美国宪法。



一块诱人的色情蛋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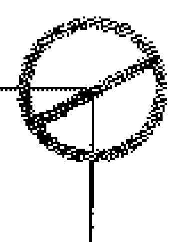
“布赖恩斯顿发行公司”（Bryanston Distributors Inc.）是佩拉伊诺家族掌管的一家纽约公司，制作发行色情电影。公演《深喉》的第一年，拷贝的发行方式和其他电影一样，也由邮政和快递公司发送到各地的电影院。电影院的老板与佩拉伊诺家族共享票房收入。当最高法院重新定义色情罪并恢复执行“康斯托克条款”后，联邦检察官可以按社会行为标准进行色情指控，“硬核片”发放的风险大大增加。佩拉伊诺家族立刻停止了使用邮递，随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发放系统。公司把信赖的员工作为派送员，这些甄选的员工还作为公司的“核查员”，他们亲自将拷贝送到电影院，并在电影院里当场清点观众人数，营业结束后，“核查员”再与电影院的老板核对票房收入，将票房的一半带回。另外还有一批称作“清道夫”的员工，他们奔波穿梭在各个城市间，从那些“核查员”手里把现钞装进皮箱带回公司。这个人工的派送和核收系统也导致员工偷窃和收入统计不准确，可是好处就是这种做法不会留下法律痕迹，于是佩拉伊诺家族就以这种运营方式收敛了上千万美元现钞。

性产业总是吸引那些有犯罪背景的人群。关注自己声誉的那些商人不会去尝试经营成人书店和投币放映机，但是有过违法经历的人就另当别论了。当性产业的潜在利润和风险同时增长的时候，犯法行为的水平也在增长。一些地域的成人书店老板必须向当地的敲诈者交“街税”以求得安宁。另外一种风险来自于高利贷，因为银行不能给有法律异议的行业经营贷款。书店老板之间的地盘之争也不能通过法律解决。宾夕法尼亚就发生过类似的争斗，原为合作伙伴的约翰·克拉斯纳（John Krasner）和艾

伦·查尔斯·莫罗（Allen Charles Morrow）就因为地盘发生暴力冲突，克拉斯纳的妻子被人绑架，书店被炸，克拉斯纳的一个雇员因为携带85磅炸药涉嫌炸毁莫罗的书店在哈里斯堡（Harrisburg）外被逮捕。莫罗幸运地躲过一次暗杀，而克拉斯纳在一个汽车旅馆的停车场里被人谋杀。

与赌博和贩毒不同，虽然成人书店老板和成人电影制作商比较容易遭到敲诈，但是性产业还是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暴力冲突并不常见。现行模式下的性产业带来了大量的现金，商人和制作商已经习惯了警察的随时调查，而不是来自敲诈者的“保护”。多米尼克·布鲁克莱尔（Dominic Brooklier）带领的属于科萨诺斯特拉家族的洛杉矶黑社会经过长期奋斗得到了“一块色情蛋糕”，就连“米老鼠黑帮”也奈其不得。在诸多原因之中，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布鲁克莱尔的手下曾经烧毁过一个由FBI经营的诱饵色情书店。那些成功地从色情产业中分得一杯羹的帮派不是靠敲诈勒索，而是靠不付“版税”、“非法”复制流行的“硬核色情片”，因为“硬核色情片”的内容存在法律争议，出版商很难提出违反版权指控。《深喉》被少数无赖大量盗版，他们全然不顾安东尼和路易斯·佩拉伊诺一家与科隆博（Colombo）家族的关系。而佩拉伊诺则利用了这个优势，对策是公司派代表去那些放映盗版《深喉》的电影院，劝说电影院的老板付给他们一半的票房收入，没有几个老板拒绝这个请求。结果，《深喉》的盗版不仅广泛地流行，佩拉伊诺节省了制作新拷贝的费用，而且还赚回了相应的票房收入。

一些成人书店也给消费者提供各式各样的非法货物和非法服务，现为东方肯塔基大学从事罪犯审判和警察研究的加里·W.波特（Gary W. Potter）教授在调查硬核色情作品零售业的过程



中发现，成人书店的店员十分乐意把那些有某种兴趣的顾客介绍给毒品贩子、妓女、赌博者和销赃者。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假借投币放映间内看电影进行同性恋活动。摩托帮开的成人书店通常都出售甲基苯丙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异教徒和在逃犯，他们的经营反而减少了这个行业的敲诈勒索现象，而且他们的女朋友经常从事“模特”工作。

令人作呕的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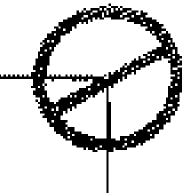
尽管美国高等法院否决了对放映《性欲知识》（*Carnal Knowledge*）的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一家电影院老板的色情指控，这部由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导演，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主演的好莱坞影片并没有那些暴露的镜头，但是好莱坞在新的法律气候下还是显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主要电影公司的影片内容都避免引起色情争议和可能的色情起诉。1973年，好莱坞的电影充满了暴力，但是并没有大量的性场景出现。此时，在南加利福尼亚州远离好莱坞的地方诞生了一个专门出品色情电影的全新电影行业。

伯格高院表明对淫秽色情罪立场的六个月后，FBI又对鲁本·斯特曼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乔治·E. 格罗茨（George E. Grotz）领导下的FBI探员监视“君主新闻”的仓库、追踪他们的送货车辆并跟踪色情作品推销员，整个监控持续了一年半。FBI通过和得克萨斯州一家成人书店老板的合作，成功诱使“君主新闻”把许多“硬核片”从克利夫兰邮寄到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Fort Worth）。1975年3月9日，联邦特工突袭斯特曼位于克利夫兰的仓库。特工出示搜查证后，依然被拒绝进入大楼。于是，特工们用铁锤砸开大铁门后强行进入，大约24名特工彻底

搜查了仓库、照相取证并没收了许多资料和色情作品，一路上斯特曼的律师们对特工们纠缠不休，还给执行公务的特工拍照。6天后，全副武装的联邦特工再次强行搜查了这个仓库，斯特曼的律师和警卫对这次行动没敢阻拦，而且相当配合。

一年后，根据联邦法律斯特曼被指控以邮寄方式发送色情作品。两个月后，依据辛辛那提（俄亥俄州西南端一座城市）根据州法指控斯特曼参与有组织的销售色情作品罪。辛辛那提对斯特曼的指控不久就撤诉了，因为一名美国地区法官宣布俄亥俄州的色情法律违反宪法。斯特曼仅仅面临一项色情罪指控，但是他的律师海劳尔德·普里斯·费林格（Herald Price Fahringer）非常担心即将来临的联邦审判，法庭出示的查抄的24本杂志和12部电影都是非常露骨的硬核色情作品，费林格私下都承认“《放纵蛋糕》（*Cake Orgy*）是一部你看过的最令人作呕的色情电影，你只要活着就再也不会吃果浆软糖了。”当法庭宣判即将到来的时候，费林格的很多客户都表现得像“神经兮兮的娘娘腔”，而鲁本·斯特曼的态度完全相反，镇定自若，坚信自己一定会赢。

1978年的夏天，法庭对斯特曼的审判持续了一个月。16名参与行动的FBI特工在法庭作证并向陪审团出示了物证。经过陪审团几天的审议，陪审团推翻了对斯特曼的指控，裁决对斯特曼和6个助手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斯特曼的律师费林格对陪审团的无罪裁决目瞪口呆。与此同时，陪审团又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们交给法官威廉·K. 托马斯（William K. Thomas）一份2页半的备忘录，指责高等法院的色情定义，威廉·K. 托马斯法官当庭朗读了备忘录并承诺将其转交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斯特曼欣喜若狂，可是格罗茨特工却发誓FBI的调查不会理睬法庭的裁决，将继续对“君主新闻”进行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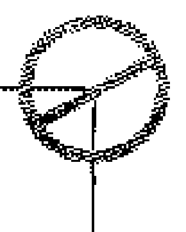
随着鲁本·斯特曼一次次战胜政府对他的指控，他在性产业的“名望”也与日俱增。不过，法庭在其他几个色情罪案件上取得的胜利却使得斯特曼渔翁得利。1974 年，法庭裁决密尔顿·吕洛斯色情罪成立，对他妻子的指控不成立。法庭判决之后，斯特曼就接管了密尔顿·吕洛斯在加利福尼亚的多家公司。当迈克尔·特韦斯因色情罪、纵火、敲诈勒索和涉嫌两起谋杀关进监狱后，斯特曼的投币式放映机业务一路杀到了美国东南部。到 1970 年代末，美国性产业里还有另外三个风云人物。第一个是迈克尔（米基）·扎法拉诺（Michael、[Mickey] Zaffarano），他曾经是“科萨诺斯特拉”头目约瑟夫·伯纳诺（Joseph Bonnano）的保镖，如今，他除了资助“硬核片”的制作还掌控一家全国范围的连锁电影院。另一个是罗伯特·迪贝纳多（Robert [DiB] DiBernardo），他是甘比诺（Gambino）黑帮家族的首领，是纽约最大的成人物品分销商并且在时代广场开了多家性商店。第三位是哈利·弗吉尔·莫尼（Harry Virgil Mohney），密歇根迪兰德的一个隐匿的商人，据称他控制了美国中西部的成人书店和电影院，同时还经营汽车影院、按摩院、脱衣舞俱乐部和台球厅。可是在鲁本·斯特曼面前，这三人的帝国就会黯然失色，相形见绌。

在色情业的一些零售领域充满了强烈的竞争，斯特曼担心带有真人秀的西洋景（peep shows）的出现会冲击投币放映间的生意，但是他不用担心批发领域的任何竞争。通过“君主新闻”、“贵族新闻”（Noble News）和“宏伟新闻”（Majestic News）三家公司，斯特曼把色情作品卖到了美国 50 个州以及海外 40 多个国家的折扣商店，另外斯特曼还继续经营他的老营生连环漫画。斯特曼销售网络的规模在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独立

的色情作品制作商必须和斯特曼合作才有可能取得较大的发行量，那些书店老板也只有从斯特曼那里才能得到新产品。斯特曼的整体实力让整个性产业都对他充满了恐惧、嫉妒、羡慕和尊敬，而那些性产业的名人也定期地拜见斯特曼以期获得资金支持或者请他出面帮助解决争端。

这时的鲁本·斯特曼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富豪，全球的业务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斯特曼在克利夫兰谢克海茨的郊区拥有一座都铎式（Tudor）建筑风格的庄园。家中收藏了许多古董和艺术珍品，其中包括荷兰大师的作品。斯特曼还拥有多辆卡迪拉克、奔驰和劳斯莱斯等豪华轿车。斯特曼穿着得体，就像一位华尔街保守的银行家。他还捐助犹太社团，比如捐助克利夫兰管弦乐队和克利夫兰芭蕾舞团。每天斯特曼还坚持在市区的基督教青年会锻炼，基督教青年会还有一块纪念斯特曼贡献的铜匾。与他形影不离的是司机兼保镖詹姆斯·朗（James [Diz] Long），他曾经当过拳击手和橄榄球运动员，还曾经是凯霍加县电器董事会的安检人员。这座豪宅装有一套先进的安全系统，他办公室的抽屉里还放有一把手枪。

每年斯特曼都在克利夫兰的一家饭店的舞厅里举办奢华的圣诞舞会，并邀请全世界数百名色情业的老板出席圣诞晚宴，然后在拉斯维加斯举办新年除夕派对，斯特曼在赌场里还是一个出名的一掷千金的赌徒。斯特曼不停地在世界各地穿梭视察他的企业，他的企业遍及芝加哥、洛杉矶、香港、苏黎世、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他喜欢给对手甚至反对者一个意外的惊喜，比如反色情示威者围绕他的书店进行示威，斯特曼却叫人给示威群众咖啡和多纳圈；联邦特工为了验证出入斯特曼家的客人，经常会在汽车里蹲守一宿，这时斯特曼会走向特工的汽车邀请他们参加院内的



聚会。斯特曼拥有享受这一切的理由，多年的打拼几乎使他垄断了整个色情业，无人与之比肩。性产业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同他一争高下，政府也没能找到一个裁定他有罪的陪审团，而且市场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每年都在增加。可是就在斯特曼帝国达到顶峰时，一个看上去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联邦探员却笃信自己可以找到击垮斯特曼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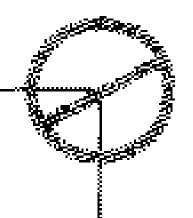
衰　落

见习调查员理查德·N. 罗斯菲尔德（Richard N. Rosfelder, Jr.）在1970年毕业前，对未来并没有太多的想法，而且经常忙于派对社交。他父亲是克利夫兰纳贝斯克公司（Nabisco，跨国糕点制造商）的销售经理，工作也不开心，他让罗斯菲尔德尽快找个工作。在学校的职业招聘会上，罗斯菲尔德驻足在美国国税局的招聘台边，招聘人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国税局如何捕获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年）的故事。阿尔·卡彭是意大利裔美籍匪徒，曾严厉地统治过芝加哥黑社会。阿尔·卡彭天生就是有组织犯罪的好手。也许他是20世纪黑社会里最会捞钱的人，在26岁那年，他就控制了成百上千多家地下酒吧和赌场，竟然从中获利上千万美元。银行里没有他的账号和固定资产记录，他从不用支票，只使用现金，涉嫌逃税。芝加哥警方和FBI多次让他逃脱，但是美国国税局终于将阿尔·卡彭绳之以法。罗斯菲尔德的脑子里充满了遐想，幻想自己身带警徽和手枪追捕白领罪犯，整个事情听起来都非常酷。于是，罗斯菲尔德申请加入国税局成为了一名见习调查警员。他父亲很快也惊讶地发现，未来家里将会有一个收税的警员。

罗斯菲尔德加入国税局后，在军队里接受了18个月的培训，又在华盛顿行政特区的财政部培训学校接受了6个月的法律仲裁培训。头几年，罗斯菲尔德在俄亥俄州的国税局情报部门工作，他审过扬斯敦市有组织犯罪成员的逃税案以及托莱多市的多名贩毒分子。1975年，当罗斯菲尔德转到国税局克利夫兰办事处后，对鲁本·斯特曼发生了兴趣。当时许多美国国税局的办事处正在跨国调查斯特曼的情况，而国税局克利夫兰分部对斯特曼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民事部门已经审计过许多斯特曼的公司，但是民事部追踪不到到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和董事长。美国国税局的特工也曾经造访过"君主新闻"的仓库，试图寻找斯特曼，但探员们被拒之门外，还告知这里没有"君主新闻"这个公司以及斯特曼这个人。美国国税局的多次审计都无功而返，就连"君主"股东的名字都没得到。

罗斯菲尔德确信斯特曼的公司运转良好，因为斯特曼的一个雇员和罗斯菲尔德住在一个公寓，但是这个年轻的雇员却有两辆崭新的卡迪拉克。发表在《克利夫兰》(*Cleveland*)里的一篇文章吊起了罗斯菲尔德的胃口，他准备调查斯特曼的公司。那篇文章的作者爱德华·P. 惠兰(Edward P. Whelan)在文章中使用了"如何搞晕了联邦政府"的副标题，文章中揭露的策略正是斯特曼使用策略，用影子代理人注册公司，自己隐匿其下。罗斯菲尔德马上想到使用这个策略可以隐蔽资产，目的只有一个——逃税。在罗斯菲尔德看来斯特曼的做法是在嘲弄政府，向政府挑战。罗斯菲尔德决定迎接这个挑战，可是当他向上级申请对鲁本·斯特曼进行犯罪调查许可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罗斯菲尔德当年只是一个27岁的毛头小伙子，只有不到4



年的调查员经历，而他面临的对手却是一个拥有上百家公司的跨国集团，而且每个公司都有各自独立的纳税申报单。罗斯菲尔德的调查请求看上去有些不自量力、不切实际。大量使用现金交易的行业都有很好的机会去逃税，例如投币式洗衣机、自动售货机、一些餐馆、迪斯科舞厅和酒吧等行业都是容易逃税的“好行业”，甚至这些行业的老板都很难确切知道现金的数目也很难防止员工偷拿现金。投币式放映间及其放映间提供的服务很难准确度量，投币放映间是个理想的逃税机器，州或联邦税收部门不可能搞清楚每台放映机放映了多少次色情片。那时候，罗斯菲尔德心里有一个感觉，可以隐瞒的数量太大了，这就足以使斯特曼受到逃税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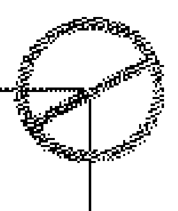
最简单的逃税方法就是虚报“缩水的”收入，如果你把逃税的钱都藏在后花园里，一辈子也不动它，那么别人也奈你不得。但是罗斯菲尔德知道，逃税者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把未申报的钱洗出来，也就是如何将现金存进银行，然后在不暴露其出处的情况下合法地使用。

1970年代，美国毒贩子及其律师和会计师的洗钱技艺接近完美。普遍的办法就是，将贩卖毒品得到的现金存进一家大量使用现金交易的公司，然后虚报加大的年收入，这种洗钱方式的缺点就是必须按照州、地方和联邦的税法缴税。为了不让政府与他们一起分享利润，冒险家们又为毒品贩们发明了一种更复杂的洗钱方法，他们将贩毒赚取的现金走私到国外，存入海外公司的国外账号。不过大量的现金走私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毕竟现金的重量通常比毒品重得多。然后国外公司再把这些钱作为“投资”汇到美国。因为当时美国国税局没有权力调查那些海外“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所以他们的“美国投资”就不用上税了。

虽然罗斯菲尔德还有其他任务在身，他还是展开了对斯特曼的调查，期望发现一些情况以便申请对斯特曼的全面调查。他经常讲自己只是个极普通的美国人，但是谦逊的背后，罗斯菲尔德却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自信心的年轻人。他不太像那些典型的联邦探员，努力工作，疯狂娱乐，喜欢在公路上开着喜爱的银色吉普车高速驰骋。对克利夫兰的许多联邦部门来讲，鲁本·斯特曼也许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对斯特曼的调查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挑战。罗斯菲尔德不喜欢斯特曼公司出售的东西，可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狂热的反色情主义者。他真正的动机就是，斯特曼看上去就是一个傲慢自大的、身价千万的逃税骗子。

罗斯菲尔德来到克利夫兰司法部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询问能否分享他们掌握的有关斯特曼的调查资料。那时，这个部门正在调查斯特曼的“君主新闻”公司。虽然联邦政府官僚主义十分严重，通常你只能分享到责备和牢骚，拿不到有用的资料。但是负责斯特曼案件的大卫·费尔德曼（David Feldman）没有刁难，还是让 FBI 特工乔治·格罗茨帮助罗斯菲尔德。我们是否还记得前面提过一个叫乔治·格罗茨的特工，他就是那个在法院裁决斯特曼后，发誓继续调查的那位联邦特工。这个部门的所有人都认为斯特曼应该受到淫秽罪的指控，他们也觉得美国国税局调查的介入似乎也是一件好事。格罗茨交给罗斯菲尔德两个三环型大文件夹，都是 1975 年 FBI 突袭斯特曼办公室时得到的资料，一本记录了斯特曼的公司名录、股东、经理和董事长的情况、注册地点和法人资料，另一本详细记录了那些公司的账号、银行签字印章和各自的税务登记号。除此之外，格罗茨还给罗斯菲尔德讲了一个斯特曼的趣事。

1974 年 10 月 14 日，斯特曼试图用“保罗·贝克”的名字



在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行开两个账号，“保罗·贝克”是斯特曼手中一本假荷兰护照的名字。银行职员通知了警察局，4名警员立刻来到银行。他们目睹斯特曼开办账号离开银行后，阿尔佛雷德·格拉夫（Alfred Graf）侦探在街上叫住了斯特曼，并在他身上搜出两本照片相同而国籍不同的护照。经检查，一本是真的，另一本是假的，随后拘捕了斯特曼。格拉夫询问斯特曼当时在银行做了什么，并且怀疑他是个毒品贩。斯特曼否认是犯罪行为，并对警察解释，“因为不愿意交税，所以才到这里，把钱藏到瑞士。”瑞士人不把逃税行为视为可憎的犯法行为，而且瑞士银行保密法明确保护存钱者的隐私，不得向外国的税务调查员透露存钱者的信息。在瑞士，用假名字开账号是违法的，可是在银行隐匿资产的事情在瑞士司空见惯。格拉夫侦探的回答打消了斯特曼的顾虑，“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缴税。”

斯特曼在瑞士被逮捕的事情让罗斯菲尔德茅塞顿开，这解决了税务案例中最难的事情：犯罪意图的证据。罗斯菲尔德在这件案子中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缺少的只是犯罪的证据。在1976年11月，罗斯菲尔德获得了开始调查斯特曼的许可。一年后，他结束了其他案件，开始全天候处理斯特曼的逃税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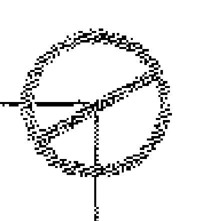
罗斯菲尔德挑选了托马斯·N. 谢安斯基（Thomas N. Ciehanski）税收特工一起工作，两个人决定亲自去通知斯特曼，美国国税局即将开始调查斯特曼。1977年秋季的一天，灰蒙蒙的还下着雪，两个人开车来到“君主新闻”，楼前有个男人正在擦拭卡迪拉克前风挡玻璃。罗斯菲尔德感觉此人就是斯特曼，但又不敢肯定，因为斯特曼的外形总是不断地变化，有时留着胡须，有时剃掉胡子，眼镜时戴时不戴。罗斯菲尔德走上前去问那个男人，如何能找到鲁本·斯特曼，那个人指了指门前的对讲

机，随后，斯特曼对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挥挥手，笑着开着卡迪拉克扬长离去。这时候，警卫通过对讲机对他们说，这里没有叫“鲁本·斯特曼”的人。

罗斯菲尔德决定从调查零售店开始，了解它们的运作方式和营业情况，试图发现瞒报赢利的线索。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跟踪了几个星期一个绰号“米尔迪大叔”的斯特曼雇员，发现他拎着皮箱进出数十家成人书店，再把收来的整皮箱的现金存入银行。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核对税收报告、发票和斯特曼成人书店进货的录像带后，发现收支税收丝毫不差，显然他们前期对书店的监视都白费了。1978 年夏天，法院对斯特曼进行色情罪指控的法庭调查时，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也在审讯厅里呆了几天，倾听证词，试图得到一些对他们正在调查的斯特曼的感性认识。斯特曼也发现了他们的存在，通过手下了解到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的真实身份。一天庭讯休息时，斯特曼在走廊里对俩人说：“你们哥俩儿就像一对儿等待残渣剩饭的狗。”

陪审团最终裁决斯特曼的经营色情物品的罪名不成立。一个月后，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俩人也加入了克利夫兰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就像美国国税局犯罪部门领导理查德·C. 瓦塞格(Richard C. Wassenaar)后来承认的那样，税法在打击色情时比色情法更有效。罗斯菲尔德加入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后，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罗斯菲尔德成为负责这件案子的特工，直接受财政部和司法部高层的主管。大陪审团也签发了许多传票帮助他们取得证据。

罗斯菲尔德决定将斯特曼带到小组留下他的笔迹和签字，因为罗斯菲尔德认为那些笔迹可能在以后的调查中有用，况且笔迹存档也只是为数不多的、法律允许的、能强令斯特曼执行的取证



手段。罗斯菲尔德、斯特曼俩人终于在同一间办公室会面了，头戴牛仔帽、叼着大雪茄的斯特曼年近50岁，曾经应对过无数次FBI探员、美国武装警察、风纪警察和检察官的审讯，而眼前这个年轻的美国国税局特工至少没有折磨或威胁他。但是斯特曼傲慢的表现却令罗斯菲尔德非常难堪，这次见面询问完全像是开玩笑，而且斯特曼在回答问题时的语气尽显讽刺挖苦之意。小组的法律专家曾经对罗斯菲尔德保证一个人很难完全伪装自己的笔迹，但是斯特曼留下的笔迹毫无法律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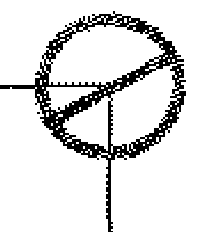
克利夫兰大陪审团给鲁本·斯特曼的雇员、他的秘书和前妻发了传票，进行调查取证，可是没有一个人提供斯特曼的犯罪证据，大陪审团一无所获。斯特曼在公司内部已经营造出非常忠诚的氛围，号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精诚团结，共同应对他们公共的敌人，即美国政府。斯特曼不仅给自己的员工支付诉讼费，而且也替那些同样被指控的代理商们支付诉讼费。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为斯特曼工作的人和代理商被判罪名成立投进监狱。罗斯菲尔德没能从斯特曼的助手和雇员那里得到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他决定转而搜寻斯特曼在瑞士银行账号的资料。1979年4月起，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夜以继日地在“加庇多国家银行”（Capitol National Bank）地下室核查斯特曼公司的银行缩微胶片记录，希望可以发现一些海外账号的证据。他们仔仔细细地审查了成千上万的注销支票和存钱票据，丝毫不敢存有侥幸心理，连续奋战了六个月。

刮走奶油

1975年，FBI突袭搜查“君主新闻”公司后，鲁本·斯特曼开始改变公司的股东结构，被政府没收的详细公司资料转眼间

就成了废纸，资料中涉及的法人和股东们瞬间就蒸发了。鲁本·斯特曼发明了隐藏资产的好办法，关系错落的加拿大籍法人使得公司从属关系混乱，调查人员几乎很难下手。在纽约加登城律师迈尔斯·雅各布森（Miles Jacobson）的帮助下，斯特曼把他的公司转变成了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商业机构，例如，阿兰蒂投资公司（Arandee Investment Establishment）、伊利亚公司（Eliat Establishment）等等，这些变脸的公司依旧保留着各自的瑞士银行账号。列支敦士登号称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公司保密法。这种公司（Establishment）不像通常的商业实体，既不是法人团体也不是企业联合，董事必须是列支敦士登的公民，公司发行“不记名股票”，某个持有“不记名股票”的人拥有这个商业机构。董事们可能知道拥有者的身份，如果他们不透露信息，那么政府调查员就必须调查所有的“不记名股票”的持有人才有可能挖掘出真正的“法人”。雅各布森帮助斯特曼在巴拿马也建立了类似的公司，因为巴拿马的公司保密法更严格，并且外国投资的公司还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更有甚者，就连斯特曼在谢克海茨的家产也变成了一家外国公司的固定资产。

早在1974年斯特曼就预见到科技的创新能改变色情物品的发行方式，并预言色情片的“未来一定是音像合一的录像带”。果不其然，三年后，卡式录像带流行开来，美国的色情电影制作公司很快就生产出色情卡式录像带，而此时好莱坞的影像公司还在抵制录像带这一新生事物。到1979年，75%的卡式录像带都是“硬核色情片”，可以说“硬核片”造就了卡式录像机（VCR）在美国的巨大成功。斯特曼立即推出自己的录像带格式的电影，在美国中西部成立了经营主流视频产品的连锁店，还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中央录像”（General Video of America）的公



司，在它下面成立了许多家发行公司。很快“美国中央录像”就垄断了美国“硬核片”的批发市场。斯特曼与荷兰合伙人又在荷兰成立了“因特克斯荷兰”公司（Intex Nederland），同样取得了成功，这家公司成为西欧最大的“硬核片”分销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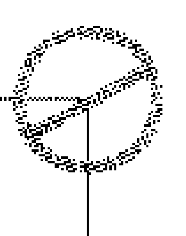
在1978年，斯特曼在克利夫兰打赢了淫秽指控官司之后四个月，又受到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大陪审团的非法经营色情物的指控。一名联邦法官随后驳回了对斯特曼的指控，原因是斯特曼受到双重指控。随后在1980年2月14日，斯特曼又受到迈阿密联邦大陪审团的指控，同一天，400名FBI特工逮捕了45名色情业的“名人”。FBI经过两年半的秘密调查取证，在“情人节”这天开始了代号为“迈普恩”（Miporn）的抓捕行动。对那些色情出版发行商来说，“情人节”变成了对色情业的集体大屠杀日。对斯特曼还有其他罪名的指控，不幸的是，这次对斯特曼和其他人的指控再次流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名FBI秘密特工曾因入店行窃被捕并在庭上作伪证，所以陪审团认为这名特工在法庭上对这次色情案件的证词不能令人信服。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对斯特曼的五次指控都无功而返。

1970年代末，斯特曼再一次调整了控股公司的结构，中止了与迈尔斯·雅各布森律师的合作关系。因为列支敦士登已经修改了公司法，那里的律师费用大大增加，商业机构的董事必须对机构的财务行为负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迈尔斯·雅各布森的一个表兄未经斯特曼的允许擅自挪用59万2千美元。那时候，他的表兄负责斯特曼的一些海外账号。斯特曼在弃用迈尔斯·雅各布森并要回那些钱后，又找到一位住在日内瓦的美籍律师爱德华·小库格林（Edward Coughlin Jr.），库格林是位彬彬有礼的哈佛毕业生，擅长构建非常规的国际化公司。库格林随后帮助斯特

曼解散了列敦士登和巴拿马的公司，在利比里亚成立了“跨欧电影公司”（TransEuropa Films）、“安佛罗有限公司”（Amphora Limited）、“社会商业金融家公司”（Société Financiers et Commerciales）等多家公司，并将原来公司的资产转进了新建立的公司，新公司的银行账号依旧开在瑞士。利比里亚的公司保密法相当严格。在利比里亚，只需一名持有不记名股票的董事就可以注册公司，而不是二三位，而且美元是利比里亚的流通货币。这就是为什么日后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成为鲁本·斯特曼全球色情帝国总部的原因。

新公司的架构非常适合斯特曼的多项要求。实际上，斯特曼那时正在大规模逃税。多年来，他已经抽出美国境内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投币机收入，大约有25～50%的投币机收入直接送到他这里。雇员们把这些钱叫做刮走的“奶油”，雇员们每天或每星期都用保险箱把刮掉的“奶油”送到斯特曼在克利夫兰的办公室，再用公文包和皮箱将现金走私到欧洲，或将现金换成面额小于一万美元的支票寄到欧洲以逃避联邦举报法。这些丰厚的“奶油”到了斯特曼的海外公司后，或进行再投资或者投回美国再组建新公司。斯特曼在英国用现金购买了劳斯莱斯豪华轿车，并用现金支付律师费用，这种以现金方式的支付手段比用支票合适，因为收钱的人不必再去上税，所以斯特曼支付的现金就可以少一些，而律师和卖车的公司也能增加些收入。除了上述大家都接受的利益动机，斯特曼还认为缴税就等于资助他的敌人——政府，政府还要用他交纳的税金找他的麻烦。

斯特曼在许多家著名的瑞士银行里用假名开了许多的账号，例如，瑞士联合银行里的户头名字是“保罗·舒策”和“罗伊·C. 英格利希”，瑞士银行公司（Swiss Bank Corporation）里



的户头名字是“罗伯特·巴特勒”和“罗伯特·斯特恩”。瑞士银行公司的一名高级副总裁是斯特曼的私人银行助理，负责料理斯特曼在外币和黄金上的投资，他们定期在银行的豪华办公室里开会讨论投资项目的进展。少数几个深得斯特曼信任的下属也用假名字在瑞士银行开设了账号。斯特曼经常在苏黎世、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之间转移大笔的资金。斯特曼的欧洲企业也采用类似在美国刮掉一层奶油的做法，同样产生了大量未申报的、也需要“洗钱”的现金。最可笑的是，1979 年鲁本·斯特曼在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单（1040 表）上填写的除去花费的总收入仅仅只有 1237 美元，在海外银行账户信息这一栏中，他填写的是“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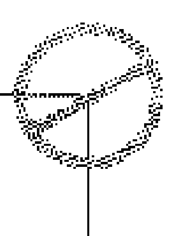
大功告成

通常一项正常的美国国税局犯罪调查大约只需要 18 个月。理查德·罗斯菲尔德对斯特曼的调查已经进入第三年，他的上级开始不耐烦了。虽然“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的成员已经对长期复杂的调查习以为常，但是美国国税局的官僚们还是有些急功近利，急于得到结果。理查德·罗斯菲尔德自己感觉到调查已经步入正轨，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可以证明斯特曼触犯法律的确凿证据。罗斯菲尔德的朋友和合作者开始嘲笑他的工作，他们都清楚为什么斯特曼这么努力地工作——因为他正在赚大钱，他们不理解，因为那个还不到一次圣诞舞会费用的零头的斯特曼的年薪税单，罗斯菲尔德居然整天在银行的地下室里研究微缩胶片。罗斯菲尔德非常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他的调查一定能取得成功。

托马斯·谢安斯基走进罗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时，小憩的罗斯

菲尔德把一张兑现的支票影印件放到桌子上说，“大功告成”。这是一张从“商人和船主银行”（Merchants and Shipowners Bank）开出的20万美元的支票，那家银行是在加勒比海圣文森特岛注册的。兑现的支票显示从一家海外银行汇入斯特曼的一家公司20万美元，没有汇入20万美元的相关理由和汇款者的信息。罗斯菲尔德和谢安斯基马上返回加庇多国家银行的地下室继续工作，下午又发现至少三笔从海外账号汇到斯特曼美国公司的钱。

罗斯菲尔德通过调查发现，圣文森特的“商人和船主银行”，即没有职员也没有分支机构，甚至一个保险箱都没有，它的资金都在纽约一家银行的账户里，这只是一家纸上的银行。汇入这家银行的钱是“阿兰蒂投资公司”通过瑞士联合银行汇出的。通过银行的相关证据，罗斯菲尔德发现了迈尔斯·雅各布森。在调查迈尔斯·雅各布森时，迈尔斯·雅各布森依照受托人与律师的特权原则拒绝回答关于海外账号和鲁本·斯特曼的问题。这就是鲁本·斯特曼的过人之处，早就预见到这个特权协议可以为委托人保密，可以阻止对他本人的调查。事到如今，迈尔斯·雅各布森律师的态度成为了本案的关键，他如果拒绝回答，本案的调查很可能就无疾而终。罗斯菲尔德决定对迈尔斯·雅各布森施加压力，警告他一旦斯特曼的欺诈行为被揭穿，即使从前做过斯特曼的律师，也不能逃脱干系，会被一并定罪。罗斯菲尔德开始相信流行在税务律师中的一句格言：如果必须有人进监狱，那一定是委托人。迈尔斯·雅各布森终于开口说话了，详细描述了如何帮助斯特曼在瑞士开立假账号、组建影子公司、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及为何洗两次钱，第一次通过瑞士银行，然后再通过圣文森特的银行进行洗钱，其目的只是加大被追踪到的难度。



罗斯菲尔德已经掌握了斯特曼在瑞士银行的账号，下一步该做的就是对它们进行调查，查看这些账号的资金，以及证明这些账号和资金都属于鲁本·斯特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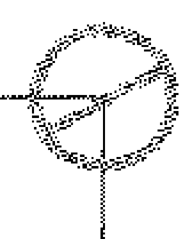
按照瑞士银行数十年的保密法，刑事调查人员不可能调查瑞士银行账户的情况。如果瑞士银行的职员透露储户的身份，他将会面临监禁和巨额罚款的处罚。银行保密法是瑞士爱好中立和尊重个人权利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保证个人的权利，所以瑞士成为了流亡者和被迫害的少数民族的天堂。可是现实中，瑞士的保密法也保护了世界上许多独裁者的财产、毒品犯的非法所得和犯罪分子掠夺的巨额收入。二次大战的幸存者不断地游说瑞士政府，要求瑞士银行将纳粹掠夺的财产归还他们，可是他们多年的努力都没有成功。1973 年，美国和瑞士联邦政府签订了《双方互助条约》，瑞士政府第一次同意允许调查银行的秘密账号，调查的前提是该嫌疑人涉嫌参与严重的犯罪行为。然而瑞士政府不认为逃税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此项条约不允许调查逃税者的账号信息，除非该逃税者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高层人物”。

当罗斯菲尔德了解到该条约里有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例外”条款后，马上联系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以寻求帮助。结果有些令人沮丧，相关人员告诉罗斯菲尔德，条约上确实存在这个“漏洞”，但是自从互助条约签订以来，瑞士政府从来没允许任何人使用过这个权利。现在是否能得到调查斯特曼账户的许可已经成为罗斯菲尔德调查的关键。那些账号可以提供斯特曼逃税和洗钱的确凿证据，因为斯特曼在个人所得税申报单上故意漏掉海外账户的做法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在美国国税局打击犯罪行动组的帮助下，罗斯菲尔德准备了一份斯特曼涉嫌联系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卷宗，司法部也向瑞士联邦司法部和警察部门递交了

一份正式申请函，请求它们同意美国国税局调查斯特曼的那些可疑的瑞士银行账号。这次，一向先知先觉的斯特曼对此事一无所知。

同时罗斯菲尔德也得到苏格兰场的帮助，那时刚担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在掀起一场打击色情产业的运动。《隐蔽的眼睛》（Private Eye）第一次详细报道了鲁本·斯特曼在伦敦性产业的投资，因为恰巧一家“约翰逊医生”商店就开在该杂志社办公室的楼下。英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非常震惊：一个来自美国克利夫兰的商人居然垄断了伦敦的色情产业。罗斯菲尔德得知英国当局正在调查斯特曼的英国公司，马上与苏格兰场取得联系寻求合作。不久，苏格兰场的第三号人物莱恩·吉拉德（Len Gillard）和负责智能犯罪部门的头头科恩·考克斯尔（Cohn Coxall）飞到克利夫兰与罗斯菲尔德见面，吉拉德对罗斯菲尔德说：“我们接到上方的指示，将斯特曼先生的企业从英国驱除出去”

罗斯菲尔德得到英国的授权核查斯特曼英国公司的银行账户，经检查发现账户里有上百万美元。这些钱都是以现金方式存入的，显然现金是走私到英国的，但遗憾的是，账户的名称并不是斯特曼本人。随后，罗斯菲尔德成功地利用美国和瑞士的合作条约“漏洞”获得了瑞士政府破天荒的一次授权。瑞士政府通知银行官员，第一，不能将此事通知斯特曼；第二，透露出此事的任何人都将受到犯罪指控。银行方面颇感为难，这种做法既违背了瑞士银行业的传统，也违背了对储户保密的承诺准则。银行一直对罗斯菲尔德开放那些指定核查的账户，同英国的检查结果如出一辙，没有一个账号是斯特曼的名字，甚至他的名字都没出现在用于授权提钱的签字卡上。罗斯菲尔德确信这些账号就是斯特



曼的账号，但是他需要一个斯特曼手写的签字样本，才能证明这一切。以前斯特曼曾经多次被带到警局做笔迹存档，在几个小时的交锋中，斯特曼表现得相当傲慢无礼，还开着粗鲁的玩笑，最终留下的潦草笔迹毫无法律价值。

长期监禁的恐惧

鲁本·斯特曼对美国国税局正在调查他在克利夫兰、伦敦和瑞士的银行记录浑然不知，但他还是感觉到来自罗斯菲尔德调查的压力越来越大，斯特曼告诉朋友，他打算退休了。斯特曼呆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爱上了年轻美丽的女歌手内奥米·德尔加多（Naomi Delgado），她发行过一张嘻哈风格的西班牙语专辑。他们后来结婚了并有了一个孩子。斯特曼开始把他的公司转卖给高层经理，底特律的“宏伟新闻”公司卖给了詹姆斯·奥尔萨斯基，芝加哥的“首都新闻”公司（Capital News）转给保拉·劳伦斯，克利夫兰的“君主新闻”公司交给了梅尔·卡明斯（也称为梅尔文·卡明斯基）。斯特曼面临一个不同寻常的局面：如何将一个在法律上不属于自己的公司卖给别人？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就能用聪明的法律手段解决掉。那些公司所属权转到斯特曼的经理名下后，然后这些公司再聘请斯特曼作为公司的“顾问”。看上去，斯特曼似乎想逐步淡出江湖，把权力过渡给新一代的管理者，然后独享天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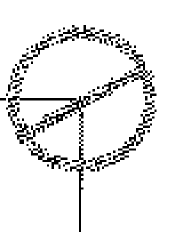
不过，政府的调查员都认为斯特曼退休只是他变相控制公司的另外一个花招而已，顾问协议似乎也只是另外一种继续使用“影子”的手段。多年以来，斯特曼的经理们都是那些对他感恩戴德、一味服从的人，他们不可能突然间不再服从这位性产业的巨人斯特曼的管理。他们成为那些公司的合法所有者之后，就必

须承担法律风险。打击罪犯小组的检察官曾经对斯特曼的一个经理说过，你们这些新所有者就是替罪羊，“你们这些傻瓜，只是傀儡而已，傻到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这个经理微笑着回答，“你才是傻瓜！我一年挣两三百万，你敢叫我傻瓜？”

在 1981 年 11 月，在英国照看斯特曼生意的斯科特·多尔曼（Scott Dormen）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被海关人员扣留。斯科特·多尔曼负责斯特曼在英国的业务，与斯特曼分红，掌管多家成人书店和电影院、“夜猫子杂志”娱乐出版公司和“黄色录像”分销公司。斯科特·多尔曼接受了几天的询问后，被要求离开英国。他和另一位斯特曼的雇员带着一个超过 24,149 英镑现金的公文箱飞到阿姆斯特丹，海关申报单的规定是凡带有超过 100 英镑的现金必须向海关申报，他们如同往常一样，漠视海关的相关规定没有申报所带的现金。几个月后，多尔曼为了寻找并训练一个他的下一任人选又偷偷潜回英国。不久，警方逮捕了多尔曼并且指控他犯有合谋进口淫秽色情物品罪。后来，多尔曼在某天晚上乘船逃离了英国，安全抵达荷兰，但他在英国的财产统统被没收了。

随后鲁本·斯特曼被缺席指控在英国销售色情文学罪，他的英国合作伙伴也受到同样的指控。本·霍洛韦和他的四个孩子都被关进了监狱，本·霍洛韦的妻子玛丽还继续在卢顿的家族的性商店工作。

1982 年，斯特曼例行公事地飞到瑞士联合银行苏黎世分行准备取消一些账号，此刻的银行官员们非常紧张，不知该如何处理。他们通报了瑞士联邦警察，警察把斯特曼在银行的消息通报给克利夫兰的罗斯菲尔德。聪明的罗斯菲尔德问瑞士警察能否尝试让斯特曼留下笔迹。警察在银行逮捕了斯特曼，并留下了真实



有效的笔迹。斯特曼很快就意识到美国政府已经以某种方式调查了他的瑞士银行账号。警察也强迫用过那些账号的斯特曼的助手留下笔迹，美国国税局还询问为什么多年都没有用过某些瑞士银行账号。斯特曼不明白罗斯菲尔德从哪里得到的瑞士账号，他认为美国国税局可能已经掌握了指控他的证据，可是他并不准备轻易承认失败。

克利夫兰的联邦大陪审团发传票给斯特曼，要求调查其商业记录。自从 1975 年，FBI 搜查斯特曼办公室之后，涉及商业纪录的机密文件就从不放在办公室里，斯特曼将它们分别存放在律师办公室、会计母亲的车库、女管家地下室的油漆桶等地方，其他可能被政府利用的文件也分别藏匿起来。当斯特曼开始用碎纸机销毁这些重要文件时，他开玩笑似的对秘书说了一句“我可能会后悔的!”。另一轮销毁文件的时间至少持续了三个星期。之后，一份全新的、在时间上可以回溯的商业记录送到了斯特曼在美国的每一家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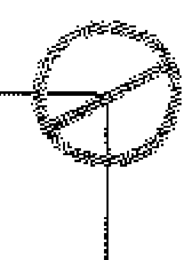
罗斯菲尔德的调查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穿梭于伦敦、苏黎世、纽约和洛杉矶，对斯特曼的助手和合作伙伴进行调查。同时，其他法律部门例如 FBI 部门、检察官、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别行政区的风化警察和苏格兰场的警官也都给予了罗斯菲尔德非常宝贵的帮助。他们热心帮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扳倒鲁本·斯特曼，而且并不仅仅因为鲁本·斯特曼垄断了国际色情业，重要的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享受嘲弄并蔑视法律和政府的乐趣。

出于对长期监禁的恐惧，斯特曼的心腹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和政府合作了。罗斯菲尔德从基层向上层开始接触，从投币机修理员、店面经理和公司会计那里得到了不利于斯特曼的证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为斯特曼工作多年，有些人还是斯特曼儿时的

朋友。斯特曼的前私人秘书玛乔里·罗林斯（Marjorie Rollins）提供了致命的证词，她和斯特曼是约翰·亚当斯高中的同学，1966年，她成为斯特曼的私人秘书，她在50多岁时做了祖母，一直是斯特曼家的亲密朋友。第一次大陪审团起诉斯特曼时，罗林斯曾经拒绝与法庭的合作，但是后来，斯特曼和罗林斯大吵一架，斯特曼认为玛乔里·罗林斯出卖了他，于是解雇了罗林斯。心怀不满的罗林斯给政府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记录，证明斯特曼如何操纵他的帝国。在那些变节者中，斯特曼的律师，也是最近的心腹伯纳德·伯克曼（Bernard Berkrnan）因病突然死亡。

1985年6月28日，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宣布克利夫兰大陪审团指控鲁本·斯特曼一项共谋欺骗政府罪、一项妨碍司法罪、五项所得税逃税罪、五项虚报收入罪、四项货币申报和海外银行账号违规罪。斯特曼的五个合伙人包括他的儿子大卫也同时被指控。法庭指控斯特曼在1978～1982年个人所得税逃税金额超过300万美元，通过转到海外银行而漏税的金额超过700万美元，而且接到传票后还销毁证据。斯特曼将面临最长75年的监禁和巨额罚款。首席检察官埃德温·米斯三世高度称赞克利夫兰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和美国国税局之后，还感谢了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诸如，苏格兰场、瑞士联邦警方、国际刑警组织、美国海关、加拿大皇家骑警、安大略地方警局、加拿大税务署、英国税务局、苏黎世警方、波士顿警方、旧金山警方、洛杉矶警方、华盛顿特别行政区警方、烟酒武器管理局、FBI、移民局和邮政管理局等部门。

理查德·罗斯菲尔德对斯特曼的案件不存在过多的幻想，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将斯特曼每一项罪行和所有的海外账户都揭露出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案件太复杂，很难完全处理清楚或彻底了



解。可是关于政府对斯特曼的指控，罗斯菲尔德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知道斯特曼实际上逃税的金额至少超过法庭指控的十倍，可是重要的是法庭指控的金额很容易得到验证，因为如果陪审员怀疑一项指控，他们可能就会怀疑其他指控的真实性，就会影响对斯特曼的有罪判决。罗斯菲尔德已经找到了数十个斯特曼在瑞士的银行账号，可能还有许多未发现的账户，但是罗斯菲尔德并不介意漏掉一些，因为只要能将斯特曼定罪投入监狱，那些账户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斯特曼是在洛杉矶被逮捕的，还轻松地交了300万的保证金。以J. 迈克尔·墨里（J. Michael Murray）为首的律师团立刻反驳法庭的指控。随后的几年里，有数百次的辩论申请指责政府调查的合法性。罗斯菲尔德的伙伴托马斯·谢安斯基感觉漫无止境的辩论很难让斯特曼伏法，对自己的努力再一次付之东流很灰心，他离开美国国税局。当斯特曼的律师了解到罗斯菲尔德如何调查斯特曼的瑞士账户后，力争要求法庭不得使用从瑞士得到的银行证据，并对联邦法院和瑞士法院系统提出诉讼。他们强调“双方合作协议”被曲解使用、斯特曼有权力知道自己被秘密调查，而且斯特曼的名誉遭到不公平的诽谤，因为斯特曼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没有一点联系，而美国国税局正是利用这一点不合法地使用了“双方合作协议”的相应条款，并触犯了斯特曼账户的隐私权。斯特曼也在一个书面陈述上发誓：“我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是犯罪组织的成员，而且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犯罪组织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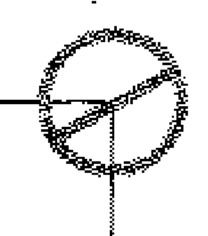
一名联邦文职官员出示了若干司法部转给瑞士政府的秘密文件，里面描述了斯特曼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关系。如果法庭认可这些文件，认定美国政府的行为合法，那么斯特曼这回就

死定了。但是如果法庭允许斯特曼对这些秘密文件解释，而斯特曼又能够证明文件的内容有问题，那么法庭对斯特曼的所有指控可能在顷刻间就会轰然倒地，土崩瓦解。

给黑社会上贡

色情业的反对者坚称色情产业受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控制。1973 年美国《读者文摘》的一篇报道也宣称“除了给警察和政客上贡外，黑社会头领也证实如果色情产业的老板不给当地的黑帮“家族”保护费，那些色情杂志、“硬核片”或是投币放映机就休想进入他们的地盘。”另外，“色情联盟被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五大黑帮家族轮流控制，他们不仅决定谁可以制作色情作品，也决定什么类型的色情物品可以发行。”1978 年 FBI 相关的报告也有同样的观点，并指出“显然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直接掌控色情产业，而黑帮头目间接控制色情产业。”FBI 的调查结果证实色情业已经成为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第三大收入来源，仅次于赌博和毒品。

多伦多的心理学家，大卫·亚历山大·斯科特（David Alexander Scott）的理论对米斯委员会的影响很大，他指出黑社会之所以进入色情业就是为了推广其“变态就是正常”的理念，进而带动黑社会其他生意的收入，比如色情业可以增加毒品和肉体交易的收入。斯科特相信存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由纽约的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五大家族控制的“全国性的色情联盟”，洛杉矶警察机关（LAPD）的高级官员也相信这一理论，他们认为鲁本·斯特曼只是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一个马前小卒。在赴米斯委员会作证之前，洛杉矶警察机关的长官达雷尔·盖茨（Daryl Gates）也曾经表示过，大约 90% 的色情业受到黑社会的



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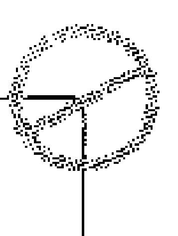
然而研究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专家们则倾向弱化黑帮在色情业的作用，因为一个总统委任的调查委员会在 1986 年公布的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中曾经列举过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 18 项主要收入来源，色情业并不在其中。应米斯委员会的请求，FBI 局长威廉·H. 韦伯斯特（William H. Webster）对 FBI 各地办事处进行了调研，四分之三的办事处都证实，在色情行业里不存在黑社会敲诈勒索的确凿证据，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有组织犯罪进入了色情业。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罗纳德·古德斯塔克（Ronald Goldstock）在 1980 年代曾负责纽约武力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他也对我说过，色情业从来没有进入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前十二个收入来源。1980 年代纽约 FBI“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的负责人詹姆斯·克斯勒（James Kossler）也同意罗纳德·古德斯塔克的观点，姆斯·克斯勒对这个问题绝对有发言权，正在他的领导下才得以摧毁甘比诺家族并逮捕了其首领约翰·戈特（John Gotti）。

毫无疑问，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成员介入了色情业，他们资助“硬核片”的制作，经营零售店并尽其所能敲诈勒索独立制作商。但是黑社会的介入并不意味着色情产业由黑社会控制。性产业在法律边缘蓬勃发展，吸引着各色人物的参与，其中有些是黑社会成员，有些不是。在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心脏——纽约，这些犯罪家族通过房地产从色情业赚取了巨大的财富，他们把地产出租给成人书店、脱衣舞俱乐部和按摩院。显然与黑帮成员做生意并不意味着受到黑帮的控制，与黑帮的关系可能是很平常的，当然也可能存在非法的关系。正像罗纳德·古德斯塔克解释的那样，“一个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成员去理发，

并不意味着他拥有这家理发店。"

斯特曼和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有关联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特曼和罗伯特·迪贝纳多的关系。罗伯特·迪贝纳多早期是甘比诺家族的成员，后来成为约翰·戈特的高级助手之一。罗伯特·迪贝纳多在长岛休利特港过着宁静的生活，平时非常溺爱孩子们，也是美国少年棒球联赛的教练。除周末外，迪贝纳多每天上午都去曼哈顿上班。那里有他经营的"明星发行公司"，是纽约最大的色情公司，出版自己的性杂志和少量的"硬核片"录像带，在靠近"小意大利"的拉斐特街运营着一个大型仓库。迪贝纳多在纽约第四十二街还拥有一家"秀界中心"，是纽约最出名的性百货商店。迪贝纳多在性产业中的影响力比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大得多，他经常出面摆平那些争夺地盘的"纠纷"。他在敲诈非法劳力的收入上也颇为丰厚，由于他对建筑业的敲诈勒索也使得他声名显赫。罗伯特·迪贝纳多本人看上去十分英俊潇洒、温文尔雅，穿着完美而又令人敬畏。

法庭公布的斯特曼参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证据看起来像是传闻，不那么令人信服，1978 年 FBI 着重强调了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色情业收入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斯特曼"在迪贝纳多的帮助下几乎全面接管了色情业"，当然迪贝纳多的"帮助"指的是对斯特曼对手的威胁和恐吓。斯特曼"新英格兰新闻公司"（New England News）的合作伙伴约瑟夫·帕拉迪诺（Joseph Palladino）是波士顿出名的色情产品批发商，与雷蒙德·帕特利亚尔卡犯罪家族（Raymond Patriarca's）有密切联系。但是数十年负责色情案件的 FBI 传奇特工霍默·扬（Homer Young）确信，斯特曼一直不断努力杜绝黑社会进入色情业，据霍默·扬讲，斯特曼曾经在 1979 年加利福尼亚州敲诈勒索案中



出庭作证，指证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成员。斯特曼当时在法庭上陈述，有两个人在克利夫兰基督教青年会门前截住他并威胁他会有“很大的麻烦”，要他每个月交2万美元的保护费，而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斯特曼的法庭证言帮助FBI消灭了洛杉矶的唐多米尼克·布鲁克莱尔犯罪家族（don Dominic Brooklier）。多米尼克·布鲁克莱尔家族的高级成员，后来成为FBI告密者的吉米·费拉蒂安诺（Jimmy Fratianno）却认为鲁本·斯特曼之所以不理睬洛杉矶黑帮的威胁，是因为斯特曼为了求得保护已经把上百万美元的保护费交给了更有权势的纽约黑帮家族。

现在看来，法庭公布的材料不足以证明斯特曼曾经给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上过贡，也不能证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收到了斯特曼上交的保护费。有25年调查色情案件经验的FBI退休探员威廉·P. 凯利（William P. Kelly）是通过“迈普恩”行动开始了解迪贝纳多的，他目前为许多反色情的组织提供咨询。他不认为斯特曼是“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马前卒，至于斯特曼是否上贡给甘比诺家族，凯利说：“如果他上贡了我不惊讶，我倒是惊讶他为何不上贡？”在许多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实力强大的城市里，斯特曼都有很多业务。假设斯特曼确实给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上贡，回报是什么呢？还是和其他合法商人一样，他也是一个深受勒索的受害商人呢？不过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罗伯特·迪贝纳多和鲁本·斯特曼的关系确实不错，迪贝纳多每年都参加“君主新闻”公司在克利夫兰市举办的圣诞舞会，他在这个盛大晚会上的出现的确给斯特曼带来了好处，因为这会给那些觊觎斯特曼的人一个暗示：有我，休想轻易妄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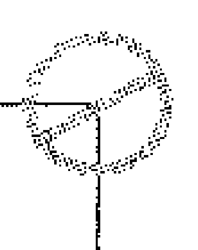
也许世上只有斯特曼和迪贝纳多两个人知道他们关系的真正

性质，然而其中一个当事人迪贝纳多再也不能透露任何细节了，他的下场很惨。迪贝纳多曾经犯了一个错误，对别人讲了一个关于约翰·戈特的笑话，遗憾的是约翰·戈特不能欣赏他的幽默，只说了一句“把他办了”。1986年5月的一天，正在等咖啡的罗伯特·迪贝纳多被他的朋友射中两枪，全部击中后脑。这还不算完，家人连他的尸体都没有找到。据一个联邦特工讲，锯木头的机器粉碎了迪贝纳多的尸体。

一起逃税案，仅此而已

认真研究美国和瑞士联邦政府之间的《双方互助条约》并仔细审查司法部递交瑞士政府的申请函后，地方法官大卫·S.佩雷尔曼（David S. Perelman）在1986年12月21日建议，允许斯特曼接触那些指证他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有关系的文件。为了能利用条约里的“漏洞”，政府必须证明被告“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名高层人士”，或被告“很明显地参与了这个组织的犯罪行为”，而且还必须证明这一指控应该对这个犯罪组织具有“明显的不利影响”。佩雷尔曼指出，如果政府不愿意透露斯特曼的信息，会被人怀疑政府指证的准确性。他在报告里还指出，“拒绝被告人质询美国政府是否遵循国际条约来搜寻自己的犯法证据的做法，有悖于法律的基本准则。”当美国地区法官乔治·W.怀特看完他的报告后，只回复了简单的批示“拒绝”。

斯特曼的律师们被怀特的决定激怒了，并且立刻上诉，而克利夫兰市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门的成员们都非常高兴，《双方互助条约》没有义务让政府给被告出示用于调查他/她瑞士银行账号的证明，克利夫兰市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门不愿意为鲁本·斯特曼开一点方便之门。司法部也对卷宗里信息的准确性非常自



信，如果让斯特曼看那些材料，只会增加更多的上诉借口，并且可能长时间地拖延最终审判。在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门的检察官眼里，只有侵犯了一点人权，侵犯了把钱存到瑞士秘密账户的权利，司法部也不会有一个人因为侵犯斯特曼把钱存到瑞士的权利而失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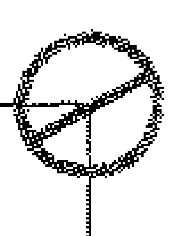
当诸多申请和上诉递交到瑞士和美国法院的时候，斯特曼又一次遭到来自拉斯维加斯州的指控。1987 年 10 月，首席检察官米斯宣布了此次指控，并且使用了针对色情战争的新武器——《敲诈者影响并腐蚀组织法案》（*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RICO Act*）对斯特曼提起诉讼，指控他触犯联邦色情法。该法案在 1984 年增加了关于色情亵渎罪等若干条款，加大了政府在处理这些案件时的权力。如果斯特曼和他的同伙在《敲诈者影响并腐蚀组织法案》下罪名成立，政府就可以将他们的色情收入以及投币放映机、色情片、内华达州的 12 家资产、14 个公司、7 家零售店、16 万 2 千美元的现金和支票、两辆奔驰、三辆卡迪拉克和一辆福特全部没收，可能还会判处斯特曼 55 年监禁和 200 万美元的罚款。这次指控的证物是市场上的“硬核片”盒式录像带，这些录像带含有交媾过程中便溺的镜头、虐待镜头和男女与动物交媾的镜头。

同年，克利夫兰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又给罗斯菲尔德安排了新助手克雷格·S. 莫福德（Craig S. Morford），他们共同处理斯特曼逃税案。27 岁的莫福德是美国国税局的律师，至今还没处理过大案。莫福德到打击小组的办公室时，看到面前有数百个文件箱，装满了 1960 年代至今的业务档案、许多海外账户的银行记录、存款单据、大陪审团 7 年的档案、最近从斯特曼女管家地下室发现的文件以及从斯特曼会计的母亲的车库发现的文件。罗

斯菲尔德和莫福德必须分析全部记录，并找出哪些可以用来作证据。他们两人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整理全部记录，他们还必须想办法把这些晦涩的记录转换成法庭的格式，让陪审员们看懂，让他们了解斯特曼的犯罪过程。莫福德是个朝气蓬勃、韧劲十足的高个子小伙，身高大约 6 英尺 7 英寸，足足比罗斯菲尔德高出一英尺。俩人的身高相差悬殊，但在工作上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而且都充满了取胜的信心。

在大陪审团最初指控斯特曼四年之后，直至 1989 年 9 月才提起对斯特曼的逃税指控。克利夫兰市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的负责人史蒂芬·H. 吉格尔（Stephen H. Jigger）针对这次对斯特曼的指控代表政府做了开场白：这次的指控与色情法和言论自由无关，只是逃税案，仅此而已。斯特曼的律师 J. 迈克尔·默里辩称由于政府在文化领域大战中采取扼杀的态度，试图摧毁一个无辜商人的生计，所以当事人隐蔽资产的行为不具备犯罪的倾向，只是单纯的自我防御行为。但是政府的两个证人，苏黎世警察局的阿尔佛雷德·格拉夫和沃尔特·布蒂警官的证词削弱了默里辩词的可信度，当时两名瑞士警官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们 1974 年曾经在瑞士信用银行外逮捕了斯特曼，斯特曼随后在警察局解释他为何使用假护照开办银行账户时的原话就是“我带着钱到瑞士……为了避税。”

庭审中共有 90 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大部分是斯特曼的前雇员。詹姆斯·奥尔萨斯基在 1971～1984 年曾经是斯特曼的会计师，后来成为“密歇根发行网络公司”的法人，他在法庭作证时陈述了斯特曼的逃税行为。公司利润丰厚后就开始虚报纳税收入，而且斯特曼从没想过交一分钱的税，他不断地用降低库存、注销应收款项和加大不存在的费用等方法给书店做资产损益



表。奥尔萨斯基还讲述了他偷运“奶油”时心惊肉跳的经历。那一次，他用公文箱装了23万美元现金通过机场安检从芝加哥飞往克利夫兰。斯特曼的另一个会计师A. 罗伯特·多斯特尔（A. Robert Dostal）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在庭上作证揭露如何为斯特曼的公司寻找“影子”法人和高级经理。那时的方法非常简单，只是拿本“黄页”（电话名录）随意翻几页，随便找个人名就把他/她加进公司档案、纳税收入表，用他/她的名字去银行开账户，那些选中的人丝毫不知自己从法律上已经成为鲁本·斯特曼色情帝国的高级主管了。与罗伯特·多斯特尔相比，斯特曼的前秘书玛乔里·罗林斯挑选“影子”的办法就略显文学色彩，从她喜欢读的小说中寻找合适的人选，斯特曼一家公司的支票签字人查尔斯·康韦的姓就是《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Lost Horizon*）主人公的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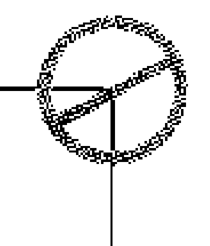
许多斯特曼的律师都免遭指控并且出庭指证斯特曼。埃德华·库格林曾经得意洋洋地向陪审团讲述了如何利用利比里亚错综复杂的公司法建立海外公司，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斯特曼的好感。已故的伯纳德·伯克曼的律师伙伴拉里·A. 戈登，在莫福德的质问下不得不承认了欺骗美国国税局的所作所为。迈尔斯·雅各布森也披露了一些他们如何在瑞士银行间转存现金而不留下证据的方法，讲述了他和斯特曼长子的故事。他们两人从“沃茨沙福特银行”（Wirtschaft Bank）取走近40万美元的现金和金条，把钱放在背包里，金条放到纸板箱里，沉重得只能用手推车推出银行，再乘出租车去瑞士联合银行转存钱和金条。

虽然斯特曼感觉这次前景不妙，但依然表现出一付胜券在握的架势。他在法庭上也是一付格劳乔·马克斯的装扮，假眉毛、

一付大眼镜还带了一个塑料假鼻子，以防范摄影记者，他的妻子则是短式宽松上衣加超短裙出现在法庭，性感的着装经常惹人议论纷纷。法庭上的斯特曼依然精神抖擞，盛气凌人，经常打断证人的陈述，以至于怀特法官不断地提醒他不得再打断证人的讲话。他的前女秘书准备作证时，斯特曼问她“玛乔里，你是不是忘了以前你曾经说过的话！”事后，斯特曼向法官保证这些话就是一个笑话儿并不是什么威胁，而且还装模作样地承诺以后不再这样了。

1989 年 11 月 17 日，法庭认定鲁本·斯特曼逃税案中的所有犯罪指控都成立，其他被告如拉尔夫·莱恩（Ralph Lane）（也被称叫拉尔夫·莱文，Ralph Levine）和斯特曼儿子的罪名也成立。从 25 年前第一次对鲁本·斯特曼开始起诉起，政府这回终于得以宣告斯特曼重罪成立，而斯特曼的律师团不服判决，立即上诉。怀特法官判处斯特曼十年监禁并处以 250 万美元罚款，但是允许斯特曼上交 100 万美元保证金后保留人身自由，等待上诉结果。

1991 年 10 月，在拉斯维加斯开始的色情诉讼中，斯特曼的律师 J. 迈克尔·默里辩称鲁本·斯特曼对他的内华达州的零售店出售“硬核片”一无所知，出售那些录像带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代表斯特曼所有的连锁店都这样，同时，默里要求法官仔细考虑什么是适当的“社会标准”以及联邦色情定义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同时考虑零售店是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经过九天的审议，陪审团已然陷入僵局，于是法官被迫撤销了对斯特曼的指控，因为有两个陪审员裁决斯特曼无罪，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两个陪审员都是教师，而且都是女性。斯特曼得知这个消息后，透过脸上的假面具对记者说：“从第一天起，政府就没有过成功



地起诉我的案例。”

当政府发誓将再度对斯特曼提起一轮新的色情指控时，斯特曼决定放弃抵抗，因为斯特曼逃税案的上诉已经被法院驳回，他的案子也都是由高等法院受理的，同时瑞士的许多法庭也判他有罪。另外，新的指控结果也不可预料，只能增加更多的麻烦，很可能会带出许多其他的问题。斯特曼同意尽早与政府达成协议，愿意认领一项违反《敲诈者影响并腐蚀组织法案》罪、七项色情罪并且同意政府没收他在旧金山、里诺市和拉斯维加斯州的资产，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政府同时对他的色情罪指控和逃税罪指控结案。斯特曼要求把他关押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中接近伯伦的监狱，监狱离他洛杉矶的家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政府同意了斯特曼的请求。当时，差不多成为美国色情行业第二大巨头的哈里·维吉尔·莫尼已经在伯伦的监狱服刑了，在早些时候，因为莫尼也从投币放映机刮掉“奶油”，密歇根国税局的特工们已经将其逮捕归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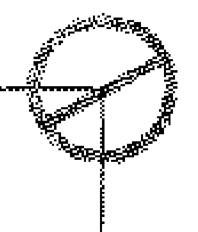
1992 年 6 月 10 日，劳埃德·D. 乔治法官宣判，判处鲁本·斯特曼四年监禁并处罚 100 万美元。在拉斯维加斯的法庭里，理查德·罗斯菲尔德欣慰地看到美国武装警察给斯特曼戴上手铐离开法庭。罗斯菲尔德为了调查这个庞大的帝国，排除万难，工作了将近 15 年的时间，其间罗斯菲尔德赢得了许多重大战役，成功地揭露了斯特曼共谋犯罪、挖掘出隐秘的海外账号、挡开了对调查程序的许多质疑、成功地接连策反了斯特曼的党羽，有力保障了对斯特曼的定罪。可是面对他曾经取得的成功，罗斯菲尔德还是有些惆怅。虽然法庭已经将斯特曼定罪并课以监禁，可是斯特曼依然从事着色情帝国的产业并享受着巨大财富带给他的快乐，对他来讲，直至今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真正地改变。当

这个色情王国的“国王”斯特曼被押出法庭投入监狱时，罗斯菲尔德感到确实打败了斯特曼，但也感觉到斯特曼依然如故的傲慢和发自内心的胜利感。

色情的新自由主义

鲁本·斯特曼色情帝国的崩溃具有与当年反托拉斯相同的效果，打破了色情垄断，也使色情业成为充满残酷竞争的行业。斯特曼原来的“美国综合录像”公司在美国各地的分公司虽然已经易主，但是这些分公司在性行业中已然占据老大的位置，其总收入大大超过其他同业公司。斯特曼的儿子大卫还经营着一家最大的色情公司“罪恶都市”。可是现在大约有几百家公司在生产并且发行“硬核片”，它们的销售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采用直接销售的方式，绕过传统的分销商直接将“产品”卖给消费者和零售店。一位公司的总经理这样评价当今的市场，由于录像带和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所以目前进入色情业的障碍只是“放不下脸面”和“缺少好律师”。在家里欣赏成人录像带和“硬核片”的现状迫使美国许多城市的成人电影院退出了色情业，洛杉矶一度拥有 30～40 家成人电影院，现在大概只有六家勉强维持生计。美国成人书店的数量也在减少，虽然不是直线下降，但是下降的趋势也很快。成人书店现在主要靠投币式放映室支撑，一些放映室允许一个顾客同时在两个屏幕上看五个“硬核片”，每 25 秒收费 25 美分。

现在美国大约四分之三的“硬核片”来自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每年旧金山县电影办公室给 X 级的电影制作商发放几千个外景拍摄许可证，但是更多的制作商从不申请外景拍摄许可证，他们在汽车旅馆、公寓楼和偏僻的住宅里拍摄性场



景。这个制造业的中心位于圣费尔南多山谷，在“环球影视”、“华纳兄弟”和“沃特·迪斯尼”等公司西北几英里远的地方，有几百家与性产业关联的各类公司，从配乐、编辑设备、印刷厂到性玩具厂应有尽有，在它们附近就是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社区。在南加利福尼亚特有的棕榈树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商店、洗车房和快餐店，它们和它们都沐浴在朦胧的阳光下茁壮成长，你很难挑出这个世界色情之都的瑕疵。

鲁本·斯特曼帝国的衰退也使得色情业从地下经营转移到了前台。“硬核片”销售和出租的收入已经不再是南加利福尼亚色情公司的天下了，已经逐步被美国国内出名的主流音像店取代。许多音像零售店大规模的合并，如“流行佳作”（Blockbuster）这种全美连锁店的出现，给那些独立经营的零售店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超级连锁店用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音像制品吸引顾客，靠海量批发赚取可观的利润，而那些独立的零售商更加依赖“硬核片”吸引顾客，增加利润。两者的市场策略使得超级连锁店谢绝销售 X 级录像带，转而销售高利润的“硬核片”录像带。一部人气旺盛的好莱坞影片录像带如《蜘蛛人》，标价 60 美元一部，3 美元租一天，与之相比，一部新“硬核片”20 美元一盘，4 美元租一天。现在许多独立音像店“硬核片”的收入大约是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一位行业专家的估计，美国大约有近 2 万 5 千家音像店销售和出租“硬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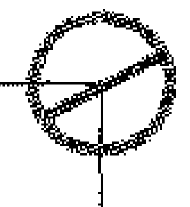
曾经见不得阳光的“硬核片”，只能放到柜台下面销售，可是现在不仅在零售店就可以买到，就是一些美国的顶级大公司也公开经营“硬核片”生意。遍布全国的有线和卫星电视的收费频道，七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以按次收费的方式播放硬核色情影片。收费频道的色情电影收入已经成为那些大公司的主要财

源，一位著名公司的高级经理形象地描述收费频道像一只"会产钱的奶牛"，成人电影给收费频道带来的利润比常规电影高得很多。当好莱坞用按次收费的方式将电影卖给客户的时候，好莱坞和有线台或卫星电视台各分50%，但是如果以同样的方式收看色情片的时候，卫星电视台或有线台的运营商通常要抽70%的利润。据统计，在2001年，美国人以按次收费方式点播观看成人电影的花费接近4亿6千5百万美元，可是大部分的收入并不属于色情制作商，占大头的是像EchoStar、DirecTV①、AT&T宽带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大运营商；另外美国人在饭店房间里观看饭店收费频道的成人电影的费用也高达2亿美元，然而饭店房间里点播的电影几乎有一半是色情电影，所以那些著名的连锁饭店如希尔顿、假日酒店、喜来登和万豪国际集团都能分到15%的点播费。

色情电影进入主流的播放频道就像给色情制造业添加了加速剂。1991年以来，色情电影的发行量每年递增七倍。视频设备成本大规模的降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制作商加入到色情制作的行列。在1975年大约只发行了100部"硬核片"，花费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2万美元，而2001年大约发行了1万1千部的"硬核片"录像带，有的成本只有区区5千美元。同时愈来愈多的色情片使得批发价也大大降低。色情片的平均利润降低后，许多制作商试图加大产量维持利润，于是又陷入了生产过剩再次导致价格下跌的漩涡。

色情市场曾经一度没有太多差异，观众也差不多都是普通的成年人，成人色情电影的内容也没有本质的差别。现在的色情市

① EchoStar和DirecTV是美国最大的两家卫星电视公司。



场则按不同观众的需求进行了细化，色情片的内容也要满足狭小群体的需求。今天的“硬核片”几乎可以迎合所有人的嗜好，甚至超出正常人想像的癖好或怪癖，有关于同性恋、异性恋（Heterosexual）、自虐、恋物癖、自慰、多人交媾的内容，比如 *Count Footùla*，片子里的主角恋物的对象是脚，还有性角色转换——“她：男性”的录像带，还有一种“猫战”（cat-fighting）类型的录像带，它的内容有裸体女人摔跤的镜头或者几名赤裸的女人一起痛打某个裸男，而且还有许多专门制作“猫战”影片的公司。另外还有给老人、施虐受虐狂和喜好语言辱骂虐待者的录像带。可以说，色情录像带的内容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美国性产业可以作为在充满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如何不断地、高效率地调整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兴旺发展的性贸易中涌现出大量自制的“硬核片”，说明了性行业没有得到有效的管控，或者说性产业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1980 年代，便携式摄像机出现在婚礼、毕业典礼、婴儿学步以及其他的活动中。有些“性开放者”群体，这里特指那些交换性侣伴者，用便携式摄像机把他们的床上行为拍录下来并交换“欣赏”。于是，一个地下市场应运而生，一些公司开始发行那些制作粗糙、真实交媾实录的录像带。现在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些由非职业人士制作的实录片，市场上被称为“业余爱好者”录像带的数量已经占有了“硬核片”和 DVD 市场的五分之一。大部分经营业余色情片的公司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地区，但是俄亥俄州的万达利亚、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纽约的利物浦、伊利诺伊州的伍德里奇、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也纷纷出现了发行销售业余实录片的公司。目前，爱好这些实录片的美国人又为他们的这一嗜好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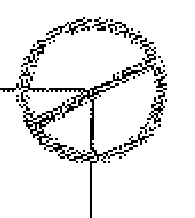
了数亿美元。

最早经营也是最大的业余色情实录片发行公司是位于加利福尼亚拉霍亚，离索尔克研究院不远的“自家产录像公司”，它可以提供一千多种普通人性实录的录像带。公司的老板提姆·莱克，39岁，看上去很像西雅图摇滚乐队的鼓手，一头披肩发、宽松的短裤T恤衫和一个传呼机。莱克和妻子阿莉萨每个星期都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录像带中甄选九到十盘上市发行，那些录像带里的“演员”来自五湖四海，体态各异，他们的形体与专业“硬核片”的“演员”完全不一样，那些专业演员的表演痕迹过重。这些寄录像带的人的动机不同，有的人希望以此为敲门砖进入色情电影业，有的是为了能赚些钱，也有人只是出于炫耀和卖弄。公司付给选中的录像带的酬金是每分钟20美元。

提姆·莱克的真实姓名叫法雷尔·提姆莱克，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费尔德县，在新迦南和肯特市读大学预科，在皮策学院（Pitzer）主攻文学，之后成为了表演艺术家，在一个摇滚俱乐部里结识了他的妻子阿莉萨，和她一起在“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1] 演出多年，两人于1986年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莱克在买下“自家产”公司之前曾经是洛杉矶的色情演员，妻子阿莉萨的职业和他一样。很多“自家产”的员工都是莱克跟随“感恩而死”乐队巡演时认识的。你也许想不到，莱克的兄弟是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

---

① 20世纪60年代，感恩而死乐队异军突起，并在摇滚乐坛上创造佳绩二十几年，是第一支在服迷幻药（LSD）后即兴表演的乐队。1966年乐队已在地下乐坛名声显赫，1967年夏天乐队参加了雷蒙德音乐节，并被誉为音乐界上最好的乐队。1995年Jerry Garcia去世，乐队宣布解散。——编注



长期反对色情业，可是现如今莱克的兄弟成为了“自家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他本人还出现在一部色情电影里。经营这么一家公司使提姆·莱克大开眼界，他评价那些录像带时说：“想像力限制了人类的行为，只要你能想出来，就一定能做出来。”莱克每天审查的那些寄来的录像带内容都不雷同。“自家产”公司在美国色情的新自由主义状态下，就像一个交换中心，“硬核片”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

所有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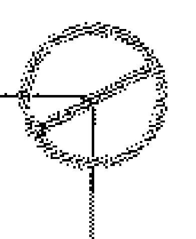
1992年的秋天，美国国税局在收缴鲁本·斯特曼所欠的税款时也不太顺利，但是似乎第一次看到斯特曼有些悔恨的意思。在监狱里关押了六个月后，斯特曼写信给大法官乔治·W.怀特，承认失败并对他的违法行为表示忏悔，请求能否减刑，因为他不想错过他小女儿的童年，影响小女儿的成长。斯特曼曾经在1992年12月日写道：“我相信我可以欺骗美国政府，那是我的一个愚蠢的想法。”可是就在怀特法官拒绝了斯特曼的请求后的一星期，在伯伦联邦监狱例行的晚9点检查时，没有见到斯特曼的身影，狱警在莫哈韦沙漠里搜寻斯特曼的行动一直延续到深夜。随后，监狱通知了洛杉矶美国特别武装警察，斯特曼从监狱中失踪了。

几天后，理查德·罗斯菲尔德正在与两个记者吃午饭，此时的罗斯菲尔德已经结束了斯特曼的逃税案，开始调查其他的案件。午饭间，罗斯菲尔德的传呼机突然响起，让他给办公室回电话，他立即起身向记者道歉后，出去给办公室回电话。罗斯菲尔德惊讶地获知鲁本·斯特曼从监狱中逃跑了，罗斯菲尔德挂上电话后自言自语道：“这家伙真是不可思议！”

复　出

在鲁本·斯特曼逃离联邦监狱的九个月前，有四个年轻人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之外的沙漠。这个沙漠在洛杉矶的北面大约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这四个家伙还引爆了一枚炸弹。这四个人都是朋友还经常一起赛摩托车，杰伊·布利塞特和唐纳德·马雷斯俩人是铺地毯的工人，保罗·马恩是一个有长期犯罪记录的惯犯，而加斯·科恩是一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退役军人。加斯·科恩制造了一个管状的爆炸装置，外壳是钢，炸药由聚偏二氯乙烯和黑色炸药混合而成。炸弹里有两个开关，一个是保险控制装置，另一个是遥控接收设备。科恩有使用过塑胶炸弹的经验，可是从来没组装过这种爆炸装置。他用遥控玩具车里的无线遥控器作为炸弹的遥控器，炸弹里的一个小金属插件接到信号后，旋转起来摩擦其他两个金属插件，形成一个回路，然后点火产生巨大的引爆。他们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而且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沙漠里炸出一个大坑并把岩石和泥土崩上了天。试爆成功后，这个小团伙的头头布利塞特对他们在下一个任务中使用这种炸弹显得信心十足，因为有人雇佣他们去芝加哥炸毁曾经属于鲁本·斯特曼的成人书店。

斯特曼过去既不愿意自己付政府一分钱，也不让他的同伙把钱付给政府。斯特曼获悉美国国税局调查了他的瑞士银行账户后，他立刻取消了被调查的户头，随即又开了相应的新账户。美国国税局找到了可以揭露斯特曼精心构建的帝国的公司记录后，斯特曼也随即放弃了那些资料暴露的公司，马上注册海外新公司并把原公司的资产转移到这些全新的海外公司。那些理查德·罗



斯菲尔德小心谨慎收集的记录，即这些所谓的法庭证据只是那些公司“还活着”时候的运营记录而已，法庭指控斯特曼逃税罪时，那些公司已经不复存在了，原来账户里的数百万美元也已经荡然无存。

这些隐匿斯特曼资产的新公司比原来的公司更具灵活，更具有隐蔽性，所有的新公司及其账户都由中间人、律师和斯特曼的朋友“掌管”，所有的文件都没有斯特曼的大名，而且公司的业务和资金往来也不需要斯特曼的签字。斯特曼的资产都转移到了巴拿马注册的公司和企业，账号分别开在瑞士、卢森堡、荷兰、阿鲁巴岛以及开曼群岛等地的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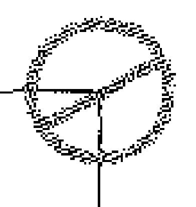
美国国税局要求鲁本·斯特曼偿还500万美元的税款，斯特曼不但不积极还钱也不尽力去催促它们还他的欠款，而且还终止了与公司的“顾问”协议。所以，美国国税局就不能再扣留那些公司曾经欠斯特曼和属于斯特曼的钱了，因为从法律意义上讲，斯特曼和那些公司没有一点关系。可是实际上，斯特曼依然命令他的经理们用现金的方式向他支付顾问协议里面规定的“顾问费”，尽管他的经理们对这样的安排不太开心，但也是无能为力。为了掩饰他的个人费用不招引美国国税局的视线，斯特曼使用一张瑞士银行发放的维萨信用卡，卡里的钱来自一个巴拿马的公司。除了税务案外，斯特曼和政府的战斗远远没有结束。美国国税局没收了斯特曼在克利夫兰和范努斯的房产后，斯特曼又秘密地通过海外公司在政府的拍卖中又以极低的价钱把它们回购回来。

斯特曼的新方案实施不久就遇到了新问题，原来的一些旧部下不想和政府对抗了，同仇敌忾的热情也大大降低。他们觉得逃税案会威胁到他们的生计，其实即使付给政府税款，也不妨碍赚

大钱，而且陷入犯罪共谋会冒不必要的风险，他们甚至对不停地付钱给原来的老板的做法感到恐惧，恐惧老板贪得无厌的要求，同样也反感美国国税局接连不断的催款。

当许多斯特曼的旧部拒付“顾问费”甚至一些人把该给斯特曼的钱作为税金交给政府的时候，斯特曼感觉被出卖了，愤怒异常，大骂这些靠自己致富的人，认为他们把理应属于自己的钱偷走了，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老板。梅尔·卡明斯早在1955年就在“君主新闻”公司工作，那时还是个小伙子的他负责运送“奶油”，现在他接管了原来斯特曼在克利夫兰的业务。在1989年斯特曼因为逃税受审的时候，梅尔·卡明斯对斯特曼忠心耿耿，拒绝与政府合作，还扬言他随时准备进监狱。就是这个梅尔·卡明斯决定停止付钱给斯特曼钱，因为理查德·罗斯菲尔德曾经走访了卡明斯并告诉他“过去你欠斯特曼的钱，如今你欠美国政府钱了。”斯特曼对梅尔·卡明斯的决定非常愤怒，他认为卡明斯的行为不仅仅是背叛，而是对他的蔑视，也是他开始丧失统治力的信号。于是斯特曼写了封信给卡明斯，信中除了让卡明斯继续付钱外，还提及过去的往事，为了达到目的还诚恳地说“毕竟，我以前为你做了很多，为何要抛弃我呢。”当感情上的劝说丝毫不能打动卡明斯的时候，斯特曼决定开始动用威胁的手段。

1991年12月的一天，杰伊·布利塞特、唐纳德·马雷斯和保罗·马恩走进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一家成人书店，叫顾客全出去，命令职员不要乱动，用大铁锤和棒球棒砸毁了投币放映机。在此之前，这家书店的老板塔玛拉·格林只支付了一半斯特曼要的钱。之后格林打电话对斯特曼讲“我知道了”，随后格林马上就又开始支付斯特曼要求的全款了。



保拉·劳伦斯·梅和她丈夫罗伊如今经营斯特曼原来的芝加哥公司，美国国税局警告过他们不得给斯特曼一分钱。一天，一名在芝加哥非常出名的税务律师和斯特曼与罗伊·梅一起讨论如何能逃避美国国税局的税务扣押权，斯特曼和律师建议，今后梅可以用几百万美元订购一些"硬核片"的版税，尽管那些片子的实际价格很低。

罗伊·梅仔细地听完了斯特曼和律师的建议，委婉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为他妻子已经因为逃税接到了监禁的判决书，自己没理由再去招惹更多的麻烦，而且现在芝加哥的公司是在他的名下，从法律上讲斯特曼没有权力再要求他们的权益，所以梅告诉他们不能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

鲁本·斯特曼在洛杉矶联系上了他的朋友米基·范（也称为赫伯特·迈克尔·范伯格），斯特曼告诉米基·范，现在要砸几家成人书店以示警告，建议先从芝加哥下手，然后再砸几个克利夫兰的成人书店。这位米基·范，当时60岁出头，他只是洛杉矶色情业的小人物，只是一个买卖"硬核片"、赚差价的皮条客而已。范在菲尼克斯安排了斯特曼交代的任务，他在地毯店找到了杰伊·布利塞特，将任务布置给他，给了布利塞特芝加哥八家成人书店的名称和地址，许诺成功后可以得到6万美元的现金，并且先支付了1/3的定金。范强调，要让那些成人书店的投币机失去作用。

这次，布利塞特和他的同伙想用炸弹去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能在远处引爆炸弹，就可以大大降低遭到逮捕的风险，于是他们去了沙漠对科恩设计的装置进行了测试，而且取得成功。在1992年4月，布利塞特、马雷斯、马恩和约瑟夫·马丁内斯乘一架商务飞机从洛杉矶飞到密尔沃基，随机行李里装了八个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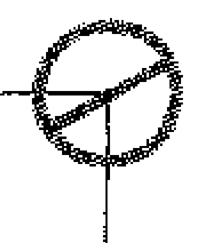
巨大的、由无线电遥控的炸弹。他们在密尔沃基租了一辆汽车开往了第一个目的地——芝加哥。

他们没有一个人去过芝加哥，只得按照地图在城里转了一整天以寻找他们的目标。他们发现有两个成人书店的位置不好，不易下手，就放弃了这两家。他们分成两组分别行动，4 月 15 日，他们在六个书店安放了炸弹，原计划是炸毁书店后面的配电柜以切断投币放映机的电源。结果位于南西塞罗大街书店后面的炸弹成功地炸毁了配电柜，而装在芝加哥老城区的炸弹都是臭弹，根本没有爆炸。

当保罗·马恩和唐纳德·马雷斯开着车沿着分界线街道（Division Street）前往另一家书店时，一枚遥控炸弹突然在马雷斯的膝盖上爆炸了，当时这枚炸弹已经打开了保险，可能受到路边无线电信号的影响，也许是交通信号、警察扫描仪或者是路边的儿童玩具遥控器“遥控”引爆了这枚炸弹。爆炸又引爆了雪佛兰汽车里的另外一枚炸弹，顿时大火笼罩了这辆雪佛兰轿车。

保罗·马恩第一个从车窗爬出了汽车，他的头上都是火。正巧，一名叫弗洛伦斯·克兰顿的中年妇女刚从服装店出来，看到此景，赶紧扯下马恩的外套，帮他扑灭了头上的火焰。随后，保罗·马恩丢下唐纳德·马雷斯不顾一切地逃跑了。马雷斯被汽车绊倒了，身上全是火，克兰顿赶紧把他从火堆拉出来扑灭了他身上的火。可是，没过多久，马雷斯还是死在人行道上了。芝加哥的炸弹小组和消防队赶到爆炸现场后，发现燃烧的车里还有两枚爆炸物，其中一枚炸弹居然从一条破裤子里滚到一名小组队员的脚边，好在没有爆炸。

马恩居然设法赶到了芝加哥公园的约定地点，随后，三个幸存者安全返回了洛杉矶。但是特工们很快就逮捕了他们，因为布



利塞特竟然愚蠢到用他的真名租了那辆雪佛兰汽车。面对长期监禁的指控，他们开始坦白。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鲁本·斯特曼这个人，三人的落网直接导致了米基·范的收审。米基·范否认参与爆炸案并且拒绝指证斯特曼，政府怀疑米基·范的证词不是真话。当时，保拉和罗伊·梅也通报有关当局，斯特曼一直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他们在芝加哥的生意。爆炸发生后，罗伊·梅当着FBI特工的面给斯特曼打电话告诉他“我知道了你的警告”，而当时警察录到的斯特曼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几个月后，1992年6月，斯特曼一副愁容走进伯伦的联邦监狱，他完全有理由郁闷，因为他一直替米基·范支付着法律费用，如果范想和政府做交易，那么斯特曼就要对芝加哥的多起炸弹爆炸案负责，而且会面临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的处罚，毕竟芝加哥的爆炸中死了一个人。另一面，他又怀着一份喜悦心情相信逃税案不久将会减刑，这是因为斯特曼不久前曾经给了克利夫兰的一位律师50多万美元，让他用这些钱去贿赂乔治·W. 怀特法官。这位名叫桑福德·阿特金的律师曾经是迈阿密的警察，还自称是怀特法官的好兄弟。斯特曼在宣判前的几个星期里给了桑福德·阿特金30万美元，非常巧合的是怀特法官在随后的判决中允许斯特曼缴纳保证金并获得保释，暂且保全人身自由，等待上诉。而这些在斯特曼的眼里，这些都是贿赂所起的作用。入狱后，斯特曼递交申请前，又付给桑福德·阿特金25万美元试图再去运作减刑。

然而桑福德·阿特金从来就没给过怀特法官一分钱，他把所有的钱都据为已有。将斯特曼付给他的55万美元，一部分用于证券投资，一部分还债、给朋友高利贷、购置一些房地产，还在克利夫兰市买了一个洗车房。而怀特法官那些相对宽容善意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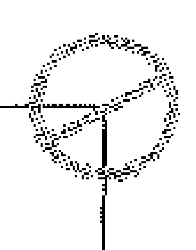
决完全是个巧合，没有一点受贿的成分。斯特曼入狱一个月后，他申请减刑并给桑福德·阿特金写了封信，信中称可以接受三年的监禁处罚。斯特曼对桑福德·阿特金说"尽全力去做，我知道你能行，我也相信你能做好。"但是，这次法官拒绝了斯特曼的减刑申请，很快斯特曼又提请减刑，法官又一次拒绝了他的申请。阿特金从加利福尼亚飞到监狱会见了愤怒的斯特曼，阿特金告诉他要有耐心，他的两次上诉间隔太近了。1992 年秋天，斯特曼第三次请求怀特法官予以减刑，申请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忏悔和自责。

当第三次的申请被拒绝后，斯特曼感觉自己被骗了。他的前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候他已经 68 岁了，不想死在监狱里，而且如果米基·范认罪并指证他，他就必须服满 10 年监禁甚至更长的时间。斯特曼在伯伦监狱的办公室里还看到过一份文件，上面说政府准备将他转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那里离他的家太远了。对斯特曼来讲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1992 年 12 月 7 日的傍晚，斯特曼跑过监狱的垒球场，翻过矮栅栏，钻进一辆在外面等候的汽车。斯特曼在途中始终躺在后座上，一直等到没有危险后，他才直起身子。斯特曼发现在沙漠中有一家汉堡包快餐店，于是让司机停车。当他们在停在行车道上时，一辆警车也停在他们后面，斯特曼的司机非常紧张，斯特曼却说"别紧张，放松些，如果他们知道咱们是什么人，我们两个人早就被捕了。"斯特曼买回汉堡包后，两个人又重新上路了，消失在夜幕中。

获得好评

虽然美国色情业由于市场的需求而蓬勃发展，但在某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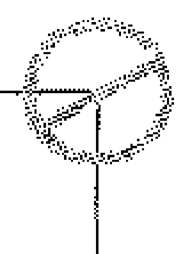
上也反映出公众对性的态度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世俗主义逐步冲淡了虔诚严谨的宗教观念。过去的五个世纪里，每一次的激进社会运动都有色情的成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乔瓦尼·皮科·德拉·米朗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著名的作品，后来被称为人文主义宣言的《人的尊严》（*the Dignity of Man*）① 里就有色情的诗句。巴黎的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作者丹尼斯·狄德洛（Denis Diderot）也写过色情小说。性自由和政治自由长时间纠缠不清，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样的情景在美国历史上也有，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各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到19世纪中叶的乌托邦群体，无不提倡“自由性爱”。近期的1960年代，青年的反传统（主流）文化演变成公开谈论性话题，引入了“友爱聚会”、“换妻游戏”和“性革命”。旧金山曾经开创过一个新的道德观，有许多与性相关的地下报纸如《身体的隆起部位》（*Ball*）、《部落》（*Tribe*）、《器官》（*Organ*）、《自由新闻》（*Freedom News*）和《暴露地球》（*Flash Earth*）定期发表露骨的色情文学作品；旧金山的嬉皮电影制作者几乎是第一批公开放映“硬核片”的人士。虽然利润的动机很快渗透到湾区（Bay Areas）的色情群体，但是那里的著名演员和导演经常赋予性个性解放和政治上的前卫含义。

“尼娜·哈特利”（Nina Hartley）是当今性产业中一位著名演员的艺名。哈特利在伯克利长大成人，那时正是反传统文化思

① 皮科·德拉·米朗多拉（1463～149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的这篇《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被称为“人文主义宣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与中世纪的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他肯定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以及现世人生的美好和意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米朗多拉的人文主义宣言拉开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序幕。——编者注

潮的顶峰时期，她认为自己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而且也是来自一个传统叛逆家庭。她的祖父在1930年代就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时他是阿拉巴马州大学的物理教授，因为他是“幼稚的反法西斯者”而被大学辞退。当时身为这所大学英语教授的祖母也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经济的唯一支柱。哈特利的父亲也是“共产党员”，他曾经是旧金山无线电台的播音员。在麦卡锡时代，他的名字上了麦卡锡的黑名单，广播公司也因此将他开除了。哈特利的母亲是位生物化学家，她父亲丢掉工作后，母亲和她祖母当年一样也成了家中的顶梁柱。青春期的尼娜·哈特利是个书呆子，性成熟相对较晚。在成为女权主义者后，尤其不信任男性的凝视，但她暗地里却经常幻想自己裸体跳舞。哈特利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以优异成绩拿到护理专业的学位后，决定要成为色情明星。从1980年代至今，她已经出演了650多部“硬核片”。她是个新潮人物，也是个骄傲的裸露症患者。她和第一任丈夫、另一个女人和睦共处保持了20年的三角关系，她的第一任丈夫曾经是一个校园激进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前任领袖。哈特利的现任丈夫是《皮条客禁忌》（*Hustler's Taboo*）杂志的编辑欧内斯特·格林。“尼娜·哈特利”这个艺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引申出一种观念：当今的女人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强壮的和性意识独立的女性。

在一次亚特兰大城举办地的视频展会上，我曾经看到很多男性影迷排队耐心地等待哈特利的签名。当时她足蹬一双五英寸高的高跟鞋、身着迷你裙，染色的指甲和一个夸张的发型，全身洋溢着电影明星的魅力。几个星期后，我和她约好在马里纳德尔雷的一个小酒店吃午饭。我这次见到的是一位戴着一副角质镜架的眼镜、身穿白色体恤衫牛仔短裤的哈特利，她没有化妆，看起来



就像一位健身教练或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毕业生。我们两人一起探讨了性产业如何对待表演者以及美国人对性的态度，哈特利告诉我："说得好听一点，我们对性的承诺是神圣的、美好的和积极向上的，我们允许麦迪逊大街用这个态度来出售火花塞和除垢剂以及所有的东西，只是不能出售性。"她强调：现在大量的色情作品不仅仅憎恨女人，也厌恶男人，甚至蔑视人类，是一种可以自由支配的商品，可以揭露性文化的深度恐惧。她不无遗憾地说："那些经营色情业的人其实自己并不是性开放者，他们在家里的性生活非常传统。也许你会很吃惊，许多色情制作者和生产者都是共和党人！"

有些进行色情表演的女人是因为她们具有裸露倾向并且嗜好性，也为了引人关注，但大多数的女演员都是为了钱。一些高报酬的演员如那些与制作商签订专门协议的女演员，她们的年薪大概在 8 万美元到 10 万美元之间，每年大约拍摄 20 个性场景，12 个公开暴露的镜头，可能只有少数的 10～15 名的女演员能签这样的合约。其他一些出名的影星每拍一个性场景能得到 1000 美元，一个性场景的拍摄大约需要两小时，可是通常需要占用一整天的时间。绝大部分的色情女演员都是"B 级女孩"，她们一场戏的酬金只有 400～800 美元，一个星期拍二三次，基本上一天拍一个场景。目前有无数的女孩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地区希望挤进色情业成为影星，而且供过于求，工资已经降低了很多，可是有些新手即使拍摄一个色情场景只能得到 150 美元，她们也会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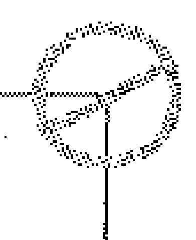
哈特利透露女演员的报酬取决于她的脸蛋是否够漂亮、是否心甘情愿地表演那些"猥亵下流的演出"，更重要的是她是否有自己独到的创新表演。这个行业经常需要新的天才，很少有女演

员能持续两年到三年。哈特利忠告那些新人，千万不要过多的曝光。随时都有成百上千的女人进入或退出这个行业，因为好莱坞需要的是新鲜面孔，而且在她们的后面，有许多觊觎她们、趋之若鹜的、年龄只有十几岁和接近20岁的女孩。虽然在南加利福尼亚州，一个18岁的女孩还不能合法地购买一瓶啤酒，可是她可以在电影里与几个男人表演交媾并赚上几百美元工资，而且不违反任何法律。

色情电影中的男演员基本上是女性的配角，出名男演员的收入比女明星的收入低得多，但是男演员的演艺寿命比女演员长很多。许多此行的男演员最初都是贪图和许多女性做爱，评估男演员是否合格主要取决于他能否有持久的能力，也许有十几个男演员有这种技能，有的男演员演了一千多部"硬核片"。

如今对艾滋病的恐惧充满了性行业，许多出名的色情影星已经感染上了，而且其他演员也有感染的传闻。现在所有的演员每月都必须定期地做艾滋病的测试，测试结果就是他们上岗的通行证。由于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到出现艾滋病的抗体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色情业没有受到艾滋病大规模地侵袭也是值得关注的。由于色情业中没有大范围流行艾滋病，所以那些演员还是用传统的眼光看待艾滋病以及它的传播方式，在他们过时的意识后面，还隐藏着他们对艾滋病和病人的恐惧、抵制和忧虑，其实其他性疾病的传播非常普遍。作为一名注册护士，尼娜·哈特利出版了一套《成人演员的健康与卫生指南》(*Health and Hygiene Tips for Adult Performers*) 丛书。

哈特利组建性工作者工会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据她讲，在这个行业里，很多的演员都是为了多挣几个钱、少缴些税，凭几句"嘿，咱们不是合作吗？或者，咱们不是是哥们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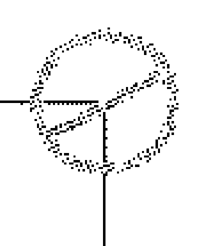
姐妹儿吗?"就与老板达成了口头协议，其中很多协议由于一方的原因破裂，收到的支票有时还是空头支票。由于这个行业具有的法律特殊性以及处在法律的边缘，所以权益受到伤害的演员很难去法庭寻求补偿。她和其他许多的色情女演员内心里都十分热爱这项工作，性和演员的身份有强烈的内在联系。那些教育程度不高而且没有什么技艺的女孩，进入色情电影界都有其他的目的。虽然高价的"电话女郎"比色情演员赚的钱多，但重要的是性表演的女孩子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哈特利这样解释道："你不必担心会被逮捕、被袭击，也不用担心哪一天横尸郊外。"有些女孩进入这个行业是为了实现她的目标，例如有一个出名的女影星用出演色情电影赚的钱进入了一所法学院学习，有的女孩子赚钱后就退出了，但是也有很多女孩是因为身不由己或毒瘾而进入这个行业。不过对这些女人来讲，这段经历是她们人生中最低潮和屈辱的永久纪录。

哈特利有半年的时间花在路上，通常一个星期里，她在脱衣舞俱乐部表演四到五次，像许多色情明星一样，这就是她为什么能挣那么多钱的原因。在里根年代，"硬核片"录像带产业飞速膨胀，脱衣舞俱乐部也像春笋一样遍布美国各地，脱衣舞俱乐部把"硬核片"作为现场表演的暖场片。罗布·阿布纳曾经是赫顿公司（E. F. Hutton）的一名分析师，后来出版了商业刊物《脱衣舞娘》。据他统计，美国各地现有脱衣舞俱乐部的数量大约是 1987～1992 年数目的两倍，现在大约有 2300 家脱衣舞俱乐部，其中有年收入只有 25 万美元的"下流场所"，也有年收入超过 500 万美元的、火暴异常的"绅士俱乐部"。在 1990 年代，脱衣舞女星的报酬以天文速度增长，现在国内顶尖的五六个色情明星在脱衣舞俱乐部每个晚上只需表演四次 20 分钟的演出，一

个星期就能挣到15000~20000美元，另外出名的六名色情影星每星期也能赚8000美元或15000美元。舞女的酬金绝大部分参照她们累积的“积分”，所谓这些“积分”通常是指她们出演过“硬核片”的次数、发行录像带数量和男性杂志上刊登照片的次数。一名出名舞女周薪的底薪从2000美元起，可是有色情“积分”的舞女的周薪至少4000美元。在那些性工作者的眼中，以往舞女都看不起色情明星，讨厌她们的工作，可是如今美国各地的脱衣舞女都纷纷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与色情演员拼杀，出演“硬核片”以赚取“积分。”

在“日落”脱衣舞俱乐部的下一个街区，我在威廉·马戈尔德的小公寓里见到了一位刚刚到达洛杉矶，梦想成为色情明星的女人。马戈尔德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男人，大高个、浓密的头发、大胡子，一副颓废的神态，从1970年代至今，他已经发行了几百部的“硬核片”，他还集编剧、导演、制作于一身，他还是个星探，出任性行业的发言人。马戈尔德不太有钱，开着一辆破旧的大众汽车，像是地下报纸的新闻记者。虽然有时候，他也写一些东西。马戈尔德进入色情业之前曾经是洛杉矶市中心的缓刑监督员，那时候他轮廓鲜明穿着得体，但是做事却和他的孩子们那样风风火火、乱无章法。他的父亲是一名联邦法官。马戈尔德居住在一个长期都蔑视传统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为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轻的色情男女演员们开了一个服务热线。他把他的公寓称为“熊室”，室内的书架上有上百只泰迪熊，屋内摆满了“硬核片”的录像带，墙上贴着他早期的色情电影海报。

一个自称“罗斯”的年轻女性从遥远的南方飞到洛杉矶，马戈尔德帮助她找了个地方居住，她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成为影星，也就是当色情影片的大明星。马戈尔德直率地告诉她不太可



能，充其量她只能成为一个“B级女孩”，就像一个橄榄球队的边锋怎么可能担任四分卫呢？马戈尔德还告诉她，她的衣装打扮太过分了。罗斯有一张招人喜欢的面孔，而眼神里却折射出罗斯苦难的经历。她今年已经33岁了，曾经做过脱衣舞俱乐部的女招待、陪伴服务公司的经理、脱衣舞女，也曾经以每小时250美元的报酬在私人舞会上充当同性恋者的性伙伴。罗斯曾经还是毒品贩子，那时她也是个瘾君子，而且她品尝过所有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毒品。当然现在她已经戒毒了，只想到这里赚些“积分”，回去做个出名舞女，然后她可以把当地的舞女姐妹带到旧金山“进修”，自己做她们的“妈咪”和代理人。她已经来旧金山五个星期了，看起来她的前景并不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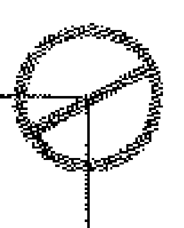
罗斯来到旧金山的第一天，一个色情电影的经纪人让她把黑头发染成金色再做隆胸，她拒绝了。因为她没有地方住，所以就住在那个经纪人的公寓里，这看起来是个错误的决定，经纪人试图和她发生性关系。之后罗斯找到了几份工作也曾参与了许多性场景的拍摄，可是她还是丢掉了角色，让其他女演员抢走了，因为罗斯不用性交易换取影片的角色，罗斯对制作商和电影公司主管们的这种要求非常愤怒，并且愤愤地指责那样的做法不好，一点也不职业。我说在这一点上色情业和好莱坞没有任何区别，听完我的话，罗斯神情更加激烈地说：“不仅在色情界和电影界，每个行业都这样！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如果你想找个好工作就必须‘搞掂’经理，明白吗？这就是现实！每个地方都一样。”

几个月后，我偶然遇见马戈尔德，问罗斯怎么样了？他说他们已经吵架分手，彼此也没有联系，不过罗斯还在洛杉矶，他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她还是没有成为一个明星。

简单的越狱计划

1992年12月中旬的一天，理查德·罗斯菲尔德和克雷格·莫福德两个人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饭店里工作到深夜，准备他们的方案，因为第二天他们要和美国特别武装警察的官员见面，一起讨论鲁本·斯特曼的越狱案件。有关部门已经通知了机场和边境的海关人员，警告斯特曼有可能偷越国境出逃。由于斯特曼在海外有很多狐朋狗友和账号，人们都估计斯特曼现在已经越境潜逃了。罗斯菲尔德和莫福德多年来一直担心斯特曼不会在监狱里服刑，很可能会潜逃。可是斯特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斯特曼面临指控和逃税案指控的四年中，斯特曼曾经离开美国21次，去过瑞士、西班牙、埃及、墨西哥和荷兰等国家。每次回国后，斯特曼都遵守联邦官方的保释规定上交他的护照。罗斯菲尔德原来的搭档谢安斯基估计斯特曼现在会躲藏在西班牙，一是因为那里有斯特曼原来的合作伙伴，二是因为很难从西班牙引渡嫌疑犯。罗斯菲尔德倒是觉得斯特曼倚仗着巨大的财富和关系可能出现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现在很可能正在某地的海滩上，喝着冰凉的饮料，口衔雪茄享受阳光呢。

寻找鲁本·斯特曼的下落看起来是浪费时间，罗斯菲尔德和莫福德一致认为应该从他的同伙那里下手。晚上，饭店的电视正放映一部关于莫哈韦沙漠的纪录片，莫福德注意到伯伦监狱的周围尽是贫瘠的荒地、沙丘还有零散的约书亚树。莫福德看到这些后，开始怀疑其他联邦部门对斯特曼如何越狱的假设：斯特曼可能是步行、乘坐直升机或是乘越野汽车越狱。监狱与最近的小镇的距离只有12英里，莫福德觉得一个简单的越狱计划更可信，某个人开车到监狱，斯特曼就在监狱的路边等，然后开车一起离



去。第二天在美国特别武装警察的总部，罗斯菲尔德和莫福德建议，找到斯特曼的帮凶的最好办法就是追踪他的钱的流向。虽然罗斯菲尔德以前没有过追捕逃犯的经验，但还是任命他负责这个追捕案，因为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斯特曼和他的帝国。美国特别武装警察的追捕逃犯部门也将追捕鲁本·斯特曼的级别列为最高等级，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亨利·E. 哈德逊也非常了解斯特曼本人和案件的背景，因为哈德逊在到这个位置之前，曾经是首席检察官米斯领导的针对色情委员会的主席。

当罗斯菲尔德核查银行记录的时候，克利夫兰市特别武装警察的逃犯追击组的调查员托尼·奥立佛也在检查斯特曼在伯伦监狱服刑六个月里的来访者名单和电话记录。罗斯菲尔德和奥立佛都发现有两个生疏的名字：斯蒂芬妮和道格拉斯·弗里德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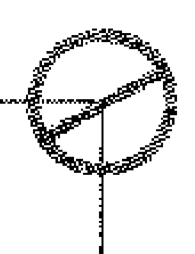
亚当和夏娃

北卡罗莱州的希尔斯伯勒是一个接近查帕尔希尔农村的迷人的乡下小镇，一条主路穿城而过，路的两边都是受保护的历史建筑，城里有许多古董商店、书店、在国内战争死去的英雄铜像、咖啡店，还有一个五金商店。半个世纪以来，这座小镇没有太多的变化。小镇大约有5000居民，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保持小镇的安宁以及乡下的质朴民风，抵抗来自查帕尔希尔的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希尔斯伯勒归属奥兰治县，本地的报纸叫做《奥林奇新闻》（*News of Orange*）。这个小镇像是只为“公共卫生工程师”公司总部开放，这个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套、性用具和“硬核片”邮购商，也是“亚当夏娃”产品录的发行商，公司的老板是希尔斯伯勒最大的私人老板，公司拥有一座现代化的三层办公楼和仓库，与之相邻的是一家护理院和兽医诊所。在公司巨大

的仓库里，30 英尺高的货架堆满了色情的性物品，传送带把货品送进仓库自动打包，并且按照顾客的邮政编码放进货柜。参观该公司时，处理邮购品操作的现代化程度之高，有些超时代的感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车间里也有很多迷人的一头金发的典型南方女士，你很容易可以在浸信会教教堂的唱诗班里见到这样的妇女，她们边笑边聊天地就把人工阴茎装进盒子里。

该公司的拥有者是菲利普·哈维，他也是一位当今美国性产业中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一些出名的“硬核片”制作商定期地飞到北卡罗莱纳州拜访哈维和他的经理，一方面推销他们最新的影片，另一方面寻求哈维对新产品的资金支持。哈维通常会同意给他们一些支持，不仅仅因为哈维的公司有雄厚的购买力，也是出于哈维自己的主观愿望。哈维在某些方面与斯特曼非常类似，那就是不懈地与联邦政府进行斗争。哈维同样是国家色情管理委员会的头号目标之一，这个组织是在米斯委员会建立之后，属于司法部的又一个针对色情管理的部门。经过哈维的顽强斗争，里根和老布什开展的反色情运动都停顿下来。然而在性产业中只有哈维的极少数同事知道菲利普·哈维有着双重的生活方式，每个月的部分时间里他在希尔斯伯勒管理“PHE”公司，其余时间他在华盛顿特区管理一家非盈利公司，而这家公司致力于艾滋病的预防和家庭计划生育。

过去的 25 年里，哈维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项目，而且在学术杂志上还发表了多篇关于人口控制的论文，他用从希尔斯伯勒赚到的数百万美元资助国外的非盈利项目。哈维现在还在监督指导印度、埃塞俄比亚、巴西、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项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80 年代末，当司法部的官员们正在竭尽全力以违反淫秽法将他关进监狱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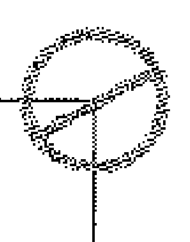
候，国务院发展署的官员正在与哈维一起紧密合作，进行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普及避孕工具的项目。

哈维本人具有良好修养气质，稍微有些不修边幅，衣着随便，眼镜经常架到头上，看起来像常青藤联合会的教授。他出生于1942年，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郊外长大，他父亲拥有一家制造农用机械的公司。哈维先在是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就读，随后进入哈佛大学，主修斯拉夫语言和文学。毕业后服了短暂的兵役，之后在美国普世救济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lief Everywhere，简称CARE）工作。那时，他和其他心怀理想的青年一样想去体验不同的文化，为大众服务。CARE曾经派他去印度工作，他在印度工作了五年，负责把美国援赠的食品分发到印度各地。在工作中，哈维意识到，尽管美国政府援赠的数量每年在都增加，但是接受帮助的印度儿童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哈维认为帮助印度控制人口的增长比印度得到更多粮食援助重要得多，印度的人口控制问题是个关键。1969年哈维回国后，从福特基金会申请了一笔专项基金，在查帕尔希尔的北卡罗莱纳大学做研究课题：家庭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

哈维在他的毕业论文里，提出了建立邮购安全套市场的设想。当时，他的指导老师也忽略了哈维的建议已经违反了美国色情法。当时康斯托克法案依然不允许通过美国邮政邮递避孕产品，甚至邮寄关于人口控制的资料也是违法的。1970年，菲利普·哈维和蒂莫西·布莱克像两个无所畏惧的战士那样成立了一家邮购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将安全套卖往全国各地，哈维的合作伙伴蒂莫西·布莱克本人是一个英国医生，也是一位计划生育的倡导者。他们考虑到这家公司在法律上存在模糊性和争议性，可能会影响他们慈善事业的初衷，于是两个人又创立了一家独立的

非盈利公司“国际人口服务”（简称 PSI），负责给贫困国家发送避孕工具。哈维在美国各地大学的报纸上做广告，通过邮政提供安全套，外包装的广告语是：“性爱是你的事（避孕是我们的事）”。订单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不久，布莱克离开美国到非洲去管理海外的业务。随着国内销售利润的增长，哈维已经成为了避孕工具“社会行销市场”的开拓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PSI”不再依赖负担沉重的、充满官僚习气的医疗机构提供避孕工具，开始利用同样发达的商业网络，因为遥远的村庄都有那些销售名牌物品的商店，于是“PSI”为当地的商店提供低价高质量的安全套，他们再加价出售。哈维越来越相信依靠市场的力量发放人口控制用品比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效率都高。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取消了以邮寄方式出售安全套的禁令后，哈维的生意也随之扩大。可是安全套的名声依然不好听。通常它们都放在药店柜台的后面，甚至《花花公子》都拒绝给哈维的安全套做广告。哈维使用了所有能想像到的促销手段改变人们对安全套的反感观念，甚至有一年他曾经尝试过用安全套做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圣诞礼品。纽约对他的销售行为提起诉讼，因为那时安全套只能在纽约的药店里出售。这起官司最后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哈维赢得了官司。按照朱利安·西蒙的《如何启动和运营邮购业务》中的经营建议，哈维尝试过扩展产品线，邮购的产品也增加了关于人口控制的书籍、口服避孕药和测试怀孕的产品。可是新产品的销售都不太好。他又尝试对安全套用户销售休闲服、数字闹钟、飞机模型，结果又是一塌糊涂。但是邮售目录中只要有色情图片的书，那么销售量就增加，于是哈维1975 年开始发行“亚当夏娃目录”，除销售安全套外，目录中还提供色情产品、女式内衣和按摩油。在“硬核片”出现在目录



里之前，哈维的公司已经是一个有上千万美元业务的企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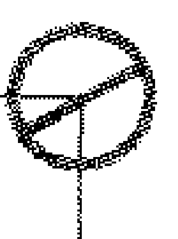
菲利普·哈维认为邮寄方式销售硬核色情片最合适，邮递公司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大，不会有大量的顾客进出邮递公司，邮递公司不会存在成人书店里出现的一些非法行为，顾客也会在悄然无息之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顾客可以避开公众的注意，也可以避免进出有耸人听闻广告的成人书店，邮寄可以更好地保障客人的隐私。就这样，装在普通的棕色大信封里的“硬核片”悄然无息地从北卡罗莱纳发送到美国各地，“亚当夏娃邮寄产品目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巨大的成功也使得菲利普·哈维成为里根总统反对色情运动的头号目标。在反色情人士的眼中，根本就不存在发行“硬核片”的合法途径。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安东尼·康斯托克就警告过，在发行色情物品的过程中，邮政是一个“最有效的机构”，因为“它的触角遍及到每个角落而且又非常保密”。

1980 年代中期，力主反对色情的查尔斯·H. 小基廷不再担任辛辛那提州的大法官了，如今的身份是一位共和党的著名募捐者，“美洲大陆公司“的总经理，他还是“林肯储蓄贷款”公司的拥有者。基廷曾经游说里根总统，希望总统能成立另外一个针对色情的调查委员会，而且这一次的调查应该得到正确的结论。米斯法案和联邦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那些基廷领导的反色情组织的律师影响，现在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通过法律保持公民尊严”（Citizens for Decency through Law），简称 CDL。实际上，司法部的国家色情强制管理小组最初就是根据 CDL 的建议组建的，而且自从 1987 年管理小组成立后，很多 CDL 的律师也进入了这个管理小组。经过长达 30 多年的反色情运动，基廷终于获得了可能终结色情的权利，那些色情商都“老死在监狱”的愿

望得到了总统、首席检察官和司法部的全力支持。

1973 年，在最高法院对色情的裁决中，允许当地社团组织强制执行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其实它的初衷是保护那些保守势力的地区不受到自由主义宽松的道德准则的影响。国家色情强制管理小组想利用高法的裁决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试图把那些保守势力城镇的道德观和道德规范推广到美国各地。如果管理小组经过调查后发现美国有些地区的陪审团经常对色情指控投赞成票，管理小组就会在那个地区根据联邦法律对当地的色情发行商提起诉讼。领导国家色情强制管理小组的 H. 罗伯特·肖沃斯（H. Robert Showers）曾经是一名北卡莱罗纳州的助理法官，他认为《花花公子》适合色情法律的定义，应该受到制裁，他希望这个国家根除暧昧色情和露骨色情出版物，H. 罗伯特·肖沃斯经常在他的公文上签署“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代号为“苦艾”（Wormwood）的计划是里根的司法部以加利福尼亚州那部地区的主要“硬核片”制作商为对象制定的，可是还不能在加利福尼亚对他们提起指控，因为不能保证当地的陪审团会认定他们罪行成立。政府派遣阿肯色、阿拉巴马、俄克拉荷马和佛罗里达等州的联邦探员参加色情行业大会，冒充影视商店的老板。这些探员找到了许多“硬核片”制作商和他们的“产品”。当“硬核片”录像带邮到那些保守的地区的诱饵商店，联邦检察官就指控那些加利福尼亚的色情公司犯有州际传输色情物品罪，而那些保守地区通常是指佛罗里达的首府塔拉哈西市、俄克拉荷马州的塔萨尔市、阿伯丁市、墨尔比市以及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等地。几十个“硬核片”制作商和发行商都是以这种形式被指控。可是“苦艾”行动在打击成人电影产业上则彻底失败了，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经过法庭调解和一些持有赞成观



点的法官的干涉，大部分的被告只得到法院的短期判罚或是支付罚金而已。当谈到“苦艾”行动时，一个“硬核片”制作商抱怨道，“我们过去已经习惯了流氓的狡诈勒索，可是令人意外的是，联邦政府也为了钱打击我们。”

当时“波斯特普恩”（Postporn）计划的目标指向了那些出售硬核色情片的邮寄公司，它的基本策略是 CDL 的律师在 1983 年提出的，随后经过两年的策划，犹他州的律师布伦特·沃德以备忘录的形式呈给米斯首席检察官。沃德强调美国各地的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对那些邮购公司提起“复合指控”①，他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一家公司立刻就有可能在美国各地面临多达 35 次的不同犯罪指控。司法部很快就采用了沃德的策略，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有一项指控成立，而且最大的好处就是当一家邮购公司突然间面临很多的指控时，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只能疲惫地应付接连不断的官司而无暇顾及公司的正常业务，公司就很可能因此被迫关张。因为政府有取之不尽的财力、物力和时间支持这场长期的战争，不可能有任何一家公司有如此的实力和时间与政府抗衡。而美国的律师指南只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多地域、不同时间段的指控，由于这种做法对被告“不公平”，所以不鼓励这种诉讼的形式。可是在助理首席检察官威廉·魏尔德（William Weld）的指导下，司法部随即改变了律师指南中关于多地域指控的条款，“鼓励”在色情案上使用多地域指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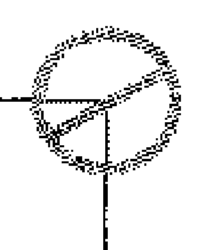
1986 年 5 月 29 日，大约 30 名联邦和州执法人员，至少还有一名犹他州的联邦探员突击搜查了菲利普·哈维的北卡莱罗纳德仓库，公司的员工在办公楼内接受了一整天的盘问，个人物品也

① 在多个地区同时指控或在不同时间段里相继指控。——译注

遭到搜查。哈维对此非常震惊，许北卡莱罗纳州的“基督徒行动联盟”的许多成员常年订购“亚当夏娃”的产品，他们也对突袭行动表示了抗议，而且 FBI 在 1984 年曾经调查过哈维的公司，当时调查的结论是该公司没有出售任何淫秽色情的商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地的 FBI 特工拒绝参与突袭哈维公司的行动，邮政检察人员也是新任命的，而且他们都是很勉强地参与了这次行动。

哈维的律师约翰·明茨和维德·史密斯（前 FBI 官员）拜会了犹他州和北卡莱罗纳州的联邦检察官，寻求庭下和解。检察官请他们转告哈维，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哈维以后必须停止销售“硬核片”和“暧昧色情”的录像带以及类似《性乐趣》（*The Joy of Sex*）那种类型的书刊。虽然哈维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他还参与了很多有意义的和非盈利的工作，但是他也还不想接受检察官建议的交易，拒绝了来自政府的威吓。哈维事后回忆时说：“当你不得不说‘受够了，再也受不了’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发生了转折。”

北卡莱罗纳州奥兰奇县的地区法官卡尔·福克斯认为对菲利普·哈维的起诉纯粹是浪费时间和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但是邻近的阿拉曼斯县的乔治·亨特地方法官不认可卡尔·福克斯的说法，他根据州法对菲利普·哈维提起八项散发色情物的指控，而且联邦检察官也支持乔治·亨特起诉哈维。如果亨特能够证明哈维出售的商品违反本州的社会标准，那么随时随地都可以判哈维的罪行成立。1987 年 3 月，哈维在阿拉曼斯县接受审讯，一半以上的陪审员是福音教派的基督徒，还有一个陪审员是牧师的儿子。审讯中，法庭给陪审团出示了一盘含有长时间纵欲情景的“硬核片”，它是由色情明星瓦内萨·德尔·里奥（Vanessa 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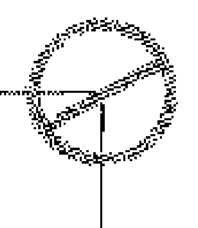
Rio）主演的一部影片。哈维的律师称这部影片中的性取向是健康的，而不是色情的，他没有为在哈维的辩护提供什么有利的证据。经过陪审团五分钟的商议，最终认为哈维的各项罪名不成立。陪审团的主席罗伯特·韦斯特曾经对《格林斯博罗新闻与记录》（*Greensboro News and Record*）评价过此事，“从这次审讯看，政府似乎很努力要限制哈维的商业行为，但是没有做到。”哈维得到了本地社团的支持后，他的信心大增，但是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因为一个北卡莱罗纳的法官对他的部下讲，“在‘亚当夏娃’的案件后，我们要吸取教训重整旗鼓，下一次我们一定用尽可能多的罪名对哈维进行指控。”

“波斯特普恩计划”的复合指控由国家色情强制管理小组的多名律师协调实施，H. 罗伯特·肖沃斯选中了一些邮购公司作为目标，选出合适的地区对他们提起指控，还制定了时间表，并准备了所需的搜查证、起诉内容以及庭下和解的条件。“波斯特普恩计划”是由联邦政府直接组织，并且在全国范围实行的旨在制止通过邮政发行硬核色情物品的行动，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经营“布鲁塞尔/帕克投机”（Brussel/Pak Ventures）邮寄公司的卡尔·布鲁塞尔、他的妻子和儿子就受到四个不同地区的指控，每间隔两个星期或者更短的时间里，他们就得去法庭接受一次审讯，布鲁塞尔最终接受了庭下调解，同意关闭邮购公司，不再销售硬核色情物品并接受一年监禁的处罚。另一家“康涅狄格”邮购公司的拥有者艾弗拉姆·C. 弗里德伯格（Avram C. Freedberg）也同时受到康涅狄格州、密西西比州、印第安纳州和特拉华四个州的指控，当他想挑战司法部的这一行动策略时，管理小组马上威胁他也要指控他的妻子，弗里德伯格最终被迫接受庭下调解：解散公司、承诺永不推销、贩卖和分发流

行的性物品。还有其他五家邮购公司也被迫接受了类似的调解方式，关闭了他们的公司。然而在上述的案例中，法庭没有做出任何法律判决，指明他们出售的商品是色情物品。

当菲利普·哈维知道了犹他州、肯塔基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正在调查“亚当夏娃”后，他愤而反击，哈维控告司法部的复合指控侵害了他享受第一修正案的权利。1990 年 7 月，美国地区法院的乔伊斯·汉斯·格林裁定，政府的法律部门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折磨的办法”达到遏制某些受保护的行为，随后格林法官颁布了一个初步的禁令，使得司法部不能在同一时间、多个地区对哈维进行指控。在格林法官颁布禁令的几个星期后，司法部做出了反应，尽管哈维的公司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向犹他州邮寄过任何的产品目录和商品，司法部依然在犹他州对哈维提起色情罪指控，哈维也在联邦法庭上对这一指控发出挑战。1992 年 5 月 26 日，第十巡回法庭裁定撤销犹他州对哈维的色情指控，该裁决中指出，有确凿证据表明司法部使用“重复犯罪指控，违反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哈维成功地迫使政府放弃使用复合指控这一威胁手段，但是哈维并没有取得全面胜利。在乔治·老布什总统卸任前的一个月，司法部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进攻，又一次搜查了哈维的公司，并且没收了一个阿拉巴马州用户的名单。通过与阿拉巴马州的联邦检察官的庭下调解后，哈维最终还是承认了一项罪名——违反美国邮政规定罪，因为在 1985 年，公司使用的邮寄纸袋上的字号不合乎美国邮政部门的规定，哈维被法院以轻罪处理并课以 25 万美元的罚款。

虽然从表面上，哈维与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大战耗费了他 300 多万美元的法律费用，但是从实际效果看，“波斯特普恩计划”的成功实施反而帮了哈维大忙，因为“成功的庭下和解”



替哈维消灭了许多竞争对手，同时"复合指控的威胁"也使得那些想进入邮购行业的人必须三思而后行。现在，"亚当夏娃产品目录"在美国的年发行量高达3000万份，吸引了200多万的客户，其中有很多客户来自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已婚人士和郊区居民。判决后，这本产品目录已经不能再寄到美国南方某些州的城镇和村庄，这些州通常都是保守主义势力占主导的州，那里的顾客已经抱怨得不到产品目录了，而哈维也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再与政府开战。现在如果向目录里添加新产品，他都把它们交给属于美国性教育家协会、美国法律协会以及美国临床医学家协会的顾问们手中，先让他们过目把关。这些独立的评论家在"亚当夏娃"出售它们之前必须给出一个意见：它们是否对人们的身心造成伤害？哈维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在法律上带来好处而且对公司员工的士气也有好处，因为他的公司有四分之三员工是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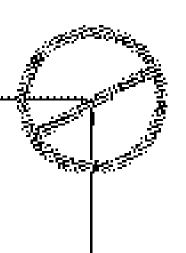
1990年，哈维的公司开始制作性教育的录像带，公司不久就成为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而且它的广告出现在像《滚石》和《亚特兰大》月刊这样的主流杂志上。哈维事后非常庆幸自己能从一场浩劫中幸存下来，因为对手借助的是"主的名义和政府的力量"。他现在仍然定期地飞到发展中国家会见那些执行他倡导的计划生育项目的官员们。我们的交谈被一个来自亚的斯亚巴贝市的电话打断，目前他正在援助埃塞俄比亚口服再水化（rehydration）盐，救治严重感染痢疾的儿童，这些援助只是他海外社会市场计划中的一部分。最近他又将许多由明星签字的"尼娜·哈特利收藏品"的一系列产品增添到他的销售目录里，一个尼娜·哈特利爱神娃娃的售价是149.95美元，而且还不含电池。

行贿与勒索

1993年2月9日上午7：30，三名美国特别武装警察冲进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阿纳翰市的一个小公寓，随着一声"嘿！鲁本"，惊醒了仍在床上睡觉的鲁本·斯特曼，此时，目瞪口呆的斯特曼惊恐地望着屋内的武装警察，无奈地举起双手，没有进行丝毫的抵抗。经过检查后，警察发现只有斯特曼一人住在公寓，卧室梳妆台上有一个敞开的公文包，里面有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在过去的五个星期里，斯特曼一直住在这个租来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公寓的拥有者叫做亚伯·莱文。在邻居们的眼里，斯特曼就像一个退休的老人，丝毫看不出是个流窜犯。斯特曼并没有出国避难，他选择了这个离迪斯尼乐园只有几英里距离的藏身地。

直到现在，政府也没有透露如何发现鲁本·斯特曼的准确的藏身之地。理查德·罗斯菲尔德和克雷格·莫福德曾经对我说过一些可能性，其中包括银行记录和电话记录、洛杉矶一个邮电局监视录像、某个退休侦探的努力或一些不明来源的线索。斯特曼则认为是他的新秘书斯蒂芬妮·弗里德曼出卖了他，因为在他被捕的那个早晨，有人发现斯蒂芬妮·弗里德曼就在克利夫兰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小组的办公室里。

斯蒂芬妮·弗里德曼是米基·弗里德曼（绰号侏儒）的女儿，米基·弗里德曼生前是俄亥俄州一家成人电影院的老板。在1991年春天，弗里德曼死后，他女儿把这个消息通报给鲁本·斯特曼，斯特曼给斯蒂芬妮和她兄弟道格拉斯买了机票，请他们来加利福尼亚，并将兄妹俩安排到在范努斯的家中居住。斯特曼帮助斯蒂芬妮在"约翰逊医生"公司的艺术部门找了一份工作，她干了几个月后就辞职了，于是斯特曼请她做私人助理。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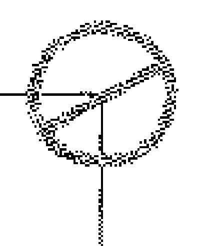
她就了解到斯特曼那些复杂的资金往来程序。先是收到许多国内各地公司上交的支票，这些收到的支票都放在一个绿色的账本里，随后的工作程序就是：复印，盖章签字，寄往瑞士、卢森堡和荷兰，再分存到不同的账号。斯特曼曾经对她解释道，因为美国政府是他的头号敌人，所以这样的做法能把政府调查人员引入死胡同，即使他们发现了一个账号也很难再找到其他的账号。

仅在1992年弗里德曼工作的最初三个月里，经她处理的那些先存到海外，再辗转回到美国的钱就有44.5万美元之多。从国外返回来的美元经常存到斯特曼的"贝弗利山庄法律公司"（Beverly Hills Law Firm）的信托账户。这又是斯特曼发明的另外一种洗钱的方式，这种资金往来的操作即使在斯特曼的监狱服刑期间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未间断过。斯特曼在伯伦监狱的每一天至少和弗里德曼通一次电话，而且她每个星期都到监狱"探望"斯特曼。1992年，弗里德曼在洛杉矶为一家"逃亡公司"（Escape Inc.）开了银行账户，不久之后，她兄弟道格拉斯开车把在监狱外路边等候的斯特曼接走，先进了一家快餐店，随后大约在午夜的时候，斯特曼在圣费尔南多山谷富人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下车走了。在斯特曼在逃期间，斯蒂芬妮·弗里德曼负责他的衣食，她兄弟则承担斯特曼出行和居住。

在斯蒂芬妮和道格拉斯接到传票前往接受克利夫兰大陪审团的调查之前，斯特曼的妻子内奥米·德尔加多开车将他们送到洛杉矶机场。在路上，她曾经叮嘱他们不要讲真话，并且开玩笑地说，如果记者要是问他们出庭后要去哪里，就说要去迪斯尼乐园。事后，按照罗斯菲尔德和莫福德的说法，在捕获鲁本·斯特曼之前，他们两个人确实准备在大陪审团面做假证。可是当他们知道鲁本·斯特曼已经被逮捕之后，两个人的脸色顿时苍白可

怕，随即在请教了他们的律师后，决定与法庭合作。斯蒂芬妮·弗里德曼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和参与的事情通通告诉了罗斯菲尔德和莫福德，其中包括新建立的海外公司、银行的新账户、违反国税局的转账行为、越狱的经过以及斯特曼试图贿赂怀特法官等等。当时，罗斯菲尔德和莫福德还有些怀疑斯蒂芬妮的供词，于是她给他们详细描述了斯特曼和他妻子内奥米·德尔加多在法庭审理逃税案时贿赂陪审员的经过，特别提到当时内奥米·德尔加多出庭时的诱人穿着就是为了引诱一名陪审员。

早在克利夫兰法庭进行庭审的那些天，出庭接受询问的德尔加多经常对一名男性陪审员微笑和飞眼，这个当时只有 20 岁出头小伙子是一名汽车修理工，面对德尔加多的举措，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知道这个漂亮的献媚者可是主嫌疑犯的妻子。庭间休息的时候，他出去在电话亭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这时候有人给了他一张便条，上面写了一个餐厅的地址、约会时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唇印。这个年轻的陪审员也不顾这个案件还处于审议期间，他还是在约定的餐厅与斯特曼的妻子见了面，这个时候他还觉得是在做梦，感觉生活也变得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可是不久之后，他就变得不安起来，因为德尔加多开始和他讨论起这起逃税案，并建议他做出斯特曼无罪的结论。等到饭后德尔加多送他回家的时候，这个年轻的陪审员更加心神不安，德尔加多竟然在奔驰车的后座上对他百般挑逗，也不顾开车的司机就是斯特曼的保镖。德尔加多后来曾经对她的朋友讲：为了丈夫，自己可以付出一切。但是事后证明德尔加多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作用，因为这个年轻的陪审员到父母家门口下车的时候，只接受了德尔加多一个在他脸颊上的吻，以后他就拒绝和德尔加多再见面甚至都不接她的电话，而且在陪审团对斯特曼的犯罪指控进行和议的



时候，他也对斯特曼的所有罪行成立投了赞同票。

听过贿赂陪审员的事情后，理查德·罗斯菲尔德或多或少地有些后怕，虽说当时坐在法庭里的罗斯菲尔德对他多年辛辛苦苦收集的证据非常有信心，但是在审讯期间，政府部门和法院一点都没察觉到鲁本·斯特曼想搞定一名陪审员的行动。逃税案已经过去三年多了，但是那个年轻的陪审员至今也没有向当局透露过一点关于他和德尔加多的饭局以及他和斯特曼的妻子通过电话的事情。罗斯菲尔德认为，这真是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而且很有可能成功，因为一个举棋不定的陪审团对政府来讲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因为假如德尔加多引诱的是另一个陪审员，那个人就有可能为了性和金钱在陪审团的和议中做出无罪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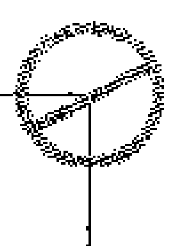
斯蒂芬妮和道格拉斯与政府全面合作，他们不仅提供证词还带领调查人员来到位于范努斯的斯特曼家的储藏室，那里隐藏着斯特曼最新的财务记录。作为他们合作的回报，政府不仅不对他们进行起诉，还按照司法部的证人保护计划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并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定居点。

很快，罗斯菲尔德又一次陷入到繁琐的核查之中，不得不再次精心检查这些从利比里亚公司和瑞士银行得到的新票据。斯蒂芬妮·弗里德曼给美国国税局提供了一份的长达八页的人员名单，这些人不理会欠缴美国国税局的税款仍然把钱交给鲁本·斯特曼，而且这个名单是斯特曼亲笔写的，名单上的有些人如今已经是性产业中赫赫有名的人士。从记录上看，即使在斯特曼服刑的短暂日子里，他每个月仍然至少有 15 万美元的进账。斯特曼被捕后，美国国税局经过几个星期的核对，确认斯特曼所欠的逃税款，已经从原先的 490 万美元上升到 2900 万美元。根据这个数字，斯特曼可能是美国历史上个人逃税数目最多的人。罗斯菲尔德按图

索骥，接触斯特曼的那些上贡者，代表美国国税局清晰地告诉他们：从今天起，他们上贡的支票都要交到美国国税局。直到今天，那些曾经被斯特曼多年刮掉的“奶油”终于回到了国库。

为了避免监狱之灾，内奥米·德尔加多同意与法庭合作帮助调查怀特法官的受贿案，联邦官员没理由相信怀特法官卷进阴谋中，可是同样，法庭也需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在斯特曼越狱后不久，他曾经给桑福德·阿特金打过电话，怒斥他偷走了50万美元。为了取得证据，法庭让德尔加多想办法和桑福德·阿特金见面，阿特金由于确信斯特曼又一次身陷囹圄，他欣然赴约，并将他如何试图贿赂法官的事情毫无隐瞒地告诉了德尔加多，这次他失算了，因为德尔加多的身上藏有一个小型麦克风。他们的谈话录音提供了阿特金确实从斯特曼那里拿到钱并且计划贿赂法官的证据，随后又对怀特法官展开深入的调查，最终的调查证明怀特法官没有卷入斯特曼的阴谋中，而且对桑福德·阿特金对斯特曼说过的所谓是怀特法官的“承诺”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些承诺都是桑福德·阿特金本人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

1993年3月10日，鲁本·斯特曼在芝加哥被指控犯有十项勒索罪和同谋罪。因为炸弹案中有人死亡，依照联邦法律，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判决。庭审期间，检察官曾经建议如果斯特曼能说出他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关系，法庭会考虑减刑，斯特曼断然拒绝了检察官的建议并且申明，他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没有一点联系。本案从1993年8月正式开庭，内奥米·德尔加多是起诉方的一个关键证人。她作证，斯特曼曾经威胁梅，如果梅不付欠他的钱，那么就要伤害罗伊·梅、保拉·梅的孩子，还要烧掉他们的房子。但是在法庭后来的交互询问中，内奥米·德尔加多变得非常神经质、歇斯底



里，时不时痛哭并且声称克利夫兰的检察官胁迫她指证斯特曼，她还说："我认识斯特曼已经14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伤害过任何人。"

经过两天的审议，陪审团认定斯特曼犯有共谋敲诈罪，但是直接参与爆炸案的指控不成立。虽然陪审员们相信斯特曼确实雇人前去摧毁那些投币式放映机，但是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地证明斯特曼知道使用炸弹这一方式，所以这项指控不成立。六个星期后，也就是1993年10月26日，内奥米·德尔加多也受到起诉，法庭指控她贿赂一名陪审员以及指示弗里德曼作伪证误导大陪审团。她的律师指责政府背信弃义，声称德尔加多的证词已经被法庭采纳，法庭不应该再对她提起有罪指控。克利夫兰的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门的律师说，他们不认可德尔加多的证词，他们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承诺，而且德尔加多现在依然隐藏着斯特曼的一些财产。贿赂陪审员是一项很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决定严厉惩处她。斯特曼得知这些后，曾经愤怒地对《克利夫兰的老实人》的记者说道："他们的矛头不只是对我一人，而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为何不起诉我们六岁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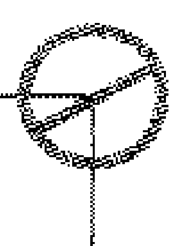
斯特曼也被指控犯有贿赂陪审员罪以及唆使弗里德曼在法庭上作伪证，在得知上述的两项指控后，他申请法庭给他指定一名辩护律师。他的朋友亚当·布尔茹瓦律师已经在芝加哥的审判中免费为他辩护。斯特曼声称他现在破产了，律师费和美国国税局的税款已经使他一无所有。斯特曼强调，在递交到法庭的财务报表里，他现有的流动资金大约只有10美元。联邦官员同意了斯特曼的请求，指定一名公共的律师为他辩护。

1994年6月17日，斯特曼在芝加哥出庭，等待美国地方法

官保罗·普伦基特对他的逃税案的宣判，普伦基特根据联邦判决指导方针——最低判决，裁决斯特曼逃税罪成立，判处斯特曼十九年零五个月的监禁且不得保释，而此时，斯特曼已经是一个接近70岁的老人了，同时法官拒绝了政府要求的罚款请求。斯特曼告诉法庭他已经身无分文了，他说“现在我有的也只是监狱里的账号了，我反对那些人指正我还有其他的账号。”

谁关心一个色情小贩

在很多人的眼里，拉里·弗莱恩特长期以来已经充分表现了色情业里的邪恶，他绝对属于应该按照色情法法办的那类人。他的旗舰刊物《皮条客》已经出版了近30年，这本刊物长期奉行挑战当局和社会风气的原则，目标就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可以看到杂志里的那些低俗幽默，而这些粗俗的幽默大都具有冒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亚裔美国人、女人和同性恋群体的倾向。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臭名远扬的《皮条客》封面内容就是在“A级粉红色”（Grade A Pink）标题下的一张把一个女人放到绞肉机里的照片。弗莱恩特经常喜欢以诋毁美国形象和离经叛道者的面目出现，他曾经穿着用美国星条旗制成的尿布出现在法庭上，因为在最高法院大喊淫秽言语被判处五个月的监禁，也曾经在1984年以共和党员的身份竞选美国总统，他当年的竞选口号是“谁关心一个色情小贩”。一些有组织的宗教组织特别是像基督教新教派，成为弗莱恩特大肆攻击的目标。弗莱恩特曾有很多年都把耶稣基督作为杂志的出版人，耶稣基督的名字曾经一直出现在《皮条客》的刊头上。1980年代，杰尔·福尔韦尔牧师（Reverend Jerry Falwell）状告弗莱恩特诋毁他的名誉并且要求其赔偿4500万美元的名誉损失费，因为《皮条客》里的一个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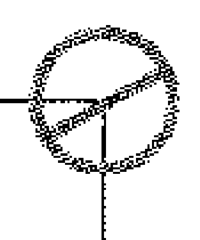
滑稽作品里暗示杰尔·福尔韦尔牧师在厕所和他母亲乱伦。最后这桩案件打到了美国高等法院，最终最高法院根据宪法保证讽刺的权力裁定弗莱恩特无罪。

弗莱恩特的办公室位于一座现代建筑风格大楼的顶层，可以俯瞰贝弗利山，办公室的灯光柔和协调，巨大的房间满是古董、油画、青铜器和蒂凡尼风格的灯，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很像维多利亚时代铁路资本家的办公室。当我拜访他的时候，弗莱恩特正坐在一个厚重结实的写字台后面，台面上规规矩矩地排放着他出版的各种杂志，他身穿三件套西装，梳着背头，看上去绝对是一个谦逊、富于思考并极具理性的人。从外貌和风度上看，他都可能是辛辛那提扶轮社（the Cincinnati Rotary Club）的会长。谈话开始时，弗莱恩特的声音不高，一边说一边摇晃着手中的咖啡杯，可是当我谈到他的老朋友和对手时，他的声调立刻高起来而且眼中充满了怒火。

拉里·弗莱恩特已经认识鲁本·斯特曼几十年了，他一直认为斯特曼是个好人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弗莱恩特至今不理解斯特曼为什么越狱后不出国而一直呆在加利福尼亚，而且也没有人能理解斯特曼的这种做法。弗莱恩特对斯特曼的遭遇深感震惊，认为监禁的判决明显是冤案，是不正当一方的胜利，鉴于他自己过去与法律的一些冲突，也有些唇亡齿寒的感觉。而另一方面，提起查尔斯·基廷现在处境的时候，弗莱恩特的心里感觉比较愉快。多年来，基廷一直利用他的影响，力劝俄亥俄州的检察官在辛辛那提取缔《皮条客》，并且试图让检察官起诉弗莱恩特犯有色情罪，并将弗莱恩特送进监狱。两个人曾经有过多次交锋，互相指责。弗莱恩特始终都认为基廷是个说谎者和骗子，现在政府也已经同意这种观点了。

基廷的“林肯储蓄贷款”公司破产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银行破产案，遗留下高达26亿美元的债务，而且基廷的反色情组织（CDL）也被丑闻纠缠不清。从1980年代中期后的三年时间，基廷把84万美元从“林肯储蓄贷款”公司和它的控股公司转到CDL。这期间，银行已经摇摇欲坠濒临破产了，而CDL也于1989年解散了。随后，米斯委员会一位声名显赫的成员，也是第一年“查尔斯·H. 小基廷”奖获得者的布鲁斯·里特神父也辞去了他在“格芬能屋”（Covenant House）的职务，他面临金融指控和涉嫌不适当的性行为指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查尔斯·H. 小基廷”奖是为了奖励那些提倡良好的社会道德和风尚的人士，而“格芬能屋”是纽约一个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的避难所。就是这个曾经不断地要求米斯委员会和美国政府谴责惩罚同性恋行为的里特神父，他自己却用“格芬能屋”的基金去找年轻的男妓。基廷现在在监狱服刑，里特因为龌龊的行为已经退休并去了修道院，而弗莱恩特正在新的办公室里享受着愉快的心情，津津乐道自己的正确判断，雄心勃勃地准备将《皮条客》推向另一个高峰。

拉里·弗莱恩特预测将来的电视机和个人电脑一定能合为一体，那时的美国人躺在床上就可以用遥控器巡游因特网，用手中的遥控器就可以订“硬核片”。最近，弗莱恩特又发行了一本新杂志《皮条客的艰难驱动》（*Hustler Hard Drive*），他认为“硬核片”录像带很快就会被DVD取代，而它们最终都会被色情网站取代。弗莱恩特认为以后凡是提供成人物品的系统都会具备更隐秘的交易流程，而因特网正是那种集传统视频商店的多选择性和电子邮件的高隐私性于一身的系统，因为你只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就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东西。



最近几年里，弗莱恩特预测的网上销售色情物品确实流行起来，色情又一次站到了科技的前沿，因特网上的视频传输已经应用了 JAVA 技术，人们也可以在因特网上使用加密的信用卡。现在美国人每年在在线色情上的花费接近 10 亿美元，对成千上百万的人来讲，浏览硬核图片和与陌生人的性聊天已经成为了他们每天的例行公事。2000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31.9% 的男人和 10.5% 的女人访问过性网站；同年《今日基督徒》（*Christianity Today*）的调查发现，27% 的美国牧师访问色情网站的次数从“一年几次”上升到“一个月多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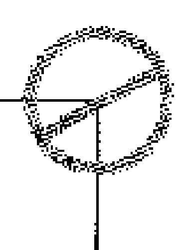
由于人们可以方便地、隐秘地在线浏览色情文学，色情网站加速了性杂志的衰退。充满裸体照片的杂志现在已经过时了，《阁楼》（*Penthouse*）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花花公子》每月都亏钱。从 1990 年代开始，《皮条客》就开始日渐没落，看起来像是夕阳产业。拉里·弗莱恩特已经对公司进行了多样化的改革，引进各种消费者杂志，制作发行“硬核片”，还建立了颇为赚钱的“皮条客”网站。即使这样，弗莱恩特现在的色情新世界将来也有可能被色情制作商抛弃。1997 年，大约有 22000 家免费提供硬核照片的网站，而今天这样的网站已经接近 30 万家了，而且那些“硬核片”的职业制作高手都迅速地改换门庭充当起网站的业余高手了。现在已经很难利用色情从因特网上赚到钱了，因为你很难控制什么类型的内容被贴到网站上，换句话说，你很难知道别人的网站上会有什么更加新奇招眼的内容。弗莱恩特告诉我，他下载的内容让他非常吃惊，“我的意思是，我都不敢发表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所有限制因特网色情的法律尝试和努力都以失败告终。1997 年，最高法院裁定《通讯行为准则

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违背宪法，五年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否定了《儿童在线保护法案》（*Child Online Protection Act*），其理由是，两项法案涉及的范围太大，有可能限制那些与性产品相关的浏览和访问，而不能真正限制对淫秽色情的访问。尼克松的反色情淫秽委员会在三年前提出过一个针对色情的调整计划，当时就遭到反色情组织的强烈抗议，他们建议应该更加严格限制硬核淫秽的色情物的发行形式。该委员会则强调成人有权利购买色情出版物，但是应该有严格的限制规定色情出版物的宣传和限制色情出版物的销售地点。如今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硬核片"公开地摆在报摊上出售，而它们的旁边依次摆放着一本本的著名美国青少年杂志《人物》（*Teen People*）。

克林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完善色情法律的努力，废除了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国家色情强制管理部门已经更名为非法利用儿童与色情部门（the Child Exploitation and Obscenity Unit），从名称上就可以反映出重心的转移。对涉嫌儿童色情案的关注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主流色情分销商的关注。然而在乔治·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中，他表示了对性产业的强烈关注，这些有可能刺激司法部再一次对性产业进行新一轮打击。在2000年的竞选活动中，小布什强调"一定要加强联邦色情法。"首席检察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上任不久也邀请了很多出名的反色情斗士到他的办公室出谋划策。康斯托克法令依然在册，淫秽演讲依旧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在RICO法令下，如果裁定一盒录像带是淫秽的，政府就可以没收整个影视商店。

为了避免与现在的法律发生冲突，一位性产业的著名律师



保罗·坎布里亚（Paul Cambria）近期为“硬核片”制作商和发行商整理了一份参考备忘录，详细解释了当前那些针对色情的新规则。他奉劝大家：“不要出现以下的主题，除非是在自然界的背景下，否则千万不要有小便的镜头；不能出现棺材；不能有眼罩；不能出现滴热蜡的镜头；淫秽的玩具可以，但是不能出现下流淫秽的镜头；不要用黑人和白种女人作为表演的主角等等。”

拉里·弗莱恩特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儿童接触淫秽的色情物品，但是他坚信成人可以安全地阅读任何内容的书籍以及各种电影，而色情法案就是对高智商的美国人民的侮辱。弗莱恩特讲，如果一旦废除美国的色情法案，他相信色情物在短时间内一定会四处泛滥，但百花争艳的场景一定不会太长。因为一旦没有了禁忌，一旦色情产品失去了禁锢，人们最终就会逐步丧失对色情的兴趣和关注。在色情物品流行过后，色情市场一定会落入低谷。弗莱恩特还预言，如果调整色情法，十年后性产业的规模一定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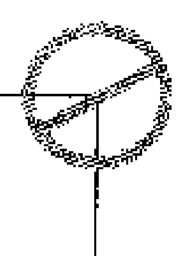
布鲁斯·A. 泰勒是“国家儿童和家庭法律中心”的主席和首席律师，泰勒早在1973年就接触过色情案件，那时候他是克利夫兰检察官办公室的法律自愿者，协助调查鲁本·斯特曼。1980年代初，他是CDL的一名普通辩护律师，不久进入了司法部，成为色情部门的高级庭审律师，他以检察官的身份参与了斯特曼在拉斯维加斯州的淫秽罪审判。“国家儿童和家庭法律中心”强烈支持儿童远离因特网上那些含有露骨淫秽描写的作品。泰勒认为拉里·弗莱恩特的假设简直是荒谬可笑的，废除国家淫秽法绝对就是一场灾难，泰勒反对淫秽色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卖淫是紧密相连的。经过近30年与色情行业的斗争，泰勒

始终不能相信有些性产业中的人为了钱还能做什么。不论菲利普·哈维看起来有多么好，泰勒都认为菲利普·哈维“是色情业的男妓”。布鲁斯·泰勒警告我不要被弗莱恩特的话所蒙蔽，“他身在这个行业里，当然希望这个行业合法化!”

拉里·弗莱恩特的理论——色情合法化最终会降低对色情的需求，似乎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其实这种结果早在几十年前在丹麦就得到了验证。1969 年，丹麦政府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废除了淫秽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放弃色情法的国家。根据哥本哈根大学刑法和犯罪学学院的前任院长瓦恩·格雷维（Vagn Greve）的说法，丹麦废除色情法的初期，色情消费确实出现过短暂的上升，但是很快色情业就进入了长期的持续下降。格雷维对我说，“从那时起色情业一直都在缩减。”现在哥本哈根色情业的收入依然很高，但那是因为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来源于外国游客。格雷维已故的同事贝尔·库钦斯基（Berl Kutchinsky）研究了丹麦色情合法化 25 年后的影响。在“色情波浪高涨”几年后的一次对哥本哈根居民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丹麦人认为色情既“有趣”又“令人厌恶”，其他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点。“对一小时色情刺激的最正常的直接反应都是厌倦。”

黑帮们干了什么?

鲁本·斯特曼在加利福尼亚州隆波克的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后，被转押到肯塔基郊外的一个中等安全级别的曼彻斯特联邦改造收容所的监狱继续服刑。其间很少有性产业的老朋友来监狱探视。现在的色情公司都已经与那些著名的贸易公司签订了发行协议，像斯特曼这些老一辈的业界名人已经逐步离开了人们的视线。1997 年 10 月 27 日，昔日的色情业枭雄鲁



本·斯特曼由于“心脏和肾衰竭”，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市的一所监狱医院中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虽然《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个简短的讣告，但是《纽约时代周刊》和主要的电视媒体都没有相关的报道。只有《查塔努加自由新闻》（*Chattanooga Free Press*）发表了一篇社论文章，标题是“色情国王逝世”，文章中提到，“他和同伙引发的邪恶还在继续影响着社会，他们造成了美国文化的衰退，造成了年轻人思想品德的堕落。”只有少数几个家庭成员出席了斯特曼的传统犹太式葬礼，一代色情帝国的皇帝鲁本·斯特曼安葬在旧金山南面的一个小镇。

司法部至今也没有透露过它们当年递交给瑞士政府的档案内容，据传那上面记录了斯特曼与犯罪集团的关系。我力图从克雷格·莫福德那里求证斯特曼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证据，并且对他说，如果政府拒绝回答此问题，势必会引起大众对档案准确性的怀疑。莫福德对我讲，斯特曼与黑社会的证据不容置疑，而且认为我的想法就像是钻进了牛角尖。他对我说：“为什么我们把有组织的犯罪作为目标？想一想，黑社会都干了什么？他们敲诈勒索，用暴力扫除自己的障碍，贿赂法官和搞定陪审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追捕他们。”莫福德认为，不管鲁本·斯特曼在开创事业初期做过什么，但是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和政府文件中所说的完全吻合。

1995 年，理查德·罗斯菲尔德从美国国税局退休，他整整花了 20 年的时间处理斯特曼的案件，现在他是克利夫兰市的一名私人侦探，与他在美国国税局的拍档托马斯·谢安斯基以及其他的人员合作，专门处理白领犯罪案件。罗斯菲尔德这么评价斯特曼，“他曾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曾是个伟大的商人，曾是色情界绝顶聪明的人，许多朋友都曾围绕在他的身边。现在他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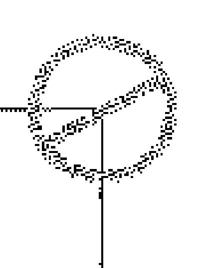
么都没了。当其他人觉得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他身上更有利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做了，其实都是为了钱。”当罗斯菲尔德听到斯特曼一文不文地死去的消息后，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有证据表明，在斯特曼进入监狱前，就已经发现他很难再使用那些曾经属于他的钱财了，他不得不从他的家庭成员和同伙那里借钱买回政府拍卖的他原来在范努斯的房产，也曾经借过10万美元去贿赂怀特法官，斯特曼越狱后的生活已经变得很拮据了。不过，鲁本·斯特曼死去的时候，他究竟是个巨富还是个乞丐仍然是一个谜。

罗斯菲尔德承认，斯特曼可能在海外还有一些美国国税局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数百万美元的存款，因为罗斯菲尔德在瑞士发现的账号只是斯特曼用来洗钱的账号，很可能没发现那些斯特曼存钱的账号。但是罗斯菲尔德不倾向这种假设，他不太相信斯特曼在海外银行存有大量的美元和金条，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调查就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核心，这是我无法想像的事情。”

只是一个无辜的老人

我在1997年走访过曼彻斯特联邦改造收容所，它看起来就像是个公司的总部，后现代风格的结构，带有天窗的天井和白墙，与我想像的监狱有天壤之别。这个监狱位于郁郁葱葱的山丘中，就在达尼尔布恩国家森林的中心。向西约30英里，就是最近的城市肯塔基州的伦敦，就是“世界鸡肉节”（World Chicken Festival）的发源地。监狱离克利夫兰、苏黎世或南加利福尼亚都很远，方圆百里都是群山和大树。监狱有两道围墙，围墙的上面都是带刺的铁网，手持滑膛枪的狱警日日夜夜24小时地开着敞篷车在监狱的墙外巡逻。

此时的鲁本·斯特曼看上去还是很年轻，丝毫看不出已经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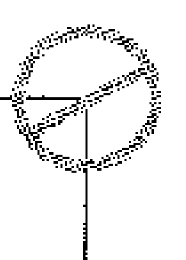
一位71岁的老人。他迈着欢快的脚步向我走来，身穿黄褐色的咔叽布工作服，脚蹬一双新的运动鞋，一头灰白的短发和花白的胡子，而他的眉毛还是黑的，他的握手很有力，依然流露出君主般的霸气。在交谈中，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迷人的、有趣的、充满活力的、乐观的神态，但是至少有一次或两次，当我问了几个他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时，斯特曼展现了他的另一面，时至今日，那时斯特曼冷峻的眼光和脸色仿佛还在我的眼前。我初次见到鲁本·斯特曼的时候，正是他感觉到那些长期的下属和伙伴抛弃他的时候。在监狱会面以及后来的电话采访中，我始终感觉斯特曼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和友善的老人。在采访过程中，他从不拒绝回答问题，他曾经颇感骄傲地对我谈起他的事业，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公司的那些合法以及不合法行为。他声称他和甘比诺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色情行业的见解似乎也没有什么错误，尽管我不能证明他是对的，但也不能证明他是错的，而且我当时也不确定斯特曼是否真的破产了。

斯特曼对美国政府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认为政府对他妻子的处理很令人憎恶，也很不人道。政府判处她两年监禁，而且还把她关到一个中等安全级的监狱而不是监管营地，小女儿只能由爷爷奶奶照顾。政府还想没收他妻子的房子和汽车，其实政府不知已经想过多少次了，只不过现在它有权力了。联邦团员只要想搜查克利夫兰的仓库，他们就倾巢出动，还威胁员工，其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把生意搅乱。早在联邦特工们调查《一个警察的性经历》时，他们的手段就毕露无遗。斯特曼愤怒地说：“他们就是一伙人渣，将来也是，是令人厌恶的一群人，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我也不想抱怨这些，但只要他们还这样，我每一次都要和他们拼到底。”

虽然国税局调查斯特曼在瑞士的账号已经过去15年了，至今他依然对这件事愤愤不平，话语中尽显无辜，完全像是一个受害者。斯特曼伏在桌子上补充道："罗斯菲尔德真是个讨厌的人，他不但对政府撒谎还欺骗瑞士政府，他骗了所有的人。"斯特曼认为罗斯菲尔德提供瑞士政府的证据全是谎言，因为即使是米斯委员会都认为他不是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成员①，很容易就能驳倒与有组织的犯罪有联系的说法。LAPD有很好的理由提高有组织的犯罪参与到色情行业的忧虑，斯特曼对此的解释是："虽然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他们在洛杉矶从来就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也就是没有一个色情罪成立的案例，于是他们

① 米斯委员会已经承认：斯特曼的商业集团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还出售那些或许是淫秽色情的物品，于是可以认定它是"有组织的犯罪"组织。米斯委员会的报告中总结道："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特曼的集团以及一些相当弱小的公司不是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讲它们与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没有任何联系，相反，似乎有证据，而且有在诸如工作分工、迁就融合、协助、共享基金等方面的确凿证据，也有证据表明他们受到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控制，但是不能说明这些公司和集团是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或他们是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的一部分。" See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pp. 292－97.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色情物品交易中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角色问题始终都是各种传言和推测的焦点，而从大量的虚构中剥离出事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我已经尽了全力，但是还是不能给大家一个结论，因为不掌握相关的确凿证据与证明。米斯委员会曾经断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在色情行业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的理由非常的巧妙，你可以在霍金斯（Hawkins）和齐姆林（Zimring）合著的《自由社会中的色情》（*Pornography in a Free Society*）发现米斯委员会结论的依据，波特（Potter）在《色情商人》（*The Porn Merchants*）中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大量的描述；没有几个人怀疑过许多犯罪集团曾经介入到色情物品的制作和销售过程中，但关键的是，是否这些组织的行为符合"有组织犯罪"的传统定义？而且，科萨诺斯特拉犯罪集团控制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一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从那个星期天起就尝试了各种方法。”另外，斯特曼讲，政府扣押了他从1969年代以来的银行记录和商务记录，“那些记录迫使我的高级经理开了口，可是那里有我和甘比诺家族有关系的证据吗？为什么没有证据？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向甘比诺家族付过钱！”那些所谓的联系，都是罗斯菲尔德杜撰出来的。

当我提起罗伯特·迪贝纳多时，斯特曼说：“他是我的一个客户，没人会比他更有影响力了。我把迪贝纳多看成是我的商业伙伴并不是朋友，不过看起来他是个好人。我和他只是生意上的关系，一点都也不知道他已经在黑社会混了十年。他父母是犹太人，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也是犹太人，而且他的孩子都上犹太学校，我也一直认为他是个犹太人，我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这一切也与我无关。不管怎样，戈特的人还是杀了他，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斯特曼声称，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黑帮的威胁，可是斯特曼总是那一句话，“别给我来这套，给我滚！”

在几个小时的交谈中，斯特曼详细地讲述了他如何建立各式各样的公司、无数的色情案以及如何将他的帝国拓展到国外。至于逃税案，斯特曼说他没义务给美国政府钱，因为政府完全有可能用他的钱反过来打击他和他的事业，从他眉飞色舞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仍然沉醉在过去的辉煌里。现在由于市场上有大量的产品以及混乱的价格竞争，色情业近乎崩溃，只是零售商们还不错。斯特曼说，“我们过去制作一部电影的成本高达40万美元，现在你花5000~8000美元就能做出一部垃圾，那真是垃圾呀！过去我经常对我的员工讲，无论如何也不要降低价格，一定要保证质量上升，保持高价格。”

当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时，斯特曼的神情变得消沉起来，其实在我看来，行贿和逃税似乎不符合他的风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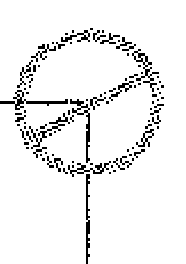
特曼是个杰出的战略家，总是比别人领先一步。当我要求他解释一下炸弹事件时，斯特曼的回答一语中地，“那些人欠我的钱，而且他们还要赖不还钱，所以我们走进了他们的商店并且捣毁了商店，只是给他们传达一个信息而已。结果怎么样，他们又开始付钱了，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其实斯特曼早就知道我最关心的问题——他为什么不出国？我还没说完他就回答我了。“这是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我以为大隐隐于市，只要我不开口、不露面、不去看我的家人，就会安然无事。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她们不能因为我而离开美国去欧洲或是亚洲，让她们和我一起颠沛流离。我觉得如果我留在洛杉矶，远离那些熟悉的人就足够了。但是我不能远离我的妻子和孩子。”

斯特曼曾经提议多付给政府 1200 万美元以期望能与政府达成某种交易，但是政府似乎兴趣不大，拒绝了他的建议。斯特曼说“他们对我恨之入骨，我是国家的公敌。”他发誓说，除了那些合伙人的欠款，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他在监狱里以读书度日，没有几个狱友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从表面上看，现在的斯特曼只是一个无辜的老人。

在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斯特曼对我说：“你不是想知道这个产业如何开始的吗，你眼前的人就是那个产业的创始人！。”

几个小时的会见即将结束，我们和一名狱警从探访室出来，来到外面的院子里。院子里的草坪和小路看起来和大学的校园里的一样，我们的眼睛一时间很难适应外面的灿烂阳光。斯特曼对狱警说，帮我送送这个小伙子，说完掉头就走了，仿佛那个狱警是他的部下。看着他轻盈的步伐，斯特曼的一生就像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年轻的斯特曼开着旧卡车到处贩卖连环画；一



个克利夫兰杂货店的小老板；一个跨国经营的帝国皇帝。他曾经拥有大量的房产、劳斯莱斯和上千万美元，“性”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辉煌和无限的权力，“性”也使他丧失了一切。斯特曼很快就消失在一片黄褐色的囚服中，突然间我又产生了怀疑，鲁本·斯特曼是否又在酝酿着什么。

异教徒和基督徒的观点[①]

在古罗马时期的色情表演里，性和暴力都是真实的而且不含

① 2000年前的性风俗与当今美国社会对色情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冲突。我认为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肉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是一本非常吸引人和发人深省的著作。为了解开早期基督徒强烈抵制世俗享乐的原因，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试图了解那些冷淡的、长期保持神秘的领域，这些书籍中有大卫·M. 霍尔帕林（David M. Halperin）、约翰·J. 温克尔（John J. Winkler）和弗罗马·I. 塞特林（Froma·I. Zeitlin）合著的《性之前》（*Before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艾米·里克林（Amy Richlin）主编的的《希腊和罗马的色情描写与表现》（*Pornography and Representation in Greece and Rom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及麦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的《庞培的爱神》（*Eros in Pompeii: The Secret Room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ples*）（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5）等著作。庞培城废墟中发现的色情作品给许多保守的知识分子带来强烈的震撼，过去这些人的脑子中充满了古典高雅的理想，这些出土的东西完全打乱了他们的思维。沃尔特·肯德里克（Walter Kendrick）在《秘密的博物馆》（*The Secret Museum: Pornography in Modern Culture*）（New York: Viking, 1987）中指出，决意隐藏大众内心的色情泛滥才是现代色情的最重要特征。林恩·亨特（Lynn Hunt）也在其《色情文学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 Obsceni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500－1800*）（New York: Zone Books, 1993）中也探讨了那些传统的价值观正在缓慢地、持续地消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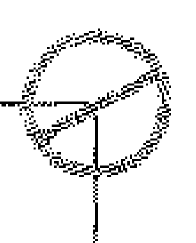
表演的成分，那些富有的古罗马公民用罪犯进行表演，观众们可以欣赏到真实的强奸和谋杀场面，而表演者的死亡就是娱乐的副产品。现在有许多现代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古罗马的性混乱史被后来的史学家夸大了，然而古罗马人对待性的态度确实与现代人有着天壤之别。在罗马帝国的竞技场里，很多形态像涅瑞伊得斯（海中仙女）的女人在巨大的人工池塘里当着众人的面裸泳，许多神秘的宗教仪式和连续七天的农神节[①]很难让人保持自我，这些以无节制的狂欢和放浪为特征的祭神仪式令人疯狂、乱性。不仅仅妓院的墙上有展现性场面的壁画，就连家中的卧室和大厅都采用这种风格的壁画，家中的装饰物都很世俗下流。普里阿普斯[②]的雕塑在花园里随处可见，人们经常把勃起的阳具石雕放到门口或街道的角落，用来阻挡邪恶的降临。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彼得·布朗在《肉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一书中指出，基督教标志着一种对人类肉体的态度变化。异教徒认为芸芸众生通过精神与众神相连，而他们的肉体则属于这个大千世界。可是，圣徒保罗普及了一种精神和肉体之间基本对立的观点，“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肉体成为“圣灵的居所”，所以某些肉体的某些行为就等于玷污。早期的基督徒由于性节制既受到嘲笑又受到赞美。在充满死亡和堕落诱惑的世界里，你只要尽力克服肉体的诱惑，保持肉体的纯洁，最终就能获得上帝的拯救。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这种教义的暗喻得到清晰的诠释，他清楚地指出：“不要

---

① 也译为“狂欢庆祝”，一种以无节制的狂欢和放浪为特征的祭神仪式。——译注

② 男性生殖神，是酒神和爱神之子，园艺和葡萄种植业的保护神。——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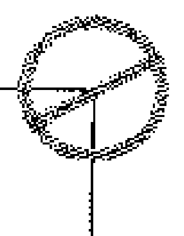
自欺，无论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近两千年，异教徒和基督徒对肉体的争论不休，冲突不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示它们的敌对。旧的道德权威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统治性行为的规则不再受禁欲主义哲学家、神职人员、殉教者以及圣徒们左右，高度的民主政治逐渐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取向，当然这也是自由市场经济满足消费者愿望的结果。虽然我在这本书里提到一些美国色情产业的大亨们，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人就应该为当今美国的色情状况负责，相反所有的美国男女们、那些躲在幕后的色情吹鼓手们、每个州的官员，还有一些你知道的以及那些你从未察觉的人都应该对此负责，美国色情文学就像一面镜子，和流行文学一样，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状况。那些色情批评家们不可能喜欢这个现状，但是这里蛰伏着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自由有多大，付出的代价就有多大。

浮出地面

美国总统加尔文·柯立芝（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曾经说过“美国人民最关心的就是商业”，这句话言简意赅地体现了他的世界观，柯立芝坚信工厂是工人们必须崇拜的殿堂、小政府通常是最好的政府，公司遵守规则同时也不受约束，而且征收少量的赋税。柯立芝的总统任期从 1923 ~ 1929 年，在那段时间，美国实行禁酒，国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产阶级繁荣，那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年代。大萧条使得柯立芝的声誉遗失殆尽，他开始被人嘲笑，罗斯福的新政代替了他的方针和政策，他的观点也被人嘲弄为是狭隘的、墨守成规的、单纯的和冷酷的。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得知柯立芝去世的消息后说：“他们能怎么说?”美国人曾经普遍认为柯立芝是美国最差的总统之一，一直到到 1981 年 1 月，托马斯·杰斐逊的肖像从白宫的内阁会议厅里移出，换上了加尔文·柯立芝总统的肖像，因为新任的罗纳德·里根总统认为柯立芝是他的崇拜的英雄，从那时起，柯立芝的崇拜者就越来越多了。

柯立芝信奉的、里根总统使之复活的商业哲学体系的核心都是市场，他们认为，任何加在商人头上的限制都是自由经济的镣铐，都应该受到谴责。反托拉斯法、劳工安全法、环境法和最低



工资法都是市场经济的障碍，它们阻碍了高效率，是对社会的根本威胁，可是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concentrated economic）就不会这样。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是里根政府时期的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的主管，他认为“如果什么限制都没有，如果只有一百家公司，那么这个世界不会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同时巴克斯特也认为，这些跨国公司互相竞争，由一百个执行总裁控制的商业行为也没什么问题。在政府不情愿限制公司的商业道德的同时，政府又竭力去审理、谴责以及惩处那些所谓道德沦丧的个体，那么买卖自由的权利也就到此为止了，某些不道德的东西被严令不得出售，然而另外一些事情如剥削非法劳工、他们的贫困和可怜的健康状况却很少被引申到道德的层面加以指责。

过去二十年美国的社会风气和经济的走向与1920年代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他的经典历史著作《仅仅昨天》（*Only Yesterday*）中的描述惊人地一致，他在书中谈到的性丑闻、股票诈骗、名人谋杀案、年轻人的快乐主义、严谨的福音主义运动、多头市场、繁荣发展的黑市、对文学反讽的喜好、那个时代的政治漠然在今天都得到重现。这两个年代由意识形态和基本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对无止境繁荣的幻想导致对所有事情的毁灭，两个时代都是突然间结束的：一个是在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整个股票市场崩溃；另一个是在2001年11月1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早晨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地下经济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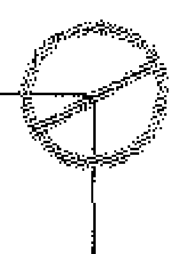
比尔·克林顿曾经在1996年讲过另外一句值得回味的名言，“大政府的时代结束了。”在过去的25年里，联邦管制机构压缩

得非常厉害，犯罪司法系统的规模也变得史无前例地缩小了，但是克林顿总统的两个任期里建造的监狱数量却比以往美国总统任期的都多。柯立芝、里根和克林顿都非常推崇小政府的哲学，而两个布什总统却只是对商业加以限制。现在摆在美国大众面前的是美国政府针对毒品的战争和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而且，政府在这两场战争中动用的资源和力度都超过了对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注程度，这个现实很难改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大政府的时代又回来了，甚至比以往更甚。

主流经济和地下经济之间飘忽不定的关系可以说明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说明墨守成规如何决定着生产和消费的模式；说明市场如何最终取决于人的干涉而不是神的教诲。对照一下鲁本·斯特曼的结局，过去那些曾经多次遭到指控的商品如今已经由美国的大公司大规模地销售了；那些社会长期认为不道德的东西，如今也被普遍认可甚至被认为落伍了；更有甚者，美国社会不仅接受了斯特曼曾经发行的产品而且也认可了他对税收的一些看法。那些总体上曾被限制在地下的商业行为已经逐渐地渗透到主流经济中。①

---

① 在过去的25年中，赌博业是美国另一个从地下经济走进主流经济的行业。1978年，内华达州是美国唯一一个可以在赌场赌博的州。如今，美国的28个州共有800多家赌场，赌博业的年收入已近从1980年的10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600亿美元。目前美国只有三个州不允许合法赌博，它们是田纳西州、夏威夷州和犹他州。原来那些可以导致发行商入狱的彩票如今已经极为普遍了，许多由州政府授权的代理商出售、经营各式各样的彩票。正像彼得·路透在《毒品战争异端》（*Drug War Heresies*）第142页中指出的，“那些本来属于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的钱如今已经转进大众的保险箱里面了”。赌博合法化已经有效地减少了一类有组织犯罪的非法收入，但是合法化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而那些大众彩票本质上就是征收穷人的递减税。



安然公司破产前在海外拥有近900家子公司，其中包括开曼群岛的692家、土耳其和凯科斯群岛的119家以及毛里求斯的43家公司，为了隐匿利润和逃税，成千上百万的美元穿梭在这些海外账户里。在1996～2000年的五年里，安然在四年内从没有给联邦政府交过收入税，而这几年应上缴的税金高达四亿美元。与之相比，当年斯特曼避税的方法显得老套过时了。

过去的十年里，几百家美国公司包括一些美国大保险公司和财务公司为了避税都在海外进行了重组，这些向海外迁移的做法被称为"变性处理"（inversion transactions），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对鸡奸者的术语，当然这里没有了性的含义。这些公司的"变性处理"使联邦政府一年损失大约40亿美元的税收，可是百慕大群岛和许多小国却从"变性处理"中获益匪浅，例如开曼群岛仅有三万五千人，但却有四万五千家海外公司，而这些海外公司的银行资产已经接近七千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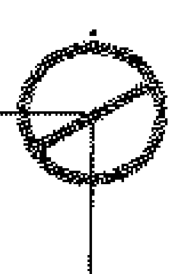
斯特曼时代的洗钱方式是依靠员工转运装满硬币的麻袋、装满美元现金的手提箱和装满金条的箱子，而现在洗钱的方式已经非常先进了。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执行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估计现在每年洗钱的金额大约是全球GDP的2%～5%，大约在8000亿美元到20000亿美元之间。诸如纽埃，瑙鲁和瓦努阿图这些南太平洋的岛国或群岛已经取代了利比里亚，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建立海外公司的天堂。仅在1998年一年，估计就有大约700亿美元从俄罗斯的银行转到瑙鲁，相当于给这个贫瘠小岛建立了一个人均存款700万美元的银行系统。

地下商业除了影响美国企业的许多财务行为外，已经覆盖了许多主流经济的经济行为。曾经只在加利福尼亚农业中出现的黑市劳工，现在在肉类加工业、建筑业以及服装制造业里已经非常

普遍。由于地下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上述行业出现了低工资、无福利待遇以及无生产安全保障的现象。直到1970年代末，在美国的工业行业中，肉类加工厂还是个高待遇的行业，，而如今却成为低收入的行业，但是营业额却是最高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墨西哥已经向美国输出了许多流动的农场雇工，而现在墨西哥又向美国输出流动工业劳动大军，这个工业从业大军如同农场雇工一样很容易遭到剥削，同样是一贫如洗。

美国国民经济中许多重要的领域开始出现了类似欠发达国家的地方。这种变化在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最为明显，那里非法移民的数目急剧上升，大约28%的工人以现金方式领取工资。据“经济圆桌会议”（Economic Roundtable）2000年的研究报告估计，地下经济已经占据洛杉矶县经济的9%～29%。美国航空业的萎缩，制造业工作岗位减低以及大量贫穷的移民涌入，使得洛杉矶的经济日渐依赖那些低工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于是个人收入下降、贫富差距加大、无人支付社会保障金和工资税，而且这个新生的劳动大军很可能限制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今洛杉矶工人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美国其他大城市，洛杉矶11%的适龄工作人群的教育程度不到6年级。在1950年代，洛杉矶还是美国未来城市的标志，乌托邦式天堂的象征，如今它却预示着一个黯淡的未来：回归到早期杂乱无序、充满剥削的经济关系，地下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取得了成功。

非法移民应该对这些变化负责，然而对这个话题的争论过多地受制于种族和文化，而忽视了真正的核心——经济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差距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过去的20多年里，造成大量移民涌入的绝大部分原因不是国家间的经济差异，而是企业主的“功劳”，源于他们大量使用黑市劳工。



许多观点都认为非法劳工是市场衰退的征兆，那些自愿违法的公司利用非法劳工可以取得竞争优势，因为他们不必像雇佣合法本地居民那样支付令人满意的工资以及他们的税款，地下经济使那些使用欺诈行为的业主获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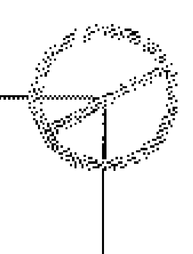
执行严格的劳工法可以很好地解决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它比仅仅在美国墨西哥边境打击非法移民要好得多。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美国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实际上只有 1968 年最低工资的 63%。如果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资，再辅以对违反劳工法的那些公司的大力处罚，就可以大幅度改善贫困美国人的生活。如果把对非法工人的处罚转向对雇主的惩处，那么一定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每人都有各自动机去违法，而后者也就是雇主因此将会失掉的更多，因为工人们关心的中心点不是自己的合法身份而是工资和工作环境。如果不解决滥用非法移民这个顽疾，任其自由发展，那么不久的将来美国就不必接受国外的农民劳力了，因为那时我们也可以对外移民了。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 1933 年政府通过《国家工业恢复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后，他曾经这样说过："那些给工人支付低于生活基本保障工资的公司没有权利继续在这个国家发展下去，我所说的生活基本保障工资不仅仅只够生存而是可以过体面生活的工资。"

看得见的手

那些自由市场经济的倡议者可能对恢复这种经济政策的想法感到心惊胆寒，但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亚当·斯密理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经常在理论上得到喝彩而没有出现在实际当中。亚

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勾画了美国商业发展的蓝图，也特别高度称赞了斯密的理论，但是他却把斯密自由市场的理念搁置一边，相反他强调联邦政府在创建城市和工业社会上应该扮演主动的角色。和当年美国西部开发和定居一样，为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打下基础的铁路建设就接受了政府大量的土地许可和补助金。美国国内战争以后，保护美国制造业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关税行为与重商主义一样，也凌驾于斯密的自由贸易观念之上。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说明政府依然遵循着同样的指导方针：例如新政对资本主义的拯救；二次大战期间政府对工业的直接投资；艾森豪威尔时代高速公路的建设；为航空取得优势的军事开销以及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行业的投资。出于某些理由，这些事实在当今对经济政策的辩论中都没有被提到。美国经济最好的时期就是从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这段期间，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高税收、强有力的反托拉斯行为以及前所未有的各个级别的联盟资格。美国历史上就没有过像《国富论》中描写的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尽管亚当·斯密比其当代的许多人以及他的追随者都担心中央集权经济力量的有害影响，相信消费者的利益一定总是领先于制作商，而这些制作商并不太关心公众利益，而总是想方设法避免竞争。他警告说，“底层商人的卑鄙行径从而成为管理伟大帝国的政治格言。”

虽然托马斯·杰佛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非常赞赏《国富论》，但是斯密直到20世纪初才变成美国的偶像，而他的著作也用于反对政府减少垄断的努力和尝试。从那时到现在，充分体现民主的市场观念有一个强烈的夙愿——商业集团一直都希望避免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规则成为永恒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充分体现民主含义的市场思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它的前提



假设就是经济的动机仅仅是人类的动机。如果赚钱是唯一目的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存在众多的护士、教师、诗人、农民、士兵、警察以及满腹经纶的教授了。最低工资、废除童工以及建立保障工人安全和环境的法律都反映出了道德层面的动力，而这些都是市场所忽略的。那些国父们都熟知政治体系中彼此之间相互制衡的至理名言，经济系统也是如此，除了具有自由市场善辩的吸引力外，也必须具有能够与权力中心抗衡的多样性结构。

管好自己的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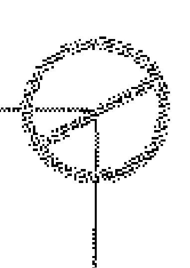
我自己的观点倾向于怀疑所有那些绝对理论，倾向于必须充分了解事物本身的局限性，所以希望强制执行的法律越少越好。现在地下经济的骇人听闻显示出美国社会已经变得孤立无援而且自相矛盾，如同正在开始分裂的人格。我们的大麻法律及其严厉，而违反该法的频繁程度和它的严厉程度绝对是正比关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分裂症状。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谋杀是一种犯罪，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但是针对禁止大麻的道德问题的辩论却非常广泛，而且吸食大麻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大家也没看到什么明显的副作用，而目前吸食大麻的非法状态只能使相关的法律更加孤立，使社会更加蔑视相关的法律，并更加鼓励大麻的黑市行为。

与各种合法药物花费极高的市场化成就相比，美国大麻法律的独断专行显得更加非同一般了。如果安东尼·康斯托克还在世的话，他毫无疑问会把万艾可——为改善男人性生活而推出的一种药品——视为邪恶的典型，但现在万艾可的贸易并没有担负任何社会的骂名。美国的内科医生一星期内大约开出 20 万份万艾

可的处方，而它的制作商辉瑞公司（Pfizer Inc.）2001年只此一项就赚得17亿5千万美元。1996年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是万艾可的第一个电视代言人。现在身为北卡莱罗纳州参议员的伊丽莎白·多尔从不避讳支持这类消遣型药品的使用，而她在2002年州参议员竞选期间曾划定了她的方针，“我们需要一个全力的复兴运动，使美国摆脱那些非法毒品，我将是这个理想的拥护者。”

在大约每十四个人里就有一人使用抗抑郁病药的国家，免费供应毒品这种社会目标似乎有些不切实际。大麻合法化的众多争论带有强烈的内在逻辑关系，但是在美国开始表现分裂人格的情况下，这种政策也许又成为另一个分裂人格的标志。你不可能期待这样的社会一夜间发生这样的变化，某个人今天还因为拥有一支大麻烟而遭到终身监禁，而明天你就可以像买万宝路香烟和百威轻啤酒那样合法地购买大麻。即刻就对大麻实行非犯罪化是走向合理的毒品政策的很好的第一步，那些毒品非犯罪化的国家吸毒率并不很高。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拥有各种毒品已经不再是犯罪行为，代之的是对毒品贩子的起诉，而且还为瘾君子提供治疗，这两个国家的吸毒比例都低于美国。所有西欧国家也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而且毒品法律的惩罚程度相对较低。

当美国的安全不再受到威胁的时候，企业的贪婪和不当行为已经动摇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在战争期间，美国人还经常被迫考虑那些必须经过斗争才能捍卫的价值观，但现在已经不再认可这些价值观了，而且美国人似乎还可以容忍许多陋习和不公正的行为。过去20年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崩溃，而且这个世界现在也变得非常不同，面对真正的恐怖，妖魔化大麻的恐惧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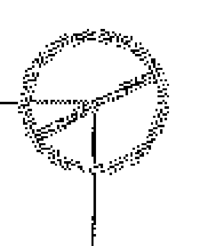


我们购买的或者是出卖的商品确实可以折射出我们的愿望，但是它只能部分地反映出来，我们的愿望也以其他的各种方式体现，只有我们的政府也承认这种复杂性的时候，才会成为真正民主的政府。监狱的囚室花费不菲，本应该留给那些犯有暴力行为的人和那些剥削弱势群体的人。对经济犯罪的惩处应该比对那些反传统和令人不愉快的行为所受到的惩罚更为严厉。当要干涉那些成年人关上房门后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政府应该遵循一些有益的忠告：管好自己的篮子。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曾经说过，“个体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它可以超越自己、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黑市也许经常在我们身旁，可是当我们的社会公德与我们自身的道德观一致的时候，它就会退却。地下经济是反映国家进步与健康的一个标志，本身错误越多，被隐藏在地下的东西也就越多。

后记：更加疯狂

2001 年秋天，里基·尼科尔斯（Ricky Nichols）出任阿拉巴马州劳伦斯县一所公立中学的校长，在他得知有些孩子正在抽大麻以后，他从毒品特别工作小组请来一名 26 岁的秘密特工，让他在学校里假扮高年级的学生。这名特工与学生们混在一起，并询问同学们都在哪里“聚会”。很快，他就了解到有一个名叫韦伯斯特·亚历山大（Webster Alexander）的 18 岁高年级学生“一个热衷于吸大麻的人”，这名学生还是校橄榄球队的成员。在 2002 年 2 月 29 日到 4 月 3 日这段时间，在开车从学校回亚历山大家的路上，那名特工曾经分三次从他手中购买了一盎司的大麻。而这时学校里也在传言说劳伦斯县的一名特工隐藏在学校里，为了消除这个谣言，尼科尔斯校长和那名特工合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校长当众训斥了慢慢腾腾进入教室的那位特工。几个星期后，亚历山大邀请这名特工去他家，在距离市镇几英里的小拖车里，他又卖给了这名特工一盎司的大麻，这时这名特工掏出手枪将亚历山大逮捕。大批警车蜂拥而至，里基·尼科尔斯也同警察一起到达现场，警察还搜查了拖车，确认是否还有更多的大麻。

韦伯斯特·亚历山大以前从未被逮捕过，他只是欠了两个学



分，还有就是将价值350美元的大麻卖给了一名秘密警察。尽管如此，里基·尼科尔斯校长还是将他开除，并称之为“一个威胁社会的人”。亚历山大当时被指控轻度拥有大麻、拥有毒品工具（卷烟纸、一个天平和一个烟斗）以及四次出售大麻。由于所有大麻交易行为发生在距离学校不到三英里的地方和当地的社区，所以依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亚历山大可能受到90年监禁的判决。在2003年1月，他承认了四次出售大麻的犯罪行为，得到了一个较轻的判决：26年监禁。当有人质询惩罚严厉性的时候，劳伦斯县的地区检察官说：“毫无疑问，判罚做到了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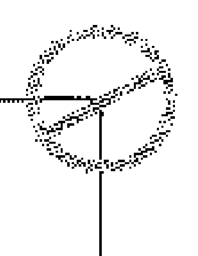
因为亚历山大的案件出现在全国倡导修改大麻法令委员会的《新闻快递》和《滚石》杂志上，很快就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关注。亚历山大上诉请求减刑，然后他转入了一所基督教中学、毕业、上大学而且还定期接受毒品检测。2003年6月，阿拉巴马州的一位法官做出了减刑判决：一年监禁；一年缓刑，取决于良好的表现。尽管，亚历山大现在已经有了一年监禁的重罪记录，而且还丧失了开车和投票的权利，但他还是非常满意法院的改判，在被领往监狱的时候，他对《伯明翰新闻》（*Birmingham News*）说“从26年降到了2年，我接受。”

在南卡罗来纳州古斯克里克的斯特拉特福中学，乔治·迈克克拉科因（George McCrackin）校长则使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策略反对大麻。某天，这位校长得到了一条线索，说有人在某个孩子的盥洗室内抽大麻、出售大麻，待他仔细地审查了70盘学校监控录像带后，校长决定采取行动。在2003年12月5日这天，多名警察隐蔽在学校的楼梯间、储藏室和教室里，6:45分，当第一批学生来到课堂的时候，校长向警察们发出信号，刹那间，

多名持枪的警察突然从藏身处跃出，大声命令道："趴到地上！所有的人都趴到地上！把手放到头上！"当时一些同学以为学校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而另外的学生立即想到了格伦拜恩的惨剧，而且都特别害怕将要发生大屠杀。当迈克克拉科因校长见到有些学生似乎对这一场景感到好玩的时候，他十分愤怒，对着那些双手抱着头、跪在走廊的学生大声地叫道："你们觉得好玩儿吗？我不想听到任何声音，都给我闭嘴！"

总共有14名警察参与了这次搜查行动，而且还有几只戒毒犬在学校的中心走廊里狂叫着嗅个不停。差不多有100多名学生遭到警察的扣留，而且还有十多个学生被戴上手铐，甚至有些学生被警察打倒在地或被扔到地上，可是警察在学校里并没有发现大麻、武器或其他的毒品。这一事件激怒了许多家长，当他们听说警察用枪指着他们只有14岁或15岁大的孩子的时候，家长们非常愤怒。起初校长对这件事情并不后悔，还强调说："我会使用任何可以保证这个校园安全和纯洁的手段。"不过从那时起，他的态度可能发生了变化。这次事件过去不久，电视台纷纷播出了警察搜查校园的录像，许多学生对迈克克拉科因提起共同起诉，同时也共同起诉古斯克里克警察局长和其他当地警察，起诉他们袭击、殴打学生以及无端逮捕学生。这起事件还隐射出种族偏见，尽管斯特拉特福中学的学生是以白人为主，但是大多数被搜查和拘留的学生都是黑人。

发生在这两个中学的事件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是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目前美国社会这类针对大麻的普遍的疯狂行为。在乔治·W. 布什总统的任期中，针对大麻的战争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2002年的12月，国家毒品控制政策的白宫办公室的副主任斯科特·M. 伯恩斯在一封"对美国检举人的公开信"中清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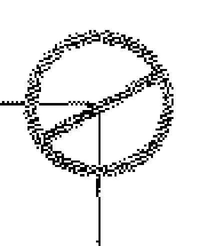
表达了政府对大麻的观点："大麻会上瘾，大麻和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大麻是毒品的敲门砖……大麻合法化就是噩梦……而且大麻不是药品。"曾经作为犹他州埃恩县地方检察官的伯恩斯要求检察官们加大追踪大麻贩子的力度，并且他还游说政府立法制定更严厉的大麻法律。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有必要传播这个真理："没有一种毒品像大麻这样具有威胁。"

大约在同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家毒品控制政策的白宫办公室也在重新恢复"杀人杂草"的概念，而加拿大参议院的针对非法毒品的特别委员会却公布了一份分量极重的报告，陈述了对大麻的不同的观点。读完这份报告后，你很难相信这两个北美洲的政府谈论的是同一种毒品，两个政府的行为方式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加拿大参议院委员会发现大麻有许多"清楚的尽管不是权威性结论的益处，它可以用于慢性疼痛的止痛，有助于多发性硬化症，对癫痫患者有抗惊厥的作用，对化疗者有止吐的功效以及刺激食欲。"报告的结论是大麻应该合法化而且大麻应该由政府控制。这个委员会还指出，"对绝大部分消遣性的大麻使用者来讲，大麻不会对身体、心理或者对社会带来短期和长期的伤害。"

加拿大执政的自由党拒绝了对大麻全面合法化的要求，只是认可了大麻的非刑事化。司法部长马丁·库肖恩（Martin Couchon）在2003年5月曾经说过，"大麻的使用首先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不应该受到犯罪的惩罚。"加拿大总理吉恩·克雷蒂安倾向支持立法，应该像处罚超速驾车者一样，对吸食大麻的未成年人给予法院传票和罚款。在被提议的法律中，大麻贩子和大麻种植者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布什政府闻讯后，立刻做出反应并提出警告，如果加拿大政府将大麻非刑事化，那么美国可能会

在美加边境加大搜查毒品的力度，这样就有可能在边境上造成交通堵塞，延迟加拿大出口货物货车的入境时间，其实这就是防止走私大麻的变相措施而已。国家毒品控制政策的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沃尔特的表现更为过激，好像一旦加拿大政府将大麻合法化，美国一夜之间就会被大麻淹没，他以美国的安全名义说出了他的观点，“我的工作就是保护美国人们远离威胁，可是现在加拿大就是那些最有效力的和最危险的各种大麻肆虐的危险地区。”克雷蒂安总理在2003年的11月离任，在其任期内，加拿大没有通过一项大麻非刑事化的法案。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克雷蒂安总理的继任者保罗·马丁似乎准备支持可以合法拥有10克（大约合1/3盎司）以下大麻的议案，而前任的计划是可以合法拥有15克的大麻。出于某些理由，国家毒品控制政策的白宫办公室至今还没有警告来自于俄亥俄州的威胁，因为俄亥俄州对拥有100克以下的大麻行为已经实施了多年的非刑事化处理。

布什政府对大麻的战争不仅针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而且也瞄向了大麻文化的主要人物。在2003年1月，当艾迪·罗森塔尔被宣布犯有种植大麻罪后，12名陪审员中有9人极其愤怒地拒绝接受这个判决。直到审判结束，他们都不怀疑罗森塔尔一直是替奥克兰市种植医用大麻，美国地区法官查尔斯·布雷耶（Charles Breyer）也认为这样的证据是不相关和不被承认的证据。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席检察官比尔·洛克耶（Bill Lockyer）也要求法官对罗森塔尔处以宽容的判罚，而联邦检察官则要求判处罗森塔尔六年半的监禁。最终布雷耶法官认为由于这件案件处于“非常特别和独特的情况”，所以没有判处罗森塔尔监禁处罚，而被告对这个法官似乎不太领情，罗森塔尔讲：“他并没有照顾



我，判了我重罪，因为他不允许陪审员去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罗森塔尔对处罚进行了上诉，而联邦检察官却认为判决太轻，也已经上诉试图寻找长期监禁的判决。

2003年2月24日，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攻打伊拉克，而且美国的许多城市依然保持着恐怖分子可能袭击的高度警告，首席检察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追捕“毒品店”（head shop）① 的拥有者和水烟枪的制造者。大约有2000名联邦、州以及本地执法官员参与了名为“猎毒行动”（Operation Headhunter）和“烟斗梦想行动”（Operation Pipe Dreams），此次共逮捕了55名嫌疑犯，由缉毒局的特工指挥，辅以美国武装警察人员、美国秘密部门的人员、美国邮政检察部门的人员以及美国海关的人员。在这次搜捕拘留的嫌疑犯中，65岁的汤米·宗（Tommy Chong）也名列其中，他是“奇奇和宗”（Cheech and Chong）喜剧小组的成员。宗拥有一家制造出售玻璃水烟枪的公司，水烟枪的品牌有“神酒”、“小妞儿”和“大竹竿”。联邦特工们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一家假冒的“毒品店”（head shop），然后通过宗的网页订购了一些他制造的水烟枪。特工们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毒品店”见到了宗，当时他正在替顾客组装水烟枪，特工们也买了两支水烟枪，还让宗在烟枪上署他的名字，而且特工们还让宗在一件印有他用水烟枪抽大麻照片的体恤衫上签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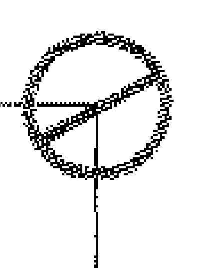
宗因为跨洲运送毒品工具可能会面临3年监禁的判罚，汤米·宗对犯行也供认不讳。助理检察官玛丽·霍顿（Mary Houghton）很显然不是他的影迷，她特别指出：“他和他的长期

---

① 在美国的俚语中，head 指那些经常吸毒的人。——译注

伙伴奇克·曼主演的电影例如《在烟雾中起床》（*Up in Smoke*），对打击毒品交易和毒品使用没起到正面的作用，电影使法律部门的努力变得无足轻重。”毫无疑问，她指的是电影里的“施特登克”（Stedenko）警官，一个在《在烟雾中起床》里被他们塑造为一个小丑警官。汤米·宗最终被罚款20000美元，没收103000美元，而且还被判处九个月的监禁。2003年秋天，宗被关进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外的一所低安全级别的塔夫脱联邦改造收容所。宗感觉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在变得越来越荒谬可笑，他曾经对《洛杉矶时报》解释道，“你假如在我入狱的前一天晚上就告诉我阿诺德·施瓦辛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下一任州长，我肯定就说过‘你正抽什么呢？’”

马克·扬在享受了连续几个月的自由后，又被关进了监狱，原因之一是延误了向政府支付10000美元罚款，其二是四次没有通过毒品测试。其中在两次毒品测试中，还发现了可卡因的痕迹，但是扬发誓那一定是个错误，而且强烈否认测试的结果，因为从1980年代至今，他始终没有吸食过可卡因。他争辩道：“我确实没吸可卡因，我不喜欢它，不喜欢它控制我，那肯定不是我的测试结果。”但是他承认确实多次违反了假释条款的规定，曾经多次吸食大麻。回到肯塔基州的阿什兰联邦改造收容所后，他又一次同他的狱友重聚了，这个狱友依然在服刑，他只是因为抽了“只有火柴头大小”的可卡因被判处15年的监禁。扬的女朋友安吉坚持两天给他写一封信，每个周末都去监狱探望他。六个月后，扬在2003年11月13日被释放，他发誓不再吸食大麻，上一次的违规再次被关进监狱着实伤害了安吉，他不想再一次伤害她。现在扬不得已又涉足到另一种新的不道德的东西：酒精。他最近用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房子贷了一笔款，和安吉准备在印第



安纳波利斯市买下一家小酒吧，扬调侃地说，“不允许我卖大麻，我只好卖威士忌了。”

自由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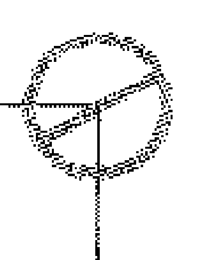
其实佛罗里达州流动雇工的工作环境可能比加利福尼亚州的环境还要恶劣，可是白宫并没有关注那些由“奇奇和宗”的电影反映出来的问题。由于佛罗里达州传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奴隶制的印迹以及长期对劳工协会的强烈敌意，那里的流动雇工特别容易受到虐待和剥削。如今在佛罗里达州，许多新的流动雇工都来自墨西哥和中非，他们多数受雇于劳动承包人，而这些承包人使真正的农场主摆脱了对工人的法律责任。承包人通常直接从工人的薪水里扣除雇工的餐费、房费和交通费，通常也替那些新来的雇工们垫付走私费，然后强迫他们工作还钱，这一系统普遍造成虐待劳工的现象。从 1996 年至今，佛罗里达州政府已经成功地处理了六起强制性的奴役案件，但是其他更多的虐待现象依然没有被揭露出来。在 2002 年 12 月，佛罗里达州怀莫马的埃利翁·克鲁茨（Helion Cruz）牧师发现了一辆装满了年轻流动雇工的拖车，当时车门还用铁链子锁着。埃利翁·克鲁茨对《棕榈滩邮报》（*Palm Beach Post*）说，“当时，我走到拖车的一个窗户边，它被钉牢了，只能一直都关着，所有的人都出不去。而且所有的窗户都一样，都被钉死了。”据这位牧师讲，许多承包人都从移民走私犯那里“购买”流动雇工，不能让他们逃跑，只有他们偿还了欠款后，才会被释放。

近几年来，佛罗里达州政府几乎没有帮助过那些雇工，州长杰布·布什与其他州立法者一样接受了大量的来自农业集团的政

治捐款。2003年，曾经出现过有两个代表雇工利益的提案，一个是给雇工们提供杀虫剂的信息，另一个是雇工可以起诉那些不发工资的农场主，但是，委员会甚至都不对这两项提案投票，它们早早就胎死腹中了。佛罗里达州的农业住房委员会的成员有一半的人都是农场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玛莎·鲍文就是一个柑橘农场主。在2003年，佛罗里达州的水果和蔬菜协会将《年度最佳立法者》奖给了南希·阿根齐亚诺，她是佛罗里达州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主席，阿根齐亚诺接受这个奖项时曾经这样说过："自由的本质就是政府的限制。"

佛罗里达州官方的放任政策最终导致美国司法部对佛罗里达州流动雇工受虐待情况的调查，联邦法院已经对目前所有的奴役案件提起诉讼。尽管司法部的劳工剥削管理部门非常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没有认定一个虐待工人的农场主有罪，而将注意力转到了承包人的身上，而且从认定的犯罪性质上看，联邦惩处并不严厉。米格尔·弗洛雷斯（Miguel Flores）一伙人曾经扣押了成百上千的农场雇工，强迫他们每周工作六天，有时还不付工钱，甚至还威胁要割掉雇工的舌头，他们才受到15年监禁的判罚。亚伯·小奎洛（Abel Cuello, Jr.）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至少扣押了22名流动雇工，直至这些人还清了他们的非法入境费用。1999年，他的"劳役偿债"罪名成立，接受了仅仅33个月监禁的判罚。而在这个案子中的流动雇工曾经被警告过，如果试图逃跑就会遭到射杀。如今，奎洛已经服完监禁重新获得自由了。

迈克尔·艾伦·李（Michael Allen Lee）在佛罗里达州招募了许多无家可归的流动雇工，扣除住宿费、饭费、交通费和香烟费，使得这些雇工身负欠款，他一天最多付给雇工10美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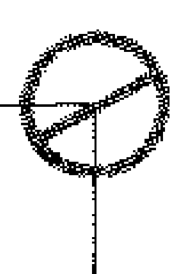
有的时候他还用可卡因和酒代替现金，并且威胁若有人逃跑，必遭毒打。李曾经毒打过一个名叫乔治·E. 威廉姆斯的雇工，然后还叫他自己清除溅在墙上的血迹。2001 年 8 月，经过法院调解后，联邦法官只判处了李 4 年监禁，可是假如李种植 100 棵大麻，那么这个法庭就会判处他 5 年监禁的强制性判罚。

伊莫卡利工人联盟（Coalition of Immokalee Workers）在佛罗里达州的六起奴役诉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展开自己的调查并且力劝那些恐惧的流动雇工与政府合作。这个联盟成立于 1996 年，立足于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伊莫卡利。伊莫卡利的周围都是西红柿种植园、橘林，这个地区还拥有美国最贫困的雇工。而这个工人联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愿意挑战佛罗里达州农场主的组织，它不仅收集有关田间奴役的信息，而且也替雇工们争取好一些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伊莫卡利西红柿采摘者的工资在过去的 25 年里已经降低了 50% 以上。1999 年，联盟中的一些成员了解到塔克钟（Taco Bell，墨西哥式快餐）是伊莫卡利一家农场的主要采购商，他们便咨询该快餐公司能否对这个农场主施压，要求农场提高采摘工工资，改善雇工的虐待现象。当塔克钟公司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的时候，联盟在 2001 年 4 月发起对这公司连锁店全国性的抵制活动。联盟已经质询过塔克钟公司：能否保证公司使用的西红柿不是由那些奴隶劳工采摘的，该连锁公司至今没有答复这个问题。

塔克钟是“百胜餐饮”（Yum! Brands, Inc.）的子公司，百胜餐饮还拥有肯德基、必胜客、艾德熊（A&W）和 LJS（Long John Silver's，海鲜连锁），大约拥有 33000 家餐厅，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餐饮公司。塔克钟已经多次否认自己有义务去过问它的供应商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人，当《纽约人》（*New Yorker*）问起

佛罗里达州西红柿采摘工的奴役案件时，塔克钟的发言人这样回答："我的天呀！对不起，那是可憎的事情，可是我并不认为那些与我们有关。"可是在塔克钟的网页上，标榜公司的承诺却赫然在目：动物们受到了舒适和仁慈的处理吗？这个在线式的声明一语道出了百胜餐饮对动物福利的政策，它的声明是"身为食品的主要采购商，我们有机会和义务去影响那些提供动物的方式，我们用实时的原则监视供应商，以确定供应商们是否正在使用人道的程序去关怀和处理那些供应给我们的动物"，同时这个政策声明还声称百胜餐饮今后"只与那些承诺保持我们高标准的供应商合作"，而它却丝毫没有提及人类的福利是否值得公司去关注。

伊莫卡利工人联盟设想能使佛罗里达州的流动工人从采摘一磅的西红柿里多得到一美分，而当时采摘工采摘一筐 32 磅的西红柿只能得到 40 ~ 50 美分的工资，如果要达到联邦规定的最低工资，采摘工一个小时至少要采摘 320 磅的西红柿或者在 8 小时的工作时间内要采摘超过一吨的西红柿。如果采摘工采摘一磅的西红柿可以多得一美分的话，其实很难影响塔克钟产品的成本，而且也不可能摧毁佛罗里达州的西红柿产业。2002 年，佛罗里达州西红柿种植者交易中心曾经对每磅西红柿额外追加了 1 美分以平衡甲基溴化物——一种常用的土壤熏蒸剂的涨价，而这个额外的费用并没有给这个行业的销售带来多大的影响。一位西红柿的种植者曾经对行业刊物《包装食品厂主》（*The Packer*）说过，"我想那些购买者早就知道佛罗里达州西红柿的发货人会怎么做，而且发货人的决定总是一致，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抵制塔克钟的行动得到了国家教会委员会和数十家大学学生团体的支持。2003 年 11 月，伊莫卡利工人联盟的三个人获得了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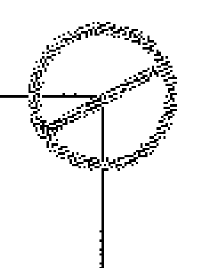
特·F. 肯尼迪人权奖，该奖项还是第一次授予美国的反对虐待人权的人士。

最近，一些帮助流动雇工的努力获得了以外的资源支持。在世贸中心坍塌了两个月后，韦尔斯法戈银行（Wells Fargo Bank）开始允许客户使用墨西哥政府签发的身份证（*matricula consulars*）开办银行账户。尽管这种身份证的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但只是在近几年才变得重要起来，这一变化使一些非法移民浮出地面，而且可以更公开地进入美国社会。现在已经有150多家银行允许墨西哥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作为身份证使用，原来只能藏起来的现金如今可以存到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和储蓄存款账户。从2001年至今，韦尔斯法戈银行已经用墨西哥的身份证开启了25万个银行账号，而且目前已经有14个州允许非法移民使用该身份证申请汽车驾照。

然而在国会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士强烈反对在美国使用外国的身份证，他们强调，国外的身份证很容易伪造而且会被恐怖分子利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森森布伦纳（John Sensenbrenner）与许多国会议员都认为墨西哥身份证是“对本国安全的威胁”。著名演员阿诺德·施瓦辛格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后，认为州立法机关应该废除允许非法移民获得汽车驾照的新法律，他认为这项法案可能会使某些人为了获得汽车驾照而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其实，这样就会很难管理地下现金经济中的数百万非法移民，而其无照驾驶轿车和卡车也不见得会使美国更安全。韦尔斯法戈银行为墨西哥移民更改政策的决定其实也是基于实用主义以及盈利的目的，该银行的一名副总裁曾经这样解释过他们的行为，“他们帮助我们打扫房间、看护小孩、洗碗、采摘我们的所需的农作物，做那些我们从来不可能去做的辛苦的工

作，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银行系统。那是不对的。”

就在国会讨论布什总统的在全国范围内的外籍工人计划的时候，美国的黑市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着活跃，而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实施的一系列严厉措施已经造成走私偷渡的利润飞涨。在过去的几年内，“小狼”（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蛇头）的收费几乎涨了三倍，如今从墨西哥非法偷渡到美国的费用接近1500美元，偷渡移民的巨大利润已经吸引了许多商人，而且也刺激出了许多新兴的相关商业行为。贩毒团伙也发现在边境上组织偷渡赚到的钱与贩毒赚到的钱不相上下，而且风险小得多，即使被关进监狱，也比贩毒的刑期短。市场的诸多力量已经把那些非法移民转换成了有价值的商品，黑社会从“小狼”那里将非法移民“偷”出来，为了赎金绑架他们。非法移民也被迫偿还这些发生在偷渡过程中的欠款。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走私集团曾经以许诺到美国做清洁工、保姆和服务员的名义诱骗了上百名的少女，结果将她们卖到妓院以偿还她们的欠款，而这些所谓的妓院也就是那些停在柑橘林和西红柿种植园边上的拖车，为那些流动工人服务。那些年轻的妇女一天被迫接待20～30个工人，而她们每一次接客只能得到3美元，她们还得支付住房和吃饭的费用，而这些费用造成了她们不断地欠款，甚至她们中间还有只有14岁大的女孩子，凡是企图逃跑的女孩通常都会遭到毒打和强奸。罗热里奥·卡德纳（Rogerio Cadena）的家族经营了一个偷渡卖淫集团，在两个15岁的女孩逃跑报警后，警方将罗热里奥·卡德纳逮捕归案，卡德纳遭到联邦指控并承认触犯禁止奴役的第十三修正案，1999年1月，被判处15年监禁。司法部估计现在大约有45000名到50000名的非法移民处于奴役状态，多数年轻的妇女都被迫做妓女。



人类愿望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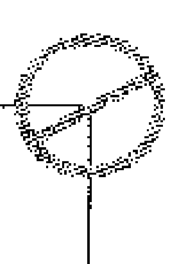
2003 年，色情表演行业的商业杂志《多样性》（*Variety*）启动了一个在线的博客网站“色情文学报告”，定期举办“针对主流文化的色情行业运动。”“硬核”色情不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已经成为美国年轻人和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线电视台播出的《家事》（*Family Business*）是一个真实的性表演的节目，导演是亚当·格拉瑟（Adam Glasser，也叫 Seymore Butts）。福克斯有线网也曾在黄金时间播放关于色情大亨家庭问题的系列片《皮肤》（*Skin*），可是不久就突然停播了，或许是暴露不够多的原因。詹纳·詹姆森（Jenna Jameson）是自琳达·洛夫莱斯（Linda Lovelace，薄情寡义的浪荡子，色鬼，原为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后的又一个著名的色情影星，她主演的《先令先生》（*Mr. Sterling*）在 NBC 上播放，高踞时代广场三层楼高的广告牌。色情影星同摇滚歌星约会而且一起出现在音乐电视上，色情团体和嘻哈一族的关系越来越近，就像紧紧跟随史奴比后面的艾斯提（Ice－T）一样，他们一起出演色情录像片《男妓的 101》（*Pimpin' 101*），甚至布里特尼·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也附和这个趋势，身着黑皮革，打扮得活像一个迪斯尼电影里的虐恋专职“女主人”（dominatrix）。

尽管色情电影已经逐步被主流文化接受，但色情行业的利润已经停滞不前。据《成人录像新闻》（*Adult Video News*）的高级编辑马克·凯纳斯讲，南加利福尼亚州的色情电影分销商们不得不继续忍耐着国民经济萎靡不振、泛滥的色情电影和因特网上越来越多的免费提供的色情片的熬煎。市场调研公司估计，大约有

美国1/4的网民每个月都访问色情网站，人数大约有3400万人；一家专门提供网络内容过滤器的软件公司声称，它们发现大约有2.6亿个涉及色情的网页，这数字大约是1998年的20倍。目前美国平均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可以有他或她特有的黄色网站名称，色情文化应有尽有。面对近于饱和的市场，一些成人公司正在试图使他们的产品更加极端，有别于他人，含有排泄的性场景已经屡见不鲜，还有一些女人被人为诱导呕吐的场景。

2003年8月，首席检察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宣布了一件重大的淫秽指控案，这是近十年来第一起不涉及儿童色情的案件。阿什克罗夫特讲，这次对罗伯特·齐卡里（Robert Zicari，也被称为罗布·布莱克，Rob Black）和珍妮特·罗马诺（Janet Romano也被称为莱兹·波尔登，Lizzy Borden）的起诉是“司法部打击成人色情泛滥的重要一步”。上述夫妻拥有一家名叫“极端合作”（Extreme Associates）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邮政检察官通过因特网从“极端合作”订购了许多录像带，随后这些录像带跨州从“极端合作”的总部运到了北好莱坞。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地方检察官曾经这样描述过“极端合作”公司的产品，“它们是互联网上最邪恶、最令人憎恶、最可耻的东西。”

被政府没收的、非常有争议的录像带《被迫侵入》（*Forced Entry*）是由莱兹·波尔登导演的、将“硬核”色情和暴力混杂在一起的电影。在“极端合作”的网站上，这部电影的广告许诺“有杀人嗜好的强奸犯和系列杀手们绑架的、拷打的、强奸的和杀掉的都是那些贫困、不端庄的女人。”莱兹·波尔登认为这部电影与其他流行的娱乐片诸如《傻瓜》（*Jackass*）不同，也不同于以往的色情音乐，它含有自相残杀、小便、大便、鲜血、呕吐和轮奸以及露骨的性行为镜头。她丈夫也说过，“我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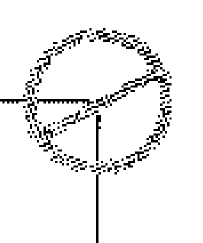
中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不强迫别人看，而那些正在被人强迫观看我的这部影片的人只有这12个陪审员。"如果罪名成立，夫妇俩将会面临50年的监禁。

对"极端合作"公司的指控可能是政府开始的另一次针对色情的战争，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可以视它为对色情行业其他人的警告。它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某些边界是不可以逾越的。长期以来，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一直都是反对硬核色情文学的代言人。在他出任首席检察官不久，他便订购了两个蓝色的窗帘，遮盖司法部的一对裸体雕塑。可是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出名的色情物品分销商和制造商被指控淫秽罪成立。布什政府针对色情的战争似乎更会玩弄文字。2003年12月，布什总统发表了公告，宣布12月的最后一周为"远离色情周"。尽管司法部宣布正在进行大约50个色情调查，一个真正的战役即将开始，而且不是针对边缘化人物而是针对希尔顿、海逸、万豪、自由媒体公司（Liberty Media）和时代华纳的高级主管人员的淫秽指控，但看起来不大可能启动这样一场战争，或者说这是一场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

因特网许诺会作为伟大的文化战场，现在因特网充满了对淫秽观点、自由演讲和文化版权的争论。目前美国儿童的确被迫无遮无挡地暴露在因特网上的色情面前，而且人们可以很轻松地在因特网上在线获得儿童色情文学，但对色情的恐惧也被用于限制在线行为。唱片行业正在寻求一项新立法，以限制对等（P2P，peer-to-peer）网络的使用，声称孩子们正在使用文件共享软件下载那些肮脏的图片，同时也下载他们喜欢的歌曲。索尼音乐娱乐公司的总裁安德鲁·莱克（Andrew Lack）说："P2P的缩写指的就是对色情物的盗版（piracy to pornography）"。

属于美国唱片行业协会（RIAA）的公司确实有理由担心，会带头反对文件共享软件，这些软件的泛滥使音乐CD的销售量降低了20%。如果关闭P2P网络，即使可能帮助唱片公司卖出更多的CD，可是同样也可能让色情业渔翁得利，它们也会卖出更多的“硬核片”，因为那些有版权的“硬核片”也同样被人非法下载和共享。2003年夏季，唱片行业协会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向因特网服务供应商（ISP）发传票的，唱片行业协会的做法是试图从ISP的手中获取那些共享P2P文件用户的ID，另外一家经营同性恋“硬核片”的分销商巨人媒介公司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希望派克贝尔因特网（Pac Bell Internet）公司提供那些没有得到许可就下载它们公司同性恋色情电影的网民。巨人媒体公司（Titan Media）的首席律师吉尔·斯佩尔林曾经抱怨道，那些被非法下载和共享的数量几乎是卖出去的10倍，巨人媒体正受到“非法文件交易的严重伤害。”

KaZaA（点对点交换程序名称）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一亿，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下载软件，它的母公司“沙曼网络”（Sharman Networks）劝阻用户不要侵犯版权法，然而沙曼网络公司却非常精明地将公司注册在太平洋的瓦努阿图岛。据估计，大约有6000万美国人通过因特网非法下载音乐，而且大约近2/3的美国青少年认为共享盗版音乐歌曲并没有什么过错。唱片公司损失成千上百亿美元的抱怨并没获得多少同情，而且成百上千例针对P2P用户的诉讼也很少得到大众的支持，例如唱片公司曾经起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布莱恩娜·拉哈拉使用“KaZaA”软件非法下载克里斯蒂娜·阿吉莱拉的歌曲。P2P网络的蔓延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创新，它也是疏远那些少数控制娱乐行业公司的一个信号，人们通常都从他们喜欢的人那里偷东



西。非法的文件共享软件已经变为一种廉价的、轻松的对抗形式，而P2P网络确实已经使因特网成为了一个熙熙攘攘的、不受控制的黑市。

现在的因特网已经汇集了主流经济和地下经济，那些控制因特网和减少因特网自由性的努力总是遭到新软件和编码技术的无情打击。你在网上只需要点击或通过电子邮件就可以轻易地找到亚当·斯密的全数字化的书籍，有大量待沽的人类梦想以及最新的精巧工具。据《商业周刊》报道，现在非法的电子商务交易量几乎等同于合法的电子商务业务量，每年美国的在线赌博收入大致等于亚马逊网站的收入，你要知道，亚马逊公司可是美国最大的因特网零售商！大量的音乐和图片在因特网上穿梭，没人顾及国界、时区和品味。那些闪亮的屏幕能给你带来联盟比赛的日程安排、中学聚会的消息、“硬核片”、铁路工人的套装、橡胶性玩具、名人崇拜者的网站、尸体解剖报告、联邦侦探逮捕骚扰儿童犯的场景、股票信息以及精神再生的承诺。因特网上应有尽有，只怕你想不到。现在一个完全的美国就在你的面前，既有黑暗也有光明，在它消失前，仔细地看上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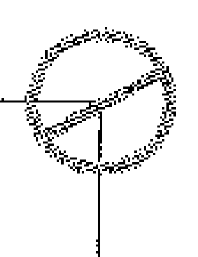
埃里克·施罗瑟

2004年1月于纽约

致　谢

本书中的三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大西洋》杂志上，那时候，负责编审文章的是威廉·惠特沃思编辑和卡伦·墨菲执行编辑，他们两位的批评意见、质疑、鼓励以及乐于助人的态度使我获益匪浅，使得我成功地发表这些挑战传统观念的长篇文章。从多方面讲，《大西洋》成为了我的从事新闻工作的学校，而且，我还有幸得以聆听到这两位出色的、意志坚强的编辑的许多教诲；我必须感谢编辑詹姆斯·法洛斯先生，是他将“色情调查”的资料从尘封中解脱出来，而且他希望有一天鲁本·斯特曼的故事可以出现在某本书中；也感谢《大西洋》其他的编辑：杰克·贝蒂、阿夫里尔·科尔内尔、科尔比·库默尔、艾米·米克、露西·普林茨、玛撒·斯波尔丁以及芭芭拉·瓦尔拉夫；洛厄尔·韦斯为《大西洋》审核了“大麻的疯狂”，伊冯·罗尔扎森审核了“草莓种植园”，他们两位天才般地校正了我的许多错误，而且在编辑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我敬重的朋友。

卡伦·格斯特先生一直为我校审核这本书里的新资料，并在旧资料边注上脚注，直到他结婚前才短暂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在此，我特别对他表示谢意；感谢查尔斯·威廉·威尔逊先生参与到审核工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批评意见，还发现了一些



含糊的信息，我们曾经对书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过长时间的辩论，而一些事情的真实性也常常使我们惊叹不已。在此申明，如果书中还有错误的话，那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

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in）的埃蒙·多兰非常支持这本书，而且力主我整理这本书的主要纲目，他的建议对我非常有帮助，埃蒙·多兰确实是一名现代的图书编辑；在惠特尼·皮林和艾米丽·利特尔有效的工作保障下，此书的出版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感谢路易斯·埃德曼充满热情的文字编辑工作；在此书的制作过程中，莉斯·杜瓦尔的监督指导功不可没；洛伊斯·瓦索夫全心全意以专业、谦逊的态度主持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对此书进行的法律审查。

感谢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社的前首席律师埃里斯·莱温先生提供的法律常识以及他的法律忠告。

感谢美国最好的纪录片摄影师安德鲁·利希滕斯坦允许我在书中使用他的一名草莓工人的照片。

在《滚石》杂志社，詹恩·温纳、鲍勃·洛夫、威尔·达纳曾经请我留意克林顿时期的针对大麻的战争，现在，他们可以在此书中找到一些他们关注的事情。需要说明一下，长年以来，《滚石》的多位编辑都曾经是美国那些遭到误导的毒品政策的批评家。

感谢我的朋友迈克尔·克勒曼、乔丹·卡茨卡茨和约翰·西布鲁克，他们读过此书的草稿后，都提出了许多直率的意见和观点。

我衷心感谢我的代理人蒂娜·班尼特女士，她的才智、诚实和决心始终激励着我，毫无夸张地讲，她是最出色的代理人。感谢斯维特拉娜·卡茨在许多方面的指导。塞西尔·巴伦德斯马奇

迹般的工作成功地将此书介绍给了海外的读者。

除此之外，我非常感激家人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多年来，他们对我接触许多毒品犯、劳工定约人和色情作品发行商从来没有过丝毫怨言，非常理解我的工作；比利和鲍勃、乔治和洛拉、克雷格和詹姆斯、凯尔、马克以及我的父母都给予了我许多的支持和帮助；我可爱的孩子——麦卡和康纳——都非常宽厚仁义，他们非常理解父亲长期在外奔波，我衷心希望有一天能写一本适合他们的书。没有我亲爱的妻子雷德的爱，就没有这部作品，而且这部作品也就没有任何价值。

参考书目

Abel, Ernest L. Marihuana: *The First Twelve Thousand Year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0).

Advisory Committee on Drug Dependence. Cannabis: *Report by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Drug Dependenc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8).

Aldrich, Daniel G., Jr., and Lorenzo Meyer.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ighbors in Crisis (San Bernardino: Borgo Press, 1993).

Allen, Frederick Lewis. *Only Yesterday and Since Yesterday: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20's and 30's, Two Volumes in One* (New York: Bonanza Books, 1986).

Anslinger, Harry J., and Will Oursler. *The Murderers: The Story of the Narcotics Gang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61).

Anslinger, Harry J., and William F. Tompkins. *The Traffic in Narcotics* (New York: Funk &Wagnall, 1953).

Bade, Bonnie Lynn. "Is There a Doctor in the Field? Underlying Conditions Affecting Access to Health Care for California Farm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California Polic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eptember 1999).

Bardacke, Frank. *Good Liberals & Great Blue Herons: Land, Labor, and Politics in the Pajaro Valley* (Santa Cruz: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logy, 1994).

Baum, Dan. *Smoke and Mirrors: The War on Drugs and the Politics of Failure*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96).

Binstein, Michael, and Charles Bowden. *Trust Me: Charles Keating and the Missing Bill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Blum, Howard. *Gangland: How the FBI Broke the Mob*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Bonnie, Richard. *Marihuana Use and Criminal Sanctions* (Charlottesville: Michie Company,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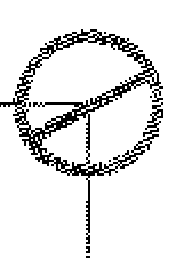
Bonnie, Richard, and Charles H. Whitebread II. *The Marihuana Conviction: A History of Marihuana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4).

Broun, Heywood, and Margaret Leech. *Anthony Comstock: Roundsman of the Lord* (New York: Albert and Charles Boni, 1927).

Brown, Peter.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1996*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2000*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Bustamante, Jorge A., Clark W. Reynolds, and Raul A.



Hinojosa Ojeda. *U. S. -Mexico Relations: Labor Market Interdepend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alifornia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Survey. A Demographic and Employment Profile of Perishable Crop Farm Workers. Research Report No. 3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olicy, Office of Program Economics, 1993).

Chavez, Leo R. *Shadowed Lives: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7).

Chernow, Ron. *The House of Morgan: 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 (New York: Touchstone, 1991).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al Worker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al Worker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Comstock, Anthony. *Frauds Exposed: How the People Are Deceived and Robbed, and Youth Corrupted* (New York: I. H. Brown, 1880).

Traps for the Young (New York: Funk &Wagnalls, 1883).
Conover, Ted. *Coyotes: A Journey through t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s Illegal Aliens* (NewYork: Vintage Books, 1987).

Conrad, Chris. *Hemp: Lifeline to the Future* (Los Angeles: Creative Xpressions, 1994).

Daniel, Cletus E. *Bitter Harvest: A History of California Farmworkers, 1870 – 1941*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Davis, John H. *Mafia Dynast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ambino Crime Famil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de Grazia, Edward. *Girls Lean Back Everywhere: The Law of Obscenity and the Assault on Genius* (New York: Vintage, 1993).

Delacoste, Frederique, and Priscilla Alexander, eds. *Sex Work: Writings by Women in the Sex Industry* (Pittsburgh: Cleis Press, 1987).

Demaris, Ovid. *The Last Mafloso: The Treacherous World of Jimmy Fratianno*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0).

Donnerstein, Edward, Daniel Linz, and Steven Penrod. *The Question of Pornography: Research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Drugs, Crime, and the Justice System: A 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Duke, Steven B. *America's Longest War: Rethinking Our Tragic Crusade Against Drugs* (New York: Putnam,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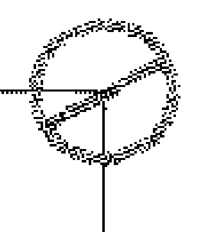
Dworkin, Andrea.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New York: Dutton, 1989).

Earley, Pete. *The Hot House: Life Inside Leavenworth Prison* (New York: Bantam, 1992).

Edid, Maralyn. *Farm Labor Organizing: Trends & Prospects* (Ithaca, N. Y.: ILR Press, 1994).

Emerson, Robert D. *Seasonal Agricultural Labor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Ernst, Morris L., and Alan U. Schwartz. *Censorship: The Search*



for the Obscene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Feder, Ernest. *Strawberry Imperialism: An Enquiry into the Mechanisms of Dependency in Mexican Agriculture* (The Hague: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1977).

Ford, Luke. *A History of X*: 100 *Years of Sex in Film* (Amherst, N. Y.: Prometheus Books, 1999).

Galarza, Ernesto. *Merchants of Labor: The Mexican Bracero Story. An Account of the Managed Migration of Mexican Farm Workers in California, 1942 –) 960* (Charlotte, N. C.: McNally & Loftin, 1964).

Garcia, Juan Ramon. *Operation Wetback: The Mass Deportation of Mexican Undocumented Workers in 1954*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

Gentry, Curt. *I. Edgar Hoover: The Man and His Secrets* (New York: Norton, 1991).

Gibson, Pamela Church, and Roma Gibson. *Dirty Looks: Women, Pornography, Power* (London: BFI Publishing, 1993).

Gittler, Ian. *Porn St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Grant, Michael. *Eros in Pompeii: The Secret Room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pl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5).

Greenfield, Harry I. *Invisible, Outlawed, and Untaxed: America's Underground Econom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3).

Grinspoon, Lester, and James B. Bakalar. *Marihuana, the Forbidden Medic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Halperin, David M., John J. Winkler, and Froma I. Zeitlin, eds. *Before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